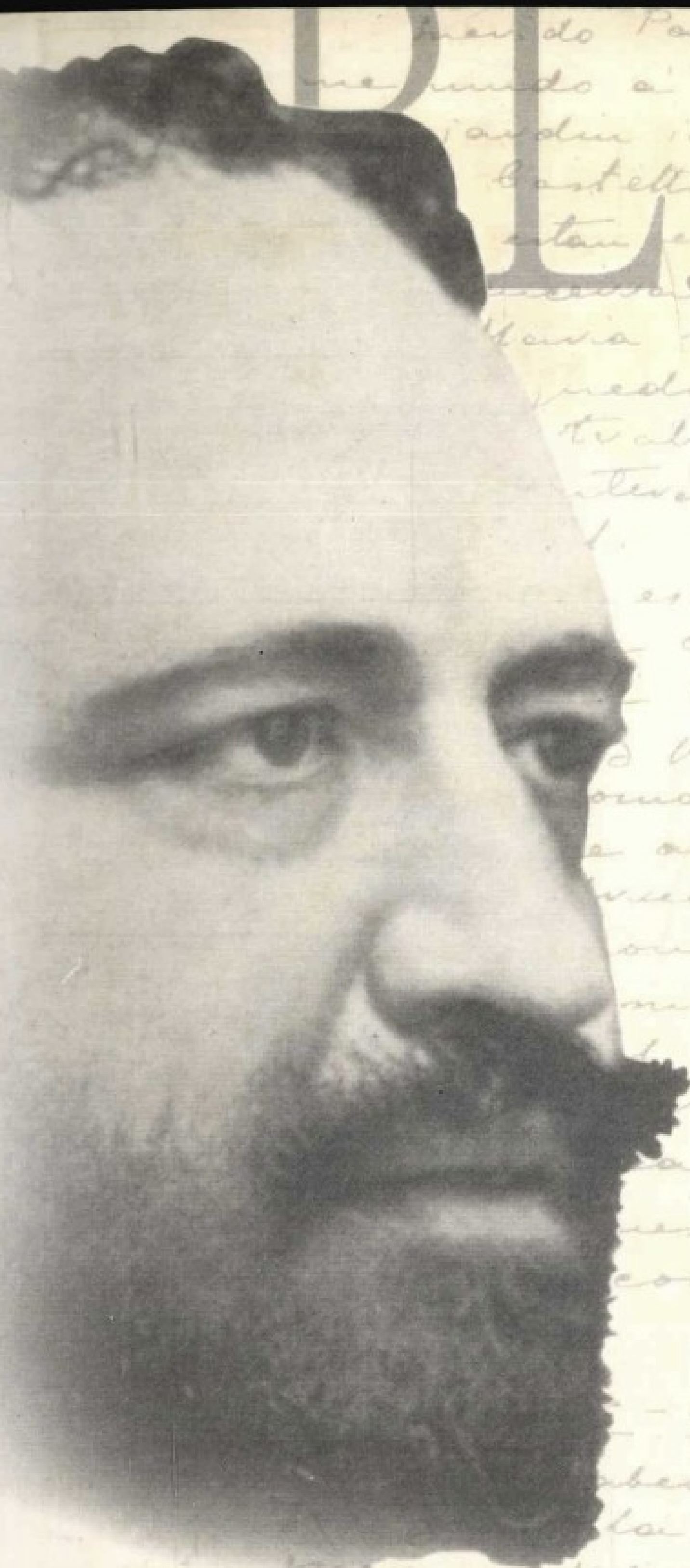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文集

大教堂

汤柏生 吕臣重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文集

加夫列尔生在世代以大教堂为家的家庭，由于天资聪颖，很有希望在天主教会步步高升。年轻的加夫列尔在周游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后，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大教堂。他在大教堂内仍然在下层穷苦人中宣传他的先进思想，结果反被急欲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弟子们所害……

ISBN 7-5313-2406-7



9 787531 324065 >

ISBN 7-5313-2406-7/1 · 2108

定价：21.00元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文集

大教堂

汤柏生 吕臣重 译

新学社
PDG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教堂/[西]布拉斯科著;汤柏生 吕臣重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4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

ISBN 7-5313-2406-7

I. 大… II. ①布… ②汤…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
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4399 号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y publica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
助翻译出版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LA CATEDRAL

本书根据 Aguilar S. A. de Ediciones 1970 年版本译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218 千字 印张: 10³/₈ 插页: 2

印数: 1—5 000 册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406-7/I·2108

定价: 21.00 元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中文版前言

(西班牙驻华大使) 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西班牙作家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最有意义的六部作品现已中译面世。我谨借此篇幅，表达我无比欣慰之情。

这位小说家是巴伦西亚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生平和创作，确实蕴藏着吸引中国读书界关注的丰富内涵，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的作品出版多年以来在世界上经久不衰的原因。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从事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他写富有巴伦西亚地方色彩的小说，也写历史小说、社会抗争和革命运动小说、世界性题材小说，还写游记等等。他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勤奋工作的一生。他带领慷慨大度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以低廉的价格，把世界文坛古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奉献给各个社会阶层。他创办了《人民报》，并以人民的名义，率先向民众传播共和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他又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周游世界，给我们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其中有不少篇幅是涉及中国的；他一如既往，笔走龙蛇，文情并茂。字里行间，闪现出他敏锐的观察眼光。他也曾多次当选议员，为政治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以至备尝流

亡之苦。总之，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塞万提斯之后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篇幅浩瀚，令人感到作家鲜活真切，历历如在目前。因此，国际社会对这位举世公认的巴伦西亚作家极为器重，对作家在鼎盛时期显示出的丰富想像力、绘声绘色及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深感敬佩折服。

今天，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依然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又有多少声名显赫的作家赶潮流，趋时尚；然而曾几何时，这股浪潮就把他们冲得销声匿迹。创作了《芦苇与泥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从未被人遗忘，他的作品总是一版再版。这是作家经久不衰的充分证明，也是作家毋庸置疑的价值的体现。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赋有多种价值的人物；也许正如曼努埃尔·巴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把他划分到（不少所谓的文学专家就很喜欢这么划分）哪个特定的时期，定位成哪种风格的作家，是极其困难的。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作家，但也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甚至像左拉或邓南遮一样，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九八年一代作家。九八年一代作家多持批判态度，希望西班牙进行深刻的改革，重获新生。他深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享尽了种种风光荣耀，也遭到世界上权势人物的追逐；然而，归根结蒂，他是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这不能不招致人们的妒忌和不解。

由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国读者得以欣赏作家六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启示录四骑士》是一部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战火的长篇小说，作家浓墨重彩，描

绘了二十世纪伊始的这幅世界图景，反对德国侵略，同情协约国。《茅屋》、《被判刑的女人》以及《稻谷与马车》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得最精彩的三部作品，写景状物，极为真切，他对菜园和果园的观察，对巴伦西亚地方氛围的渲染更为透彻，对被盘剥的农民的同情更为真诚。《大教堂》是一部发生在托莱多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倾向极其典型的作品，而《碧血黄沙》这部小说，像作家许多其他小说一样，曾多次搬上银幕。作家运用他那支擅长丹青、烘云托月的生花妙笔，描绘了西班牙斗牛的引人入胜的场面，并将故事在异国情调中铺陈展开。

在向译者及出版社谨表祝贺之际，请允许我祝愿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六部作品不断再版，终古常青。这对于不畏旅途劳顿、风尘仆仆的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来说，是一次重游这么多年以前他所敬重并留下足迹的中国的新机遇；而对于读者而言，则是鉴赏作家超群才华的一次新的体验。最后，我相信，这次重逢将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也许，这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巴伦西亚作家的小说还会在中国开辟新的天地。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五日，北京
(林一安译)

西班牙民族魂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总序

林一安

布拉斯科其实是中国读者的老相识。这应该感谢前辈翻译家们的艰苦发掘和辛勤耕耘。上世纪二十年代伊始，这位西班牙文学巨匠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地从法文、英文，甚至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并引起读书界和创作界的浓厚兴趣了。四十年代曾经在我国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碧血黄沙》，就是根据布拉斯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班牙斗牛士离奇而不幸的遭际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拉斯科漫游神州之际，曾经积极推荐西班牙文学的鲁迅先生还特意撰文向读者热情介绍了这位当时在中国尚鲜为人知的作家；虽然，先生用的译名是作家的母姓伊巴涅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出生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巴伦西亚市。父名加斯帕尔·布拉斯科，母为拉蒙娜·伊巴涅斯，家庭从商，比较保守。一八八二年，早慧的布拉斯

科·伊巴涅斯中学毕业，进大学攻读法律，接触新思想，并开始练笔，发表作品。一八八三年，离开守旧的家庭，告别故乡，只身来到马德里，为著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冈萨雷斯任记录员，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翌年，回巴伦西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办报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一八八八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正式取得律师资格。此后，政治活动更为活跃频繁。一八九四年，创办并主编《人民报》，发表大量政论及文学作品，招致多次官方传讯、放逐。由于作家领导开展民主共和活动，声誉日增，曾连续七次当选议员，但也因思想激进，猛烈抨击旧制度，曾被捕入狱三十余次。晚年，曾环游世界，考察各国政情，还在阿根廷创办“塞万提斯”及“新巴伦西亚”庄园，以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为缺钱无地的农牧民提供维持生计的劳动场所。一九九八年三月，笔者应巴伦西亚自治区议会主席曼努埃尔·塔兰孔·范多斯先生的盛情邀请，赴巴伦西亚访问，参加一年一度盛大的法雅节即模拟人像篝火节，曾结识同样也应邀来访的一位阿根廷小姐。据她自我介绍，她就是现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庄园的主席或曰村长！可见，这位作家的想法虽然天真，然而却是认真的，因为，在布拉斯科谢世七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他的庄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有效地运行！人们是记得并尊重这位毕生替民众着想的作家的。

布拉斯科才思敏捷，满怀激情，且笔勤不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巨大财富。他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写学术专著、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道或游记，几乎年出一书，甚至二书。其全部著作，逾中文千万字，恐为世所

罕见。其主要作品有：以故乡巴伦西亚为背景，描绘当地风土人情，刻画底层民众苦难及世事沧桑的小说《稻谷与马车》（1894）、《五月花》（1895）、《巴伦西亚故事集》（1895）、《茅屋》（1898）、《被判刑的女人》（1900）、《橙园断情》（1900）、《芦苇与泥淖》（1902）；抨击旧制度、鞭笞教权、反映劳苦大众生活酸辛的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酿酒厂》（1905）、《游民》（1905）、《生存的意愿》（1907）、《碧血黄沙》（1908）、《死者发号施令》（1909）、《船蛸》（1914）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情协约国、谴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启示录四骑士》（1916）、《我们的海》（1918）、《妇女的仇敌》（1919）、《大家的土地》（1922）等。此外，布拉斯科尚著有散文随笔集《幻想、传说与传统》（1887）、《巴黎：一个移民的印象及西班牙革命史》（1893）、《置身艺术之国》（1896）、《旅途追忆》（1904）、《东方之旅》（1907）、《墨西哥军国主义》（1920）、《一个小说家的环球旅行》（1924—1925，三卷本）等。

由于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布拉斯科于一九〇六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年获“巴伦西亚之子”荣誉称号，一九〇九年获阿根廷文学院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〇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他的乡间别墅逝世。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遗体由西班牙共和政府隆重遣回巴伦西亚安葬，其时民众倾城出动，参加葬礼，以寄托他们对这位有西班牙民族之魂崇高声誉的作家的哀思和怀念。

尽管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受到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他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作家本人认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格，与他的“文学之父”已然毫无共同之处。从布拉斯科作品总的倾向来判断，应该说这是作家颇为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

布拉斯科的笔触的确是写实的、悲壮的、尖锐的，甚至是残酷的。他描摹巴伦西亚景色旖旎的田园风光，甚至用特写镜头让我们仔细地看到他无限深情地拍摄的芦苇、泥淖、水塘、茅屋、稻谷、橙林、鳗鱼、鲜虾乃至田鼠；他也揭露高利贷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压榨，刻画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以及他们无助而又无奈的呼唤；他渲染斗牛场上血染黄沙的惨烈，同情勇敢然而愚昧的青年铤而走险的不幸遭际；他也愤怒谴责教会的伪善与卑劣，为迷途的人们而深深惋惜；他批判资产者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又控诉旧制度的罪恶和反动……总之，布拉斯科无论写景状物，抑或叙事绘人，均能力透纸背，引人入胜。作家倾心表露了他的爱与恨。他热爱巴伦西亚的一切，热爱西班牙的一切，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无不激情满腔地讴歌赞颂；他也痛恨所有的邪恶，痛恨所有的暴行。对此，作家极尽暴露、揶揄、讥刺、挖苦之能事。布拉斯科写出了巴伦西亚乃至西班牙民众的苦难，写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企盼，更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因此，不少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认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巴伦西亚民族之魂，西班牙民族之魂。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集的所有作品，全部译自西班

牙文原文。我们的前辈翻译家鲁迅、戴望舒诸先生若地下有知，我想也会感到欣慰的。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太阳宫

第一章

拂晓时分，加夫列尔·卢纳来到了大教堂前。托莱多狭窄的街道还在沉沉的黑夜中，刚才悄悄从屋顶的飞檐间溜进来的黎明鱼肚白的光亮较自由地在市政府的小广场扩散开，从昏暗中映照出大主教宫平庸的正墙和耸立在市政厅这座卡洛斯五世^①时代的灰暗建筑物上两座以黑色板岩作顶的塔影。

加夫列尔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踱了好一会儿步。他竖起斗篷的翻领把脸一直遮挡到眉毛，同时咳嗽着，身子在痛苦地颤动。他不停地走动着以御寒，观望着称为“赦罪门”的大门，这是教堂显示它纪念碑式建筑的唯一的正门。他联想起其他一些著名的教堂，孤寂地处于显要的位置，四周空荡荡，孑然为它们的美貌秀姿而骄傲。他把这些教堂和托莱多大教堂相比较，托莱多大教堂是西班牙的教堂之母，却被淹没在它周围鳞次栉比的房屋的汪洋之中。这些建筑物似乎将

^① 卡洛斯五世(1500—1558)统治西班牙长达半个世纪，是唯一一位疆域横跨新、旧两大陆的国王，可称西班牙历史上的巅峰时代。

向它的两边翼墙压下来，仅仅留给大教堂与小胡同之间一点小小的空间以展示它的外貌风采。熟悉大教堂内部华美的加夫列尔想到那些东方氏族住房的欺骗性。这些房屋从外面看其貌不扬，寒酸可怜，但内部却大理石铺地，描金镶银，画栋雕梁。犹太人和摩尔人曾经在托莱多生活了几百年决没有虚度。这些住房厌弃外表的奢华看来给了建筑大教堂以启示。大教堂被淹没在向它周围紧靠紧挤似乎在寻求它荫庇的房舍之中。

市政府的小广场是唯一留下的一片空地，使这座基督教的丰碑得以一展它的宏伟雄姿。在这块小小的自由空间，大教堂正在黎明的曙光下展示它正门主墙上三个尖顶拱门和钟楼塔。这钟楼建造得十分坚固，棱角突出，顶端是“胡椒瓶”式的楼顶，恰似教皇的黑色三重冕，塔影消失在冬天雾茫茫铅灰色的晨曦中。

加夫列尔深情地望着这座大门紧闭的宁静的教堂，在那里面居住着他的亲人们，在那里面他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多少年没有见到它了！他是多么热切地期望它敞开它的大门！

他从马德里乘火车头天夜里就到了托莱多。在他住进拉桑格雷客栈（塞万提斯曾住过的古老的塞维利亚诺客店）的陋室，他就感到急切需要看看大教堂。他在教堂的周围度过了一个多小时，听着看守教堂的狗，发觉附近死一般寂静的小胡同里的脚步声，警惕地发出的吠叫声，高嗥声。他昨夜无法入睡。在经历了那么多惊险困苦之后来到了他的故土，他睡意全消。还在黑夜里，他就离开客店来到大教堂附近等待它开门。

为了打发那等待的时光，他重又审视教堂正门的优点和缺点，他甚至出声评说起来，仿佛要让广场上的石凳和忧伤的树木做他评判的见证。以十八世纪大花瓶做隔柱顶饰的栅栏展延在正门前，拦成一个宽大的石板墁砌的内院。在这院内从前曾举行过教士委员会排场豪华的招待会，在盛大的节日里，人们在这里可观瞻巨人模型。

正门外墙底层的墙体已经从门中间裂开，这门洞是一个又深又大的尖拱，往里顺着一层层尖拱收窄缩进，每一层尖拱又饰有基督使徒像，透雕的华盖及狮子、城堡等的盾形徽章。在把两扇大门分开的中间柱子上，耶稣头戴王冠，披着国王的斗篷，四肢舒展，身躯疲弱，一脸病容，悲悲切切，这是中世纪圣像雕刻家赋予的形象，以显示神的崇高。

在三角楣有一座圣母的浮雕，周围天使们正给圣伊尔德丰索^①穿上十字褙，在大教堂好几个地方一再表现这则感人至深的故事，似乎它是大教堂最好的徽记。正门的一边是叫做“钟楼塔”的门；另一边是叫做“公正门”，从前公证人员很庄严地进这个门宣誓忠于职守。两边门的门框内都有石刻像和无数人像和徽章沿着棱边一直伸延到尖拱的最高处。

在这极为哥特式的三座门的上面，是正门外墙的第二层，是一种希腊罗马式的建筑，又几乎是现代化的建筑，这些都同样使加夫列尔·卢纳感到讨厌，犹如一个不和谐的刺耳的号声破坏了一支交响曲的演奏。在中间正门的上面，和真人一样高大的耶稣和十二使徒，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每个

① 圣伊尔德丰索 (San Ildefonso)，托莱多大主教 (607—667)，其祭祀节日为 1 月 23 日。

人各有自己的壁龛；两边以两道扶壁为界，这两道扶壁恰如两座高塔把正门外墙一分为三。从扶壁往两边去，是两排意大利宫殿式半圆形拱门长廊，加夫列尔童年在管钟楼人住处玩的时候，曾不止一次伸出头去窥探那两条长廊。

加夫列尔在想：“教会有了钱财，对艺术来说是一种灾害。在一所贫穷的庙堂也许能保存古老正墙的完整统一性。但是，当托莱多的大主教们有一千一百万收入，教士委员会也有那么多的收入，又不知道怎么花这些钱，这时就启动种种工程，一再重复建设，于是没落的艺术就产生出最后的晚餐那样荒诞离奇的作品。”

再往上，是正门外墙的第三层，有两个大拱门把阳光送给中央大厅的圆形花窗。三层顶部是一排透雕石头栏杆，沿着外墙曲折而行。正门外墙就处在守卫它的两大突出的建筑物——钟楼塔和阿拉伯区西班牙人专用祈祷厅之间。

当加夫列尔发现不只他一人在大教堂前面时，他就停止了观赏。天几乎已经大亮，有几位妇女低着头，头巾盖到齐眼睛，贴着栅栏行走。从人行道的花砖传来了一个瘸子拐杖的嘀笃声，而在钟楼塔更远一点的地方，在联接大主教宫和大教堂的巨大拱门下，一群乞丐聚集在那儿以便在回廊的门口占领地盘。虔诚的妇女和要饭的叫化子彼此都认识，他们是天天早晨最早占领教堂的人。天天见面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手足之情。他们发出一阵阵干咳和咳嗽声，埋怨早晨天气那么冷和管钟楼人迟迟不下到教堂门口来。

大主教宫的拱门再过去些的地方，有一扇门开了，这是通往钟楼塔和上回廊教堂人员住处的楼梯的小门。一个男人手里挥动着一大把钥匙，穿街而过。在赶早的客人们的包围

下，他开始打开下回廊的门，这门又窄又尖就像一个箭头。加夫列尔认识这开门人，他就是管钟楼的马利亚诺。为了不让他看见自己，加夫列尔就一动不动留在广场，让那些急切要进大教堂的人蜂拥进入“圆面包门”，仿佛可能有人会抢占他们的位子。

最后，他决定跟着那些人走，他走下了回廊的七级台阶，因为大教堂是建在一个低谷地，低于毗邻的街道。

一切依旧如故。沿着教堂的墙上，巴耶乌^①和马埃利亚的巨幅壁画，表现了圣欧洛希奥^②的伟大业绩，描绘了他在摩尔人的土地上的布道活动和那些裹着大块缠头布和蓄着大胡子不信天主的人残酷鞭打这位圣徒的情景。在“圆面包门”里面，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拉瓜尔迪亚^③的儿童殉难图，这是出于反犹太的仇恨在好几个天主教村子同时发生的故事。画中几个长相如凶神恶煞的犹太人在杀害信基督的孩子。那些犹太人把孩子从他家中偷出，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挖他的心，喝他的血。

潮湿使这虚构故事的壁画的大部分斑驳脱落和模糊不清，这幅画画在尖拱上，就像是画在一本书的扉页上。但是，加夫列尔仍然能看出坐在十字架脚下的那个犹太人狰狞的面孔，以及另一个嘴里衔着刀，俯身向坐着的犹太人递送

① 巴耶乌 (Bayéu, 1734—1795)，西班牙萨拉戈萨的著名画家，戈雅的岳父。

② 圣欧洛希奥 (San Eulogio, 780—859)，西班牙科尔多瓦的殉道者，其祭祀节日为3月21日。

③ 拉瓜尔迪亚 (La Guardia)，西班牙的一个小渔村。

殉难孩子的心脏的犹太人那凶残的模样。这些戏剧式的人物曾经不止一次地扰乱加夫列尔童年的梦境。

在回廊四座牌楼中间的花园，在这隆冬季节，展现在眼前的有高大的月桂和柏树等古希腊植物群，树枝穿过围住每一边五座拱门的栅栏，一直伸到高高的柱顶。

加夫列尔看了好一会儿这高出于回廊地面的花园。他的脸正和过去他父亲劳动过的土地处在同一水平线。他终于又看见了那苍翠的一角。这院子由于大教堂受俸神甫们几个世纪的经营已经变成了花果园。当他漫步在波兰的大森林或者英国的海德公园时，他曾怀念这座花园。对他来说，托莱多大教堂的花园是花园中最美丽的，因为这是他生来见到的第一座花园。

那些坐在门口台阶上的乞丐以好奇的眼光瞧着他，不敢向他伸出手来。他们不知道那个形容枯槁，戴一顶破帽，穿一双旧靴子，赶早来的陌生人，是个看热闹的，还是他的职业就是在大教堂找到一席之地行乞的。

加夫列尔讨厌这种刺探性的目光，沿着回廊继续往前走，走过了把回廊和教堂连通的两扇大门。这是“圣母献瞻门”^①，通体为雪白的石头，展示了赏心悦目的工匠花饰艺术，装配有一些独具匠心、玲珑剔透的饰物，简直是一件精雕细刻的珍宝。再继续往前是大主教们通过楼梯从他们的大主教宫下到教堂的楼梯井的挡风墙。这是一堵有哥特式串珠状缘饰和巨大盾徽饰的墙。几乎贴着地面，就是那块闻名遐

① 此门得名于圣母献瞻节（11月21日），为纪念圣母由其父母带入神庙瞻仰上帝的节日。

迹的宝光石，这是一块长长的透明的大理石，如同一面照亮楼梯的镜子，最让参观回廊的乡下人惊叹不已。楼梯井的后面，是“圣卡塔利娜”^①门，黑色描金，两边墩柱上有许多彩色的树丛、城堡和狮子的图案，以及两尊先知的像。

加夫列尔看到有人从门里打开“圣卡塔利娜”便门，他就走开几步。那是钟楼人刚刚在教堂走了一圈，已经打开了教堂所有的门。一条大狗从便门出来，伸长了脖子，似乎要发出饥饿的叫声。在狗后面出来两个人，帽子压到了眉毛，裹在棕色的呢斗篷里。钟楼人扶住了栅栏门让他们俩出来。

“早安，马里亚诺！”他们中间一个人说，算是打招呼告别。

“愿上帝保佑我们，并让你们睡一个好觉！”

加夫列尔认出了这两个教堂的守夜人。他们是头天下午就关在教堂里，现在回家去就寝。那条狗沿着去神学院的路跑去，以便吞食学生们的残羹剩饭，要到两个守夜人找到它，重新把它关起来才不吃。

加夫列尔下了“圣卡塔利娜”门的台阶走进了教堂。他的脚刚踩着铺在地上的花砖，脸上就感到地窖环境中那种冷飕飕、黏糊糊的气袭来。教堂里似乎还在黑夜。在上面，数百扇依次排列的窗子的彩色玻璃给五间厅堂送进缕缕光线，在晨曦的照耀下光彩熠熠，宛如在一天最初的光辉下开放的奇妙的花朵。在下面，在石林般的巨大壁柱之间笼罩着一片昏暗，而各个祈祷室里点燃的红色晃动的灯光，断断续续地

^① 圣卡塔利娜 (Santa Catalina)，307 年的殉道者，其祭祀节日为 11 月 25 日。

划破这昏暗，照得黑影憧憧。成群的蝙蝠盘旋在柱子的交接处，在那些虔诚的妇女们的头上飞来飞去，总想延长一点它们占据教堂的时间，直到初升的阳光透过那些玻璃窗照射进来。那些妇女跪在圣坛前大声祈祷，她们对自己此时此刻在大教堂里就像在自己家里那么自由自在感到心满意足。另外一些妇女则和教堂里的助祭及其他仆役在谈话。这些助祭和仆役就像去工厂车间上班的工人一样睡眼惺忪，一边伸着懒腰，从各道门陆续进来。在昏暗中，有几件教士长袍形成的黑影在去圣器室的路上游动，他们在每个圣像前都停下来行跪拜大礼。在远处昏暗中有个看不清的人影，但从那人的钥匙声和他逐一打开门的嘎吱响声，可以猜想到是钟楼人，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精灵在活动。

大教堂醒来了。大门的碰撞声如隆隆炮声般轰响，从一个厅堂到另一个厅堂响起不断的回声。有一把扫把从圣器室开始打扫，发出如大锯锯木头的沙沙声。几个助祭侍童在掸去有名的唱诗堂座席上的灰尘，发出劈啪劈啪的声音，使教堂都为之震响。似乎大教堂由于神经受到刺激在伸展懒腰，哪怕最微小的擦碰都会引起它阵阵呻吟。

人的脚步声引起巨大的回声，仿佛埋葬在教堂石板底下所有国王、大主教和战斗勇士的坟墓都给震撼了。

教堂里面的寒冷比教堂外更为凛冽。温度低加上排水管道通过的地方的潮湿，地下阴沟渗出的水把地面弄得污秽不堪，这使得唱诗堂里的受俸神甫们都在咳嗽，似乎他们都在发牢骚说“这是在折他们的寿”。

早晨的阳光开始洒遍各间厅堂。托莱多大教堂走出阴影，显示出它圣洁无瑕的洁白。大教堂石块的洁净，使它成

为最美、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教堂。大教堂八十八根匀称优美出众的壁柱，高耸大胆向上直破青天的粗硕的束柱尤为突出，这些壁柱白如固体的雪，辐射交织起它们的经络以支撑起各个拱顶。最高处开设着巨大的彩色玻璃的窗子，恰似奇妙的盛开着光的花卉的花园。

加夫列尔已经在两根柱子间的一根壁柱的柱墩上坐下，但是不多一会儿，他不得不站了起来。石头的潮湿，整个教堂四周坟墓似的阴冷，钻心刺骨。他在各个殿堂间行走，引起了那些虔诚的妇女们的注意，她们看见他就中断了祈祷。在这个只有教堂的老熟人才来的时刻，一个陌生人引起了她们的好奇。钟楼人好几次和他擦肩而过，用一种不安的眼光凝视着他，仿佛在这各个祈祷室的财物无人看管的时刻，那个脸色可怜可悲的陌生人的闲逛让他很不放心。

在最大的圣坛附近，另外一个人碰到了他。加夫列尔认识他。他叫欧塞维奥，是萨格拉里奥圣母殿的司事，教堂里的人把这圣母称做“蓝衣圣母”，因为在举行庆典的日子她穿天蓝色的服装。从加夫列尔最后一次见到欧塞维奥已经过去六年了，他没有忘记过他肥胖魁梧的身躯，长满疙瘩的脸，多皱纹窄窄的前额，一头粗硬的头发，以及长着斗牛一样的脖子，几乎不让他呼吸，使得他的呼吸成了风箱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所有居住在回廊的员工都羡慕他的职位，因为这是个最生钱的职位，又享有接近大主教和受俸神甫们的优势。

这位“蓝衣殿”司事把教堂看做是他的产业，他差一点把所有引起他反感的人都撵出教堂。他看见一个流浪汉在教堂里漫步，就尽力抬起他浓浓的眉毛，用傲慢的眼光盯着他。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个怪物？加夫列尔注意到他在努力集

中记忆。为了不让他审视，加夫列尔转过身去，装作在注意看一根壁柱上的一则宗教故事。

为了避免呆在教堂里引起人们猜疑的好奇心，加夫列尔走出教堂，来到了回廊。这儿比较好，只有他孤独一人。乞丐们坐在“圆面包门”的台阶上在闲聊。用教士长袍捂着半个脸的神甫们从他们中间走过，急匆匆地从“圣母献瞻门”进入教堂。叫化子们叫着名字向他们问好，但不向他们伸出手。他们认识这些神甫，都是自家人，朋友之间是不乞讨的。他们呆在那儿是冲着外来人，耐心地等待英国人的到来，因为所有乘早班火车从马德里来的外国人，只能是从英国来的。

加夫列尔停留在靠近门的地方，他知道所有住在上回廊的人都从这个门进教堂。这些人穿过大主教拱门，沿着大主教宫的露天楼梯下到街上，再从“圆面包门”进大教堂。加夫列尔熟悉这著名教堂的全部历史，他回忆起各个门名称的由来。第一个叫“公正门”，因为大主教管区的代理主教在那儿接见来访者。随后的门叫“圆面包门”，因为每天在大弥撒之后，主持弥撒的教士带领助祭和执杖人就来到这里，为将给穷人们施舍分发的半磅重面包或小圆面包祈求上帝赐福。据加夫列尔回忆，每年这种施舍要用掉六百法内格^①麦子，但那是在大教堂每年收入超过一千一百万比塞塔年代的事。

那些正进入教堂的神职人员和居家修士们好奇的目光让加夫列尔感到讨厌。他们习惯于天天总是他们这些人，在同一个时间里见面，一旦有一个生人的面孔打乱了他们这种单调的生活，他们就感到坐立不安的好奇。

① 法内格 (fanega)，粮食的计量单位，约合五十五点五升。

这时乞丐们的两句话促使加夫列尔往后退，他一直退到回廊的深处。

“‘木权杖’这老家伙来了！”

“早安，埃斯特万先生！”

一个身材矮小，脸刮得很干净，穿着黑衣服，像个神职人员模样的人走下了台阶。

“埃斯特万！埃斯特万！”加夫列尔一边嘴里喊着，一边置身于埃斯特万和“圣母献瞻门”之间。

“木权杖”用他一双如琥珀般明亮的眼睛看了看他。这是一个惯于长时间呆在教堂里的人的消极被动的眼睛，任何最微弱的叛逆思想也不至于扰乱他坚定不移的极乐世界的信念。他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无法相信这张苍白、精瘦的脸和那张他记忆中存在的脸何其相似，但是最终他痛苦又惊讶地确信就是同一张脸。

“加夫列尔！……我的好兄弟！……不过，是你吗？”

在他那看来已经学会了壁柱和雕像的无动于衷的教会仆人^①僵硬的脸上兴奋地绽出了亲切的微笑。

他们俩紧紧握着手，从回廊走开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但是，你一向在哪儿？……你的生活怎么样？……你来想干什么？”

“木权杖”显得很惊讶，不断地提问，不给他兄弟回答的时间。

加夫列尔解释说他是头天夜里到的，从天亮前他就呆在

^① 基督徒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为教会、教堂效力的人是教会、教堂的仆人。

教堂前面，等待时机见到他的兄长。

“现在我是从马德里来，但此前我到过许多地方，英国、法国、比利时，谁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我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到处奔走，始终在同饥饿及人们的残酷作斗争。贫穷和警察一直跟着我寸步不离。每当我由于这种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的生活处于一无所有的时候，司法机关，以担心害怕为由，喝令我走开，我又重新开始远征。现在，正如你看到的，埃斯特万，我是个令人可怕的人，是个病人，身体已未老先衰，肯定我会很快死去。就在昨天，在马德里，他们对我说，要是我拖延在那儿停留，我将重新进监狱。下午我就乘上了火车。上哪儿去呢？世界是很大，但对于我和同我一样的叛逆者来说，世界在变小，压缩到不让我有一块立足之地。在地球上我只剩下你和这个你幸福生活着的平静安宁的角落。我是来找你的，如果你拒绝我，那么我别无去处，只有死在监牢里，或者要是他们认出了我的姓氏，愿意收留我，我就死在医院里。”

加夫列尔说了这些话，感到很累，痛苦地咳嗽着，他的胸部发出回响，仿佛空气在曲折回旋的洞穴中流动。他热切地想说清楚，下意识地挥动他的双臂，如同一个长期以来惯于在公众场合讲话，胸中炽燃着争取支持者的热烈火焰。

“啊，兄弟，……兄弟！”埃斯特万带着亲切责备的表情说，“你看了那么多报纸，读了那么多书，对你有什么用？你为什么要去收拾本来就好好的东西，或者本来是坏的，但无法收拾的东西呢？……你要是安安心心走你的路，也许就是大教堂的受俸教士，谁知道你是不是成为受俸神甫中的一个，坐在唱诗班的席位上，这是家庭的荣誉和依靠呀！……

始终是你的头脑有毛病，还有你是我们中间最聪明的。该死的才能使你落到如此贫穷的地步！……兄弟呀，我知道了你的事情，我是多么难受！自从你最后一次来过这里之后，我是多么辛酸痛苦！我以为你在巴塞罗那印刷厂校订书籍很满意，幸福，那薪水比起我们在这儿挣的钱是一笔财富。但看到你的名字，经常和那些要求均分一切，打倒宗教和家庭的会议以及我也不知道还有哪些胡说八道的东西，一起出现在报纸上，让我有点起疑心。卢纳同志这么说，卢纳同志那么做，我没有把那位同志就是你这一点告诉家里人，而且我猜想那些疯疯癫癫的事结果好不了，一定很坏！……后来……后来就发生了炸弹事件。”

“我和这事毫无关系”，加夫列尔以悲伤的声音说，“我是个理论家，我憎恨不成熟和无效的行动。”

“这我知道，加夫列尔。我一直相信你是无辜的。你，那么善良，那么温厚，从小你就好心得让我们大家吃惊；你，就像我们可怜的母亲说的，你是当圣徒的料！你去杀人！用什么见鬼的装置，那么阴险奸诈！天啊！”

“木权杖”沉默了，似乎给想起把他弟弟也卷进去的谋害事件惊吓住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你陷进了在那些事件发生后政府要抓捕的一伙之中。我痛苦了好一阵子！在那边城堡的壕沟里，时不时枪毙人，我就焦急地在报纸上那些被处决人的名字中寻找，想着会找到你的名字。有许多传闻，说他们对犯人用可怕的酷刑让犯人供出实情，我就想到你，你那么娇弱，那么瘦小，以为有一天早晨他们会发现你已经死在了牢房里。更痛苦的是，我要竭力不

让这儿的人知道你的情况。一个卢纳，老埃斯特万先生的儿子！老埃斯特万先生是大主教教堂花园的老花匠，受俸神甫们，甚至大主教们都和他交谈……而他的儿子竟和那些想破坏世界的该下地狱的群氓混在一起！因此，在‘蓝衣殿’司事欧塞维奥和这里其他爱说闲话的人问起我报纸上谈到的卢纳是否可能是你的时候，我说我的兄弟在美洲，由于他忙于做大生意，只偶尔给我写信。你明白这有多痛苦！我只能等着他们随便什么时候把你杀了，又不能讲，不能怨恨，甚至不能把痛苦告诉家里人……我只有在这儿，在心里祈祷！……我们这些教堂里的人习惯于天天见到上帝和圣徒，我们有点铁石心肠，我们是有罪孽的人，但是灾难能软化心灵，我就向万能的圣母，我们的庇护神，萨格拉里奥圣母诉说，求她能记起你，因为在培养你进神学院的时候，你从小就跪在她的面前。”

加夫列尔甜甜地微微一笑，表示对他兄长天真憨厚的钦佩。

“你别笑，我求你了；你的笑让我痛心。崇高的圣母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好。几个月之后，我得知他们把你和其他人，装到了一条船上，下令不准再回西班牙，而……一直到眼前。没有一封信，没有一点消息，是好是坏都没有消息。我还以为，加夫列尔，你已经死在遥远的异乡客地，我不止一次为你可怜的灵魂祈祷，这是你的灵魂很需要的。”

加夫列尔同志从他的眼神中表示出对这番话的感激之情。

“谢谢，埃斯特万。我敬崇你的信仰，但是你要相信，从那件阴暗的冒险事件中我并没有活得如你想象的那么好。

要是死了倒更好。殉道者头上的光环是要比一个好端端的人关进牢房，却成了块千疮百孔的破布出来强。我现在病很重，埃斯特万，我的死刑判决是不可更改的。我没有胃，我的肺已经支离破碎，你看到的我的身体是一部几乎不能运转的散了架的机器，从各个方面嘎吱嘎吱发响，就像这些零件都将散开，从各自的部位掉下来。由于你的祷告曾经救了我命的圣母完全可以为我多说点情，软化我的看守们。不幸的人们认为，只要让历史的余孽，睡在我们身边的野兽依他们的本性肆虐，就可以拯救世界……然而，释放之后，活着比死还痛苦。我回到了西班牙，在迫害和贫困的驱赶下，我就像生活在地狱。我不能在任何有人聚会的地方停留。他们像狗一样追赶我，要我住在城外。他们围堵我，把我往山区赶，往沙漠赶，往没有人类生存的地方赶。好像我是个可怕的人，比那些绝望中掷炸弹的人还可怕，因为我说话，因为只要我面前有两个贫穷不幸的人，我内心有一种让我宣传真理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这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放心，哥，我是个已经死了的人，我的使命已经终结，但是在我的身后，会有另外一些人，之后还有另外一些人。田垄已经开好，种子已经播下。生根发芽吧！我的一位流放的朋友，当他在西班牙从断头台上见到最后一线阳光的时候，他这么高呼……我就要死了，但我自己认为有权休息几个月。我希望在我一生中第一次品味一下默默无闻、静止不动、隐姓埋名的甘美；做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既不给人好感，也不让人害怕。但愿我成为那大门正墙上的一尊雕像，大教堂的一根壁柱，成为某种漠然不动的东西，时间、喜悦和悲伤从它表面滑动流过，既不产生颤动，也不产

生激情。我已提前死去，是一具还有呼吸和吃饭，但不会思想、不感受痛苦、没有热情的行尸走肉。那样对我来说就是幸福，哥哥。我不知道上哪儿去，在那门外的人正等着我，要再次驱赶我……你愿意我留在你这里吗？”

作为全部回答，“木权杖”只是亲切地推了推加夫列尔。

“我们上去，疯子。你不会死，我会养你的。你现在需要的是灵魂和亲情。大教堂会治好你。在这儿，这颗像堂吉诃德一样有病的脑袋会恢复健康。你还记得小时候在晚会上给我们朗诵堂吉诃德的故事吗？……往前走，狂热的家伙。世界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跟你有什么相干？眼前我们见到的是这样的世界，将来永远是这样的世界。要紧的是活得像个基督徒，确信来世会活得更好。那是上帝的事，不是凡夫俗子的事。往上走，我们上去！”

他亲切地推着这个流浪汉，他们走出了回廊，从乞丐中间走过，这些乞丐早就以好奇的眼光注视他们见面谈话，但一句话也没能听到。他们穿过了街道，进了钟楼的楼道。这台阶是红砖砌的，磨损严重，刷白的墙壁所有拐角的地方，都是那些慕“大钟”之名登上钟楼的人涂抹上粗劣的画和弯扭费解的留题。

加夫列尔缓慢地往上走，喘着粗气，每走一段要站住停一停。

“我身体不好，埃斯特万……很不好。这只风箱四处漏气。”

过一会儿，他似乎悔恨他的忘性，急匆匆地问道：“佩帕，你女人怎么样？我估计她很好吧。”

这位大教堂的职员紧皱了一下眉头，目光变得呆滞，似乎要哭出来。

“她死了。”他阴郁简单地回答说。

加夫列尔停住了脚步，用手抓住扶手栏杆，仿佛给惊呆不能动了。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希望安慰他哥哥，补充说：“不过萨格拉里奥，我的侄女，一定长成个妙龄美女。上一回我见到她就像个王后，浅黄色的发髻，粉红的小脸，金黄色的汗毛就像果园里的杏子。她和士官生结婚了，还是跟你在一起？”

“木权杖”的表情更加阴郁，以凶狠的眼光看了看他的兄弟。

“也死了。”他干巴巴地说。

“萨格拉里奥也死了？”加夫列尔奇怪地问。

“对我来说她死了，反正都一样。弟弟，在这世界上不管你爱说什么，就是别跟我谈她。”

加夫列尔明白他的问话引起他哥哥巨大的悲痛，就不再言语，重新往上走。在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哥哥的生活中发生过严重的事情，一定是一件拆散家庭、使活着的人永远分离的那种人生中无法解释清的事情。

他们穿过了大主教拱门的封闭式走廊，走进了上回廊，这地方叫做“丁子香园”。有四座和下回廊的柱廊一样长的柱廊，但光秃秃没有任何装饰，样子凄惨。地上铺的砖已经磨损破碎。朝花园的四边，在支撑年久的梁桁的屋顶的扁柱子之间有一道栏杆。那是三个世纪前的一项临时工程，按原样永远留了下来。在刷白的各面墙上不对称地为大教堂员工住的房间开了门和窗子。这些员工从职务到住房都是父子相传。这回廊的柱廊较低，给人是四条街的印象，每条街都只有一排房子。前面花园里的柏树探出它们尖尖的树冠。从回

廊的顶上，可以看到第二排房间的窗户，因为几乎所有丁子香园的住房，都分为两层。

这是生活在大教堂之上，与教堂屋顶同一水平的一个群体。到了晚上，钟楼的楼梯关闭之后，他们就和城市隔绝了。这个半教会式的群体在托莱多的心脏地区生息死亡，不下到托莱多的街上去。按照传统的天性，他们依附于那座雕刻的白石山，这座石山的拱门为他们提供庇护。他们生活在香烟缭绕之中，呼吸着教堂陈旧的铁器特殊的霉锈味。放眼天际只见前面林立的尖拱或钟楼。从上回廊望去，钟楼以其庞然大物的躯体压塌了一片天空。

加夫列尔感到一下子回到了他的童年。像当时的加夫列尔一样的小孩子们在这四条长廊里奔跑嬉耍，或者蜷缩着身子坐在回廊里，沐浴初升的阳光。他记得妇女们，其中有他母亲，居高临下，对着花园拍打床上的毯子，或者清扫她们住房附近红色砖地。全都是老样子。在这里时光不流逝，无疑确信什么都不会变老。加夫列尔甚至还依稀看到他八岁时用煤块画在墙上的两个娃娃像。要是没有幼年小儿们追逐叫喊笑闹，他真相信生活就停止在大教堂的这个角落里，仿佛在这个居民小村——几乎是座空中小村——既无生，也无死。

“木权杖”自打说了那几句话后，一直双眉紧锁，脸色阴郁，这时他才想给他弟弟做些解释。

“我就住在我们的老房子里。为了纪念父亲，他们把这房子给了我。这要感谢教士委员会的先生们，他们考虑到我只是个可怜的‘木权杖’……自从发生了那桩不幸事件后，我有一个老婆婆给收拾屋子，另外，教堂乐师堂路易斯和我

住在一起。你会认识他的；是一个年轻教士，很有才能，但在这里埋没了他。他是个菩萨心肠的人，但在教堂里他们把他看做疯子，他却像个天使般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他们走进了卢纳家族的房子，这是丁子香园最好的房子。靠门口，有两排安装在墙上的表壳式的花盆，从花盆悬挂下花草的绿色枝叶。门里面，在作为接待室的过厅里，加夫列尔发现一切如他父母生前的原样。白色的墙壁由于有了年头呈现出一种蛋壳黄的颜色，墙上挂着几幅旧的圣徒版画。一套桃花心木的椅子，由于不断的抚摸而闪光锃亮，显示它们的青春活力，同世纪初期椅子的曲线式样和行将松开的底座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一扇半开的门，可以看见厨房。加夫列尔的哥哥已经进了厨房，给一位神情腼腆的老年妇女吩咐些什么。在过厅的一个角落里，安放着一架套着罩子的缝纫机。上一回加夫列尔过路来大教堂时，他看见他侄女用缝纫机做活。自从那次引起她父亲忧郁痛苦的灾难之后，这小姑娘给加夫列尔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回忆。通过厅里的一个窗子，加夫列尔看到了内院，这内院使得这套住房成为丁子香园所有的住房中令人羡慕的。由四排细长的石柱托起的顶层的房间，形成一块自由的天空，这四排石柱使内院貌似一座小小的回廊。

埃斯特万又回来和他弟弟呆在一起。

“你说说午饭你想吃些什么。厨房里全都准备好了。你点吧，老弟，你开口点吧，尽管我穷，但要是我不能让你渡过难关，消除你那种死里逃生的样子，那我就太无能了。”

加夫列尔伤心地笑了笑。

“你尽心努力都枉然。我的胃完蛋了。要一点牛奶就够

了，要是我的胃能接纳就谢天谢地了。”

埃斯特万就吩咐老妇人下到城里去买牛奶。当他在他弟弟身边坐下的时候，冲回廊的那扇门开了，门开处探进来一个年轻人的脑袋。

“早安，叔叔！”他喊了一声。

他的外形像条压扁了的狗，长一对贼眉鼠眼，两鬓梳得油光锃亮，贴着耳朵向上翘起。

“进来吧，你这落拓货进来吧。”“木权杖”说道。

他又冲着他弟弟补充说：“你知道他是谁？不知道吧？那是我们可怜的哥哥的儿子，愿上帝留他在天堂。他和他母亲一起住在回廊上面那排房子里，他母亲给受俸神甫先生们洗的唱诗班的衣服，折叠的白色法衣，让人看了都高兴。这是你加夫列尔叔叔，刚从美洲、巴黎，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回来！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

这年轻人问候了加夫列尔，这位亲戚悲切的病容有点让他害怕。他曾经听他母亲说起这位亲戚，说他是神秘传奇式的人物。

“现在你看到了，”埃斯特万朝着他弟弟向他介绍这年轻人，继续说道：“他是大教堂最没头脑的人。要不是顾念他父亲和祖父以及他的姓氏，主管财务的受俸神甫先生早就不止一次把他撵出教堂，赶到大街上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卢纳家族是大教堂的老人，跟墙上的石头一样老的老人。……没有他想不出，干不出的蠢事。就在圣器室里，背着受俸教士们，像一个不敬神的人那样起誓发咒。你别说你没干，你这无赖！”

他半严肃半微笑地扬起一只手来威胁他侄子，似乎在他

思想深处觉得他侄子所犯的错误还有点可乐。他侄子对这责备报以鬼脸，像猴子一样腮帮子动个不停，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出顽固又傲慢。

“你理这样的头，”叔父继续说，“真丢人现眼，活像个在盛大节日里来托莱多的演戏的宫廷小丑。要是在大教堂鼎盛时期，他们早就给你剃个大秃瓢。但是在现今教会财产在变卖、讲自由、不幸的事一件件发生的时代，我们神圣的教会已是一贫如洗，贫困弄得教士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心思去注意那些细枝末节了，江河日下，太遗憾了！失职呀，加夫列尔！你看看吧！这儿就像马德里的许多办事处一样，人们来取钱，拿了钱马上就走。大教堂一如以往是美好的，但是没有一处找得到信奉主的尊严。教堂乐师也这么说，他看到在盛大的节日，甚至只有五六个乐手坐在唱诗堂里，感到很气愤。家住在丁子香园的年轻人并不爱我们的大主教教堂，他们埋怨薪金太少，而不考虑宗教现在所遭遇的时代。要是继续这样下去，看到这个坏蛋和另外一些跟他一样的小无赖在教堂翼廊里玩掷瓦片游戏，我也不会感到奇怪……求上帝饶恕我这么说！”

这个天真憨厚的“木权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对他自己说的话表示生气。之后，他继续说：

“你在这儿看到的这位少爷，对他的现状还不满意，他几乎乳臭未干，现在已经担任了他可怜的父亲到30岁才争取到的职务。他想做斗牛士，甚至有一个星期天，竟敢在托莱多的广场出场参加斗小牛。他母亲披头散发，痛哭流涕地下来告诉我这一切。我想到他父亲已经故世，我有责任替他来管教，我就等候这位先生从广场回来，他还自以为是好样

的。我就用我在教堂里用的那根木棍，从钟楼楼梯口一直揍到他房里。他会告诉你我生气的时候手狠不狠……圣母呀！神圣的大主教教堂的一个卢纳竟去干斗牛士！据他们告诉我，那些受俸神甫们，甚至红衣主教大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一位很幽默的受俸教士从此给他起了外号叫‘塔托老弟’^①，全教堂的也就这么叫他。兄弟，你看到了这个调皮鬼给我们家带来了多大的荣耀？……”

他不再说话，企图以他的目光来使塔托感到羞愧，但是塔托却笑嘻嘻地不觉得他叔父的话有什么了不起。

“你别以为，加夫列尔，”埃斯特万接着说：“这家伙是缺面包吃，所以干荒唐事。尽管他没有头脑，但是从二十岁起就负责看管本大教堂的猎犬。他已经达到了只有在较好的年景，经过许多年之后，仗了好靠山才能达到的地位。他每天挣六雷亚尔^②，而且由于他在教堂可以随便走，他能向参观者讲解各种新奇的事情。加上落到他手里的小费，他收入比我还多。那些参观大教堂的外国人，那些被革出天主教教门的人看我们如同珍稀的猴子，认为我们的一切都稀奇可笑。他们发现了他。一些英国妇女问他是不是做过斗牛士，而他，就别提了！……他见他们对他有兴趣，就打开谎话的口袋子（因为说假话，谁也比不过他），他讲述他在托莱多和外地进行的斗牛盛况，在这些场斗牛中他杀死的牛有……而那些英国大傻瓜在他们的纪念册上记下笔记，甚至有个黄

① Tato 音译为“塔托”，意为兄弟的昵称，如中文的“小老弟”。首次出现译为“塔托老弟”，以后只音译“塔托”。

② 旧时西班牙通用的银币单位，约合四分之一比塞塔。

头发的大脚女人几笔把这骗子的脑袋画了下来。他感兴趣的是他们相信他的假话，最后给他钱。至于那些异教徒回到他们家乡，大肆宣扬说在托莱多大教堂，在西班牙大主教教堂，他们的员工是斗牛士，而且以一场场斗牛来帮助举行宗教仪式，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总而言之，他挣的钱比我多，而且尽管如此，他还自认为他的职务给压低了……一个多么光彩的职务！在盛大的宗教游行时，他走在大家前头，紧靠着大主教的长披肩，用一根裹着红色天鹅绒的叉子托住长披肩以防它滑下来。他像红衣大主教一样，穿着猩红的锦绣大袍！据熟悉这类事的教堂乐师讲，这身衣服甚至像几个世纪前居住在意大利，后来因为写了一部诗体游记下了地狱的一个叫做牙齿^①或者叫什么别的名字的人的衣服。”

在一条狭窄的小旋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这脚步透穿墙壁通报上一层楼有人下来了。

“是堂路易斯，”“木权杖”说，“现在他要去萨格拉里奥圣母小教堂主持弥撒，然后去唱诗班。”

加夫列尔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向这位教士问候致意。他个儿矮小，体质虚弱，一眼就可以看出多病的身子骨和硕大的脑袋之间比例失调。兀突冲出的前额好似以它的重量压倒了他让天花留下的印记变了形的不端正的褐色的五官。他长得难看，但是一双充满表情的蓝眼睛，似乎给他的嘴增添光辉

① 应是“但丁”，在西班牙文中，“牙齿”（diente）同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读音相近，但埃斯特万不清楚但丁的名字，所以把它说成了牙齿。

的一副雪白、整齐、健康的皓齿，挂在双唇边天真、几乎带有稚气的微笑，使他这张脸向那些醉心于艺术爱好的普通人揭示出他和蔼可亲的神情。

“敢情这位先生是你和我常谈起的那位兄弟？”他听了埃斯特万的介绍后说。

他友好地向加夫列尔伸出他的手。他们俩都是一副病容，似乎他们肌体的失衡使他们情同手足。

“既然这位先生在神学院学习过，”教堂乐师说，“那一定懂点音乐。”

“这是我对那时的教学唯一记得的东西。”

“你周游世界各地，一定听到些好东西啦！……”

“略有一点。音乐是我最喜爱的艺术。我懂得很少，但是我能体会它。”

“很好，很好。我们会成为知己。你可以给我讲讲那些东西。我真羡慕你跑遍了世界！……”

他讲话时像个不安分的小孩子，他不想坐下，尽管在大厅里他每挪动一个地方，负责维持安静的人员就会给他送过一把椅子。他不停地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手里拿着黑褐色长袍和瓦形帽，这帽子真可怜，已经没有了毛绒，压得瘪瘪的，两角有一层油渍，和他的教士服和鞋子一样陈旧悲惨。尽管这么穷困，教堂乐师也有一定的风雅。他的头发，按教会的规矩是长得太长了，卷曲盘伏在他的脑门顶端。他披在身上的长袍潇洒的折叠式样令人想起歌剧中男高音的斗篷，他身上有某种世俗的放荡不羁，透露出他是个被教士服埋葬的艺术家，渴望着把这些教士服作为寿衣抛弃在他脚边，飞离它们而去。

几声沉重的钟声如同远处的响雷传进了这间屋子，庄严地震撼了回廊。

“叔叔，他们在召唤人去唱诗班了，”塔托说。“我们早就该到大教堂了。快八点了。”

“是呀，好家伙，有意思的是这回让你来提醒我。走吧！”

之后，埃斯特万又冲着乐师教士补充说：

“堂路易斯，您的弥撒是八点。回头您再和加夫列尔谈他那些事情。现在履行职责。正如您所说的，得去挣吃点心的钱。在这种魔鬼世道，做工作也几乎不够吃饭的。”

乐师伤心地点头表示同意，就跟在教堂的两个仆人后面走了出去，但心中反感，仿佛他们俩拖他去做一件痛苦、令人厌恶的工作。

他和加夫列尔握手告别时，心不在焉地哼着歌，而加夫列尔相信他听出来那个年轻教士嘴里轻轻地、断断续续唱出来的是贝多芬七重奏曲的片段。

加夫列尔·卢纳在大教堂门前长时间等待之后，在只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感到累极了，就躺倒在沙发上。侍候他哥哥的老婆婆在他边上放了一小罐牛奶，然后又给他倒满了一杯子。加夫列尔喝了一口，竭力控制住他有病的胃的颤动，他的胃一个劲要把牛奶喷吐出来。

由于一个晚上没睡好，又在疲劳中苦苦等待，他的身体十分疲乏，刚才吸取了食物，陷入了一种好久没有感觉到的很舒适的倦怠之中。加夫列尔可以让自己安睡了，就这样他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呆了一个多小时，虽然有时低沉的咳嗽的

湿罗音打断他不均匀的呼吸，但还不至于驱散他的睡意。

他突然间一下醒了，那是因为使他从头到脚震动的一个神经性的颤抖，使他如被弹簧弹出来似的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这是因为已经永远固定留在他心里对危险的担惊受怕，因为在阴暗的牢房里犯下的提心吊胆的毛病，那时他每时每刻都等候着牢门打开后他被像一条狗那样毒打，或者被押到两边列队排着两排步枪的刑场，除此之外，是因为他在任何国家都被监视生活养成的习惯，他预感到警方的特务就在周围；在那些客栈里，他还没有休息一会儿，深更半夜会突然命令他马上出去。

他不想再睡了，似乎害怕在沉睡中再做那些讨厌的噩梦。他宁可回到现实生活，大教堂的宁静使他感到温柔的爱抚，教堂这座用石头筑成的巍然大山令人肃然起敬的宁静，又似乎沉沉地压迫着他，永远隐藏起他那受迫害者的脆弱心里。

他走出门来到回廊，把双肘靠在扶手栏杆上，观赏起这花园。

丁子香园已渺无人迹。清早，使丁子香园热闹的孩子们都 在学校里了；妇女们在她们家里做饭做菜。在整个回廊里除了他没有别的人。太阳光从回廊的一面照射过来，柱子的条条斜影割裂了画在瓷砖上的大幅金色彩绘。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安静，大教堂神圣的静穆，就像甜蜜的麻醉剂沁入这个鼓动家的心田。那些经历了七个世纪的石块恰似七个世纪的幔帘把他包裹起来，使他与世隔绝。在丁子香园的一间房里响起了锤子不停的敲击声。那是加夫列尔透过一扇窗上的玻璃看到的一个鞋匠，正躬着身子在小小的工作台前干活。

在四边屋顶框出的一片天空，几只鸽子在盘旋飞翔，扇动着它们白色的翅膀，犹如在一片湛蓝的湖泊划动双桨。它们飞累了，就下到回廊，歇息在扶手栏杆上，发出一阵咕咕叫声，好似恋人的叹息震荡打破了教堂宗教的静谧。时不时地有人打开教堂的栅门，向花园和丁子香园送出一股充满香烛味的气息，传出管风琴的吼声以及用拉丁语唱出的凝重的歌声，庄重地拖长着每个音节。

加夫列尔凝望着周围白石边连拱围绕的花园以及连拱的深色花岗岩的粗糙的扶壁，在扶壁的顶端雨水留下一片浓密的蕈类，其状就像黑乎乎天鹅绒的纽扣。太阳往下移照到了花园的一角，花园的其余部分沉浸在教堂阴影下的一片翠绿之中。大钟楼挡去了一片天空，在它装饰有哥特式缘饰和突出的扶壁的红色翼墙上，凸显出几条黑色大理石排口饰，上面有神秘的人物头像和参与此建筑的各位大主教的徽记。在最高处靠近极白极白的石头小尖塔的地方，在巨大的栅栏后面，显露出几口大钟，活像是关在铁笼子里的铜制的鸟群。

庄严的钟声在整个大教堂回荡，宣告大弥撒正在隆重进行。整座石头山在颤抖，震撼着各间殿堂、走廊、连拱甚至深深的地基。

之后，再一次归于寂静，似乎是在铜的轰鸣之后更深沉、更肃穆威严的寂静。又可以听到鸽子的咕咕叫声，在下面花园里，几只小鸟好像受到太阳光线的刺激发出啾啾的叫声，使这片绿莹莹的阴影重又显出生机。

加夫列尔深为感动。绝对的安宁和寂静无声使他甜丝丝地如痴如醉：这是无为的幸福。世界就在那些大墙的外面，但是看不到它，感受不到它。那可敬又令人厌倦的世界，就

停住在那座历史的纪念碑——一座美丽的坟墓面前，在这坟墓里面没有任何东西会激起他的好奇。谁能设想他加夫列尔就在里面？……那个由已经死去的政客权贵构筑的七百年的瘤子，一种奄奄一息的信念，竟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在盛行不信教的时代，教会对于他，就像对于中世纪罪大恶极的罪犯一样，为他们提供了避难场所。他们从回廊的高处嘲笑着司法，而司法就像那些乞丐一样被拒之门外。在这里，他要让自己破残的躯体无声无息地慢慢毁灭。他将在这儿死去，他为自己早早地离开这世界感到舒心地满意。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在西班牙昏沉沉的大教堂的一个角落里了结他最后的日子。当他徒步行走在欧洲的公路上，躲避着宪警或宪兵的时候，当他在一个地穴里过夜，身子蜷缩得胡子都碰上了膝盖，以为自己会冻死的时候，这一愿望是唯一在鼓舞着他的希望。

抓住大教堂，就像行将淹死的遇难者抓住船的边缘：这就是他的希望，而他刚才实现了这希望。教会接受了他，就像一位严厉的老母亲，没有笑容，但是张开了双臂。

“终于……终于……”加夫列尔·卢纳喃喃地说。

他想到他抛弃了的那个充满迫害和痛苦的世界，想到就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另一个星球上，他永远不再回去的世界，他微笑了。大教堂保护他到永远。

在听不到街上各种嘈杂声的回廊中深深的静谧中，加夫列尔相信他听到了从远处，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刺耳的军号声，随后是低沉的连续敲击的军鼓声。于是他想起了托莱多的阿尔卡萨尔城堡，城堡似乎居高临下控制着大教堂，以其塔林的沉重的庞然大物慑服大教堂。那响起的就是军校的军

号。

这些军号声和军鼓声，刺痛了加夫列尔。他已经看不见这个世界了，而当他以为自己离这个世界很远、很远的时候，他却感到这个世界依然存在，就在教堂屋顶不远的地方。

第二章

从波旁王室的第二任红衣大主教时代起，埃斯特万·卢纳先生，由于似乎与他们家族有关的权利，一直是大教堂的花匠。进圣大主教教堂效劳的第一代卢纳是什么样的？有人向花匠埃斯特万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就满意地微笑着，两眼凝视着无垠的天际，仿佛想阅尽无比久远的时代。卢纳家族就像教堂地基一样古老。他们若干代人就生息在上回廊的几间房子里。在杰出的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还没有建造起丁子香园的时候，卢纳家族就住在邻近的房子里，似乎他们不能在教堂的庇荫之外生存。谁也没有比他们更有权利说大教堂是属于他们的。多少受俸神甫、受俸教士和大主教都过去了，他们取得了职位，死去了，另有人登上了职位。他们见过一张张新的脸孔，来自西班牙各个角落的先生们坐进了唱诗堂，若干年后死去了，把缺位让给另外一些外地人，而卢纳家族的人则始终在他们的岗位上，犹如这古老的家族是许多支撑大教堂的壁柱中的又一根壁柱。可能有一天，大主教名叫堂贝纳尔多，过一年叫堂加斯帕尔，下一个叫堂费尔南多，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教堂不可能没有某个卢纳在花

园，在圣器室或在翼廊工作而存在，多少个世纪中大教堂已经习惯于他们奉献的效劳。

花匠埃斯特万满怀骄傲地谈到他的门第血统，谈到他高贵又不幸的亲戚堂阿尔瓦罗统帅，他像一位国王一样安葬在大祭台后面的小教堂内；谈到教皇贝尼迪克特十三世，他就像他家族中所有的人一样，显得高傲又固执；谈到堂佩德罗·德·卢纳，他们是他们姓氏中登上托莱多大主教神座的第五位，还谈到其他并不逊色的亲戚。

“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族系的，”他骄傲地说：“我们大家跟随贤明的国王阿方索六世前来夺取了托莱多。只是几位卢纳家族的人喜好杀死摩尔人，他们成了领主，夺取了城堡，而另外一些族中人，如我的祖父辈，他们作为热诚的基督徒，留下来为大教堂效劳。”

埃斯特万先生怀着一个公爵有如此辉煌的祖先那样的踌躇满志，追忆着卢纳家族的世系，磕磕巴巴、迷迷糊糊一直叙述到十五世纪中叶。他的父亲曾经认识堂弗朗西斯科三世洛伦萨纳，这位奢华挥霍无度的枢机主教，他花去了大主教辖区的大量年金收入，建造宫殿，出版书籍，成为文艺复兴的一员主将。他父亲也曾认识波旁王室的第一位红衣主教，堂路易斯二世。他给埃斯特万讲述这位王子，这位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的兄弟的传奇生涯。王室尊贵的次子们献身教会事业的习惯使他在九岁的时候就成了红衣主教。在教士厅悬挂着他的画像，他戴着白色假发，红润的嘴唇，蓝蓝的双眸。但是，对这位善良的先生来说，人世的欢乐享受比教会的伟业更有召唤力，他抛弃了大主教辖区，和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士结了婚。他总是和君主争吵，君主把他

流放了。这位年迈的卢纳，跨越几个世纪，从一位祖辈讲到另一位祖辈，他回忆起阿尔维托大公，这位大公放弃了托莱多的主教职位，去治理荷兰，又回忆起杰出的塔维拉红衣主教，这位艺术的守护神；所有杰出的枢机主教都亲切地对待他的家族，感谢这个家族数百年来献身于圣大主教教堂。

埃斯特万先生的青年时代是不幸的，正当独立战争时期。法国人占领着托莱多，正在做大弥撒的时候，他们像异教徒那样进入大教堂，身上拖挂着军刀，到处东张西望，一个角落都不放过。贵重物品都已藏了起来，那些受俸禄的神甫和教士，当时总称受俸教士，都分散住在全半岛各地，有的躲藏在西班牙要塞，有的躲在乡村，祈求他们心中想念的君主早点回来。唱诗班可怜巴巴没有几个人。那些胆小害怕和贪图安逸的人，依恋他们的职位，不能离开他们的职位而生活，他们承认了外来的国王。波旁王室的第二位红衣主教，那位温文尔雅又无足轻重的堂路易斯·玛丽亚，正在王国的摄政王所在地加的斯。他是王室唯一留在西班牙的人，朝廷利用他以便给其革命权威以一定的王朝色彩。

战争结束时，当这位可怜的红衣主教又回到他的教区，埃斯特万先生看见他那张忧伤的娃娃脸、圆圆的小脑袋，很是动情。他在马德里迎接了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七世之后，神情沮丧、愁眉苦脸地回来了。他的摄政时代的同伙们都关在监狱，或者被流放，如果说他没有遭受同样的命运，那是由于他主教的职位和他的姓氏。这位不幸的高级神职人员相信他在战争期间为维护他家族的利益做了件大好事，现在被指

控为自由派，是宗教和王位的敌人，而他却想不出来他在哪方面曾经阴谋反对他们。可怜的波旁的红衣主教在宫中伤心得消沉下去，把他的俸禄用来在大教堂内建设工程，直到一八二三年反动时代开始时，他死了，把这地方让给了因关索这位专制主义的护民官。他是位络腮胡子已经花白的高级神职人员，曾在加的斯议会任职，作为议员，他遵守一切改革，主张退回到阿斯图里亚家族时代，以此作为拯救国家的可靠办法。

这个善良的花匠以同样的热情向国王们所憎恨的波旁红衣主教和络腮胡子的高级神职人员致敬意，后者以他粗暴、变化无常的脾气和专制主义的革命者的趾高气扬使整个教区为之颤抖。对于埃斯特万来说，谁登上了托莱多的神座谁就是个完人，他的行为不容争议。埃斯特万对受俸神甫和教士们的流言飞语充耳不闻。他们这些人，在花园的凉亭里抽着烟，谈论因关索这位大人先生乖僻的行径。因关索对费尔南多七世的政府很气愤，因为这政府不够“干净”，由于怕外国人，不敢恢复健康的宗教裁判法庭。

唯一让这位花匠伤心的是看到他心爱的大教堂在衰落。大主教的年俸和教士会的收入由于战争已经锐减。又发生了洪水退去时冲走了树木和房屋使土地荒芜、无人居住这种事。大主教教堂失去了它的许多权利，佃户们趁国家的困窘自成为田地的主人；各个村子拒绝偿付封地的劳役，似乎奋起自卫打仗的行动使他们永远摆脱了贡赋徭役。此外，令人极其讨厌的宫廷颁布法令废除领地制，削减了教堂大量收入，而这是在几个世纪中，托莱多的大主教们头戴头盔，用剑猛刺或猛击，同摩尔人周旋才取得的收入。

即便如此，大主教教堂还剩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而且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依然维持它昔日的辉煌。但是，埃斯特万先生通过受俸神甫知道了自由派的种种阴谋，以及国王堂费尔南多为了遏制君主制和教会阴险的敌人，不得不采取的枪决、绞刑和流放等处置办法，他从他花园的深处已经嗅到了危险。

“他们尝到了甜头，”他说，“他们会卷土重来，一旦给他们机会，他们一定会卷土重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咬了我们第一口，夺去了教堂一半多的财物，这回如果他们大权在握，他们将从我们手中抢走其余部分。”

花匠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义愤填膺。天哪！为此多少托莱多的大主教先生曾经跟摩尔人打仗，他们夺取城镇，袭击城堡，为牧场立界，所有这些都成了大教堂的产业，为礼拜上帝作出了最光辉的贡献。多少女王、达官巨头、平民百姓落入了一切神明的敌人的肮脏的手中，他们在临死的时候表现得坚贞不移，把他们财富中最神圣的部分留给了圣大主教教堂，希望以此拯救他们的灵魂！七八百人，大人和小孩，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身居要职的和普通的职员，这些靠大教堂的收入糊口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把这叫做自由？去偷抢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让依靠教士会这口“大锅”维持生计的无数家庭陷入贫困？

当花匠伤心地预感开始实现和门迪萨瓦尔^①下令取消产

① 门迪萨瓦尔（Mendizábal），西班牙政治家，1790年生于加的斯，1853年死于马德里。1835年奉召主持政务，让表决通过了著名的“使失去产业永久占有权法”。

业永久占有权的时候，埃斯特万先生相信自己将气死。因关索红衣主教表现得比他好。就像他的前任被专制主义者关在宫中一样，他被自由派人关在他的宫中，他决心自杀，不想看到侵犯教会神圣财产的种种不法行为。埃斯特万，由于他是个普通的花匠，不能效法红衣主教，而继续活着，但是当他得知那些微不足道的小偷小摸，天天生一通气。那些过去从不缺席大弥撒的人中的几个温和派，今天占一所房子，明天占一幢郊外别墅，后天占一块牧场，他们占去了过去总称为国家财产的属于大主教教堂的所有庄园。一帮强盗！那种缓慢进行的拍卖行为一样让埃斯特万先生气愤，因为拍卖把教堂的财富弄得支离破碎，成了一件件物品，他看到一些下级官吏进入他丁子香园的屋里拿走家中的家具，而每件家具都保留着对一位先辈的纪念。

有时候他曾经想离开花园，到马埃斯特腊斯戈或者到北方的省份去，去寻找保卫卡洛斯五世权利和主张回到旧时代的忠君派。那时他四十岁，他感到行动敏捷，身体健壮，虽然他生性平和，从来没有碰过枪，但是几个腼腆、心肠慈悲的学生逃出了神学院的事例鼓舞了他。据说他们追随着拉蒙·卡夫雷拉^①的红色披风在加泰罗尼亚进行战斗。但是，花匠为了不是一个人孤独地呆在丁子香园他的大房间里，三年前他和教堂司事的女儿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再说，他不能脱离开教堂，他是这座石山上的一块方石。虽然他现在

① 拉蒙·卡夫雷拉（Ramón Cabrera, 1810—1877），莫雷利亚的伯爵，卡洛斯派的斗士，以他野蛮的报复和疯狂的暴力行为使第一次卡洛斯战争（1834—1839）具有残暴的特点。

像一个人那样活动和说话，但是他敢肯定他一离开他的花园，决死无疑。如果在卢纳家族忠心耿耿为教堂效力那么多世纪之后，缺少了一个卢纳，教堂就失去了某件重要的东西，而对花匠来说，离开教堂生活的可能性也让他大吃一惊。这些年来，除了从丁子香园的楼梯到“圆面包门”这一段街面外，他从没有踏上别的世俗的土地，他怎么会去群山间开枪射击呢？

他继续培育他的花园，他对自己在教堂这位石头巨人的庇护下，免受革命祸害的侵犯感到忧心忡忡的满足，这位石头巨人以它的庄严和古老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可以削弱、消灭教堂的财富，但他们不可能反对生活在教堂庇护下的人们对基督的信仰。

这座花园对于向教堂倾泻猛刮的革命风暴无动于衷，充耳不闻，继续在连拱廊之间展示它忧郁的美貌。月桂树长得挺拔，直碰到上回廊的扶手栏杆；柏树摆动着它们的树冠似乎想攀上屋顶；那攀缘植物的藤蔓爬满了回廊的栅栏，形成了浓密的绿色百叶窗；芳草为中心凉亭铺上一片绿茵，亭子上面是一个黑色石板顶，有一个生锈的铁十字架。在亭子内，教士们在做完了下午的唱诗班，借着从枝叶间透进带绿色的光线阅读卡洛斯派的报纸，或者热烈地评论卡夫雷拉的英雄事迹，而在天上，对于人间琐事无关痛痒的燕群在盘旋，随心所欲成双作对地翩翩飞舞，发出阵阵鸣叫，仿佛要用它们的尖嘴啄破晶莹的天空。埃斯特万先生默默地站立着，观察着这黄昏俱乐部，这俱乐部的喧扰招惹得托莱多全国兵团的人疑虑重重。

战争结束了，花匠最后的希望、幻想破灭了。他陷入失

望的沉默，他不想知道教堂外的任何事情。上帝已经抛弃了善良的人们；叛徒和坏人成了多数，唯一让他得到安慰的是教堂固若金汤，它已经存在了漫长的好几个世纪，仍将在更多的世纪挑战敌人。

他只想做个花匠，像他的祖辈一样死在上回廊，留下新的一代又一代卢纳使这个家族永远为教堂效力。他的大儿子托马斯十二岁时就帮他照看花园，隔了几年他有了第二个儿子，埃斯特万，他会走路时就跪在屋里的圣像面前，哭着要他母亲带他下到教堂去看圣徒像。

贫困进入了教堂，压缩了受俸神甫和教士的人数。职员有死了的，就取消这些人的职位。那些过去依附于教堂的工人，住在教堂，为教堂不断地进行修缮的木工、泥瓦工和玻璃工都给辞退了。如果偶然需要检修某项工作，就从外面请临时工。在丁子香园，很多房间都空出来了，像墓地一样一片死静，而过去是人满为患的一个小村子，就缺空间。马德里政府（应该看到这花匠以什么样的轻蔑态度强调这几个字）和教皇打交道为解决一件称之为协约^①的事情。受俸神甫的人数受到了限制，似乎大主教教堂是任何一个神甫会主持的教堂，政府给他们钱就像给小职员付钱一个样。在当时收什一税的时候，教堂的财产多得没处存放，而现在为了维持西班牙教堂中最著名的教堂及其宗教活动，每月拨款一千二百比塞塔。

“一千二百比塞塔，托马斯！”他对他儿子讲（他儿子是

^① 原文为 Concordato，专门指罗马教廷和某国政府就宗教事务签订的协约或条约。

个文静、发育过快的孩子，是个除了他的花园以外对什么大事都没兴趣的人)。“一千二百比塞塔！在我知道大教堂的时候收入有六百多万。要这么多干什么用？我们总会遇到不好的年月，要是我是另外一个人，我就让你学门手艺，做任何工作，到大教堂以外的任何地方去。但是卢纳家的人不能像那么多背叛上帝事业的无赖那样开小差。我们是生在这里，直到我们家最后一个人也要死在这里。”

教堂里教士们满足于平安摆脱了革命风暴，看来很欢迎那个协约，很高兴拿他们的薪金。花匠对他们很生气，自我孤立的花园里，关上了栅栏门，拒不参加昔日的聚谈聊天活动。

那个植物的小天地没有变化，它的绿阴如同温暖花匠心灵的黄昏夕照。这不是色彩斑斓、沸反盈天的那种喧嚣的快乐，也不是洒满阳光的旷野里的果菜园的欢乐。这小天地有着四周高墙之内寺院花园的忧郁的美，只有沿着屋檐，透过连拱饰照射下的一点阳光，只有在高空盘旋、惊讶地瞧着在一个井底的天堂的飞鸟。植物就是希腊风景中一样的植物，如古希腊诗人的田园诗歌中的月桂树、柏树和玫瑰。但是那些把花园封闭起来的尖拱，坚硬的大石板铺的甬道，在石板缝隙间长着边饰状的青草，中心凉亭上的十字架，陈旧铁栅栏的霉锈味，以及扶壁上由于雨水长满的一层青苔发出的潮气，赋予花园一种基督衰朽的氛围。树木在风的吹拂下像一支支香，那些颜色惨淡、没有生气、显出病态美的花朵有一股香烛味，仿佛是从附近的门里传出的充斥教堂的一股股散发天然香味的气流。从屋檐的沟槽和落水管流下的雨水静静地睡在两个很深的石头蓄水池中。花匠的木桶打破一会儿水

池绿色的水面，可以看到深处墨蓝的颜色，但是汲水激起的一圈圈涟漪平息之后，那些绿色的浮萍重又靠近聚合在一起，水再次消失在植物的裹尸布底下，纹丝不动，没有一点声息，就像教堂在下午的寂静中一样没有生命，静止不动。

八月中旬，在圣体节和萨格拉里奥圣母节，人们带着水罐来到花园，花匠允许他们在两个水池里装满水罐。这是托莱多老人们很珍视的一个古老的习惯，盛赞教堂的水清凉，而一年中其余时间，他们只能喝用塔霍河含泥沙的黄水。另外有些时候，人们进花园给埃斯特万先生提供点好处，那些虔诚的妇女托他要几枝花献给她们家的圣像，或者买几盆花，她们相信这些花比郊外别墅的盆花更好，因为这是大主教教堂的。有些老太太要几枝月桂用作调料和家庭药用。这些收入，加上致命的取消产业永久占有权之后教士会发给花匠的两比塞塔，作为埃斯特万先生养家糊口之用。他快近暮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就是加夫列尔，这小不点儿四岁的时候就引起了丁香园妇女们的注意。他母亲盲目地相信，他长得活脱脱是教堂圣母手中抱的圣婴耶稣基督。她的妹妹托玛莎，嫁给了蓝衣圣母殿神甫，生下了一大家子人，几乎占了上回廊一半的人口。在加夫列尔刚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到处夸她小外甥天才，夸他怎么眼望着圣像行婴儿涂油礼。

“他就像个圣徒，”她对她女友们说：“要看到他那么认真地重复祷告词。小加夫列尔将来会成为个人物。谁知道我们会不会看到他当主教。在我父亲负责管圣器室的时候，我认识几个侍童，他们现在就戴主教的法帽，很可能有一天我

们托莱多也会出几个这样的侍童。”

从孩子初生的头几年，一片赞美颂扬声就像教堂里缭绕的香烟围绕在加夫列尔的周围。全家都为他活着。埃斯特万先生，一位拉丁式的父亲，爱他所有的孩子，但是对他们都显出阴沉和带有威胁性，为的是让他们长大了正直做人，而对于小儿子，他感到青春的复苏，逗他嬉戏，对他的任何任性淘气都笑颜相待。母亲放下了所有家务事以免怠慢了加夫列尔，两个哥哥对牙牙学语的他也关心备至。老大托马斯这个文静的大小伙子，已经接替他父亲照看花园，大冬天光着脚在花圃和甬道粗硬的石板上走来走去，经常拿上几束芳香的花草让他小弟弟玩弄。老二埃斯特万，十三岁了，在教堂的侍童中由于协助做弥撒一丝不苟而小有名气，他穿着红色的教士服和熨得皱褶分明短袖法衣让加夫列尔感到惊奇。他把蜡烛头和从某个受俸教士每天的祈祷书上撕下来的彩色人像画片送给加夫列尔。

有时候，他抱着加夫列尔走进巨人模型厅，这是一间在殿堂的扶壁和扶垛之间的宽敞的大厅，石头的拱扶垛横贯大厅。那里放着古老的节日的英雄模型：手持大剑的巨型熙德^①像，四对代表世界各地的人像，几个穿着过时的服装和脸部都裂开了口子的高大的人物像。这些巨人模型曾经给托莱多的大街小巷增添喜悦，现在就放在大教堂的屋顶里发霉腐烂。在一个角落里，放着巨嘴龙，这是令人恐惧的用硬板纸做的魔鬼，张着有尖齿利牙的大嘴吓唬加夫列尔。在巨龙

① 熙德（Cid），十一世纪卡斯蒂利亚贵族和军事领袖，文学作品中讴歌的一位英勇善战的西班牙民族英雄。

皱巴巴的脊背上，一个头发蓬乱，厚颜无耻的女人模型，发了疯似的在转动，这是几个世纪前信教人给命名的安娜·博莱娜。^①

当加夫列尔上学读书时，大家都为他的进步感到惊讶。上回廊的孩子们真让外号叫“银权杖”的祭司生够了气。“银权杖”神甫负责领导居住教堂内这帮居民并维持良好的秩序，他就赞扬小加夫列尔是个奇迹。加夫列尔走路还不稳的时候就能流利地朗读；七岁开始反复习念拉丁文，很快就掌握了拉丁文，如同他生来就没有说过别的语言。十岁就和常来花园的教士们辩论，他们也很乐意反驳他和给他出难题。

埃斯特万先生的背越来越驼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对他最后的作品满心欢喜地微笑着。他将是这个家的光荣！他姓卢纳，他可以无畏地追求一切，因为这个家庭甚至出过几位教皇。

受俸神甫们带这小不点儿去唱诗堂之前先去圣器室，就他的学习向他提问考考他。一位大主教办公室的教士引他见了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在听了他说话后，给了他一把杏仁，并给了他享受一个助学金名额的希望，让他免费在神学院学习。

卢纳家族和较亲近或较不亲近的亲戚（他们几乎是上回廊的全部人口）都为提供的这一机会兴高采烈。加夫列尔除了当神甫还能做什么呢？那些人生下来就像石头上长的赘物

^① 安娜·博莱娜（Ana Bolena），英国王后，亨利八世的第二个妻子，因被控背叛和谄媚罪，被斩首。

一样依附于教堂，他们认为托莱多的大主教是世界上仅次于教皇的最有权力的人，一个有才能的男子惟一值得去的地方就是大教堂。

加夫列尔去了神学院，全家人都觉得丁子香园变得荒凉、寂寞。随着他学业的进展，在卢纳家族家里，学期末都举行晚会，钟楼老人、宗教仪式执杖人、教堂司事们以及教堂的其他职员都来听加夫列尔明确、铿锵有力的声音。加夫列尔犹如一位天使，有时候给他们念一些圣徒的生平故事，有时候读读从马德里收到的天主教的报纸，有些个晚上，朗诵《堂吉珂德》，这是羊皮封面、用古老的字体印刷的，他们家代代相传的一个珍本。

加夫列尔在神学院的生活是勤奋的学生单调平庸的生活，在神学辩论中优胜，获得大批奖状，还有幸被推举为模范学生。时不时有某个在神学院讲课的受俸神甫走进花园。

“这小伙子学得很好，埃斯特万，各方面都是第一，而且像个圣徒一样少言寡语，心肠慈悲。他将是您晚年的安慰。”

花匠越来越衰弱苍老，他摇了摇头。如果上帝召唤他上天堂，他只能从天上看到他儿子完成学业。他将在他功成名就前死去，但他不会为此伤心，家里人将留下来享受他的胜利和感谢主的仁慈。

人文学、神学、弥撒常典，所有的功课，这个年轻人都以令他老师们惊奇的异乎寻常的轻松攻克了。在神学院，他们拿他和那些曾经以他们的早熟令人瞩目的教皇们相比较。他很快就将结束他的学业了，大家都预言红衣主教阁下会让

他首次主持弥撒之前就在神学院讲课。他的求知欲是无止境的。他把神学院的图书馆看做是自己的东西。有几个下午他去大教堂提高他对宗教音乐的研究，他和教堂乐师和管风琴手谈话。在祭祀演讲术的课堂里，他讲经布道的情感和信念让老师和同学都瞠目结舌。

“人家叫他讲道师，”人们在大教堂的花园里这么说。“他感到有使徒们火样的激情。也许他是又一个圣贝尔纳杜^①或者又一个波舒哀^②。谁知道这年轻人要到什么地步才是他的尽头。”

各科学习中加夫列尔最热衷的是大教堂历史和主持大教堂的枢机主教们的历史。在他心中产生了卢纳家族对那个他们永恒的母亲的大女人强烈的热爱。但是他不像家族中其他人一样盲目崇敬她，他想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和是怎么回事，他想从书本中证实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模模糊糊的传奇性多于历史事实的信息。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托莱多大主教的年表，一连串的著名人物、圣徒、武士、作家、枢机主教，在他们大家名字的后面，就像各个朝代的国王一样，都有一个罗马数字，表明他们是几世。他们曾经是在某些时代西班牙真正的君主。在朝中的哥特族的国王只不过是因时代需要捧上去或拿下来的

① 圣贝尔纳杜 (San Bernado, 1091—1153)，法国战斗的天主教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创建了克莱尔沃修道院和在法国宣布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留下非常精彩的书信和《神学论文集》。

② 波舒哀 (Bossuet, 1627—1704)，曾分别于 1669 年和 1681 年任法国孔东和莫城地区主教，法国最著名的宗教演说家，他的布道词和葬礼祷文是宗教辩文中最优美的。

装饰性人物。国家是一个神权政治的共和国，真正的元首是托莱多的大主教。

加夫列尔把长长的名单中赫赫有名的高级神职人员，根据他们的特点加以分别归类。首先是圣徒、基督教英雄辈出时代的宣教者，这些贫穷的主教们，如同那些有辖区的主教，光着脚，是罗马迫害下的逃亡者，最终把他们的头颅交给了刽子手，以期用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教义学说增添新的威望。他们中间有圣欧亨尼奥^①、梅兰西奥、佩拉希奥、帕特鲁诺及其他在历史上还没有冲破使徒列传的迷雾只闪烁一现即逝的人物。其次，是哥特时代的大主教，君主高级神职人员，他们优越于那些成为征服者的国王，凭借这种优越性，精神权威最终统治了野蛮的征服者。奇迹伴随着他们去迷惑他们的敌人，阿里乌斯教派^②的信徒。上天的奇迹也听命于他们去吓唬那些打仗的大老粗，并征服他们。蒙塔诺大主教，他和他女人住在一起，风言风语使他很气愤，他把烧着的煤炭放在他的几件法衣之间，一边讲弥撒，他人却没有烧着。他用这奇迹来表明他生活的纯洁性。圣伊尔德方索不满足于写书反对异教徒。他在他的手指间夹了一块披饰，表示有幸圣母亲自从天上下来给他手上放一件圣母亲手绣的十字褙法衣，好像他就是圣女莱奥卡迪娅。几年之后，西希维尔托竟大胆穿上这件法衣，由于他的大胆妄为，被免职，并革出教门，放逐外地。当时出的书只有托

① 圣欧亨尼奥（San Eugenio），托莱多的主教和忏悔神甫，死于656年，其祭祀节日为11月15日。

② 阿里乌斯教派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因而被确定为异端。

莱多高级神职人员写的。

他们照抄法律，给君主们的脑袋涂上圣油，即兴式地任命万巴为国王，密谋危害埃希卡^①的生命，在圣女莱奥卡迪娅大殿举行的教士会议就是政治大会，在这些大会上主教职位高于王位，国王的王冠被置于高级神职人员的脚下。

发生了撒拉逊人入侵^②之后，重又开始一系列对大主教的迫害，但他们不用像罗马苛政时代那样担心自己的生命。穆斯林们不搞酷刑折磨，尊重被战胜者的信仰，托莱多所有的教堂，除大教堂外，都在与摩尔人混居的西班牙基督徒手中，大教堂则改成了最大的清真寺。天主教的主教们都受到摩尔人的尊敬，希伯来的犹太教博士也一样受到尊敬，但是天主教教会穷了。撒拉逊人和基督徒之间连年不断的战争，再加上对光复战争中的野蛮行径的报复行为，给宗教活动造成困难。到此时此刻，加夫列尔还痴迷于阅读西克西拉、埃利潘多和维斯特雷米罗的晦涩的作品。对后者，他把他称为圣埃乌洛希奥《神圣精神的火炬与西班牙的光明》，但是史书对他的活动没有任何记载。由于圣欧洛希奥过分的宗教热情，摩尔人在科尔多瓦把他杀害了，他就这样殉难牺牲。贝尼这个法国人，接替了圣埃乌洛希奥的职位。为了显示他不

①埃希卡（Egica），西哥特族的国王，687年继承他岳父埃尔维希奥的王位，但登基不久，即抛弃他的妻子西希洛娜，这成为托莱多大主教发动阴谋的信号。埃希卡死于701年。

② 中世纪欧洲人称阿拉伯人为撒拉逊人，这里指711年北非阿拉伯人对西班牙的入侵，从此开始长达近八百年的统治。

逊色于他的先辈们，他在来到托莱多之前，请圣母在他国内的一所教堂赐降了另一件十字褙法衣。

在他们之后，在那很有趣的年表中出现了那些戎马生涯的大主教，身穿战袍和锁子甲，手持双刃斧的高级神职人员和征服者们。他们把唱诗班交给了职位低微的人，跨上他们的战马，自认为在一年中没有给教会的财富增加几个村庄和几座山岭那就没有为上帝效力。到了十一世纪，阿方索六世^①收复了托莱多。首先到来的是法国人，著名的克卢尼寺院的僧人，他们受雨果教长的派遣来到萨哈贡修道院，并开始使用“堂”作为对先生的尊称。先前的主教们习惯于以阿拉伯区西班牙人广泛的宗教信仰自由对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但继他们仁慈的宽容之后，是征服者基督徒的残暴的不妥协让步。堂贝尔纳多大主教刚一登上托莱多大教堂的宝座，就趁阿方索六世不在托莱多之机，违反阿方索的承诺。根据阿方索六世（他和光复战争^②时期所有的君主在宗教问题上一样宽容）的庄严协议，最大的清真寺仍然在摩尔人手中。这位大主教左右了王后的意志，使她成为他各项计谋的帮凶。有一天夜里，在教士和教堂修缮管理人员的追随下，他推倒了清真寺的各道大门，把清真寺清洗一空。早晨，当撒拉逊人迎着旭日祈祷念经的时候，他们发现清真寺已经变成了天主教教堂。那些相信战胜者的诺言的被战胜者抗议他

① 至今托莱多保留有阿方索六世门，据说 1085 年 5 月 25 日，凯旋而归的基督徒军队从它的拱门进入城内。

② 光复战争（La Reconquista），指西班牙中世纪驱逐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们受到了羞辱，只是由于阿卜·瓦利德法律博士的干预才没有发生起义暴动。阿卜·瓦利德博士相信国王会履行他的承诺。阿方索六世在三天中从卡斯蒂利亚内地匆匆赶到托莱多，决心以这一罪行杀了大主教，甚至要杀他自己的妻子，因为这次不法行为使他堂堂国君之言受到了怀疑，但他的震怒是如此强烈，以致阿拉伯人自己都为之感动，博士出面见阿方索，请求他尊重既成事实，因为受损害者都忍让了，并代表被战胜者，要他不必履行他的诺言，因为占有一所建筑不能成为破坏和平的理由。

加夫列尔看到这里，赞赏这位善良的摩尔人阿卜·瓦利德的谨慎和宽容的气度，但他满怀神学院学生的热情，更钦佩那些凶猛、不妥协和战斗的高级神职人员，他们经常为了给上帝争取更大荣耀而践踏法律，毁坏村庄。

堂马丁大主教是与安达卢西亚摩尔人战斗中的陆军上将，夺取了许多城镇，在阿拉尔科斯战役中追随阿方索八世左右。高级神职人员，著名的堂罗德里戈写了西班牙编年史，史书中充满英雄业绩，使教会更显辉煌。他的这部史书实际上更多时间是骑在他的战马上，而不是坐在唱诗堂的太师椅里写成的。在拉斯纳瓦斯战役中，他身先士卒，投入最惨烈的战斗。为了表彰他，国王在胜利后赐他二十处采邑，并把塔拉维拉·德拉·雷伊纳分封给他。后来，这个好战的大主教，背着国王，把摩尔人赶出克萨达和卡索尔拉，占据了大片领土，成为他的采地，冠名为“统率辖区”。堂桑乔，即阿拉贡的堂海梅的儿子和卡斯蒂利亚王后的弟弟，比起托莱多主教职位，他更看重他的军事首领的头衔。他看到摩尔人向前推进，就在马尔托斯战场迎头出击，投入最激烈的战

斗，被摩尔人所杀，摩尔人砍下他的双手，并把他的头挂在一根柱子上示众。

堂希尔·德·阿尔沃诺斯^①这位闻名遐迩的红衣主教，逃避“暴君”佩德罗^②去了意大利，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夺回了在阿维尼翁避难的教皇们的全部领土。堂古铁雷三世和堂胡安三世一起同摩尔人开战。堂阿方索·德·阿库尼亚在恩里克四世王朝时代，战斗在民间起义反抗中。作为这一系列参政和参战的高级神职员们当之无愧的压轴者，涌现出了有钱有势的真正的枢机主教，如堂门多萨红衣主教（他参加了托罗战役和收复格拉纳达战役，之后统治了这王国）和希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他那时在半岛已无摩尔人可打，他跨海到了奥兰，挥舞着十字架，成为他的战争武器）。

加夫列尔这个神学院的学生钦佩这些在云遮雾障的古代历史上，被教会的颂扬赞美所夸大了的人物。对他来说，他们是世界上仅次于教皇的最伟大的人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教皇们。他感到惊讶的是今天的西班牙人是如此不明事理，竟然不信任托莱多大主教们的领导和治理，而这些大

① 希尔·德·阿尔沃诺斯（Gil de Albornoz），托莱多的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生于1310年，卒于1367年，被“暴君”佩德罗驱逐出西班牙，伊诺森西奥六世嘱他迫使意大利人服从教廷。他完成了使命，并亲自护送乌尔瓦诺五世至罗马。

② “暴君”佩德罗（Pedro I el Cruel，1334—1369），卡斯蒂利亚的国王。1350年继承其父王阿方索十一世的王位，但登基不久就开始迫害他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在位十六年间，在卡斯蒂利亚实施最暴虐的独裁统治。

主教在过去几个世纪曾经创造了那么多的英雄业绩。祖国的光荣和发展和他们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王朝几乎和国王的历朝历代同等重要，而且他们曾经不止一次以他们的忠告和毅力挽救了那些国王。在雄鹰之后总是跟随着家禽。在戴着铁的头盔，身穿战袍的高级神职人员后面，行进着富裕奢华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只是以打官司来战斗，同市政府、行业公会和个人进行诉讼，以保持他们的先辈们积攒创下的大笔财产。那些出手大方如塔维拉之辈，盖起了宫殿楼堂，保护埃尔格雷科^①、贝鲁格特^②及其他艺术家，作为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回响，在托莱多也创造了一个文艺复兴。那些贪婪如基罗加之流，削减奢华的教会的开支，自己成为国王的债权人，给那些奥地利君主们提供数以百万计的杜卡多^③。当时这些君主统治的辽阔领域可称日不落，但是一旦航行于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大帆船耽误了航程，这些君主就被迫去乞讨。

大教堂是它的那些主要教士们的杰作。他们人人都给大教堂注入了某种反映他们性格的东西。那些较缺少风雅和尚武的人，树立了建筑的骨架，垒起了石头山，种上了树木，

① 埃尔格雷科 (El Greco)，西班牙画家，生于 1548 年 (?)，卒于 1625 年，他的作品有禁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点。

② 贝鲁格特 (Berruguete)，十五世纪末西班牙画家。他的儿子阿隆索 (1480—1561) 为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在托莱多、格拉纳达等地创作了叹为观止的作品。

③ 杜卡多 (ducado)，十六世纪曾通用于西班牙和奥匈帝国的金币名称，币值各地不同。

构成了教堂的框架，而那些较有文化修养、在不同的精雕细刻的时代登上教座的人，则建造了精工细作的铁栅栏，石头边框的正门，增添了绘画和成为圣器室宝库的一件件珍宝。这件庞然大物的营造历时近三个世纪，它和史前时期的大动物一样，出世之前在母腹内沉睡了漫长的岁月。当大教堂的壁柱和高墙拔地而起的时候，哥特艺术还处于它的初创时期。在大教堂建造的两个半世纪中，建筑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加夫列尔察看了大教堂，以他的目光跟踪了建筑学缓慢的演变过程，找到了它演进的痕迹。巍峨的教堂是一个脚上穿着粗陋的鞋，头上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顶饰的巨人。那些壁柱的础石是粗糙的，没有任何雕琢装饰，往上升高的柱束呆板简朴，起拱面带着简单的柱顶，柱顶上哥特式的刺蓟装饰还没有哥特式建筑全盛时期的繁丽，但是在拱顶，那是大教堂建筑的后期，或者说开工二百年之后建造的，那儿有巨大的窗子，以及五光十色的尖拱，显示大教堂竣工期间的一种艺术的壮丽宏伟。

在翼廊的两端，加夫列尔找到了大教堂从平地而起所需要的数百年间取得巨大进步的证据。“钟门”，也叫做“集市门”，以其严格的圣事式的粗陋雕像及挤满三角门楣上的一出《圣经》《创世纪》的故事，和翼廊另一端的“狮子门”，另一个名称叫“欢乐门”，形成鲜明对照。“狮子门”建造于二百年之后，轻松愉快与威严庄重并存，作为一座宫殿的入口，它透露出文艺复兴时代世俗的大胆表现，在严肃的基督教建筑中争得一席之地。固定装在门上的裸体美人鱼，以她卷曲的尾巴作为门钹。

大教堂全部是用托莱多附近采石场白色和乳白色石头加

工建筑成的，从壁柱的础石到拱顶，一气呵成，没有割断连拱饰和使有层层叠叠尖拱的殿堂显得低矮沉重的拱廊。加夫列尔把教堂看成是石化的美妙的祈祷文，无需任何支撑它直上青天。柔性的石头就是为建筑工程之用，另一种石头，更为柔性，构建拱顶。在外部，那些扶壁和扶垛，以及如同它们之间的桥梁的拱扶垛是用花岗岩般非常坚硬的石头，组成一个金色的骨架，只是由于经过了几个世纪，色泽暗淡了。这骨架保护和支撑着教堂内架空的纤巧精细的部分。这两类石头突显出大教堂的面貌：外面是暗红色，里面是白色和乳白色。

这个神学院的学生从大教堂找到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曾经兴盛的各种建筑风格的表现。加夫列尔在各个正墙的大门上看到了原始粗糙的哥特式建筑，在“赦罪门”和“狮子门”看到了全盛时期的哥特式建筑；阿拉伯建筑则遍布拱廊上迷人可爱的马蹄形拱，这拱廊沿着大祭台后面的整个半圆形凹室走，是西斯内罗斯的杰作，他焚烧了穆斯林的书籍，在教堂的建筑风格上恢复了完全的基督教殿堂的形式。那种带有复杂花叶形的风格在回廊的正门表现出它淘气逗人的趣味，甚至那种浮饰过多的丘罗格拉^①艺术，最完美地表现在著名的托梅^②设计建造的光孔，光孔开在大祭台后面的拱

① 丘里格拉（Churriguera, 1650—1725），西班牙雕塑家和建筑师，他给西班牙创造了设计风格古怪、过分装饰复杂的建筑风格，称之为丘里格拉风格。

② 托梅（Tomé），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丘里格拉的学生。他凭着自己巴洛克式的遐想，从1721年到1732年，才完成了光孔这一工程。

顶，把光线照射到半圆形凹室。

每当假日的下午，加夫列尔就离开神学院，在大教堂游逛，直到关大门的时刻。他喜欢在各殿堂之间漫步，去大祭台后面全教堂最昏暗和安静的地方。那里沉睡着西班牙的大部分历史。在历代国王小教堂门口有两尊双手叉腰的石头开路先锋官守卫着，在紧闭的大门后面，卡斯蒂利亚历代君主安卧在他们的坟墓中，坟头有身披金盔甲、腰佩长剑的雕像在祈祷。加夫列尔驻足在圣地亚哥^①小教堂前，透过小教堂三个矢形尖拱的铁栅栏凝视着。在教堂的底部，这位使徒列传中的圣徒，身穿朝圣服，高举着利刀，骑着马冲向摩尔人。巨大的贝壳、红色的盾徽和一轮银色的月亮，装点着白色的四面墙壁直到拱顶。这个小教堂，他的父亲，这位花匠，把它看做如同家珍。这是卢纳家族的教堂，虽然有人嘲讽这种攀亲关系，但是他们杰出的先辈堂阿尔瓦罗和他的妻子就在那里，安卧在宏伟的坟墓里。堂娜胡安娜·皮门特尔墓的犄角跪着四个呈黄色大理石的修士，他们静视着躺在陵墓高处那位高贵的夫人。卡斯蒂利亚不幸的统帅的墓有四个裹着教团长袍的圣地亚哥骑士护卫着，他们似在守护埋葬在四边配上哥特式缘饰的石棺中，他们无头的伟大统帅。加夫列尔记起曾经听他父亲讲过关于堂阿尔瓦罗卧像的故事。过去，那像是铜的，在小教堂做弥撒时，到了献圣餐礼那一刻，雕像通过暗藏的机关会坐起来，一直跪到仪式结束。有的人讲是天

① 圣地亚哥（Santiago），耶稣基督十二使徒之一，44年殉道，其祭祀节日为7月25日。

主教女王^①使这套扰乱信徒虔诚宗教活动的戏剧性装置消失了；另外一些人则说，是统帅的敌兵在发生骚乱的一天，把这个四肢可以活动的雕像砸得粉碎。在这神殿的外面，卢纳家族的小教堂竖起有堞形边饰的高大的塔楼，形成了大教堂内部的一座孤立的城堡。

虽然加夫列尔家人把这小教堂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但这位神学院学生却深为邻近的圣伊尔德方索的小教堂所吸引。那里保存着希尔·德·阿尔沃诺斯红衣主教的坟墓。在大教堂的全部历史中，最激起加夫列尔敬佩的是这位传奇式的高级教士，他尚武骁勇，又酷爱文学，出生于西班牙，建功立业于意大利。他安息在华丽的大理石陵墓中，大理石经过岁月的打磨锃光发亮，呈一种柔和的酱色。无形的世纪之手抚摸了他卧像的脸部，使鼻子扁平，赋予这位好战斗的红衣主教以莫卧儿大帝^②凶暴的表情。四只狮子守护着高级神职人员的遗体。他一生至死都是非同凡响和充满冒险。他的遗体是在祈祷和赞美诗声中从意大利运送到西班牙的，沿途一个个村镇的全体居民都出来为他抬送棺材以争取教皇赐予免罪。他死后回归祖国走了好几个月。这位优秀的红衣主教出殡队伍前，有现今布置在他小教堂的基督画像开道，从一个教堂到又一个教堂都做短暂停留，向沿途跪拜的人群洒下用于给

① 天主教女王指伊萨贝尔女王。费尔南多和伊萨贝尔两位君主于1492年3月31日下令驱逐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也清除了异教，天下一统为天主教。1494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赐予他们“天主教国王”的称号。

② 莫卧儿大帝，指十六世纪征服印度而建立穆斯林帝国的蒙古族首领。

他防腐的香油。对于堂希尔·德·阿尔沃诺斯来说，没有任何不可能做到的事。他是又回到人世间的使徒的利剑，以便推行信仰。他逃避了“暴君”佩德罗，到阿维尼翁避难，那里还居住着另外一些被流放的更尊贵的人物。他们中有被一群民众逐出罗马的教皇们，这群民众在他们中世纪的迷梦中妄想里恩基^①的号召下复辟旧的执政官的共和国。堂希尔·德·阿尔沃诺斯不是那种愿意生活在歌舞升平的普罗旺斯朝廷的人。作为一位出色的托莱多大主教，他在他的法袍下穿着锁子甲，由于已经没有摩尔人，他就要杀掉异教徒。他作为教会的首领前往意大利，欧洲的冒险家和西班牙的匪帮组成他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农村烧杀，以教皇的名义进城市抢劫，不久那些在阿维尼翁流亡的教皇们可以重又登上他们在罗马的宝座。这位西班牙红衣主教，在经过无数次征战向罗马教廷归还了半个意大利之后，变得像国王那么富足，在博洛尼亚创建了著名的“西班牙学校”。教皇了解他到处劫掠，要他交清账目，而这个傲慢的堂希尔交了满满一车钥匙和锁头。

他凶狠地说：“这些是我为教廷夺取的城市和城堡的钥匙和锁。这些就是我的账目。”

面对着阿尔沃诺斯红衣主教，这位神学院的学生感到了——一个军事家施于弱者的不可抗拒的魅力，而且考虑到在一个教会的仆人身上勇猛和高傲兼而有之，这种魅力就更是增无减。为什么在当今不敬神灵、冷酷无情的时代，他这样的

^① 里恩基（Rienzi），即里恩佐（Rienzo，1313？—1354），领导罗马民众造反（1347），建立新政府，自任保民官，因其专横统治引起人民不满，在暴乱中丧生。

人不能复活以复兴天主教？

当加夫列尔漫步在大教堂时，他赞叹大祭台的栅栏，那是比利亚尔潘多的惊世之作^①。它的黄金的枝叶已显得陈旧，黑色的横穿枝条上已暴露出锡焊的斑点，这些锡的焊点肯定了那些乞丐和教堂的导游的说法：这栅栏是银的，只是受俸神甫先生们把它涂黑了以免被拿破仑的士兵抢走。在栅栏后面，大祭台的装饰屏展示其精细古老又庄严的包金制作工艺，那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世界，在抽纱小华盖下表现了耶稣受难始末的各个戏剧故事场面。在装饰屏和栅栏之间，似乎黄金沿着雪白的墙壁点点滴滴往下滑流，在方石的接缝处勾勒出耀眼的线条。在齿形尖拱下面是卡斯蒂利亚最古老国王们的墓穴和门多萨红衣大主教的陵寝。

在屋顶饰物的末端，有一支穿着严格的法衣、双翼收拢、哥特式天使们组成的无声的乐队，弹着诗琴和古琴，吹着笛子。在壁柱的中心部位，圣徒主教们的形象和历史传说人物的雕像浑然融为一体。一边，是善良的阿卜·瓦利德法律博士，由于他的宽容精神在一所基督教教堂留下他永垂不朽的形象。在对面，是神秘的拉斯纳瓦斯牧羊人，他给基督徒指明了胜利的道路，之后就像神的使者一样消失了，留下一个可怜巴巴的乡下人的形象，用一顶粗劣的风帽遮掩着扁平的脸部。在铁栅栏的两侧，作为大教堂昔日财富充裕的见

① 这栅栏最完美最全面代表了西班牙花式栅栏的风格，由弗朗西斯科·德·比利亚尔潘多制作。栅栏经大马士革方法处理，镀上金银，上部是冠有巨大耶稣受难十字架的王徽。制作历时六年，于1548年完成。

证，有两座华美的大理石和鍍花青铜讲道台。

加夫列尔向唱诗堂看了一眼，他为受俸神甫们所坐的罕见的椅子感到惊讶，甚至兴奋地想到也许有一天他能争取到坐在其中，让他的家人们感到十分骄傲。在漫游大教堂时，他再往前走一点，在巨大的圣克里斯托瓦尔^①像前停住了脚步。这是一幅又糟糕又给人印象深刻的油画，一幅粗制滥造的画像，整个画布占据从踢脚一直到正檐整整一面墙，从它的面积看似乎它是大教堂唯一当之无愧的主人。士官生们下午来欣赏这幅画，对他们来说这个满面红光、肥胖臃肿的巨人是大主教教堂最杰出的东西。巨人肩负着圣婴，向前迈出他轮廓分明的双腿，身子靠在似一把扫帚的棕榈树枝上。快乐的年轻军人们兴致勃勃地用军刀测量他脚踝的长度，随后估计要多少把军刀才能够上这位神圣巨人的高度。这是他们在军校已经厌烦的数学测算可以做的最立竿见影的运算。这些战争的学子们像淘气的鸟儿一样在大教堂放肆活动使这个学当神甫的学徒工愤愤不平。

有些天早晨，加夫列尔来到了阿拉伯区西班牙人专用的祈祷室^②，专注地观看那些属于这教派、忠实地保持了中世

① 圣克里斯托瓦尔 (San Cristóbal)，生于叙利亚，250 年殉难，其祭祀节日为 5 月 9 日或 7 月 25 日。这名字来源于希腊文，意为“背负基督的人”，暗示了这位圣徒一生传奇神秘的特点。

② 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恢复了阿拉伯区西班牙人的宗教活动，于 1504 年将原教士会议室辟为阿拉伯区西班牙人专用祈祷室，在这里按庄重的礼仪举行宗教活动。书中摩萨拉伯 (mozarabe) 一词为阿拉伯区西班牙人的形容词。

纪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们，在做那种古老的宗教仪式。在祈祷室的四壁墙上，以鲜艳的色彩表现了西斯内罗斯红衣大主教收复奥兰的各种情景。加夫列尔听着摩萨拉伯派教士们单调的吟诵，回忆起在阿方索六世时代罗马宗教仪式和托莱多仪式之间的斗争——外来宗教信仰和本国宗教信仰之间的斗争。为了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信徒们祈请上帝来裁决。国王任命了罗马的保卫者，而托莱多人相信一个比苏埃加河畔的西班牙人——胡安·鲁易斯的剑能捍卫哥特式的宗教仪式。在战斗中，哥特式的每日祈祷胜利了，以它出色的刀砍剑击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是即便在以这种坚决果断的手段表明了上帝的意志之后，罗马的礼仪还是渐渐成了宗教仪式的主宰，甚至使摩萨拉伯的仪式作为已往年代的一种新奇的东西保存在祈祷室的角落里。

下午，当唱诗班结束，关上了大教堂的大门的时候，加夫列尔上去到了钟楼老人的房间，探身到“赦罪门”的游廊。马利亚诺，钟楼老人的儿子，是个和神学院学生同龄的小伙子。他们俩关系密切，由于加夫列尔的学问他敬重加夫列尔，而在教堂的高层建筑漫游时，这个年轻人又为加夫列尔做向导。他们手中掌握了去拱顶的钥匙，进入这个神秘的地方，这里是只有工人们偶尔才上去的地方。

从顶上看，大教堂既难看又粗俗。在早期，石头的拱顶是暴露在外面的，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排朝天的镂空的栏杆。但是雨水糟践了这些拱顶，几乎要毁了这些拱顶，教士会议厅以棕褐色瓦的屋顶遮挡住了大教堂，使大主教教堂有一种仓库或居民大杂院的外貌。扶垛上的球形装饰羞怯地现露在这粗俗的顶部，那些拱扶垛淹没和消失在那些紧挨着大

教堂的枯燥乏味的附属建筑之中，楼梯上小塔形的柱子隐藏在那个粗糙的瓦片的屋脊后。

这两个年轻人，沿着房顶的边缘，在由于雨水长满青苔的飞檐上一步一滑着行走。他们的脚给生命力旺盛的大自然在方石接缝间长出的野草绊住了。当他们走近这些微型树林时，群鸟就一哄而飞跑了。雕刻的凸饰成了这些鸟的避难所。每块石头的凹坑就是一个小小的湖泊，积存着雨水，鸟儿就来此畅饮。有时候，在一个扶垛的尖顶上，一动不动地停歇着一只黑色丑八怪，如同建筑物上一件出人意外的终端装饰物。这是一只乌鸦，在用嘴梳理它的翅膀，它可以在太阳下呆上整整几个小时，人们从下面看去，它就像一只苍蝇那么大小。

那些拱顶使加夫列尔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谁也不能猜想到在教堂的高处存在着那么一个世界。若干年之后，当加夫列尔看见那些高高的游廊，看见舞台上升降布景的梁格结构时，就想起了大教堂的拱顶。这些游廊穿过支撑屋顶的已被蛀蚀的林立的柱子，行走在穹隆圆顶之间，这些穹隆圆顶犹如地面鼓起的一个个积满灰尘的白色肿瘤。时不时有一个窟窿，通过窟窿可以看到教堂的内部深不可测，令人头晕目眩。那是些垂直的射击孔，窄小的井口，在它们的底部人群如蚂蚁般在教堂的地砖上来往走动。通过这些窟窿，放下挂大灯的绳子和把耶稣挂在大祭台栅栏上空的金色的链子。巨大的转轮在昏暗中拨动着它生锈的齿轮、曲柄和粗粗的缆绳，看去如同已被遗忘的刑具。那是大型宗教演出用的暗藏的机关。利用这些装置升挂起圣周^①花烛祭台的巨幅瑰丽的

① 复活节前一周。

帷幕。

当太阳的光线从柱子间照射进来时，铺盖在拱顶上一层层几百年积存的尘土的微粒在翩翩起舞。多少年的蛛网像一把纱扇随风摆动。游客们的脚步声激起老鼠在阴暗的角落里，在遗弃的木头后面急匆匆展开疯狂的赛跑。夜里，黑不溜秋的鸟群从拱顶窟窿眼溜进教堂，在最昏黑的两端扑扇着翅膀。鸱鸢的眼睛在黑暗中如同点点磷火，闪烁发亮。被光亮吓着了的蝙蝠蠢笨地乱飞，它们的翅膀刮着了两个年轻的脸孔。

钟楼老人的儿子察看着混在尘土中的排泄物，一一说出在这石头山之巅栖息藏身的各种鸟禽的名称。这是雕鸢的，那是鸱鸢的，那边远一点的是乌鸦的，他带着敬意说到某种鹰的窠，这种鹰是他父亲年轻时在那地方看见过的。这种凶猛的动物要啄他父亲的眼睛，迫使善良的钟楼人每次察看拱顶时都向守夜人借猎枪。

加夫列尔喜欢那个坐落在大教堂头顶上的奇怪的世界，因为它静谧、肃穆、孤寂。那是阴森的兽类栖息的木材的密林，是在教堂头颅部位拱顶内部被遗忘的密林。仁慈的上帝给了信徒们一个家，给了空间的动物一层宽广的顶楼。

高处旷野的孤寂和八角小教堂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在这小教堂里到处是黄金的杯盏、珐琅和象牙的小箱子等文物；这孤寂和珍宝的奢华形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珍珠、翡翠等珍宝多得堆积如山，仿佛这是些鹅卵石；这孤寂和服装之众多、之讲究形成鲜明对照，在存衣库装满各种面料，用这些衣料可绣制出各种色彩斑斓的服装。

加夫列尔十八岁时就失去了父亲。老花匠看到他全家人

都在为教堂效力，卢纳家族没有中断这神圣的传统，他平静地死了。大儿子托马斯在这儿负责管花园。埃斯特万，在当了多年侍童和教堂司事助理之后，已经是负责维持教堂安静和执掌木权杖，每天收入七雷亚尔，这是老花匠的全部奢望的目标。至于小儿子，埃斯特万先生深信他为教会生了一位先哲，天堂里已经为他保留了一个在万能的上帝右边的位子。

加夫列尔已经在神学院练就了教士的坚强性，这种坚强性使神甫成为一个斗士，使得他更关注教会的利益，较少关心家庭的亲情。因此，他父亲的去世对他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有更为严重的不幸事件在让这个神学院学生操心担忧。

第三章

那正是“九月革命”^①的年代。在大教堂和神学院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早到晚议论着马德里传来的消息。传统和完好的西班牙，有着伟大历史纪念事件的西班牙垮了。立宪议会成了一座火山，对于穿着黑色教士服的人来说，成了地狱的通道，这些教士们围绕报纸组成一个大合唱。每次曼特罗拉^②的演说让他们高兴一回，读着革命者狠狠鞭挞过去的讲话，他们又气得要死。宗教界人士把目光转向堂卡洛斯^③，他在北方各省发动了战争。巴斯克山区的国王一旦下

① 指 1868 年，在欧洲革命运动的影响下，西班牙自由派军官发动了推翻伊萨贝尔二世的起义。这次革命为西班牙第一共和国（1873—1874）奠定了基础。

② 曼特罗拉（Manterola，1833—1891），西班牙的教士和政治家，雄辩的演说家。

③ 堂卡洛斯（Don Carlos），由卡洛斯派宣布为王，命名为卡洛斯七世。他于 1872 年发动了最后一场卡洛斯战争，战争延续到 1876 年。

到卡斯蒂利亚平原，将对一切采取补救措施。但是岁月流逝，堂阿马德奥^①来去匆匆，甚至宣布成立共和国！而上帝的事业没有多大进展。上苍充耳不闻。一个共和派议员向上帝宣战，向上帝挑战，要让上帝哑口无言，不敬神的言行继续不受惩处，胜利前进，口若悬河的言论如同毒化了的水源四处横流泛滥。

加夫列尔处于一种好斗的激情状态。他忘掉了书本，置他的前途于不顾，已经不再想首次主持弥撒。眼看教会处境危险，从他在摇篮里起，就像古老缭绕的香烟和凋谢的玫瑰的香云一样包围着他的几百年昏昏欲睡的诗篇，即将烟消云散，那么他的学业对他还有什么重要可言？……

经常发生神学院的学生失踪，教授们以狡黠的眼色回答好奇学生的提问：“他们在那儿，和好人在一起。他们不能冷静看待发生的事。年轻人干事……干糊涂事。”

这类糊涂事使教授们怀着父辈的满意心情在微笑。

加夫列尔也想做一个逃跑的学生。他相信世界将终结。在有些城市，革命的人群侵入寺院，褻渎寺院。他们还没有像其他的革命那样杀害教士神甫，但是神甫们不能穿着法衣长袍上街，否则就有被起哄和被辱骂的危险。想起托莱多的大主教们，那些勇敢的枢机主教，那些对不信基督的人毫不留情的斗士们，加剧了加夫列尔的战斗性。他从来没有离开

① 阿马德奥（Amadeo，1845—1890），西班牙国王，1870年加冕为王，1871年1月2日来到马德里，但是他的善良的意愿并没有赢得西班牙人的信任。不久发生了卡洛斯战争。他眼看不能维持秩序，1873年2月10日退位，于是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

过托莱多，从来没有走出过大教堂的阴影。对他来说，西班牙是那么大，就像世界的其他地方那么大，他忍不住想看看某些新的东西，想就近欣赏欣赏书中读到的他所钦佩的异乎寻常的事物。

有一天，他吻了吻他母亲的手，面对可怜的几乎双目失明的老太太瑟缩的身子，他也没有太动情。对他来说，神学院比父母的家更温馨亲切。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在大教堂的花园里抽了最后一支烟，也没有向他们透露他的意图。那天夜里他逃离了托莱多，随身带了一条缝在上衣上的圣心披肩和一顶装在衣袋里的漂亮的丝贝雷帽，这是本城修道院里那些白嫩的手缝制的作品。钟楼老人的儿子跟他一起走。他们加入了人数不多的队伍，走过了拉曼恰，之后到了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他们期盼为上帝和国王的事业创立更重要的功业，而不是想去小偷小摸和向有钱人征收税赋。

加夫列尔从那种流浪生活中找到了很大的乐趣，虽然一直不断地提心吊胆，期待接近军队。他们考虑到他的学历以及大主教教堂的几位受俸教士的介绍信，让他当个军官，但对于一个神学方面很有前途的小伙子去冒生命危险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祭司感到惋惜。

加夫列尔·卢纳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毫无战争常识，只怀着逃出牢笼的学生的渴望，但他不能隐瞒那些为基督教信仰而战的军人的眼光使他产生的痛苦的失望。他原来设想找到类似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事情：士兵们为理想而战斗，在投入战斗前跪下祈求上帝和他们在一起，到了晚上，在热忱的祈祷之后，做着纯粹苦行僧的梦入睡，但他遇到的是些武装的羊群，这些羊群不听从牧羊人的话，没有盲

目去死的狂热，却希望战争尽可能延长，以便维持靠国家来养活的懒散流浪生活，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活。这些人见了酒、女人或者钱，如饿狼似的四处蜂拥而上，全不顾忌他们的长官。

这是以往乌合之众的生活，却出现在高度文明之时，出现了手持武器偷抢面包和别人的女人这种返祖习惯，出现了拉帮结派，窝里斗的塞尔梯贝里亚^①精神，以此使某种政治借口死灰复燃。加夫列尔，在这些武器差、穿得更差的匪帮中间，除罕见的例外以外，没有发现有人为一个特定的理想而作战。那是一些为战争而战争的冒险家，一心只想发财。那是些农村小伙子，处于盲目愚昧状态，他们参加队伍就像呆在家里要听别人的话行事一样，他们心灵单纯质朴，坚决相信城里有人在烧杀和吞食上帝的使者，他们上山是为了使社会不陷入残暴荒蛮。大家面临共同的危险，为了躲开敌人而永无止境的艰苦跋涉，在作为他们庇护所的不毛之地和高山峻岭间忍受物质的匮乏，这些对大家无论是满腔热情的，无论是怀疑论者，还是愚昧无知的，都一视同仁。大家都有同样的愿望，就是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能得到补偿，平息他们内心野兽般的狂暴，这种狂暴为剧烈变化的生活所激化，忽而掠夺到特大的财富和疯狂地挥霍，忽而忍受在一望无际、不见人影的旷野行军的艰难困苦。进入一些乡镇，他们就高呼“宗教万岁！”但是，遇到最细微的一点点儿不顺利，

① 塞尔梯贝里亚（Celtiberia），指古时塔拉戈纳西班牙，包括今塔拉戈纳、桑坦德、潘普洛纳、韦斯卡、莱里达、安普里亚斯、赫罗纳、巴塞罗那和托尔托萨等地。

这些为信仰而战的战士们以上帝和所有的圣徒的名义做尽种种坏事，但在他们那些肮脏的誓言中也没忘记说到宗教信仰中最神圣的东西。

加夫列尔已习惯于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但不做那些出丑的事。昔日神学院学生的种种顾忌不见了，泯灭在战争使他成为一个吃苦耐劳又冷酷无情的军人的外壳下。

国王的小姨子，堂娜布兰卡，这位如同传说中的人物，从他面前经过。以她朝气蓬勃的公主的浪漫主义，她想仿效法国旺代战争的巾帼英雄，骑了一匹小马，腰间挎着左轮枪，雪白的贝雷帽下发辫在婀娜摆动，走在那些武装的部落的前头。这些部落曾在半岛的中部恢复几乎是史前时期的生活和战斗。这位巾帼英雄穿一身黑色女骑手服装，在马背上颠簸起伏，成为那些佐阿夫营^①的军旗，那是些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冒险家组成的军队，全球历次战争的垃圾，他们更乐意跟随一位渴求声名远扬的女性，而不愿意参加阿尔及利亚外国军团。

袭击昆卡，这是征战中的唯一的一次胜利，在加夫列尔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头戴贝雷帽的人群，在冲决了像围墙一样不牢固的城墙之后，如同泛滥的洪水涌进城市的各条街道。从各个窗口射出的枪弹没能阻止他们前进。人人脸色苍白，嘴唇失去了血色，眼睛闪着凶光，双手因杀戮而颤抖。战胜了危险，肯定最终他们会成为这城市的主人的信念使他们发了疯。房屋的大门在枪托的打击下倒塌。惊恐万

^① 原指法国旧时的一种轻步兵，原在阿尔及利亚募集，以善于冲锋陷阵并穿阿拉伯式华丽服装著称。

状的男人们逃出家门，来到人流中间，被刺刀捅死；在家里，妇女们蓬头散发，在那些袭击者的手中挣扎，用一只手抓袭击者的脸，用另一只手拼命揪紧她们的衣服。

加夫列尔看见那些最粗野的人怎么在一所学院用枪托砸碎物理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他们冲着那些魔鬼的创造发明吼叫出气，他们以为那些不敬神的家伙用这些东西和马德里政府进行联络。他们用枪和脚捣碎踩破那些仪器金色的轮子、唱片和早期的电池。

这个神学院的学生满意地欣赏这种破坏行为。他也憎恨，但是怀着在神学院培育起来的反思的憎恨，憎恨这些实用的和物质的科学，这些科学在其种种推理之后，最终必然达到否定上帝。那些山区的子孙们以他们圣洁的愚昧，做了一件伟大事业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啊，要是全国都学他们的榜样那该有多好！在过去没有科学那些玩艺儿的时候，西班牙更幸福！要圣洁淳朴地生活，只要有教士的智慧和民众的愚昧就足够了，民众的愚昧可以提供一种上帝赐福的宁静。还要别的东西干什么？我国就是如此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光荣的几百年。

战争结束了。军队从中部被驱赶到加泰罗尼亚，最后，被压迫到边境，不得不向法国海关人员交出武器。许多人得到赦免，都很想回家去。加夫列尔的战友马利亚诺也走了。他不愿意生活在异国他乡。再说，他父亲已经去世，如果他申述他们家的功绩，他为宗教打了三年仗，一条腿还挨了一颗子弹，让他们把教堂的钟楼交给他不会有困难。他几乎可以和基督教的殉教者相媲美。

加夫列尔去了移民局。“我是个军官，不能宣誓效忠外

国的王朝。”他带着从军队的漫画上学来的傲慢这么宣称。那张漫画把旧时尚武精神的典礼仪式发挥到了极致，在画上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腰带上挂着军刀，相互传递着命令，总是自称为军官先生。但是加夫列尔不回托莱多的真实动机是他喜欢随着事物的潮流走，看看新的地方，改变一下习惯。返回大教堂那就是一辈子永远呆在那儿，舍弃生活，而他，在战争中已经喜欢上了世俗的乐趣，不愿意那么快就放弃生活。他年龄不大，还有时间完成他的学业。神甫的职位肯定是静心修养，他不急于回到这种状况。再说，他母亲已经故世，他兄长们的来信也没有告诉他上回廊昏昏沉沉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只是大哥花匠已经结了婚，二哥“木权杖”正和丁子香园的一位姑娘谈恋爱，因为和大教堂以外的人联姻是违反优良传统的。

加夫列尔在移民居留地生活了一年多。他所受的经典教育和因年轻产生的同情心为他开辟了某种道路。他和法国长老用拉丁语谈话，长老们很高兴从那个年轻的神学家那里知道了关于战争的事情，同时他们教给他法文。这些教会朋友把他介绍给亲教会的上层资产阶级教西班牙文课。在他贫困的时候，他和一位正宗的老伯爵夫人的友谊救了他，伯爵夫人邀请他到她的城堡住几天，把这个好斗的神学院学生介绍给她茶话会的高雅和仁慈的人士，仿佛他是参加十字军刚从巴勒斯坦回来。

加夫列尔热切的愿望是到巴黎去。他在法国的生活根本改变了他的思想。他有降落到一个新的星球上一样的感受，对于他这个习惯于神学院单调的生活和那场野蛮、毫不光荣的战争的游牧生活的人，在法国土地上物质的进步，人们精

湛的文明、文化和生活福利使他惊讶不已。现在他想到西班牙的愚昧就感到羞愧。那种西班牙式的夸大其词是靠满纸谎言的文章维持的，这些谎言使他相信西班牙是世界上第一强国，西班牙人民最勇敢、最高尚，而其他民族则是上帝创造的可怜的羊群，只能是邪教异端的牺牲品，一旦他们试图同这得天独厚的国家较量，只能遭到严厉的痛击，而这个国家，虽然吃得差，喝得少，但它有名列前茅的圣徒和基督教界最伟大的首领。

当加夫列尔能自如地讲法语和积蓄了几个法郎可以旅行的时候，他就搬到了巴黎。一位长老朋友先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圣叙尔皮斯区附近的一家宗教书店做清样校对员。在巴黎这个宗教色彩浓重的市区，有专门接待教士和信教家庭，像修道院一样昏暗的旅馆，有仁慈的圣像绘画和雕塑商店，店里充斥了油漆的笑容可掬的圣徒像。就在这市区，实现了加夫列尔的大转变。

圣叙尔皮斯市区的街道和西班牙的街道一样幽静，戴黑面纱的修女们在钟声的召唤下，贴着神学院的墙边走过。对于这个西班牙神学院的学生来说，这个市区犹如大马士革市区之与使徒。法国的文明，讲道理，尊重人类的进步的天主教使加夫列尔感到惶惑、茫然。他那种西班牙式的骇人的虔诚惯于蔑视世俗科学。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智慧，那就是神学，所有其他科学只是些游戏，充其量也只是哄骗永远幼稚的人类。了解上帝和测知上帝的能力有多伟大才是人们唯一能从事的严肃的工作。机器、实用科学的种种发现，所有一切与神性和来世无关的东西都是些哄骗没有信仰的疯子的鸡毛蒜皮的小玩艺儿。

这位神学院的老学生自小就看不起人类的进步，认为那是可笑的骗人的谎言，但他看到法国的天主教界那么庄重地谈论人类进步，他都惊呆了。加夫列尔校对了那么多宗教书籍的清样，他注意到那种他看不起的科学激发起善良的法国长老们深深的敬意，而他们的文化水准永远在西班牙受俸神甫之上。不仅如此，他甚至注意到那些宗教界的代表们面对科学显得谦逊局促，他们有一种愿望，如果他们不被拒绝，将很高兴以和解的办法传播同情心，使宗教的教义不致停留在地上，而在那趟飞速前进的列车上却没有一席之地，这趟列车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新发现把人类引向未来。尊敬的教士们所写的整本整本书都是为了调整，甚至冒一定风险，篡改圣书的启示，使其和科学的发现相适应。加夫列尔在他自己的国家所看到的古老可敬的教会，木然不动，保持了圣事的庄严，不肯屈尊用手指去碰一下，以免碰掉了几百年的尘埃，而在法国，这古老可敬的教会在躁动，希望振兴，把传统的服装当做使它出洋相的老朽的破布头抛在一边，尽力松弛它的肢体以适应科学这个昨天的大敌，今天的大赢家的现代化框架，科学的出现曾经受到火的焚烧和羞答答的改邪归正的洗礼。

这天堂的致命的苹果^①内有些什么呢？为什么在被咒骂了六千年之后，教会自己开始敬重它，并且努力让人忘掉已往的种种迫害？为什么多少个世纪中曾经坚如磐石，迎着迫害、分裂和战争而上的宗教，由于害怕几个人的发现而变软了，卷进了疯狂的潮流，去寻求一切事物的原由和解释一切

① 意指夏娃送给亚当的苹果。

事物呢？有着悠久的信仰的支持，何必寻求理性的帮助来维护宗教的传统和证明它教义的正确合理呢？

加夫列尔小时候，一种强烈的好奇心迫使他弯腰曲背埋头在神学院图书馆羊皮装帧的浩繁卷帙之中，今天他感到了与儿时同样狂热的好奇心。他想了解那种使上帝的教士们神经混乱和使他们间接背叛一千九百年信仰的可恨的科学的神秘的芳香。他希望知道为什么那些神圣的书本自找麻烦、自我折磨，从各个地质年代去解释世界的创造，而这创造是上帝六天内早已完成了的。他希望知道是为了避免什么危险，他们让神性和科学相对质，以便说明神的行为和使这些行为符合科学的结论。他希望知道，那些宗教书籍的作者本能地害怕斩钉截铁地肯定上帝创造的奇迹，而以错综复杂的理由来辩白，却不敢坚持超自然的奇迹不容置疑，证据确凿，那么，他们的那种本能的害怕是出于什么原因。

于是，加夫列尔放弃了宗教书店的安静的环境。他的人文家的名声早已传到了邻近的索邦的一家出版古典书籍的出版社，加夫列尔不用离开塞纳河的左岸，就跳槽到拉丁区去校对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清样。他一天挣十二法郎，比那些托莱多的受俸神甫挣得多得多，而在过去他觉得这些受俸神甫是富得像大公爵。他住在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学生小旅店里。夜里，这些学生在抽烟斗的烟雾缭绕中和住宿的同伴们热烈地争论，他们的争论同那些可恨的科学书本一样教育着加夫列尔。这些学生介绍给他许多书本，或者告诉他在业余时间他应该在圣热诺韦瓦山的图书馆寻找哪些作者的书，他们对昔日神学院学生兴奋地惟命是听，就像非基督徒一样大笑起来。

在两年中间，年轻的加夫列尔不干别的，就是读书。偶尔他自愿放下工作陪同他的朋友们闲逛，沉浸在市区愉快友好的生活中。他在啤酒酒店的小桌上消磨了许多时光。那个叫米米·德·米尔热的好多次在面前走过，她不像诗人^①的作品中那么忧伤。这位前神学院学生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在巴黎附近的森林中，有了他自己的偶像。但是加夫列尔没有谈情说爱的秉性，好奇心和求知欲支配着他。在这几次外出之后，他回来时更清醒，头脑更开窍，仿佛经过了一次平息他青春激情的洗礼，更精神饱满地投入学习。历史，真实的历史的冷漠、清澈，同他童年所读的编年史讲述奇迹那种绕来绕去，如一团乱麻的方式，形成鲜明对照，真实的历史摧毁了他大部分信仰。对他来说，天主教已经不是唯一的宗教。他不再把人类历史以在朱迪亚^②出现的几个模糊不清人物前后分为两个时期。这几个人物分散到世界各地宣讲从东方民族的箴言和希腊哲学的教育中引出的世界性的道德。对于加夫列尔来说，各种宗教是从属于一切机体生存条件的人创造的，在其幼年时期，慷慨大度，能盲目做出牺牲，在其壮年，有吸收能力又专横，从前的甜言蜜语变成了以权力强加的霸道，到了其无可救药的晚年，是缓慢的垂死阶段，使一个病人猜想到行将入木，却以绝望的忧虑抓住生命。

从前的信仰试图在加夫列尔心中复活，力争把支配着他

① 米尔热（Murger）是法国的作家、诗人（1822—1861），这位法国姑娘和诗人同姓。

② 朱迪亚（Yudea），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

的种种新的信念抛得远远的，但是次日的阅读足以抹去夜里动摇他思想的朦胧的回忆。对于加夫列尔来说，天主教已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种种表现之一，这种思想希望解释人在地球上存在及其死后可能存在的骇人的奥秘。这两个问题是自从人类脱离了史前蛮荒时期就一直让人关心的问题。人类脱离了蛮荒时期，有了让其躲避野兽的屋子，御寒的衣服，耕种土地以保证其营养，后来才能发展其最迟发展的官能：思维。

他对天主教作为唯一的宗教的信仰已完全消失。当他失去了对教义的信念，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他也失去了对于曾经驱使他在丛山间打仗的君主制的信仰。现在他清楚地评价他的国家的历史，而没有种族偏见。外国的历史学家向他展示了西班牙悲惨的命运。当年轻、生气勃勃的西班牙走完了中世纪的丰盈富饶时期，由于教士和宗教裁判所法官的狂热和几位国王的疯癫，西班牙停留在其发展的危机时期。这几位国王缺少办法，却要恢复恺撒大帝的君主制，在这一疯子的事业中耗尽了国力。那些已经和教廷决裂，永远背弃罗马的国家，比那个如同教堂门口的乞丐一般还在瞌睡的西班牙，要繁荣幸福。

在加夫列尔智力发展的这一阶段，他有了一个崇拜的偶像。许多天下午，他放下工作，去法国中学听他一小时课。此人就是埃内斯特·勒南^①。加夫列尔对他倍感亲切和钦佩，这是由于他的才能和他的历史。他出生在一个和他一样的家

^① 埃内斯特·勒南 (Ernest Renán, 1823—1892)，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大胆的历史学家，著有《天主教之起源》。

庭。这位伟人也进过神学院，而且仍然保持着某种教士风度，似乎教会模子的重压给他留下了更深的印记。他是个叛逆者：“推倒教堂的锤子是在教堂内部锻造的。”当信仰逐渐消失，广大群众不再感觉到初始期的恩惠，一切宗教都遵循不可避免的规律。

加夫列尔惊讶地看到这位智者如何一点一点揭示曾经成为天主教基础的希伯来人民的智力根源，看到这位智者如何一件一件拆卸开人类在其面前跪拜了十九个世纪的巨大的圣台，指明各个装配件的不同来源。这个西班牙神学院的学生以一种冲动的刚烈性格的全部怒火对过去的信仰感到愤慨。他过去可以对一切全都相信，认为那是人类智慧的总结！天主教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起着有益的作用。在中世纪，当人们不能离开宗教一步，天主教充实了人的生活，在这个被种种斗争毁坏得满目疮痍的地球上，没有别的希望，只有寄希望于天国，对于思想没有别的庇护所，只有城里的教堂和农村的寺院。“那些集市，做生意或娱乐的集会，正如他的老师所说，是些宗教的节日；舞台演出是些圣迹剧；旅行漫游就是朝圣，而战争，则是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生活就分开了：一边是宗教性的，另一边是人所固有的。艺术置大自然于理想之上；人们更多想到在地上而不是在天国；产生了理性；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信仰的倒退一步；最终到了这样的时刻，那些有洞察力的人，那些为前途忧虑不安的人，已经想到该是什么新的信仰来取代垂死的宗教。加夫列尔毫不犹豫地认为：科学，只有科学将占据永远死亡的宗教留下的空白。

由于他已习惯于天天和希腊作者交往，他老师的古希腊

文化很容易在他身上生根。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他梦想未来的人类将是个巨大的雅典，一种艺术和智慧的民主，由伟大的思想家治理，除各种思想的斗争外没有别的斗争，没有别的希冀，只有把智慧琢磨得更光辉，使风俗习惯亲切优美，使精神愉快和理智得到陶冶的希冀。

对他过去的老信念，加夫列尔只保留了上帝是造物主的思想，还有某种迷信的顾忌。使他有点茫然的是天文学。他为天文的美妙魅力所吸引，几乎怀有幼稚的热情投入这方面的研究。在这片过去是众多天使翱翔其间和作为圣母下凡的通道的无穷无尽的空间，突然布满了亿万个世界，而且随着人创造的器械功率越强大，世界的数目就越增多，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无边无垠的空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一些物体和另一些物体相互吸引，围绕着空间以每分钟千百万莱瓜^①的速度转动，整个这片众多世界组成的星云下降又下降，在这静谧的无边无垠的空间，没有第二次经过同一个点，而且随着观测器械的不断改进完善，又出现一批又一批天体星球。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地球，用泥巴造了两个清清白白的人、吹口气让他们长了血肉，但它又为这两个人的任性感到忿怒，它从无到有创造了太阳和千百万个世界，其中太阳只照亮这个无边无垠的空间中可怜的一颗尘埃分子般的星球。在这无穷无尽的空间，这个上帝又在哪里？

当加夫列尔的上帝失去了种种宗教赋予他的肉体的形式并融入天地万物的创造之时，也就失去了他的一切特性。在上帝不断长大以致充满无穷无尽的空间并与之混为一体时，

^① 莱瓜 (legua)，西班牙里，约合五点五公里。

对人的思想来说，上帝变得如此虚无飘渺，如此触摸不到，几乎成了一个幽灵幻觉。正如叔本华^①所说，泛神论等于因其无用而辞退了上帝。

加夫列尔的学生朋友们把达尔文、毕希纳^②和海克尔^③的书送到他手里，也把自然界创造的秘密送到他手里，在消除了神的万能之后，这秘密使他的思想不得安宁，在他眼前神的万能被粉碎了。他看到了生命如何在这颗在空间转动了亿万年的星球上产生，经历了种种灾变和变迁。当地球年老冷却了它的外壳，由于种种有利环境的结果生命才露头，并适应环境的条件，开始有了生命的微型和羞怯的形式，如刚才覆盖在岩石上的苔藓，刚能看出一个初步机体的迹象的动物。以此为自然界创造的前奏，开始有生命，经过亿万年的发展，由于地球生长中最后几次危机震动地球造成的灾变使生命几次中断，又以盲目的顽强精神继续向前发展，赋予大自然以生气。这是一根经过流产的形式又经过筛选优胜的机体不断进化的无比长的链条，直至达到人，人又经过他的头颅内物质的极大努力，脱离了兽性，脱去了他祖先的野兽的

① 叔本华（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哲学家，惟意志论的创始人，认为意志是人的生命的基础，也是整个世界的内在本性。著有《意志和表象世界》、《论自然界的意志》等。

② 毕希纳（Büchner，1813—1837），德国戏剧家，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地下革命组织“人权协会”，号召农民起来斗争，代表剧作有《丹东之死》、讽刺喜剧《莱翁采和莱娜》等。

③ 海克尔（Haeckel，1834—1919），德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支持者，提出生物发生律，为进化论提供了有力证据，主要著作有《人类发展史》、《生命的奇迹》等。

外貌，把他的祖先作为奴隶，统治了这星球。

在加夫列尔身上，他旧时的理想已一无所剩。他的意识成了被大风刮过的一片光秃的空地。他最后的信仰，依然如独石碑屹立在废墟中说明天地万物起源的最终信仰，倒塌了。加夫列尔告别了上帝，仿佛告别一个在人与大自然之间进行调解的抚慰人的幽灵。

但是，这个从前神学院的学生不可能有了新思想的学识而静止不动。他需要信仰些什么，以他的性格和信念去捍卫一种理想，发挥他在神学院辩才课上令人钦佩的那种争取信徒的热忱。革命的社会学支配了他。首先是蒲鲁东^①，他大胆的著作影响了他；之后是和他在同一印刷厂工作的几个战友补充完成这件事。他们是巴黎公社老战士，刚从流放地或从大洋洲的监狱回来，他们以因遭受痛苦而倍增的热忱和要复仇的渴望重又开始反对社会组织的运动。他和他们一起去参加无政府主义的会议，他听埃利泽·勒克吕^②和俄国前贵族克鲁泡特金的演讲，而已过的巴枯宁的话，在他听来如同是一个未来的圣保罗^③的福音书。

① 蒲鲁东（Proudhon，1754—1826），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主张各阶级进行经济合作，废除国家，著有《什么是财产？》、《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

② 埃利泽·勒克吕（Eliseo Reclus，1830—1905），法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著有《世界地理》。

③ 圣保罗（San Pablo），基督的使徒之一，67年殉教于罗马，教会纪律和基督学说的初创者之一，写有许多收入《新约》的使徒书。

加夫列尔已经找到了他新的宗教，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不幸的人们相信了来世的信仰，从死后的幸福得到虚假的安慰。但是宗教是骗人的，不存在现世以外的生命。加夫列尔对社会的不公正感到义愤，这种不公正为了数千个特权者的幸福，置千百万人于贫困之中。他认为，权威这个一切弊病祸害之源，是最大的敌人。必须置之于死地，但先要创造没有主人、教士和士兵能生存的人。他温柔的性格，以及在打了三年仗之后，他对暴力的仇恨，使他离开了那些新同志。这些新同志幻想用炸药和匕首进行屠杀以令世界惊恐，迫使世界因害怕而接受新的学说。不，他相信思想的力量，相信人类无害进化。应该像天主教的首批使徒那样工作，相信未来前途，但是不急于看到他思想的实现，把目光放在当天的工作，而不去想经过多少年，多少世纪才产生的后果。

争取信徒的热忱使他五年后离开了巴黎。他渴望看看世界，自己去研究社会的贫困状况和贫穷人具有的实现自身伟大转变的力量。此外，他讨厌法国警察由于他和拉丁区俄罗斯学生的密切关系对他的监视。这些俄罗斯青年目光冷漠，头发散乱下垂，敢于在巴黎用民粹主义的手段进行复仇。他在伦敦认识了一个英国女青年。这个女青年身体有病，和他一样受了革命宣传热忱的鼓动，从早到晚在步行街和工厂周围散发小册子和印刷品。她把这些小册子和印刷品放在她一直挎在手臂上的一只帽子盒里。露西不久就成了加夫列尔的伴侣。他们相爱不是出于冲动，他们有一种冷静沉着的激情。他们相爱不是出于异性本能的接近，而是出于共同的理想，这是以背叛现存的一切的思想为统治地位的革命者的爱情，而不给其他情感留有余地。

加夫列尔和他的伴侣去过荷兰和比利时，后来又定居德国，一直和一群群朋友旅行，从事各种工作。普天下的革命者很容易相适应，他们没有钱，就忍受艰难困苦走遍世界，但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总会遇到一只兄弟般的手，把他们扶起来，送他们重又上路。

这么生活了八年之后，加夫列尔的女友因痼病而死去。那时他们在意大利。加夫列尔只有孤身一人，他第一次意识到他生活的伴侣曾经给他的温馨和支持。他忘记了自己革命的热情而为露西痛哭，为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空白而悔恨。他没有像其他男人一样关爱她，但她是他的伴侣，他的妹妹；他们俩趣味和爱好相投；共同经历的贫困给他们铸就了同一个意志。另外，由于那种激动人心的冒险生活和痛苦的贫困匮乏，加夫列尔在此之前就感到自己衰老了。在欧洲好几个地方，他们因怀疑他是恐怖分子的同谋把他关进监狱。警察许多次拷打他。他开始难以在欧洲大陆旅行，因为他的照片在主要国家的警察局里和许多同伴的照片放在一起。他成了一条危险的野狗，最终到处被人用脚踢出国门。

加夫列尔不能独自一人生活。他看惯了身边一双蓝蓝的眼睛，听惯了像鸟儿一样婉转悦耳的声音，这声音在困难的时候始终在鼓舞他。在露西死后，他不能承受在异乡客地的孤独落寞。在他身上激发起了对故土强烈的眷恋。他希望回到西班牙，回到他曾经那么冷嘲热讽的西班牙，尽管她的落后根深蒂固，但现在他觉得颇有好感。他想念他的兄长们，他们仍然如同植物一样攀附在大教堂的方石上，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也不寻找有关他的消息，似乎已经把他忘却。

他突然间有一种冲动，仿佛害怕自己死在远离故土的地方，返回了西班牙。在巴塞罗那，朋友们让他领导一个印刷厂，但担任这职务之前，他想去托莱多住几天。他回来了，四十岁不到的人未老先衰，他会讲四五种语言，但比离开托莱多时更贫穷。他知道了他大哥花匠已经去世，他的遗孀和儿子一起栖身于丁子香园的一间阁楼里，给受俸神甫们洗衣服。“木权杖”埃斯特万，在那么长期未见面之后，还是以他在神学院时一样的钦佩招待他，夸奖他在外游学，召集上回廊的人来听这个周游世界各地就像在自己家中闲逛的人讲话。在他们的提问中，很可怜的地理知识一片混乱，他们只知道一种地理区划：异教徒国家和基督徒国家。

加夫列尔同情怜悯这些人安于贫困；敬佩他们驯服地为教堂效力，满足于生于此又死于此，对四壁高墙外发生的事无心去打听。他觉得教堂是一大片废墟。

教堂是昔日一种强大坚固的动物的头骨架，但是这动物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死了，它的躯体在肢解，它的灵魂在消亡，除了那层外壳没有留下别的痕迹，如同地质工作者在史前矿藏中找到的甲壳，从它的结构上让人猜测到已经消失的物体的柔软部分。他看到那些过去使他感动的宗教活动仪式，感到不满情绪的冲动，想高呼让神甫和助祭们都退位，因为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信仰已经死亡，但是出于陈规和害怕外面的议论，人们才又回到这些过去从早到晚充满宗教热忱的地方。

加夫列尔回到巴塞罗那时，他还活着激起了一股争取群众、展开斗争和遭受迫害的旋风。同志们尊敬他，把他看做是理想的伟大宣传家们的朋友，是个几乎走遍整个欧洲并同

最著名的革命者们通信的人。凡举行会议，必有卢纳同志出席。他那种曾经在神学院学习之初就令人惊讶的天生的辩才，在革命的会议上如同令人陶醉的气体在膨胀、扩散，激励起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贫穷困苦的民众，他们在这位使徒描写的未来社会面前感情激动。在这个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天堂的城市里，没有产业，没有恶习，没有不平等，那里劳动将是一件愉快的事，除了科学和艺术外没有别的宗教信仰。有些听众，那些最忧郁的人，听了 he 铿锵有力的咒骂和对消极抵抗胜利的娓娓动听的介绍和高唱的赞歌，都在微笑，显出同感的表情。他是个大家应该听他讲话的思想家，因为他服务于理想的事业。他们作为人、斗士，会默默地把可诅咒的社会埋葬掉，因为这个社会对真理的声音充耳不闻。

当大街上发生炸弹爆炸，由于卢纳同志的名字太出名了，是第一个因这场灾难被抓的，他也是第一个进监牢的……啊，在蒙特胡伊奇要塞关了两年！这两年在加夫列尔的记忆中犁开了一条深深的垄沟，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痕，稍一回忆起来就疼痛震颤，扰乱他的平静，使他因恐惧而打寒颤。

社会害怕得要疯了，人人自危，为保护自我而置法律和对人尊重于不顾。过去几个世纪以暴力手段执行的司法在充分文明的时代死灰复燃。由于宗教信仰和疑虑，他们不信任法官而起用役吏，要他们重新使用古老的刑具。

夜里，万籁俱寂，加夫列尔看见他阴暗的地牢，透进亮光，几个穿制服的人推他上楼梯，一直进到一间屋子，屋子里另外几个穿制服的人手持大棒在等候着他。一个年轻人，

说话声音很甜，带着中尉的肩章领徽，一幅克里奥尔人^①懒散的神气，向他提了几个关于在几个月前在城里发生的袭击事件的问题。加夫列尔一无所知，一无所见。也许那些恐怖分子是他的同志，他眼睛凝视着上方，考虑着他要说的看法，但没有注意到在他周围暴力正在萌生。他断然否定的回答激怒了那些人，克里奥尔人甜润的嗓音由于愤怒而升高了，在威胁和咒骂声中，他们所有的人都扑向他，整个地牢开始了对人的狩猎，大棒落到了他身上、头上和腿上，追赶到墙角打，当他绝望地一跳，压低着脑袋，冲到对面墙边，他们继续不停地打。他的背部挨着棒打，发出一只空箱子的砰砰声。有时候，痛苦的绝望会激奋受害者，羔羊会变成猛兽。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在他倒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抽搐之前，他冲向那些刽子手，抓挠他们，想咬他们。加夫列尔至今还保存着克里奥尔人制服上的一粒扣子，这是他一个弱者如此多次反抗中留在他手指间的。

之后，这些酷刑手打累了，眼看他们的暴力也无能为力，就把他遗忘在地牢里。一个面包和几块干咸鳕鱼就是他的饭食。干渴，极度的干渴，干渴得他五内如焚，喉咙冒烟，嘴巴着火。开初，他从门底下，以痛苦难忍的声音要水喝。后来，他不愿意哀求了，因为他早就知道回答他的是什么。那是一种预谋的刑罚。他要多少水他们可以给他多少水，但是只有在他告发了事件责任人的名字，确认了那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之后。饥饿随着干渴在他身上开战，但他更怕

^① 克里奥尔人，一般指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或不在欧洲出生的欧洲人。

干渴，他把那些咸得齁人的食物像毒药一样掷到墙角。他做噩梦，说胡话，在苦水恶浪中要淹死的人还死死想着要水喝。在他的噩梦中，他看到了清澈淙淙流着的小溪，宽阔的江河。为了给他的嘴寻找一丝清凉，他用舌头去舔肮脏的墙壁，舌头接触到粉刷墙壁的石灰感到缓解一点焦渴。关在牢房里，没有吃喝，加上可怕的梦呓，使他神经错乱，智力尽瘁。许多次加夫列尔突然发现在牢狱中有四条腿，不知为什么冲着门哼叫和狺狺狂吠。

对他施酷刑的那些人似乎把他忘了。他们另有一些犯人要照顾。狱卒给了他水，过了整整好几个月没有任何人进他的牢房。有几天夜里，透过厚厚的墙壁，他隐隐约约听到从附近地牢里传来遥远的哀叹声和呜咽声。一天早晨，几声雷鸣把他惊醒，虽然一线阳光正透过小窗子照射进来。他听见狱卒们在附近走廊里走动，他明白了这奥秘。他们又枪杀了几个囚犯。

加夫列尔把死的希望作为一种幸福来欢迎。他愿意欣然放弃在这石头笼子里那尚存的一息生命。他受损的身体和对那些人的残忍的恐惧折磨着他。他的胃给缺食少喝伤害了，好多天来感到可怕的恶心，拒绝接纳粗硬的面包和一勺难以下咽的菜。长时间的呆着不动，稀薄的空气，缺少营养已经使他得了致命的贫血。他连续不断地咳嗽，感到胸口压紧。在他对一切都勤奋好学中获得的人体知识使他不能欺骗自己，他将像可怜的露西一样死去。

在被监禁了一年半之后，他混在一批悲惨的人群中出席了军事法庭，这人群中有老人，妇女甚至青少年，他们个个因坐牢而骨瘦如柴，身体受到摧残，皮肤像被捣碎的纸一样

苍白没有光泽，由于长期禁闭眼睛出现斜视。加夫列尔但愿他们把他杀了。当检察官在长长的起诉书中念到卢纳的名字，他停顿了一下，用凶狠的眼光扫了加夫列尔一眼，被告人为“理论家”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未直接参与暴力事件的证人的声明中，这些证人在他们的谈论中谴责暴力事件；但是不要忘了他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宣传鼓动人之一，他曾经在袭击事件的主犯们经常出席的各个工人协会发表演说。

一位老年的上尉凑近了军事法庭另一个同事的耳朵，加夫列尔听见他这么说：“对于那些发表演讲的少爷们应该严加惩处，让他们吸取教训，不再讲托尔斯泰、易卜生以及所有那些教人丢炸弹的外国佬。”

加夫列尔单独在牢房里关了好几个月。根据听到的狱卒的片言只语，他的命运可能会继续漂浮不定。他可能会和他所有不幸的同志们一起给送到非洲去服苦役，或如人们向他预言的，马上会获释，或者如他们向他预示的，会集体枪杀。他两年后离开了阴森凄惨的要塞，和所有他的被强迫移民的同志一起都上了船。加夫列尔已是没有了人形。他身体虚弱得像个孩子一样走路东倒西歪、颤颤悠悠。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的惨状，怜悯起另外一些病得比他更重的同志们，他们身上留下了明显的受刑的累累伤痕和野蛮的窒息造成的性萎缩。恢复自由使他重又产生了他从前的温和柔情，对所有人都同情的哲学，原谅了他们的错误。他的同志中那些最勇敢的人，在英国上岸时就谈论今后要向刽子手们报仇，而加夫列尔则请求饶了他们，这些是在恐怖时期被社会使用的盲目的工具，他们还信以为他们用的野蛮办法拯救了社会。

伦敦的气候使加夫列尔的病极端恶化。两年后他不得不

搬回欧洲大陆，尽管英国有其绝对的自由，是他唯一能平静和无人知晓地生活的地方。

他的生活是严酷的，一直漂泊于欧洲各国之间，警方的监视把他从一个国家赶到另一个国家，由于最细微的一点可疑之处，就把他投入牢房或驱逐出境。这是中世纪迫害吉卜赛人的古老方法，对独立的、生活流浪不停的人进行追逼驱赶，这种古老的方法在充分文明的时代又复活了。疾病和对安宁的渴望使他回到了西班牙。随着时间的流逝，西班牙对流亡者有了某种宽容。在西班牙现在一切都已忘却，虽然当局比其他国家更为凶残，较不认真，但由于种族所固有的缺少远谋和漫不经心，也就不太费心去找他麻烦。

一身的病，没有一个可以维持生计的职业，又不能去印刷出版部门找工作，因为他的名字就使老板们害怕。加夫列尔陷入贫困，而同志们的援助不够他需要。他走遍伊比利亚半岛，在自己人中间乞讨度日，又得躲着警方。

他的情绪低落。他是个败兵，不能继续斗争。他只有等死，但是慈悲的死神却迟迟不召唤他。他想到他的哥哥，在这世界上剩下的唯一的亲人。他回忆起那个丁子香园安居的家人，想念他最后一次去大教堂见过的家人。作为最后的希望，他去找这个家。

他回到托莱多，发现这个幸福的家已经四散分离。在这个宁静不变的角落也发生了不幸事件。

但是，那座对人间变迁无动于衷的大教堂依然如故。他紧紧抓住大教堂，深深躲藏在其中以求平静地死去，他没有别的愿望，只求被人忘掉，早早死去。他喜欢那种隐姓埋名的苦涩的幸福，把那种曾经引起他对社会的仇恨的叛逆性，

如同一头野兽脱去它的外皮一样，统统都留在大门外。

他的幸福就是不想，不说话，使自己适应那个死亡了的世界。他将只是在居住在上回廊的活的泥塑木雕中又一个没有头脑的机械人，他将学习一点那些孺子身上所具有的扶壁花岗岩的坚硬粗糙性，企盼如同一块镇静的香胶，吸入生锈的铁栅栏多少世纪来在大教堂散发出的老朽的芬芳。

第 四 章

每天早晨，天亮后不久，当加夫列尔出门来到回廊，他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堂安托林，外号叫“银权杖”。这位神甫按大教堂总管的模式行使权力，因为非教会的仆役人员都听他管，所有不太重要的工作都在他的监督下进行。

在下面，在教堂内，他监督那些教堂司事和助祭人员，注意别让受俸神甫和受俸教士抱怨服务工作粗心大意。在上面，在回廊，他关注良好的秩序和各家各户健康的生活习惯，由于红衣大主教的恩典，他成了那个居民小村的村长一类的人物。

他占据丁子香园最好的住房。在盛大的节日活动中，他手持一根与他一边高的银权杖，身穿主祭法袍，走在教士队伍的最前面，手中的银权杖敲击得石板路面都在颤动。在做大弥撒和下午唱诗的时候，他在各殿堂转悠以免教民们有什么不敬的行为，以及职员们出现心不在焉的情况。冬天晚上八点，夏天晚上九点，他锁上回廊的楼梯门，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全体居民就和城市相隔绝。要是有时候有人晚上病了，就必须把堂安托林叫醒，他把手伸进他教士服的深处，

有劳他用他的钥匙重新沟通和世界的联系。

他已年近六十，身材瘦小干瘪，但年龄还几乎不曾使他的鬓发染霜。他剃了个光头，前额宽阔，正方脸型，几乎没有一点曲线。这脸型在他冬天戴的丝织帽子下，凸显如一块骨头的薄板，两边有棱有角。脸部绷紧了，没有一点皱纹，也没有一丝表露情感的变化。下巴颏又窄又尖，如同铁矛的尖。两眼和他的脸一样没有表情，纹丝不动，但是冷峻的目光逼人，令人茫然。

加夫列尔在童年时就认识他。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教会的普通一兵，以他多年服役努力，上升到了军士级，到此再上不去了。在加夫列尔进神学院的时候，堂安托林在大主教教堂从侍童做起，在圣器室度过了半辈子之后，刚任命为神甫。虽然他愚昧无知，但由于他绝对的、无理性的信仰，由于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教会，神学院的先生们使他事业上步步升迁。他是本地土生土长，生在托莱多群山中的一个乡村。对他来说，托莱多大主教教堂是世界第二大教堂，仅次于罗马圣彼得教堂。对他来说，教会的学说是神圣的智慧射出的一束束光辉，让他眼花缭乱。他怀着愚昧无知者的深深敬意崇拜这些学说。

他具有神圣的坚定和盲目的信仰，这在过去几个世纪是教会十分珍视的信仰。加夫列尔相信要是“银权杖”生在天主教的鼎盛时代，他在精神生活中一定已经成了圣徒，或者他主管教徒的教规一定在宗教裁判所起到出色的作用。但他在天主教衰落的时代来到这世界，信仰在削弱，教会已经不能靠暴力让人崇敬。天真的堂安托林在大教堂的底层的管理工作中黯然失色，帮助主管财务的受俸神甫分配和确定国家

拨给大主教教堂的钱财，每分钱他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推敲，努力使得这神圣的家，如同许多破产的家庭一样，保持它良好的外表，不要显露出它的贫困相。

他们好多次允诺让他担任管理修女小教堂的神甫，但是他是一个忠于大教堂的信徒，是个酷爱这所孤傲的大教堂的人。他对大主教大人给予他的信任感到骄傲，也为受俸神甫和教士们和他谈话的友好直率，以及他同财务主管和司库举行的秘密行政会议感到骄傲。因此，当他穿上主祭法袍，手握银权杖，各个村镇的教士顺道路过大主教教堂走进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显出某种瞧不起人的优越神态。

他的毛病纯粹是教会人士的毛病。他悄悄地积蓄钱财，具有着各个时代大教堂人都具有的冷漠、专横的贪婪。他的沾满油垢的四角帽永远是某个受俸神甫嫌它旧而丢掉的。他呈绿黑色的教士服和他的鞋，过去是某个受俸教士的。在丁香园，人们小声议论堂安托林积蓄的钱，说他把积蓄的钱用来放高利贷，这些借给大教堂的穷人——迫于贫困的役工——的贷款，不超两三个杜罗^①。每到月初主管财务神甫发钱时，他就加利收回。对他来说，贪婪和放高利贷是同绝对忠于大教堂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圣器室苦苦追求哪怕最微小的赚头。他向教士委员会交账是那么细枝末节，连财务主管都讨厌了。每个人各尽其职嘛！教会很穷，从教会即便只克扣一分一厘都是该下地狱的罪孽。他作为上帝的忠实奴仆，也很穷。他在贫困之中，忍受了痛苦的匮乏，靠他勤奋节俭积聚起来了钱财，他相信从这些钱再生点小钱他没有

① 西班牙旧时的一种银币，相当于五比塞塔。

什么错。

他的侄女玛丽基塔和他生活在一起。她很难看，长着男人的相貌，肌肉丰满健壮。她是从山区来照顾她叔父的。在他们村里亲朋好友对她叔父在大教堂的财富和权力夸奖赞美有加。在丁子香园，她滥用堂安托林的绝对权威，常常虐待所有的妇女。那些最胆小的女人在她的周围形成了如同一帮阿谀奉承的朝臣，以便赢得她的保护。她们给她打扫屋子或做饭做菜，而玛丽基塔则穿着法衣，仔细讲究地梳好头（这是她叔父唯一允许的奢华），走出家门来到回廊，希望有某个士官生上前来问候她，或者希望去钟楼或去巨人模型厅的外来游客注意到她。她用她柔情脉脉的眼睛观看所有的男人。她这个对妇女们那么粗野霸道的女人，对所有居住在丁子香园的单身男子都微笑相迎。塔托是她的好朋友，她叔父不在的时候她就去找他，笑话他学斗牛的雅兴。加夫列尔以他的病态、神秘的冥思苦想、周游世界的琢磨不透的经历，令她也不乏兴趣。甚至对年老的“木权杖”谈话，她也怀有明显的敬重，就因为他是男人，而且丧偶。正如那个打狗的塔托所说，男子汉都会让这可怜的女人发疯，因为在大教堂那个家里大多数男人都显得女人气。

堂安托林在加夫列尔年幼时就认识他，跟他亲切地以你相称。这位愚昧无知的教士还记得加夫列尔在神学院取得的伟大成功，现在虽然见他贫病交加，几乎像求施舍一样在大教堂避难，他那种表示优越地位的你的称呼仍然带有一定的敬佩。从加夫列尔来说，他害怕“银权杖”，因为他了解他那不能容忍的狂热。因此加夫列尔仅限于听他说，小心翼翼地在他的谈话中不要漏出泄露他过去情况的片言只语。因为

“银权杖”可能会是要求把他逐出教堂的第一人，而加夫列尔希望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大教堂。

每天早晨，他们两人相见，总是以同一句问话开始攀谈：“身体好吗？”

加夫列尔表示乐观。他心里知道他的病已无可救药，但是平静、没有激情的生活，他哥哥不断的照顾，就像喂鸟一样几乎时时都在强迫他吃东西，支撑着他病人膏肓的身体。这病情还慢慢拖着，死还不那么容易。

“我好一些，堂安托林。昨天情况怎么样？”

“银权杖”把他一双瘦骨嶙峋的脏手伸进教士服深深的口袋，掏出三本票据簿：一本红色的，一本绿色的，第三本是白色的。他一页一页翻过去，查看已撕去门票的存根单据。满怀敬意抚摸着这些本子，仿佛它们比唱诗班的大本乐谱经书还重要。

“不大好，加夫列尔！现在是冬天，外出旅行的人很少。旺季是在春天，据说，那时候英国人从直布罗陀海峡进来，去逛塞维利亚的集市，然后来看一看我们的大教堂。再说马德里人天好才外出，虽说不很情愿，也会掏腰包看看巨人模型和大钟。于是我很高兴地给撕票据。有一天，加夫列尔，我收了八十杜罗。我记得是最近一次圣体节。玛丽基塔不得不给我重新缝好教士服的口袋，因为那么多比塞塔的重量把口袋弄破了。这是主的赐福！”

他伤心地看着单据本，似乎在悲叹冬天的日子过得一天撕不下一两张门票，如何消耗那些观光大教堂的宝贝和新奇东西的门票这个任务充斥了他的头脑。这是在拯救教会，是使教会继续发展的现代手段，他为自己在这起作用而感到骄

傲，这作用使他成为大教堂生命中最重要器官。

“你看见这些绿单据了吧？”他对加夫列尔说，“这是最贵的门票：每张两比塞塔。买这门票可以看最重要的东西：珍宝室、圣母小教堂、八角楼及其文物，这些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物。其他教堂的文物跟我们的相比，那是一堆破烂货，由于妒忌我们大主教教堂，他们还编造出许多骗人的鬼话。你看见另外一些红颜色的单据了吗？只值六雷亚尔，凭这门票可以参观六间圣器室、服装间、堂阿尔瓦罗·德·卢纳和阿尔博诺斯红衣主教的小教堂和教士会大厅，那里挂着两排大主教的肖像画，那真是一大奇观。谁不摸摸口袋来看看这样的奇才们？”

之后，他又补充说，一边有点瞧不起地指着最后一本票据说：“这些白票只值两雷亚尔，只可以看巨人模型、钟楼。这种票在节日里来大教堂的普通老百姓中卖得很多。竟然还有犹太人表示抗议，说这是在抢钱，你信吗？有一天，三个军校的士兵，带了几个乡下佬来看巨人模型，闹了一场风波，因为为了一角钱没让他们进门。好像我们是要饭的！他们对教会说了许多恶言恶语，仿佛他们是些异教徒，在楼梯上用木炭画了些讨厌的东西，或者写些下流话。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加夫列尔你说呢？”

加夫列尔默然微微一笑，“银权杖”为这沉默感到鼓舞，觉得这表示赞同。他略带骄傲地补充说：“门票这件事是我发明的。可以说，实际上我并不是发明者，但是在本教堂建立这制度应归功于我。你到过许多地方，你大概在那些洋人的国家已经看到了，那里什么都可以参观，但得付钱。本届红衣主教的前任红衣主教大人，愿他安在天国（这时他只

手举到四角帽边)，他也周游过许多地方，是个现代派，他要是多活些时间，一定给大教堂各个殿都安装完了电灯。有一回我曾经听他说，在罗马和其城市的博物馆和著名的优秀建筑，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进去，但要付钱。这对公众是极大的方便，看那些东西不需要什么介绍信了。有一天，财务主管和我在算账，我们看到那个倒霉的国家给我们的那一千多一点的臭钱，（求上帝饶恕！）用不到月底，我就提出了我的想法。你愿意相信在教士委员会有先生会反对？有几个年轻的受俸神甫谈论起教堂的商人，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是几个上帝手里拿了皮鞭赶走的犹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卑鄙勾当；另外几个较年长的说，几个世纪来大教堂已经把它奇珍异宝向所有的人开放了，应该继续这么做下去。所有的大人先生们说得都有道理，因为没有点才能也当不了受俸神甫；但是已故红衣主教——愿上帝保佑（他再次用手碰了一下四角帽）——发言说，教士委员会虽不太愿意，但也得接受改革，最后终将欢迎改革。对任何人来说，这一块糖也是苦的！你知道去年我给红衣主教大人交了多少钱？三千多杜罗，几乎和罪孽深重的国家给我们的钱一样多。这对谁都没有坏处。公众付钱观光了东西，走了。无论如何，他们是些过路的鸟，只来一次，走了就不再回来。区区几比塞塔算得了什么？花几个可怜巴巴的比塞塔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界最光荣的教堂之一，西班牙天主教的摇篮，托莱多大教堂，真值了！”

他们两人漫步在回廊里，沿着此时早晨的太阳照暖的一边走。这位教士已经收藏起单据本，眼睛凝视着加夫列尔。加夫列尔相信对这哑谜式的微笑，堂安托林会看做是肯定的

表示。这鼓励他继续诉说他的秘密。

“啊，加夫列尔！你别以为我不费力气就完成我繁重的职责。红衣主教信任我，教士委员会对我特别青睐，财务主管只希望得到我的协助。由于这些门票，大教堂马马虎虎也可过得去，并且保持它旧时宏伟的面貌吸引公众来欣赏它。我们现在是一贫如洗。幸亏给我们留下点过去的残羹剩饭使我们有所补救。要是一阵风或者一场冰雹砸破了殿堂的玻璃，我们还可以利用过去几个世纪的缮工先生们给我们留下的剩余玻璃。啊，主呀，我的上帝！想一想过去有一个时期，教士委员会自己出钱在教堂内维持着玻璃装饰工和铅工车间，还有我不知道多少个工场，足可以完成大工程而不需要到教堂外面去寻求援助，那是什么情景！现在如果一个十字褙破了，我们还有绣着圣徒和花的精美的缎条把它修补起来。但是等到这一切都用完了，怎么办？打碎了最后一块备用的玻璃，用完了修缮处的零散边角料，怎么办？为了不进风，不进雨，就必须得给大窗子配上便宜的白玻璃，大教堂将像个宾馆（求主饶恕我这么比喻），大主教教堂的教士们将穿得像穷乡僻壤寺院中的祭司来赞美上帝。”

堂安托林嘲讽地笑了起来，似乎他说到的将来是一件违反永恒规律的荒谬的事情。

他接着说道：“你别以为这儿会浪费或者不让一切可用的东西生钱。这花园，多少年来是你们家管的。自从你大哥故世后，教士会把它租了出去。你的姨妈托玛莎每年付二十杜罗，让她儿子经营，这是因为，你是知道的，这位老太太是红衣主教阁下的好朋友，她从小就认识他。我么就在教堂和上下回廊到处忙活，什么都监看监看免得有人捣鬼，因为

这儿有些手脚不干净的年轻人不可信。一会儿我在八角楼看看你的侄儿塔托是不是向外来游客收门票（因为他很可能让人家给点小费就放他们免费进来了），一会儿我就到回廊去视察那个展示巨人模型的鞋匠的工作。他们骗不了我！谁也别想不交钱滑过去。哎哟，我已经好久没有主持宗教仪式了。你看见我，到了中午，大教堂关了门，我就匆匆忙忙在回廊念我的祈祷文，注意着时钟到点我就下去叫他们重新打开教堂门，让外来游客进来参观珍宝室。这不是一个天主教徒的生活，要是上帝不记得我为他的家——这座大教堂的荣耀所做的一切，我相信我甚至会罚自己进地狱受苦刑的。”

他们俩默默地走了好长时间，但是凡涉及大主教教堂经济生活问题，堂安托林轻易不会沉默不说话的。

“你想想，加夫列尔，”他接着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过去那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你和大多数生活在这儿的人，你们不了解大教堂曾经有多富裕。富得像个皇帝，有时候有过之无不及。你从年轻时起就比谁都熟悉我们光荣的大主教们的历史，但是对他们为上帝积攒的财富，你是一无所知。你们这些学者对这些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知道那些国王和达官贵人活着的时候给我们教堂的捐赠，以及他们临终时分给教堂的遗产？有多少事你该知道啊！我全都知道，我从修缮处、档案室、图书馆了解到了。各人有各人的志趣。我，面对教堂的窘况，不止一次跟财务主管先生大发脾气，但想到我们出生之前大教堂所有的一切，我就自我安慰了。我们曾经是很有钱，加夫列尔，很是有钱的。托莱多的大主教可以给他的法冠做一层或两层的皇冠，我不说三层，

因为我想到罗马教皇……首先有国王阿方索六世在攻克托莱多之后给大教堂的恩赐手谕。这手谕是在堂贝尔纳多被选为主教之后，在一所荒凉的寺院里写的。这是我这对罪孽的眼睛在档案中看到的，是一张用花体字写的羊皮纸，抬头写着本教会特权证书。这位好国王给了大教堂九个城镇，要是你想知道，我可以给你报出它们的名字，好几处磨坊，无数葡萄园、城里的房子和店铺，最后他以基督徒骑士的慷慨大度这么写道：‘此乃我以此方式的赐予，作为完全可自由支配的捐赠，我赐给神圣的贵教会，赐给你，贝尔纳多大主教，但愿在任何时候，无论发生杀戮或任何诬蔑，万勿丢失。阿门。’后来，堂阿方索七世给了我们瓜尔达基维尔河另一边的八个镇子、几个面包房、两所城堡、贝林琼的全部盐场，以及在托莱多制造的钱币的什一税，作为受俸教士做服装用。阿方索八世又给大教堂如雨倾注般大量捐赠，有几个城市、农村和磨坊，伊列斯卡斯市是我们的，埃斯基维亚斯的大部以及塔拉维拉药房都是我们的。以后，来了身经百战的高级神职人员堂罗德里戈，他从摩尔人手中夺回了许多土地，大教堂拥有一个侯国大的地方，卡索尔拉总督管辖区及巴萨、尼埃夫拉、阿尔卡拉斯等镇子……除列位国王外，关于高贵如王子、郡公、郡侯等大领主们也有不少事情可说，他们对大主教教堂都表现出慷慨大方……比斯开的领主，堂洛佩·德·阿罗，他不满足于出钱建造了从‘书记官门’^①到唱诗堂的整个殿堂，他把阿尔库维莱特镇及其所有的磨坊和渔场都送给了我们，他还捐赠了唱诗堂在做晚祷时高烧的那

① “书记官门”是“公正门”的另一名称。

种叫做‘极品’的蜡烛，这蜡烛就插在大乐谱架的青铜鹰嘴上。堂阿方索·特略·德·梅内塞斯给了我们瓜迪亚纳河两岸的四座城堡，跟堂阿方索一样，其他大领主让给我们一些什一税、过路税，我都不知道还有多少财富……我们曾经富裕强大，加夫列尔。那时，本主教的辖区比一个公国、侯国还大。大教堂陆上、天空和海上都有产业。我们的领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及全国，没有一个省我们不拥有点财产。一切都献给上帝荣耀的事业和神甫们的衣着生活。一切都要交付大教堂的开支：炉里烤的面包、掉进网的鱼、石磨上的麦子、冲模压制出来的钱币、赶路的远游人。那时候农民不交税赋，他们交给我们十分之一的庄稼以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这足以保证大主教教堂的粮仓丰赡。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加夫列尔，那时有信仰，而信仰是生活中最主要的，没有信仰就没有品德，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一切。”

他停顿了一会儿，因为长篇讲话而气喘吁吁，呼出的气都冲到加夫列尔的脸上。这位神职人员身上渗透了大教堂气氛，似乎全身汇集了教堂的各种各样的气味，他的教士服有古老石头发霉的气味和生锈的铁栅栏的锈味，从他嘴里似乎散发出屋檐落水管的味道和顶楼陈年的潮气。

堂安托林迅速地回忆起以往的财富，他情绪激动甚至义愤填膺。

“过去是那么有钱，加夫列尔，今天我们却陷于贫困，我的孩子呀，我，作为一个主的教士，为了我们大家活命，我必须拿着门票单据走来走去，就像一个斗牛入场券的二道贩子，仿佛上帝的宅院是一个剧院，必须忍受外国的异教徒进门也不画十字祝福，拿着望远镜窥视一切。而我必须对他

们笑脸相迎，因为他们付了钱，为我们提供可怜的饭后的甜食！真……他……愿上帝保佑！我差一点说了句粗话。”

堂安托林继续不断地发出愤怒的悲叹，直到走过他家门
前，玛丽基塔探出她那硕大难看的脸说：“叔叔，别再散步
了，巧克力都凉了。”

甚至当这位教士消失在他家里之后，他的侄女仍然殷勤
地向加夫列尔微笑着说：“您也来喝一点，堂加夫列尔？”

她睁着饥饿的母狼般大胆的眼睛邀请加夫列尔进去。她
喜欢那个男人绅士派头的举止，正如她所说，他过去同世界
打交道使他利落洒脱。此外，加夫列尔神秘的过去，他默不
作声的傲慢，他不确切的冒险事迹的名气，以及他听上回廊
人讲话时那种既富有同情心又瞧不起人的微笑，都对她女人
的想像力有某种魅力。

殷勤讨好的玛丽基塔退进了屋，加夫列尔则继续在回廊
散步。他已经喝过了他兄长每天早晨给他送上来的一小瓶牛
奶。

八点钟教堂乐师堂路易斯出来了，他总是戏剧性地斜披
着教士长袍，脑后挂着的草帽如同他大脑袋上的一轮光环。
他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嘴里哼唱着，神经质地不停地摇动着身
子。他不安地询问是否已经敲过了唱诗班的钟，他害怕迟到
罚款的危险。加夫列尔感到自己为这位教会艺术家所吸引。
他被人瞧不起，苟延残喘地生活在教会的最低层，更多
想到音乐而不是教义。

每天下午，加夫列尔上去到卢纳家族住家的上面一层教
堂乐师住的阁楼斗室。房间包括了这位艺术家的全部财产：
一张仍然属于神学院的铁床，一个五屉柜、两个贝多芬和莫

扎特的石膏半身像，以及一大堆音乐的包裹，有装帧好的总谱、五线谱的散页，但是一包包都那么大，混杂在一起，一堆堆东西都坍塌下来，白色的纸片散满屋子，连犄角旮旯都是。

“他的几个钱都花在这上了，”“木杈杖”带着好心责备的口吻说，“他一分钱也不会积起来。他一拿到工资，马上向马德里订购更多的废纸！堂路易斯，给自己买一顶新帽子，哪怕是低档点的帽子也有用些，别让唱诗班的先生们嘲笑他头上戴的那个盖子了！”

冬天的下午，在唱诗班下班之后，这位音乐家和加夫列尔就躲进那间屋子。那些受俸神甫们，避开寒风或冬雨，每天就在上回廊的各条走道里散步，以此希望不要中断他们有条不紊的生活习惯的锻炼活动。天上的雨点敲打着那间斗室的玻璃窗。借着下午惨淡灰暗的光线，乐师翻阅他的本子，或者双手在风琴上奔走，一边和坐在床上的加夫列尔聊天。

这位音乐家谈到他艺术上崇拜的人物，就感情激动。谈到他热情奔放，最感人的时间，他不再说话，身子向风琴微微倾斜，风琴奏出的旋律充满整个屋子，沿着楼梯，如同远方的回声一直传到在回廊散步的人耳中。他弹到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却戛然而止，重又开始他们的聊天，仿佛担心如果继续离开话题，他的思想会挥发消失。

沉默寡言的加夫列尔是他在大教堂找到的唯一的听众，是第一个听他长时间谈论而不嘲讽他，也不把他看做疯子的人，相反，以他简短的插话和提问表现出听他讲话的勃勃兴致。每天下午谈话的结束都是如此：这艺术家教士的崇拜偶

像，贝多芬真伟大！

“我一辈子就热爱他。”教堂乐师说，“一位圣耶罗米教团的修士教育了我。他是个还俗的老人，在离开修道院之后，作为一个大提琴教师，他去过世界上一些地方。圣耶罗米教团的教徒是教会中出色的乐师。这一点您不会知道，要是我生下不久没有受到这位品德高尚的人的庇护，这一点我也不会知道。对我来说，他是位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看来每个宗教教团的人在他们的年轻的时候都从事一种专业培训。有些人，为本笃会的修士注释古籍；另外一些人，生产女士用的烈性酒；还有些人有一双巧手，制作鸟笼，而那些圣耶罗米教团的教士学六年音乐，每人专攻一种他钟爱的乐器。在西班牙的各教会保留了一点，真正一点儿良好的音乐爱好，这要归功于圣耶罗米教团的教士们。据我教父告诉我，那些圣耶罗米教团教士在他们的修道院组织了多么好的乐队！对于那些夫人们来说，每星期下午去听讲座是一种乐趣，在那儿她们可以遇到优秀的神甫，而每一位神甫都是一位乐器大教授。这是那个时代唯一的音乐会。他们吃饭有保证，不用为住房、穿衣操心，他们的全部责任和义务是热爱艺术，加夫列尔，你想想，能培养出什么样的音乐家！因此，当人们把修士们赶出他们的修道院时，圣耶罗米教团的教士并非不利。他们绝对不必在做弥撒时在教堂门口乞讨，也不必在虔诚的教徒家蹭饭吃。他们有刻苦学到的一门艺术糊口，很快他们在各大教堂找到了管风琴演奏者和教堂乐师的工作。有些更为大胆的，他们渴望就近看看在修道院时觉得是虚幻的天堂的那个音乐世界，他们进了剧院的乐团，到处旅行，在意大利他们做出了一些糊涂事。他们的变化是那么大，连

他们修道院的老院长也不认识他们了。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教父。真是了不得的人呀！他是个善良的基督徒，但是他是那么投身于音乐，以致在他身上很少有过去修士的影子，当人家告诉他那些修道院将很快修复重建，他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膀。他对新的奏鸣曲更感兴趣。总之，加夫列尔，那个人有些话永远铭刻在我记忆中。有一天，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在马德里他带我去参加一些音乐界朋友的聚会，他们只给自己演奏了著名的七重奏曲。你知道这曲子？这是贝多芬最新、最优美的作品。我记得我教父沉思着离开音乐会，低着头，拉着我走，我几乎跟不上他的流星大步。当我们到家的时候，他凝神注视着我，仿佛我已是个大人一般对我说：你听好，路易斯，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主’，那就是我主耶稣，还有两个‘小主’：那就是伽利略和贝多芬……”

他这位音乐家教父是深情地望着贝多芬的半身像去世的。这个半身像从一个柜子角上，皱着狮子般的眉心，以一个聋人不信任的目光审视着这简陋的小屋。

“我不了解伽利略”，堂路易斯接着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学者，是个科学的天才。我只是个乐师，这种事情我不大懂。但是我崇拜贝多芬，我相信我的教父没有我那么崇拜他。贝多芬是个神，是这个世界上产生的最非凡的人。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加夫列尔？”

由于热情激动，他神情激昂，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脚下踩着散在地上的纸片。

“啊，我多么羡慕您，加夫列尔，您走遍世界，听到过那么美好的事情！有天晚上我不能入睡，想着您给我讲的在

巴黎的生活情况，那些星期天的下午，多么美的下午，吃过午饭，您有时候去听拉穆勒^①的音乐会，有时候去听科络纳^②的音乐会，充分领受音乐的高雅……我唯一的安慰就是读音乐，通过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品来了解音乐，而在城里那么多傻瓜听着这些伟大的作品打瞌睡，或者感到厌烦。我这里那一堆是一代伟人贝多芬创作的崭新的交响乐，他的许多首奏鸣曲，他的弥撒曲，和他在一起的有海顿^③、莫扎特、门德尔松，一句话，所有伟大的人物。我甚至有瓦格纳的作品。我读他们的作品，在风琴上弹一切可能弹的作品，还能做什么呢？如同用极华丽的辞藻向一个瞎子描写一幅图画及其色彩。我如同瞎子一样被封闭在这回廊里，我知道世界上有很美的东西……但是我只是耳闻。”

教堂乐师对前年怀有一段幸福的回忆，他一直兴奋地谈起这件事。根据红衣大主教的指示，他去马德里做管风琴演奏者考试的评委。

“那是盛大的节日，加夫列尔，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一天晚上，我认识了瓦格纳，没有任何掩饰，就像人们说的是原汁原味的。我穿着一位有时参加托莱多节日演出的小提琴手朋友的衣服，在马德里皇家剧院这座天堂里听了《女武神》。另外一个晚上，我参加了一场音乐会。那是个伟

① 拉穆勒(Lamoreux, 1834—1899), 法国大提琴家、指挥家。

② 科络纳(Colonne, 1838—1910), 法国指挥家。

③ 海顿(Haydn, 1732—1809), 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交响乐、弦乐四重奏两种形式作出贡献，一生创作丰富。

大的夜晚，加夫列尔，一个难以置信的夜晚！我们演奏那个难看的家伙的第九交响曲，而那个坏脾气的聋子就在场听我们演奏。”

说到这儿，这位乐师一跃而起，走到那个半身像边上，如同一个孩子抚摸双眉紧锁、威严的父亲一样，以儿童稚气的谦卑亲吻这半身像。

“您知道第九交响曲，对吧，加夫列尔？您听这交响曲有什么感觉？我听音乐会发生稀奇古怪的事：我闭上眼睛，看到一些陌生的景色，奇怪的脸，值得注意的是我多少回听同样的作品就重复出现同样的幻觉。如果我和下回廊的人谈这件事，他们就叫我疯子。但是您属于和我同一类人，我不怕您会笑话我。有些音乐章节让我看到大海，湛蓝的，一望无际，掀起银色的浪涛（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海），另外一些作品在我面前展示森林和城堡，一群牧羊人和白色的羊群。听舒伯特的作品，我永远看到一对情人的二重唱，在一棵椴树脚下叹息，有些法国的音乐家让美丽的夫人们在我的想象中鱼贯而行，她们在玫瑰的花圃间漫步，穿着紫红色的，始终是紫红色的服装。加夫列尔，您没有看见过这些东西吧？”

这位无政府主义者点头表示肯定。他见过，音乐也曾激起他看到一个比现实更美的幻想世界。

“我，”教堂乐师继续说：“我现在还记得第九交响曲让我看见了什么，现在只要我一哼某些片段，就看见那情景。啊，那首谐谑曲是多么优美迷人，还有那特有的鼓的震音！听着，我觉得上帝和他的圣徒们都走出天国来漫游，只留下天使们看家。自由自在，优哉游哉，一派欢乐！一群天堂的

孩子，不拘礼节，雀跃在彩云间，嬉戏作乐，把圣女们忘掉的千日红的花瓣洒向大地。一个孩子打开了雨屋的门，让大雨降落人世，另外一个孩子走近雷的琴键，弹奏了起来，发出令人恐惧的雷鸣，扰乱了在嬉耍的孩子，把他们吓得四散逃跑！但是，他们过一会儿又回来了，继续新一轮滑稽有趣的玩乐，又喧闹地淘气，再一次被雷鸣打断。而那段柔板呢？关于柔板，您有什么可对我讲的？您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悦耳，更温馨？又如此神圣恬静？人类无论取得多大进步也不会达到如此谈话的境界。所有著名的有情人都在一起也找不出这些似乎相互爱抚的乐器表达的曲折多变的柔情。听着这音乐，我想到那些画着油画、有许多神话人物的屋顶。我看到了一些裸体像，柔美的曲线，肌体滋润丰满，宛如阿波罗和维纳斯在清晨金色的阳光下，在玫瑰色的云山雾层间相互殷勤献情。”

“教士，您说走题了，”加夫列尔说。“这不太像个基督徒。”

“但是这是艺术，”乐师单纯天真地说。“我不太管宗教。我相信别人教给我的东西，我不会费劲再调查研究。我只关心音乐，有人跟我说过，音乐将是未来的宗教，是理想最纯正的表现。一切美的东西我都喜欢，我相信美的一切如同相信上帝的事业。‘我信上帝，信贝多芬’，正如他的弟子……所说的。再有，什么宗教有音乐那么伟大？您知道贝多芬写的最后一部四重奏吗？他感到将死去，他在乐谱的边上写下了这个惊世骇俗的问题：‘必不可免吗？’，在下面他接着又写道：‘对，是必不可免，必不可免。’尽管他是个天才，死也是必然的。虽然他头脑中还有那么多高雅优美的东西，也

必然要抛开生命，也必然要为人类的更新作出贡献，而并不考虑他半个神的尊严。于是他写下了这一哀叹，这么告别生命，他生命的伟大没有任何一支歌曲，没有任何一句宗教的语言能与之媲美。”

乐师在风琴前坐下，好长一段时间他一直演奏这位天才最后的哀叹，在他跨过生命的门槛时发出的痛苦的哀怨，但并非由于害怕陌生的世界而发出的绝望和颤抖的哀怨，而是一种有阳刚之气的旋律，它坠入永恒的黑暗之中，仍然相信决没有任何东西能消融他的光荣。

这些天下午，在昏昏欲睡的教堂的那个角落里，共通的艺术以日益增长的亲情把他们两人联系在一起。乐师一边说话，一边心情陶醉地翻阅他的乐谱，或者弹奏管风琴，而这位革命者则默默地听着，只有他患病的肺部的咳嗽声打断他朋友的谈话。在那些悲伤又亲切温暖的下午，他们两人水乳交融：一个幻想着离开这座石头牢房去看看世界，一个则才回到生活，受了伤，神情沮丧，对在这美丽的废墟中默默地休息感到满意，对过去的秘密谨慎地保持缄默。对于他们两人，艺术如同在大教堂灰暗、单调的环境中一线闪亮的阳光。

每天早晨在回廊里，他们见面时的对话永远像两个朋友间的交谈。

“下午见，唉！”教堂乐师神秘地说，“我有几张新乐谱。我们来欣赏今天它们将给我带来的新鲜玩艺儿。另外，昨天晚上我写了个小东西。”

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作出肯定的回答，他很高兴以某种娱乐形式为那个艺术的贱民服务，这个艺术的贱民也把他看做

是他唯一的听众，热情款待他以便留住他。

在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加夫列尔就独自一人在回廊里散步。除了那个展示巨人模型的鞋匠，所有的人都在教堂里。加夫列尔懒得和那些探身站在丁香园各家门口的女人们聊天，他或者往上走，到他过去的战友——钟楼人的房间去，或者在花园门开的时候，沿着壮观的特诺里奥楼梯下到花园里，或者穿过大主教拱门上街去。

他喜欢在树林中呆上个把小时。他在花园里和在上面的房间里一样能使他回忆起自己的家庭。除了在散步时总会碰到使他想到监狱的石头墙以外，他感到疲乏，需要风儿吹拂花草树木的动态，形成他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旷野之中的幻想。

在凉亭里，过去他看见他父亲，由于年老几乎不能动弹，大声对他大儿子说话，大儿子则甘心顺从地接受他的一切指示。现在在这儿，他看见他的姨妈托玛莎在织袜子，一边用监视的眼光，察看一个为她打杂的小伙子的工作。

加夫列尔的姨妈是丁香园最重要的人物。她的话和堂安托林的话一样管用。“木权杖”怕她，在人人猜想到的这个可怜的女人身后的巨大庇护力面前，他只有弯腰折服。在她的父亲，加夫列尔的外祖父任大教堂司事的时候，一个孩子，某位受俸教士的侄子任侍童的职务。这位教士最终出钱供他在神学院完成学业。这个半个世纪前的侍童现在是枢机主教和托莱多的红衣大主教。托玛莎老太太和他从小就认识，他们为了争夺一张小画片在上回廊打架，或者一起逗那些占据“圆面包门”的乞丐们玩。那位威严的堂塞瓦斯蒂安看一眼可以让教士委员会和整个教区的教士们都发抖，但当

他偶然看见托玛莎的时候，显得很高兴，很随便，情同手足。这是他对在大教堂童年唯一鲜明生动的回忆。托玛莎怀着极大的敬意吻他的戒指，但接下来就像对她家中人那样跟他谈话，差一点就亲切地以你相称。这位红衣主教，任何时候都给敬畏和奉承包围着，时而也需要女花匠那种坦诚和无拘无束的交往。据大教堂里的人讲，托玛莎夫人是唯一能向这位尊敬的阁下当面讲真话的人。当丁子香园的居民们看到这位枢机主教大人拖着色彩鲜艳的法衣走过一条条石头通道在凉亭坐下来，和这位老太太聊上一个多小时，他们感到他们贱民的自豪得了满足，而这时候托玛莎家里人都恭恭敬敬地站立在栅栏的门口。

托玛莎并不为这种荣誉感到骄傲。她只觉得枢机主教只不过是她幸运结识的童年时代的伙伴，至多是个堂塞瓦斯蒂安，在以礼相待和客套方面也仅此而已。但是她的家人懂得利用这一友谊，特别是她的女婿，“蓝衣圣母殿”神甫。据老太太讲，他是个虚伪狡诈的人，他甚至用教堂里的无足轻重的小事赚钱。他是只不知疲倦的蚂蚁，利用红衣主教和他岳母的友谊，渐渐取得一个又一个特权，教堂的神甫和司事见他如此受到庇护，没有一个敢于对他表示一点不满和反对。

加夫列尔很喜欢和他姨妈交往。她是唯一生在回廊又似乎摆脱了教堂昏昏然的影响的人。她热爱大教堂如同她的祖居，但是似乎各小礼拜堂的圣徒们和唱诗班那些尊敬的贵人们并不令她很敬崇。她为自己有一个健康、恬静的晚年感到愉快，笑颜常开。如她所说，她六十春秋没有什么灾难。她说话的语言有点出言不敬，口无遮拦，如同出自一个见多识

广、又不信人间富贵和坚不可摧的品德的女人之口。她性格的本质是宽容，同情一切缺点，但是对那些力图掩饰缺点的人感到愤慨。

“大家都是人，加夫列尔，”她对她外甥谈到大教堂的先生们时说，“堂塞瓦斯蒂安是人。大家都是罪孽深重的人，对上帝负有很大的责任。不可能是别的情况，对此我都原谅。但是，外甥，你可以相信我，许多时候，在我看见跪在他们面前的人，我就想笑。我信萨格拉里奥圣母，也信一点上帝，但是，信那些先生们？我太了解他们了！……但是，九九归一，我们大家都得活着，坏并不是坏在有缺点，而在于掩饰缺点，坏在像我无耻的女婿一样装腔作势，什么地方你看见他一个高大健壮如城堡的人，在那儿捶胸顿足，像虔诚的妇女一样吻地，那他是在求我早死，因为他相信我的大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他把圣母堂奉献箱里能有的一切都拿走，他偷蜡烛，在做弥撒的钱上捣鬼。我要是上街去，那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我想到了我的女儿，她一直有病，还想到了我那些可怜的外孙。”

当加夫列尔下到花园来看她时，她总是以这样的问候来欢迎他：“你好，瘦高个儿，今天你气色更好，你身体在慢慢好起来。看来有你哥哥那么精心的照顾，会把你调养好的。”

之后，她就拿她健壮的老年和那些身体虚弱，同死亡顽强抗争的年轻人相比。

“你看我现在六十岁了，一辈子没得过病。无论冬夏，从来不在床上睡过四点钟；满口牙齿一个不缺，还像当年堂塞瓦斯蒂安穿着红色的侍童服跑来想分吃我的午饭时一个

样。你们，卢纳家族的人总是体弱多病，你父亲，还没有到我这年龄，就走不动路，抱怨这花园潮湿，得了关节炎。我也在花园里呆，一点事也没有，就跟我没有从丁香园下来干过活一个样。我们这些比利亚尔潘多家族的后代是铁打的：我们这些出身于那个制造了大祭台栅栏、圣体盒以及无数绝妙东西的有名的比利亚尔潘多氏族的人，多少继承些什么。那些绝妙的东西中大概有一个巨人模型，从这巨人用各种金属铸造的身体部位能灵活转动，就可以断定是这家属制造的。”

加夫列尔被摧垮的身体让她深为怜悯，同时又引起她种种坏的猜测。

“你在那些地方寻欢作乐了吧，外甥？对你来说，战争毁灭了你。要不然现在在唱诗班总有你的座席，谁知道你是不是会成为另一个堂塞瑕斯蒂安！说真的，他年轻的时候，没有你在神学院让人议论得那么多，他不是个智慧的奇迹……但是你见过世面，你喜欢上了那些国家，据说那儿有很漂亮的阔太太，戴的草帽就像遮阳伞。你现在成了一个难看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但是过去你很帅。我对你说，当然，我是你姨妈我才说，你这么回来一身是病，疲弱憔悴。你活得很匆忙。谁知道你为这世界干了些什么，你这个滑头！你可怜的母亲生下你让你做个圣徒！愿上帝赐圣我们……你别跟我强嘴，你别自以为是好人，说假话我会生气的。我提醒过你，你做得对，临到末了你抓住了一切机会。糟糕的是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怎么这样子回到这里，看见你让人怜悯。我见过许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教会的人有些什么想法，他们内心有什么坏主意，但那些年轻人一旦误入歧

途，走上堕落的生活道路，那就不会停住脚步，他们就毫无节制地发烧，发烧，直到不可救药。像你这样的人，神学院有过许多。”

一天上午，加夫列尔向他姨妈提了一个早有准备又不敢提出的问题。他想知道他侄女萨格拉里奥是怎么回事以及在他哥哥家发生的事情。

“姨妈，您人好，您会告诉我的。好像大家都怕谈这件事，甚至我的侄子塔托也这样，他是个多嘴多舌的人，对丁子香园所有的人都横加指责，但我问到他某些事，他就闭口不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姨妈？……”

老太太的脸一下悲戚阴沉了起来。

“那是极大的不幸，孩子，在上回廊从来没有见过的事。世界上的狂暴之徒进了大教堂，恰恰把丁子香园最荣耀、最古老和最可敬的房子作为他们的窝点。我们大家是善良的好人，总之，我们是些从来没有见过世面、连大门也不出的人，我们生长在这里就像封闭在罐头里。你们卢纳家族是好人中最好的，我们且不谈比利亚尔潘多家族，他们比你们来得晚。天哪，要是你母亲抬起头来！要是你父亲活着……我要责怪的是一切责任全在你哥哥，由于他是个好好先生，由于他简单纯朴，出于所有父母那种该死的怪癖，他们曾冒险希望把女儿嫁个好人家……”

“但这是怎么回事，姨妈？我侄女和那个士官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那是在世界上经常发生的事，但是在这儿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千百回告诫你哥哥：‘你瞧着，埃斯特万，那

位公子哥配不上你女儿。’他是很给人好感、很活泼可爱的人，穿上军校的制服神气活现，不可一世，领着那帮最邪恶的士官生在全城胡作非为。再有，他是一个望族的儿子，那些有钱的阔佬从来不让他空着口袋来托莱多。而她，这可怜的萨格拉里奥，一个痴情的小姑娘，给她的士官生弄得神魂颠倒。每星期天，当她在她母亲和那个穿着讲究的未婚夫之间，漫步走在索科多维尔和米拉德罗街上，是多自豪，城里小姐们都在羡慕她。你侄女的美貌令全托莱多都议论纷纷。贵族女子学校的学生出于嫉妒，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她‘大教堂的女司事’。但是她这可怜的姑娘，只为她的士官生活着，用她蓝蓝的大眼睛盯着士官生，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你哥哥这个粗人让他进了你们家，为他给家庭增添荣誉感感到很骄傲。加夫列尔，你知道，一些没地位的托莱多人有一种完全的盲目性，他们把士官生和女孩子的恋爱关系看做是一种光荣，虽然这种爱情结成夫妻的情况是极少的。这儿没有一个有点姿色的女人逃脱过那些穿彩色裤子的士官生的追逐喜爱。甚至我自己都记得我当小姑娘的时候，头发剪得齐耳朵根，一听到回廊的石板甬道有军刀拖地的声响，我就拉长绷紧了裙子。这是从母亲一辈传到女儿的盲目性，但那些该死的在他们家乡有表妹或者已经有未婚妻，而且他们走出军校校门必定回到她们身边去。”

“好，姨妈，但是我侄女的事落到什么结局呢？”

“在那个少爷毕业当了中尉时，他家里人争取到把他派往马德里。辞行是有点戏剧性。我相信你那个没有个性的哥哥和他天真单纯的老婆（愿她安息）甚至哭得那么伤心，好像他们俩是要分手的未婚妻。两个年轻人手拉着手，几个小

时凝视着对方，似乎恨不得把对方吃掉。男的较为冷静，答应每星期天来，天天写信。起初，他是这么做了，但是后来过了几个星期也不见人来，投递员上丁子香园的趟数也少了，直到最后不来了。一切就完了：这位中尉少爷在马德里换了几次工作。你可怜的侄女失魂落魄，脸上失去了色泽，不再是那颗皮肤细嫩、水灵的杏子，那是谁见了都想咬上一口的鲜杏呀！她躲在角落里伤心痛哭，哭得成了个泪人儿……有一天，那个疯丫头飞走了，……直到现在。”

“但是，她上哪儿去了呢？没有找过她？”

“你哥哥失常了。可怜的埃斯特万！有几个晚上我们发现他穿着内衣呆在上回廊，像电杆木一样直挺挺站着，用他那双呆滞的眼睛死死仰望着天空。不能跟他说去找女儿，他悲愤交加。丑事已经铸成，他不想找回她来使这丑事更丑，让一个失身的女孩子走进大主教教堂，走进卢纳家族体面的家门。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呆在丁子香园就像给这件事压垮了，似乎我们大家都在服丧。现在你明白了，在大教堂发生了这事，在这儿，日子在神圣的宁静中过去，我们彼此都不大声说一句话！……那时我想起了你。总觉得从卢纳家族，那么安分守己的规矩人中间，不可能出一个女孩子，竟大胆出逃到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马德里，和一个男人在一起，不怕上帝，也不怕众人。这个表面温顺的人能像谁呢？像她叔叔加夫列尔，他本来是圣徒的人才，但是在英勇参战之后，像吉卜赛人一样在世界漂泊流浪。”

加夫列尔没有反驳他姨妈对他过去的看法。

“那她出走之后，关于这姑娘您还知道些什么？”

“起初，有许多传闻，后来就一句话也没有了。他们两

人一起住在马德里，避开众人，就像丈夫和妻子一样很平静。这情况有一段时间，我知道了那些事，我自己都怀疑我的坏心眼，我想这个该下地狱的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好人，末了和萨格拉里奥结婚。但是一年后一切都完了。他厌倦了，他的家庭进行干预不让这糊涂事断送了他们孩子的前程。他们甚至找到警察来威胁姑娘，让她别再以一个不干净的女人的固执去纠缠年轻军官。后来，……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了。偶尔那些上马德里去的人给我说些什么。有人见过她，但是最好他们没有看见她，丢人呀，加夫列尔，辱没你们家庭，这也是我的家庭。那个倒霉鬼现在是个坏透坏透的东西。人家对我讲她病得很重，我相信她现在还在生病。你想想，那样的生活，在五年之中！那个倒霉鬼会发生什么情况……再想想她是我姐姐的女儿呀！”

托玛莎夫人讲话声音很激动。

“后来，加夫列尔，你已经知道这儿所发生的事情，你可怜的嫂子死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就只短短几天时间的事儿，也许是死于羞愧，因为她死的时候一直在说一切都是她的错。看到你哥哥在这事之后弄成什么样子真让人心碎。埃斯特万一直是无所作为的人，但是在发生了他女儿的事情之后，他好像成了个笨蛋……啊，不幸的人哪！我也碰到点这种情况！尽管你看我很愉快，活得很满意，但有时候在这儿，在我脑门里，会死死地想起那个倒霉鬼，我吃不好，更睡不好，想到一个孩子，她无论如何有我的血脉，在这世界上堕落，供男人们玩乐，而没有任何人庇护她，仿佛她就孤零零一个人，似乎她没有家庭。”

托玛莎夫人用围裙角擦了擦眼睛，她的声音颤抖，眼泪

顺着干瘦的脸颊往下流。

“姨妈，您是个大好人，”加夫列尔说，“不过应该更关心那个不幸的人。应该把她接回来，救救她，把她带到这儿来……对别人的弱点不幸应该慈悲为怀，更何况这受害者是我们的骨肉。”

“啊，孩子呀！你给谁说这话呀？这事我想过千百遍，但是你的哥哥让我害怕。他生性温顺，逆来顺受，但是谁跟他一谈起他女儿，他就变成一头野兽。即便我们找到了她，把她带回来，他也不肯认她，接纳她。他会气得如同建议他做一件亵渎神明的事。他不会冷静地忍受她在这个家、你们父母的家里存在。再有，即便他不说话，他也怕在所有了解所发生事情的丁子香园的邻里中引起风波。他们的事很容易办，只要我居间调停，他们大家会注意不言不语的。但是我怕你哥哥。我不敢。”

“我会帮您的，”加夫列尔坚定地说。“让我们找找这孩子，一旦我们找到了她，埃斯特万由我负责。”

“找到她也有点难。有一段时间我对她已一无所知。无疑，那些看见她的人，为了不引得我们生气就闭口不谈。不过，我会调查了解的……我们再说，加夫列尔，……我会想着这件事的。”

“还有那些受俸神甫呢？红衣主教呢？他们不会反对这可怜的女孩回到丁子香园？”

“咳！这事发生已经好久了，很少有人会记得。还有，我们可以把这女孩子送到一个修道院，让她深居简出，静静地呆着，不惹起任何人的不满。”

“不，这不行，姨妈。这是一个残酷的办法。我们没有

权利以牺牲这可怜人的自由来救她。”

“你说得对，”老太太略加思考肯定地说。“修女身份这类事我从来就不那么喜欢。哪里有比在家人身边、以良好的榜样让她改邪归正更好的地方？如果她悔过了，希望安安静静生活，我们就把她带到家里来。在丁香园谁出头第一个对她说三道四，我就把他揍扁了。我的女婿也许会假装恼火，不过我来跟他算账。这比让他对堂塞瓦斯蒂安的那位士官生侄子，小胡安在回廊散步不视而不见好办。这个小胡安只要我的外孙女在门口一露面，他就在回廊转悠。我的女婿，这个蠢而又蠢的蠢货竟然做梦想和红衣主教攀亲家，梦想他女儿当将军夫人。他可能也很想念可怜的萨格拉里奥。至于堂塞瓦斯蒂安，你放心歇着吧，加夫列尔。只要我们能把这可怜孩子带回来，谁也不会说什么。他们为什么非要说三道四呢？……对同类要有仁爱，他们就最应该有仁爱。因为，总之，相信我，加夫列尔，……我们都是人呀！毕竟是人呀！”

第五章

对于任何稍微涉及有关现任大主教的情况，大教堂里的人都绝对保持沉默。这是丁子香园的传统习惯。加夫列尔记得他童年时就见过同样的情景。

那些人，如同所有生活在某种封闭状态的人一样，习惯于背后议论，但如果谈起前任天主教，就快言快语，议他的历史，论他的缺点。对死了的大主教，就没必要害怕他。而且说死人的坏话就是间接恭维活着的大主教和他的宠儿们。但是如果谈话中出现了现任大主教的名字，大家就噤若寒蝉，把手举到帽檐表示致敬，仿佛枢机主教能从邻近的大主教宫看见他们。

加夫列尔听着上回廊的朋友们的议论，回忆起了埃及人的盖棺定论。在大主教区对于高级神职人员不讲真话，在死神支配着他们之前，谁也不敢公开说他们的错误。

他们敢做的充其量就是评论受俸神甫先生们之间的分歧，提及在唱诗班相互问候或在念祈祷经文和对唱赞美诗之间，像差一点互相撕咬的疯狗一样彼此怒目相视的人，或者惊讶地谈论教士会法规顾问和财务主管神甫之间的大辩论，

他们就《圣经》中的洪荒是世界性的还是局部性的这一问题，在马德里打了三年天主教笔墨官司，以四个月为期相互用文章答复。

在加夫列尔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朋友圈。他们找他，他们感到需要他出场，他们体验到那些天生当人类牧羊人的人，即便不言不语也具有吸引力。每天下午，他们在钟楼人的房间里聚会，天气好就走出去，到“赦罪门”的长廊里。每天上午的聚谈会就在展示巨人模型的鞋匠屋里。他是个脸色苍黄、个头瘦小的人，有病，长年头痛，这迫使他随身带好几块卷成包头布样子的头巾。

他是丁子香园里最穷的。他没有工作，就展示巨人模型，没有任何报酬，惟有希望争取到补上第一个空缺的位子。他很感谢教士委员会的先生们，考虑到他老婆是大教堂一个老勤杂人员的女儿，免费提供他住房。糨糊和潮湿的墙基发出的恶臭使他家充斥了一股贫穷的酸不溜丢的味道。他老婆皮肤肌肉松弛，愁容满面，长着一双大大的呈黄色的眼睛，每年生一个扒着她饿瘪的乳房的小小子。在回廊里，沿着墙壁一溜几个小小子来回溜达，他们大脑袋，细脖子，一直病歪歪又从来死不了，受着奇怪的贫血病和脸上时生时消的鼓包的折磨，双手长满令人恶心的硬皮嘎巴儿。

鞋匠给城里的几家商店干活，没有什么长进。自从太阳出来，静静的回廊就响起他的铁锤声。这是大教堂唯一世俗劳动的声音，吸引着所有无所事事的人上那间穷困、散发臭味的屋子去。马利亚诺、塔托和一个也住在回廊的执杖人是加夫列尔最经常见到坐在鞋匠小凳子上的人。这些小凳子几乎要散了架，那么矮，坐在那上面手都可摸到盖满灰尘的红

砖地。

钟楼人一天许多回跑上钟楼去敲响日常的钟声，但是他空缺的位子自有一位管风琴鼓风手老人和那些圣器室的人来替代。他们是被大教堂下层人聚会谈话内容所吸引而跑上来的。聚谈的目的是听加夫列尔说话。这位革命者想不说话，想漫不经心地听听关于宗教生活的种种议论，但是他的朋友们怀着一种被封闭与世隔绝的人的好奇心，希望知道加夫列尔到过的地方的事情。他们听到他描绘巴黎的秀美或伦敦的宏伟，就像小孩子听神话故事一样都睁大了眼睛。

鞋匠低着头，并不中断他的劳动，也在注意听讲那么多美妙奇闻。在加夫列尔停下不讲的时候，大家都一致同意：那些城市比马德里漂亮。你瞧马德里！……在加夫列尔绘声绘色地讲述外国贵夫人的奢华时，连鞋匠老婆站在一个角落里，忘了体弱多病的后代，也惊讶地听加夫列尔讲，兴奋得脸上露出了一丝惨淡的微笑，把身子都探过她手中忍受贫困的小畜生。

大教堂的所有奴仆，听到对一个遥远的、他们永远不该看到的世界的追忆联想，都感到他们像墙上的石头一样坚硬和没有感情的心灵受到震动激越。现代文明的光辉比起布道讲经中描绘的天堂的美景更真挚地使他们感动。在这间小破房子酸不溜丢、灰尘飞扬的氛围中，他们想象的眼睛看到了美不胜收的城市，他们天真地询问他们吃些什么，满以为那是另一类人。

每天下午，在唱诗的时间，在鞋匠一个人干活的时候，加夫列尔厌烦了丁香香的单调寂静，就下到教堂呆一会儿。

他的哥哥，穿着呢长袍，戴着白色的皱褶领子，像一个古代的差役手里拿着一根长木棍在教堂的翼廊站岗，以免那些好奇的人在唱诗堂和大祭台之间穿行。

两块挂在壁柱上，用花体字书写的古老的黄金告示，庄严宣告：凡在本大厅内大声喧哗或打手势者，均应逐出教堂。但是，几个世纪前的这种威胁对于那些参加夕祷和在一根柱子后面同大教堂的仆役们交谈的少数人已经不起作用。傍晚的阳光，透过大窗户给地面洒下一大块一大块闪光的斑点。教士们走在这光织的地毯上，根据各块玻璃的颜色，变成绿色或红色。在唱诗堂，受俸神甫们在教堂忧伤的孤寂中低声吟唱。那些栅栏门关闭时的撞击发出爆炸般的响声，只给哪个迟归的教士留下一个出口。在唱诗堂的顶上，管风琴偶然发出龠声龠气，掺和进平缓的唱诗声中，但是如同纯粹为了敷衍塞责，懒洋洋、泄了气似地响着，在孤寂的昏暗中哀怨自己做出的努力。

加夫列尔绕大教堂还没有走完一圈，他的侄子，教堂里的打狗人，停止了和侍童们或教士会圣器室的传递口信的小使童（他在教士会厅门口有固定的位子）的谈话，来找他了。

塔托的刁钻使坏倒让加夫列尔感到可乐。他在大教堂信心十足又漫不经心地到处乱走，仿佛他出生在大教堂反使他对一切都没有敬意。一条狗进了殿堂倒让他兴高采烈。

“叔叔，”他对加夫列尔说，“你看我怎么来逗狗。”

他拉住上衣的两端，摇摇摆摆，像斗牛士那么跳跃着朝前向狗走去。这狗早就认识他，想从最近的一个门找路逃出

去，但是塔托拦住了它的去路，假装追它把它往殿里面赶，一个小教堂又一个小教堂跟它斗，直到把狗逼到角落，可以狠狠地踢它几脚。狗的惨叫声扰乱了受俸神甫的唱诗，塔托则高兴地笑了，这时在唱诗堂栅栏那一边，善良的埃斯特万气得脸都变了颜色，拿着木权杖威胁要揍他。

“叔叔，”一天下午这淘气的打狗人说，“您以为您很熟悉大教堂，您大概没见过大教堂那些不正经的东西？”

他挤眉弄眼，又用这神态做了个下流的动作，表示那些事比不正经还要不正经。

他接着说：“我对过去老人们放任自己开的玩笑感兴趣，没有一件瞒得过我。您跟我来，叔叔，让您乐一会儿。您像所有自以为熟悉大教堂的人一样，可能多少回在那些东西边上走过，却视而不见。”

塔托沿着唱诗堂外面走，领加夫列尔走到“赦罪门”前面的墙壁跟前。在支撑贝鲁格特^①的作品“塔博尔山”的雄伟的圆形浮雕下，开辟了“星星圣母”小教堂。

“您注意看看那座圣像，叔叔。全世界有一个和她一样的吗？是一位少女，一位妙龄少女，要是她眨一下眼睛，会让男人们都发疯。”

对加夫列尔来说，这不是个新发现。从小他就认识那座美丽、性感妇女的圣像，脸含世俗的微笑，身体前倾，胯部突出，双眸有一种愉快欢蹦雀跃的表情，仿佛要翩翩起舞。

① 阿隆索·贝鲁格特（Alonso Berruguete）（1480—1561），西班牙著名画家和雕塑家，在托莱多、格拉纳达、萨拉曼卡等地留下许多令人赞叹的作品。

她手中抱的圣婴也在笑，一只手抓住美女的披巾，似乎想窥探她的胸部。这是座彩绘、涂金彩色石头圣像，有一块缀满金色星星的蓝色披巾，由此给了她“星星圣母”的称号。

“叔叔，您虽然博览群书，但也许您不知道这小殿的历史，它比大教堂古老得多。这里在建造大教堂之前，托莱多的羊毛商、羊毛梳理工和毛纺工建有他们的守护女神，他们以惟有他们仍是这小殿的绝对主人的条件才出让这块地，而且在这小殿以及在大教堂到附近的壁柱整个这块地方，他们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这就带来了种种纠葛！在向圣母做弥撒的日子，他们置受俸神甫在唱诗于不顾，用三弦琴、古诗琴和放肆的歌唱来扰乱宗教仪式活动。如果受俸神甫要求他们安静，他们却回答说应该安静的是唱诗班那些人，因为他们在他们自己家里，这家比大教堂要古老得多。叔叔，这您知道吗？”

“知道，我现在记起来了。巴莱罗·洛萨大主教在十八世纪初跟他们打官司。你瞧，他的坟墓就在祭台的边上。他输了官司，气死了，交代把他埋在这儿让那些骄横无礼的羊毛商在他死后践踏他，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赢他们。这些教会的枢机主教们的傲慢驱使他们保持最值得骄傲的谦虚。但是，这一切就是你要让我看的東西？”

“您会看到更精彩的东西。我们暂且不把她看做圣母。不过您注意看！看这张脸，怎么样！她的眼睛昏昏欲睡。真是个美娇娘！我在这里几小时地看着她。她是我的新娘子……多少个夜里我梦见她！……”

他们向大教堂的大门走出几步以便更好地看清唱诗堂的

全部外貌。在贯通唱诗堂的三个门洞或者说三个小殿上面有一条古老的浮雕排口饰，这是一位中世纪无名氏肖像雕塑家的杰作，代表了创造世界的各种情景。加夫列尔认得这些如“钟门”的当代作品和大教堂早期作品一样粗犷的雕塑作品。

“您瞧。在第一排圆形浮雕中，亚当和夏娃像虫子一样赤身露体。但是主把他们从天堂抛了下来。他们必须穿上衣服去周游世界，您瞧他们在干什么，几乎没穿衣服。您注意看第五个圆形浮雕，从右数，制作这个的那位大叔心情有多好！”

加夫列尔头一回仔细看那些被遗忘了的浮雕。这是中世纪的朴素自然主义。艺术家们相信他们代表了在那个理想时代他们的世俗观念，他们希望在神秘主义文物的任何一个不被注意的角落永远保留肉欲的胜利，以此来证明生活没有死亡。夏娃掉落在树丛中，她的衣服散乱，亚当在她上面，带着疯狂的性欲的表情，把夏娃抱在手里要控制她，他的嘴那么贪婪地紧贴她的胸口，可以看做是在吻，也可以看做是在咬。

塔托对他叔叔的惊讶感到骄傲。

“是吧！怎么样？这是我在教堂里到处转悠发现的。那些受俸神甫先生天天就在这墙壁那边唱诗，没想到在他们头上有这么寻欢作乐的事。那么玻璃窗呢，叔叔？您好好看看。一开始那么多的色彩让人目眩眼花，那些人物形象混成一片，模糊不清，铅丝分割了人像画面，什么也猜想不出。但是我用整整几个下午进行研究，现在我知道得详详细细。那是些故事，是绘制它们的玻璃工时代的事

情，它们隐蔽的意图已经失传，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发现它。”

他指着第二殿的大窗子，透过这些窗子，下午的太阳照进淡茶色的光线。

“您瞧那儿，”那打狗人继续说道：“一位穿着红披风、佩着剑的先生沿着绳梯往上爬。在窗口一个修女正在等他。就像每年‘万圣节’^①上演的堂胡安·特诺里奥^②的故事。再往那边看，那两个人在床上，又有人在敲门。一定就是那两个可疑人物和家里人发现了他们。在另外一块玻璃窗，您仔细看，情夫们光着身子，娘儿们除了长长的头发没有任何遮盖，总之，是那个时候的事，那时候人们没有廉耻，还高昂着头，目空一切。”

加夫列尔面对古老艺术的独出心裁引起了这打狗人的蠢话感到好笑。

“可是在唱诗堂，叔叔，也有东西可看。我们上那儿去，法事活动已经完了，受俸神甫们也离开了。”

加夫列尔感到他走进唱诗堂的那种敬佩之情大大减退了。那把高高的椅子，一边是费利佩·德·博尔戈尼亚的杰作，另一边是贝鲁格特的杰作，以及大量的大理石、碧玉、镀金饰品、雕像和圆形浮雕，都令他陶醉。那是米开朗琪

① 万圣节：11月1日，祭祀没有专门祭日的圣徒。

② 堂胡安·特诺里奥（Don Juan Tenorio），简称“堂胡安”，旧译“唐璜”，是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Tirso de Molina, 1571—1644）作品中好色、玩弄女性的人物。

罗^①的精神再现在托莱多大教堂。

打狗人在审视那把矮椅子，在哥特式浮雕中探求他不健康的好奇心的发现。这第一排和地齐平的椅子比那排高椅子还早半个世纪，是那些低级别的教士们坐的。但是这半个世纪中，艺术有了大的飞跃，从严格、死板的哥特式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温柔优雅。在基督西班牙时期，高涨的热情震撼全国，天主教双王^②作出最后的努力，完成了光复大业。^③在这基督西班牙时期，罗德里戈大师雕刻了这排椅子。在椅子的靠背和翻板靠座的嵌板上，五十四幅雕刻画再现了攻克格拉纳达的主要事件。

塔托不看这些栎木和核桃木雕刻的骑兵们冲锋陷阵和士兵们接二连三攀登摩尔人城墙的场景。他对椅子的扶手，通向高椅子台阶上的扶手、枕头的突出部位更感兴趣。这些部位雕满了动物和怪诞的人物：狗、猴子、鸟禽、教士和伴童，所有这些姿势难辨、古怪和淫秽。这是一个猥亵的群像世界，形似猿猴，姿态荒淫，以最粗俗的兽性的怪模样来表现肉欲。

“您看，叔叔。多有趣，这个最引人注意了。”

① 米开朗琪罗（Miguel Angel, 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主要作品有雕像《大卫》、《摩西》，壁画《最后的审判》及建筑设计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等。

② 指十五世纪西班牙伊萨贝尔女王和费尔南多国王。

③ 指公元711年，北非阿拉伯入侵并占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经历八百多年，到1492年西班牙天主教双王最后收复全部失地，史称“光复战争”。

塔托指给加夫列尔看一个修道士的矮胖小人像，正对着驴的大耳朵布道讲经。

当他们走出唱诗堂，加夫列尔在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大幅油画附近看见了教堂乐师。他刚才关上了紧挨大油画的一扇小门，这门经过一道螺旋式楼梯可通到音乐档案室。这位艺术家手臂下夹着一本封面盖满灰尘的大书。他把书拿给加夫列尔看。

“我从上面拿来的。您会听到点东西，值得一听。”

他说着把眼光从这本书移到了旁边的小门，感叹道：

“哎呀，这个档案室，加夫列尔，真让人难过！每次我去档案室，出来总是很伤心。野蛮、无教养的人去过那里。所有的音乐书的书页给撕了，剪去的都是有花字体、插图、花饰等好看东西的地方。古老的音乐沉睡在尘埃之下。那些受俸神甫先生不喜欢音乐，不懂音乐，也不肯花几个比塞塔在盛大的节日里去听音乐。为了解脱，他们只要有罗西尼^①的任何一个片段就够了，至于管风琴，他们唯一在意的是缓慢地弹奏，很缓慢地弹奏。越缓慢，越显得虔诚，即便风琴演奏者弹一曲哈瓦那女人也无所谓。”

他以忧郁的目光继续瞧着档案室的小门，似乎他将为音乐的毁灭而痛哭。

“在那里面，加夫列尔，有一些非常杰出的作品，只要世界上存在艺术，这些作品不应该泯没。在世俗音乐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大成就，但是请您相信，西班牙有一些宗教音乐的作曲

^① 罗西尼（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以歌剧著称，主要作品有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威廉·退尔》等。

家……这不言而喻是说如果确实存在世俗音乐和宗教音乐，对此我是怀疑的。对我来说只有音乐，我不知道是哪位能人做出这一区分，详细说明前者何处结束，后者又从何开始……在那片圣克里斯托瓦尔墙的后面长眠着西班牙伟大的音乐家，他们被阉割了，尘埃作为他们的裹尸布。他们沉睡比较好。难道让他们听这唱诗班唱的歌！那里有克里斯托瓦尔·莫拉莱斯的作品，他早在三个世纪前，在帕莱斯特里纳^①开始改革音乐之前二十年，就是这大教堂的教堂音乐师。他在罗马和有名的大师共享光荣。他的画像放在梵蒂冈，他的哀歌、赞美歌、圣母赞主歌沉睡在这儿，被遗忘了几个世纪。还有维多利亚，您知道他？是同时代的另一位大师。好忌妒的现代派把他叫做‘帕莱斯特里纳的模仿者’，在他长时间呆在罗马之后，他们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看做是仿制品，但是请您相信，他不仅没剽窃那个意大利人，也许还超过了他。这儿还有里维拉，他是个谁也不记得的托莱多乐师，在档案室有整整一卷弥撒曲；罗梅罗·德·阿维拉，他对阿拉伯区西班牙人的歌曲研究得最好；拉莫斯·德·帕雷哈，这位十五世纪的音乐家，在博洛尼亚写了他的《关于特拉克塔图斯音乐》一书，他打破了阿雷佐的圭多^②的古老体系，发现了声音的平均律；乌雷尼亚和尚，他给音阶增加了第七音；哈维尔·加西亚，上世纪对音乐进行了改革，使之

① 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 1525—1594），意大利作曲家，作品以技巧完美著称，一生创作大量形式不同、风格多样的宗教与世俗音乐，包括弥撒曲、经文歌、奉献曲及牧歌等。

② 阿雷佐的圭多（Guido de Arezzo, 990? —1050），意大利本笃会修士、音乐理论家，创造了成为近代西方音乐记谱法基础的五线记谱法，著有《音乐理论剖析》、《旋律进行法》。

走向意大利(愿上帝饶恕他),他走的这条路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来;内夫拉,卡洛斯三世时代伟大的管风琴演奏家,这位先生在瓦格纳出生前一百年就在西班牙使用了不谐和音,他在为堂娜巴巴拉·德·布拉甘萨的葬礼写安魂曲的时候,就预感到乐器演奏者和歌唱家对他的革命音乐不习惯,他在分谱的边上写道:‘请注意这纸上写的没有错。’他的连祷仪式是那么出名,甚至禁止抄袭,否则就革出教门,但是这一条没有用,因为今天要被革出教门的人正是怀念这连祷仪式的人。请您相信,加夫列尔,那个档案室是一座伟人们的殿堂,但是到头来是座公墓,这殿堂中没有一个人复活。”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教会是始终不太爱好音乐的。要了解音乐,体会音乐,必须是天生的艺术家。您早就知道所有为挣钱在唱诗班唱歌的先生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懂音乐。当我看见您,加夫列尔,对着宗教的事物微笑的时候,我猜测到在您的姿态中有许多没说出的话,我觉得您是对的。我曾经好奇地去了解教会中的音乐史,我曾经一步一步走过了这不幸的艺术几个世纪来身背着十字架所走过的漫长的耶稣赴难的路。也许您听人多次谈到宗教音乐,似乎它是教会创造的又一项事业。行了,那是扯谎,宗教音乐根本就不存在。”

打狗人一听到教堂乐师不知疲倦,滔滔不绝谈他的艺术,谈音乐问题,就远远地走开了。他对堂路易斯已形成他的看法,而且把这看法对上回廊人都讲,说他是个神经病,只知道用他的风琴弹奏些伤心悲哀的曲子,从来不想到让丁子香园的穷人高兴高兴,像“银权杖”的侄女请求的那样弹点可以跳舞的曲子。

这位教士和加夫列尔漫步在宁静的各殿堂间，一边谈着话。这儿没有别的人，只有一群教堂内部的人在圣器室门口，和两个女人跪在大祭台的栏栅前，在大声祷告。冬天傍晚的黑暗开始很快使大教堂暗下来了。第一批蝙蝠从拱顶下来，在林立的柱子间飞翔。

“教会音乐，”这位艺术家说：“是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在教会一切都是无政府的。请您相信，关于天主教在全世界的统一，有许多话可说。基督教，自成为宗教起连不好的作曲法也没有创造过一种。基督教吸取犹太人的颂歌和唱法，形成一种原始、粗犷的音乐，如果现在听这种音乐，我们会觉得刺耳。除了帕莱斯特里纳以外（他的作品没有犹太人的影响），早期的基督教诗人，如圣安布罗斯^①、普鲁登西奥^②等，他们创作的新赞美诗和圣诗圣歌都采撷当时在古罗马帝国世界流行的民间歌曲，也即希腊音乐。看来关于希腊音乐这一点意义重大，对吧，加夫列尔？希腊人在造型艺术和诗歌方面真是伟大，一切有他们名字的作品似乎都渗透了不容争议的美。不过，加夫列尔，那样的希腊音乐应该说是一种封闭禁锢的音乐。艺术的发展并

① 圣安布罗斯 (San Ambrosio, 340—397)，意大利米兰大主教 (374—397)，在职期间竭力维护教会的权力，在文学、音乐方面造诣颇深，创作了圣咏曲。其祭祀节日为 12 月 7 日。

② 普鲁登西奥 (Prudencio, 388—404?)，西班牙拉丁文诗人，基督教早期诗人之一，创作了赞美诗及其他诗作，语言粗俗，但风格生动活泼，富有画意。

不是和人类生活平行的。当雕塑艺术出了个菲迪亚斯^①，并已达到了顶峰的时候，绘画没有经历那种几乎是胚胎性质的阶段，这一点在庞培^②仍然可以看到，而音乐当时还处在幼儿哑哑学语阶段，文字记载不能使音乐永存，因为音乐的形式之多和民族一样多，几乎全部音乐取决于表演者意愿的抉择。嘴上唱的和乐器演奏的不能固定在羊皮纸上，因为那样就不可能进步。因此才有了雕塑的文艺复兴，绘画和建筑的文艺复兴。在中世纪之后，当各种艺术复兴的时候，发现音乐还处在它脱离古老的世界时原先的幼年时期。”

加夫列尔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教堂乐师的话。

“这是原始的基督音乐。”堂路易斯继续说：“宗教歌曲信赖传统，以耳听相传，渐渐就走样变质。在每个教会唱法都不同。宗教音乐是一种晦涩难懂的语言。音乐家们趋向于严格的统一，趋向于严肃。圣格列高利一世^③在六世纪公布了他的启应轮流吟唱的《圣咏集》，集所有礼乐曲调之大成，又根据他的观点加以精炼。那是两种成分的混合。希腊的，但是是东方和

① 菲迪亚斯（Fidias），活动时期是公元前490—430，古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主要作品有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宙斯坐像，原作均已无存。

② 意大利南部古城，在维苏威火山附近，公元79年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自十八世纪中叶起，考古学者继续发掘其遗址，至少已完成过半，近来又有新的发现。

③ 圣格列高利一世（San Gregorio I, 540—604），意大利籍教皇（590—604），集中教廷权力，建立教皇领地，整顿神职纪律，改革礼拜仪式，主持编订《格列高利圣咏》，为中世纪罗马教皇制奠定了基础。

精选的成分,再有有点像当代马拉加民歌那样的东西,另一个是古罗马成分,庄重又死板的成分。音符用字母来表达,沿用弗里吉亚^①、吕底亚^②等等的音调,而希腊音乐的迷宫继续存在,虽然希腊音乐用了装饰音、短休止和送气音,十分多变。那本集子已经失传,许多想重新欣赏这古董的人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们认为那是最优秀的作品。根据现存的片断来看,如果现在来演奏那样的音乐,按今天对艺术中的宗教性来理解,那就毫无宗教音乐可言,因为那可能是一首摩尔人或者中国人那样的歌曲,或者是某些至今存在于古宗教仪式中的支离破散的希腊歌曲。竖琴在十世纪出现管风琴之前一直是庙堂的乐器。管风琴是一种粗陋笨重的乐器,必须用掌击进行演奏,同时用鼓鼓的皮囊给送气。阿雷佐的圭多在《圣咏集》的基础上做了一点音乐处理,仅此一点处理而已,但这就足以为他创造了五线谱而给他戴上本笃会修士的称号。他继续以博埃西奥^③和圣格列高利的文字作为音符,而且用三种不同的颜色写在两条线上。无政府状态的纷杂依然继续存在。粗粗学点音乐得花十二年时间,不同城市的歌手做不到对同一首歌、同一个角色有一致的理解。圣伯尔纳^④为人如他那时代一般严厉和节俭,认为这种歌曲由于不太严肃是荒唐的,他是个对艺

① 弗里吉亚 (Frigia), 小亚细亚的一古国。

② 吕底亚 (Lidia), 小亚细亚的一古国。

③ 博埃西奥 (Boecio, 470? —525),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 著有《哲学的慰藉》。

④ 圣伯尔纳 (San Bernardo, 1090—1153), 法国基督教神学家, 明谷隐修院的创建人和院长 (1115), 神秘主义者, 著有《论恩宠与自由意志》、《致圣殿教士团书》等。

术有抵触的人。他希望教堂没有家具陈设,没有建筑上的装饰;在音乐方面,他认为最慢的最好。他是圣歌之父,是他说的音乐越缓慢、越多休止越具宗教特色。但是到了十三世纪,基督徒们认为这种旋律是极其荒谬的。教堂是排遣烦恼的场所,戏剧是当时人生活的中心。上教堂稍许祈祷上帝,也是去排遣,忘掉外部的战争、暴力和胡作非为。民间音乐再次进入了教会,在各大教堂里可以听到流行的歌曲,而且几乎都是些猥亵的歌曲。人民参与了宗教音乐,唱各种音域的歌,他们觉得哪个音域好就唱哪个音域,因为他们首要的意图是唱复调或多声部协调的歌,那时宗教是愉快的、大众的、民主的,正如您所说的,那时还没有以狂热和恐惧使人情绪暴躁的宗教裁判和对异教的猜疑。那些使城市里的手工艺者和丰收的农民愉悦的粗陋的乐器进入了教堂,管风琴加上了中提琴、小提琴、小号、风笛、笛子、吉他和古诗琴伴奏。圣歌本来是几乎全欧洲的礼乐,但是教徒们由于其难懂而轻视它,代之以各种歌曲。在盛大的节日,哼唱宗教的赞歌,但使它们适应流行的民间曲调的音乐,如《武士之歌》、《吻我吧,莫雷尼塔》、《我不知什么使我热血沸腾》、《为我悔恨吧,夫人》、《该死的,谁把你出嫁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歌曲……也许您会问,那罗马怎么样?面对如此混乱,教会说些什么?……天主教教会并无艺术观点,而且从来没有过。它没有能像其他宗教那样创造一种独具特色的圣事用的建筑学,也没有能创造它自己的绘画和雕塑,更不用说音乐。它是逐渐适应环境,缺少特色地接受、吸收和拥有本不是它的,但是人类进步的东西。罗马格列高利风格、拜占庭风格、哥特风格、文艺复兴,凡此种种都进入了它的建筑,

但是纯粹又独特的基督艺术不存在，从来不曾存在过。在音乐方面，大谈特谈严肃性、统一性、格列高利的传统，都是空话，没有确切的意义，是掩盖缺乏艺术观点的含糊其辞。宗教与世俗的界限何在？从十六至十八世纪评论家讨论过这问题，而教会放手让谈论这个问题，无定见地一切都接受。偶尔罗马让人听到教皇的某个诏书，但谁也不理会它，因为教皇不可能说：‘艺术上的宗教是这个，艺术上的世俗是那个。’帕莱斯特里纳接到了改革教会音乐的委托：教皇表示决心不让圣歌再延续下去，或者如有必要，就取消圣歌。教皇马塞洛的弥撒曲及其他曲调就是这一指示的结果，但是进步并不太大。要使教堂内的音乐纯洁化，就必须在以意大利的蒙特威尔地^①，法国的拉莫^②及德国的塞巴斯蒂安·巴赫^③和韩德尔^④为主的世俗世界发起强大的音乐运动。那是多宏

① 蒙特威尔地 (Monteverde, 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创立威尼斯歌剧风格，对后世音乐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歌剧《奥菲欧》、《尤利赛返乡》、教堂音乐及牧歌（9卷）等。

② 拉莫 (Rameau, 1683—1764)，法国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曾长期任教堂管风琴师和古钢琴教师，理论著作有《论和声》，作品有钢琴曲、歌剧《皮格梅良》等。

③ 塞巴斯蒂安·巴赫 (Sebastián Bach, 1732—1795)，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出身于爱森纳赫的音乐世家，一生作品丰富，多用复调音乐写成，把巴洛克音乐风格推向顶峰，对西方音乐发展有深远影响。

④ 韩德尔 (Haendel, 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七十余部及康塔塔、声乐曲、器乐曲等，代表作有清唱剧《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等。

伟的时代！加夫列尔朋友，后来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人，格鲁克^①、海顿、莫扎特、布瓦尔迪约^②等，尤其是我们的好朋友贝多芬！”

这位教堂乐师沉默片刻，犹如他崇拜偶像的名字令他进行宗教式的静默，之后他又继续说：“整个那场艺术的雪崩排山倒海冲过教会，而教会则按它的老习惯，逐渐取其最合意的东西。在每个国家，天主教礼仪都取得符合其传统的音乐。在西班牙，从帕莱斯特里纳时代起我们充满了意大利品种，德国音乐和法国音乐传不进我国。我们首先是赋格曲派和对位法作曲者。在罗西尼的《圣母悼歌》之后，我们如此饱餐了戏剧的旋律，以致我们不再喜欢品尝新的菜肴了。在西班牙，宗教音乐和意大利歌剧并驾齐驱，那些受俸神甫先生不懂这一点，如果在做弥撒时给他们演奏点贝多芬的作品，他们会十分愤慨，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世俗的，但他们会神秘地全神贯注倾听多少年来上演的意大利戏剧片段。您会问，那么圣歌呢？圣歌的老窝就在这大主教教堂。几个世纪中这儿保存着圣歌并使之纯洁化。托莱多逐渐把最好的东西采集起来，西班牙和美洲所有教堂的合唱曲都是从本教堂的本子流传出去的。啊，可怜的圣歌！它已经死亡很长时间了。现在您看到，加夫列尔，有谁在唱诗的时候上大教堂

① 格鲁克（Gluck，1714—1787），德国作曲家，原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1754），倡导歌剧革新，主张音乐服从戏剧，对西方歌剧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有歌剧《奥菲欧与欧律狄刻》、《阿尔西斯特》等。

② 布瓦尔迪约（Boilbeau，1775—1834），法国歌剧作曲家，主要作品有《有罪的女儿》、《巴格达酋长》、《白衣夫人》等。

来？绝对没有人来。晨祷时念经祈祷，所有的宗教仪式是在最孤独中吟唱进行的。信教的人已经不熟悉礼拜仪式，也不重视，把它忘了，只觉得九日祭、三日祈祷和演习活动有吸引力，所有这些统称为被允许的、礼拜仪式外的宗教活动。早就应该舍弃古老、无邪念、直率和严肃的西班牙天主教习惯仪式，正如我们所说的，舍弃一种家常便饭式的天主教的惯常做法，而以通用的语言给人们唱动听的歌曲来吸引人。耶稣会以他们的智谋想到了应该给宗教仪式一种戏剧性的吸引力，把礼拜仪式和小歌剧相结合，因此他们的教堂金碧辉煌，铺着地毯，十分华丽，挤满了人，而那些老教堂像坟墓一样显得空空荡荡。虽然他们没有大声宣告必须改革，但是已经付之实践，取消了拉丁语的圣歌（这是不为平民大众所欢迎的），代之以各种浪漫曲和亲切温柔的经文段落。这是教会的禅让，是对教会所处的音乐的无政府状态的认可，是承认它古老的宗教仪式无力感动民众，承认这种仪式已经死亡。在各教堂，除了保留大圣礼外，没有任何用拉丁文唱的了。讲经布道和赞美诗都用本国语言。这和新教教堂的情况一个样。对于信教而不进行思考的虔诚的教民来说，是那些外观的东西在区分各种宗教，本来就没有必要在篝火上用火刑烧死那么多人，没有必要让半个欧洲激烈地进行有名的‘三十年战争’，没有必要让罗马教皇们一次又一次下令逐出教门，最后到头来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一个形象和几根教堂用的蜡烛，因为双方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不过，加夫列尔，咱们走吧，要关门了。”

钟楼人在各殿堂间匆匆走过，摇晃着他的一串钥匙，吓唬那些越来越多的蝙蝠。那两位虔诚的妇女早已不在了。在

教堂内只留下乐师和加夫列尔。从下面一个殿走来了那些守夜人，前面跑着一条狗，守夜人在他们岗位上一直要呆到第二天早晨。

这两个朋友，在玻璃窗恍惚的光线的照引下，走出那些昏暗的殿堂来到了回廊。在外面，一片阳光映红了花园和丁香园的回廊。

“我再说一遍，”这位艺术家教士一边看着他们刚走出来的门，继续说道：“在那里面既不热爱艺术，也不懂艺术。教堂只为音乐提供一种服务，并不爱好这工作。只是宗教仪式需要乐器演奏者和歌手，教堂才维持六人演唱班的乐队和学校，以便在没有学校的时代进行音乐教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任何作为。我们这些代表教堂内艺术的人，如同古老小教堂乐队的乐器演奏者：玩笛号的人、巴松管的吹奏手和低音乐器手一样，被人瞧不起的。对于受俸神甫来说，沉睡于音乐档案室的一切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我们这些宗教艺术家则属于另类，充其量是比教堂司事高一个台阶。我们乐师、管风琴手、男高音、女低音和男低音几个人就组成教堂乐队。我们是和受俸神甫一样的教士，我们是通过考试受俸禄，我们和他们一样学习了宗教学，此外，我们是乐师。尽管如此，我们几乎拿一个受俸神甫薪俸的一半。为了让我们随时随地记住我们低下的地位，他们安排我们坐在低椅子上。在唱诗班里唯一懂得音乐的我们却排在最后。唱诗班的领班依法是歌手们的头头，领班是不经考试由罗马任命的任何一个受俸神甫，他对五线谱上的音符一个不识。无政府状态！我的朋友加夫列尔！教会瞧不起音乐！音乐始终只是它的女奴，从来不是它的女儿！在修女的修道院，也相仿

佛，女管风琴师和女歌手始终是最被瞧不起的人，把她们叫做‘蛮女人’。按节拍唱歌是教会中最低的职务。教会中干什么都有钱，教会产业的资金什么都可以用，就不能用于音乐。受俸神甫们把我们看做是穿着宗教法衣伪装起来的疯子。每当到了圣体节或者萨格拉里奥圣母节，我一直幻想举行一次与大教堂相称的大弥撒，但是财务主管阻拦我，要我办点简朴的意大利式的事情：在本市找五六个乐器演奏者就行了。我不得不指挥几个充数的滥竽，听着在这些为了较重大的事件而建筑的拱顶下那蹩脚的乐队怎么演奏就怎么生气。总而言之，我的朋友加夫列尔，这已经死亡，……而且彻底死了。我们还没有消失，他们还看着我们，不过已是半截入土。”

乐师的悲叹并没有让加夫列尔吃惊。在大教堂人人都抱怨宗教信仰活动忍受的卑微苦难的生活。有些人，如“银权杖”，把这种生活归咎于岁月的冷酷无情；另外一些人，如音乐家，认为责任在宗教自身，但不敢大声说出来。从童年就学到的对教会和对其崇高权力的尊敬，迫使大教堂的居民噤若寒蝉。教堂中的大多数仆人在道德观念上仍停留在十六世纪盛世，生活在奴隶主义和对上级怀有迷信式的恐惧的气氛中，他们预感到他们地位的不公正，但是在思想中不敢把他们模模糊糊要抗争的意图表达出来。

只有到了晚上，在静静的上回廊里，在大教堂的石壁中间生儿育女又相继死去的夫妇们才敢学舌，相互讲讲教堂的议论传闻，那些关于单调的基督生活的无休无止的流言飞语；讲讲受俸神甫对大主教阁下的微辞和红衣主教关于教士委员会说的话——每回大主教提升发生的无声的战争；讲讲

苦于自己的奢望和情有独钟的单身汉的诡计和怨恨，以及讲讲他们回想起教士们选举高级神职人员并对他们指手画脚的时代，而现在只能呻吟在大主教铁的意志的严厉压迫下所产生的返祖式的怨恨。

住在上回廊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些争斗。他们甚至听到了受俸神甫们在圣器室放肆发表的议论，但是这些低微的仆人即便当他们面说那些议论传闻，他们也心存疑虑，保持沉默，怕被邻居揭发，也许这邻居正觊觎着他的职位。这是几个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恐怖，这种恐怖仍然活在那个麻木停滞的小小的世界里。

打狗人是唯一不害怕并公开谈论教士会和红衣主教的人。能对他怎么样！他几乎都巴不得他们把他撵出那个洞穴，让他干他宠爱的事，回到斗牛场而不引起家中的反对。此外，他对说唱诗班先生们的坏话乐此不疲，因为这些先生在他当侍童的时候打他后颈打得最多。他给所有的受俸神甫都起了外号，而且一个一个指给加夫列尔看，给他讲他们生活中的秘密。

他认识每个受俸教士在参加唱诗班之后去度过下午的家，知道那些弄皱他们白色法衣的夫人们或修女们的名字，了解这些教士委员会的女崇拜者之间激烈凶狠的暗斗，她们竭力浆洗熨好受俸教士的服装，从而战胜对手。

他们走出唱诗堂的时候，他指着那个领班——一个身体肥胖、脸上布满红色痂疤的受俸教士。

“叔叔，您看那个人，”他对加夫列尔说：“他脸上那块疤痕是过去留下的纪念。他跑得太快了，没有注意一脚踩在……以他脸上这块痂疤，现在他还自诩为是胜利者！有一天

下午，他在回廊对双王小教堂的一个教士说：‘那些军校的上尉教授们认为对于女人，他们能勾引上托莱多最漂亮的女人，但是那里有教会，这些俗人就俯首自愧不如了！’”

过后，他指着一群年轻的教士，笑了起来。这些教士仔细刮干净了脸，面颊涂了蓝色和玫瑰色，丝质的长袍来回翻动，散发浓烈的麝香味。那是些教士委员会的雏鸡儿，年轻的受俸神甫，他们频频去马德里向他们的保护人，年迈的侯爵夫人们忏悔，这些侯爵夫人以她们的权势影响，为他们在唱诗班夺取了一个席位。他们在“圆面包门”前停留片刻，以便整理好长袍的褶子，然后朝大街冲去。

“他们去搞女人了，”塔托用他下流的黑话说。“小心！快让开那些堂胡安们！”

等到再没有受俸神甫出来时，打狗人对他叔父讲起了红衣主教。

“这几天他净发脾气，在大主教宫中没有人忍受得了他。那个倒霉的痠管弄得他发了疯了。”

“不过，他真的有那个病？”加夫列尔问。

“行了！大家都知道。您去问问托玛莎姨妈。甚至有人说他们真是那么要好的朋友，因为她给他制作某种油膏，涂了他感到像天使的手在安抚。他就像有一条疯狗死死咬住他那部位，所以他有那种无法忍受的脾气。早晨起来就发脾气，闹得宫里翻了天，而后整个教区都翻了天。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后面的恶狗咬他的时候，就该逃避他。我在主教主持的盛典上看见过他，只见他头上戴着法冠，用那种眼光看着大家，差一点就要掷出法杖，揍我们嘴巴子了。正如姨姥姥说的，‘他要是没喝……’”

“看来教士委员会的传言是真的。”

“喝醉酒，那没有，老叔。人各有所好：他这个时候喝一小杯，过会儿再来一小杯，如果有朋友拜访他，为了招待客人，才喝第三杯。这是他在安达卢西亚当主教时养成的习惯，从那儿带来的。但是绝对没有纵酒狂饮的。浅浅地呷一口，有节制，只是为了活血健身。而那酒，是高档的，叔叔，我这是通过他的一个侍从知道的。一阿罗瓦^①五十杜罗！是把拉曼恰最好的酒贮存在一个法国人时代的桶里面的，是一种暖肠胃的甘味酒，把肠胃作为器官来加温锤炼。但是，对大主教阁下来说，还得锤炼更往下的部位，使他像个该下地狱的人忍受极大的痛苦。拿托玛莎姨姥姥的话来说，‘医生给他调理治病，而他却用那种高贵的美酒又把自己弄病。’”

塔托以他那种恬不知耻的嘲讽口气，表现出对这位高级神职人员一定的情分。

“叔叔，您别以为他是个凡夫俗子，抛开他的坏脾气，他真是了了不起的人物。您看他，长着一个小脑袋，一张白净的脸，像雏鸡一样白里透红。跟他高大肥胖的身体相比，那脑袋就更显得小了，但是什么东西都装在那颗小脑袋里。他在马德里发表了许多讲话，有关他的印刷出版物把他说得如同‘战神’，他的才智对任何事都有办法对付。有人和他谈到世界上存在的贫困？他立马开出处方：给穷人面包，有钱人要乐善好施，给大家多讲基督教教义；如此人们就不会因为你比我钱多而相互争斗，世界就会有宽容忍让和讲情

① 西班牙液量单位，其量值因地区或液体的类别而不同。

理，这正是现在所缺少的。怎么样，叔叔？您怎么在笑？我可是喜欢阁下开的处方，特别是关于面包这一点，因为教义，虽然是需要，但我们大家从小就学了。”

打狗人谈到他的枢机主教，他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像个人物吧？完全是个神情潇洒的人物。一点不虚伪，不卑不亢。大家知道他年轻时当过兵。托玛莎姨姥姥还记得在修道院见过他戴着饰有马鬃毛的头盔，带军士长的肩章，挂着一把弯刀，很神气。他什么都不怕，不做违规的事，也不虚张声势。去年这里来了一位葡萄牙小姐，用她的丝袜子和大草帽引得士官生们都疯了。您认识小胡安，您知道他是死了很久的红衣主教阁下的侄子的一个儿子。就是这小子穿着制服，挽着这位葡萄牙小姐的手臂在索科多维尔大街散步，让军校的伙计们眼红。有一天，这姑娘来到了大主教宫，下人们看她打扮得那么华贵，以为她是马德里的一位太太，就给她放行。主教阁下接见了她，面带慈父的微笑，目不转睛地听她说话。这是在场的一个侍童朋友告诉我的。这个娘儿们向红衣主教告他侄子那个士官生的状，说他哄了她两天但没给她一分钱。主教阁下微微一笑，客气地说：‘夫人，教会是穷，但是我不愿意为了那个没有头脑的坏了家庭的好名声。请您收下，聊以自理吧。’他付给了她两杜罗。这个葡萄牙女人，为受到良好接待所鼓舞，想尖声怪叫，以为用这丑闻把堂塞瓦斯蒂安吓倒了。但是，这下该看到主教阁下暴怒时是什么样子了。‘孩子，叫警察。’他对侍童喊道。他的脸色那么难看，这位葡萄牙女人急匆匆走了，把两块银币也留在了桌上。”

加夫列尔一边听这故事，一边在笑。

“他真是个人物，叔叔，请您相信我。我喜欢他，因为他把教士委员会攥在手心里，不像他的前任，那个窝囊废，只知道祈祷，见了最低的受俸神甫也战战兢兢。他们要是恫吓这一位，那会怎么样？！他敢于在一天下午走进唱诗堂，用他的法杖大打出手。从此两个多月他不下到教堂，连受俸神甫也见不到他。最近一次，受俸神甫的一个委员会到宫里去，下人们都吓得发抖了。他们要建议在大主教教堂进行我也不知道的什么改革，他们威胁说：‘先生，教士委员会的意见是……’堂塞瓦斯蒂安怒不可遏，打断了他们的讲话说：‘教士会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教士会没有常人的见识。’于是他就转过身去不理他们，使他们一个个呆若木鸡。之后，他用手拍着家具，高喊着说，应该尽可能让教堂所有的空位子由教士中最坏的人补上，让那些酗酒、搞诈骗等等的修士进入教士委员会。‘我要粉碎教士会，’他大声喊叫说：‘我给它泼脏水，这样它会学会不再谈论我，我要让教士会蒙受……对，先生，让它蒙受……’您可以想象，叔叔，主教阁下想使受俸神甫们蒙受什么。这位可怜人是对的。那些唱诗班的神甫干吗要去干预堂塞瓦斯蒂安是这么还是那么生活的，有这些或者另外一些纠葛呢？是他不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了？难道他们对他们令人气愤的外出会客说了一个字？虽然托莱多都知道这些丑事。”

“那么受俸神甫们对红衣主教说些什么？”

“他们说小胡安是他的孙子，他父亲死了，又成了大主教阁下的侄子，其实是他在安达卢西亚当主教时同某个夫人的儿子。但这看来并不使堂塞瓦斯蒂安很生气。另外有一件事使他大发雷霆，甚至癆管发炎，弄得他火冒三丈，是他

们谈到了堂娜维西塔。”

“那位夫人是谁？”

“哎呀！她可是好人。大教堂内外除了她就不谈论别人，您竟然还不认识堂娜维西塔？她是主教阁下的侄女，和他一起住在宫里。她才是发号施令的人。堂塞瓦斯蒂安，尽管平时是那么可怕，但是见了她，就变成温顺的天使。他该死的病犯的日子里，他发火、大喊大叫，几乎要咬人，但是堂娜维西塔一出现，他立马克制自己，默默地忍受痛苦，像个小孩子一样哼哼，一直到她给他说句温柔甜蜜的话，或者给他表示一下亲热，让主教阁下高兴得如痴如呆！……他很爱她！”

“不过，她是……”加夫列尔奇怪地接着问。

“当然她是您想得到的情况。还能是别的什么？她从小在贵族女子学校，红衣主教一到托莱多就把她领了出来，带到他宫里。堂塞瓦斯蒂安的恋爱是多盲目！问题是这件事不值当。她是一个瘦弱、脸色苍白的娇小姐，大眼睛，头发很美，就这些。据说她会唱歌，弹钢琴，看了很多书，知道许多那所有钱人学校教的东西，她有上帝的恩典能让主教阁下神魂颠倒。她有时穿过拱门到大教堂来，穿着出家人的服装，披着披巾，打扮得像个修女，旁边有一个难看的女佣人陪着。”

“事情不会是你们认为的那样吧，小伙子。”

“哎呀！整个教士委员会都肯定是这样，而且最规矩的受俸神甫也坚信不疑。连主教阁下的朋友和得宠的人，把这儿流传的不利于阁下的流言飞语转告阁下的人也并不很热情来否认。每当这种流言飞语传到堂塞瓦斯蒂安耳朵里，他就

气愤，大发雷霆。如果有人对他说要在唱诗堂举行一次舞会，他也不会像知道有人嚼堂娜维西塔的舌头那样激怒。”

打狗人停了一会儿，似乎在犹豫是否要说出些严重的事情。

“那位女士是很好的……所有宫里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和他们说话和颜悦色。再说，如果她对红衣主教行使她极大的权力，那是为了避免阁下厉声斥责，好多次在他剧烈疼痛的时候，他就想把杯子、盘子都扔到家里佣人头上。他们为什么要把她扯进来呢？难道她伤害了他们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而谁要是做坏事，上帝会惩罚他的。”

他揉了揉太阳穴，好像又在犹豫了。

“至于说到堂娜维西塔和红衣主教的关系，”他补充说：“对此我毫无疑问。我有材料，叔叔，我有可靠消息，知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一个侍从好多次看见他们亲吻。是说两个人接吻？不是。是她吻他，堂塞瓦斯蒂安以天真的微笑接受那个马德里小女人的亲热。可怜的他已经那么老了！……”

塔托以他淫秽的设想说完了他的机密要闻。

这种对红衣主教的流言飞语从圣器室一直往上传到了回廊，让加夫列尔哥哥很生气。“木权杖”，这个教会中的普通一兵，决不能平静地听任对他上级的攻击。他认为，那全都是诬蔑诽谤。关于堂塞瓦斯蒂安的流言，受俸神甫们对过去历届大主教也都说过同样的话，这并不妨碍他们死后都成了圣徒。当他发现塔托在丁香园学舌讲那些低下的闲话，他就以一家之主的绝对权威来威胁塔托。

埃斯特万眼看他兄弟的身体状况很是伤心。他赞扬他兄

弟的态度，总是很谨慎，默默地以恭敬的态度接受教堂的习惯，没有说过一句话透露他的过去。他对周围人敬佩他兄弟的气氛，对回廊的平民百姓以热切的心情听他兄弟讲游历感到骄傲。但是，加夫列尔的病使他很难过，他确信死神的手伸到了他兄弟身上，只是由于周围人对他的细心照料才推迟了攫走他的时间。

有些天，这位默默无闻的老人，看到加夫列尔气色很好，不那么经常听到他痛苦的咳嗽声，他满意地微笑了。

“小弟，现在那样很好。”他愉快地说。

“是呀，”加夫列尔回答说：“但是你别抱幻想。我是病魔缠身。到时候它就来了。是你在阻挡它。但是，总有一天它会胜过你的。”

死神终将战胜他的说法激励着埃斯特万，使他加倍努力照顾加夫列尔。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营养，只要走来看加夫列尔，他手里总带点东西。

“把这吃了。……把我给你带来的喝了。”

他在顽强地斗争，同那个受损的肌体，同被贫困糟害的胃，同受伤的肺和运行失调的心脏，同由于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和感情波折已经筋疲力尽的人体机器作斗争。

经常不断地对病人的照顾关心打乱了埃斯特万的经济生活。他微薄的工资和教堂乐师可怜的一点资助几乎不足以满足他一个人比全家人加起来都高的消费。每到月底，埃斯特万得恳求“银权杖”帮助才能度过月末的日子，这样他也加入了拴在教士高利贷上的驯服又可怜的教民群。另外有些时候，教堂乐师，一时意识到了现实生活，给埃斯特万若干比塞塔，牺牲了他购买一本新的乐谱的乐趣。

加夫列尔猜想到他哥哥忍受的艰难贫困，也想为家中的开支做点贡献。但是，他隔绝在教堂之中能找到什么工作呢？他期望找一个为教堂效力的位子，每月初从“银权杖”手中挣些比塞塔，免得自己成为让哥哥那么费钱的累赘。但是所有的位子都有人，惟有死神可以打开空缺，而又有那么多饥民在等待机会，申述家庭的权利。

希望自己对哥哥有点用处和让哥哥的牺牲少付出点代价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使加夫列尔十分痛苦，使他单调苍白的的生活惶惶然不可终日。他问埃斯特万他能做些什么以免整天无所事事，他哥哥以他厚道善良的表情回答说：“照顾好你自己，只要照顾好你自己。你唯一的责任就是保养好身体，没有别的。其他的事，有我在这儿。”

圣周到了，加夫列尔找到了机会打几天短工。他们要在大教堂内在唱诗堂后面和“赦罪门”之间竖起闻名遐迩的花烛祭台。这是一项繁重又极其复杂，豪华又是巴罗克式的建筑，为此在本世纪初曾经花去波旁国王的第二任红衣主教一大笔财富。那真要一大片林木才能搭成祭台的支架。浪费了红衣主教的财富才筑成这牢固又奢华的工程，为了搭起这神圣的祭台需要好多天和不少的人工。

加夫列尔拜访了堂安托林，请他在工程中找个工作。在两星期中，他可以每天向他哥哥交七雷亚尔。他过去习惯于他的工作得到优厚的报酬，现在接受这短工却如同意外发了一笔财。

“木权杖”愤愤表示反对。加夫列尔有病，不应该干费劲的体力活伤害他脆弱的身体。他不断地咳嗽着，感到喘不过气来，在那种极其繁重的搬运和捆扎木料工作中能去干什

么？这病人却让他放心。他早就知道教堂里的工作是怎么回事，一切都不慌不忙地干，不赶什么时间。为教会干活的工人干起活来都是懒洋洋，稳稳当当，小心谨慎，慢慢腾腾，这似乎也影响到了一切宗教活动。再说，“银权杖”了解他的身体状况，给他留个不太艰苦的工作，让他安螺丝钉和销钉，摆齐台阶上的大烛台，布置好壁毯。他们相信他是个各处游历，见多识广的很有鉴赏力的人。

加夫列尔在祭台工程中工作了两个星期。这一段时间较多的活动看来对他有一定的好处。他来回走动，挥动手臂，给他的同事下达命令，从教堂走到丁香园的最高处，祭台就设在这个地方。他满身尘土，四肢由于不停地来回走动而感到疲劳，这些反使他产生了自己身体健康的幻想。

这两个星期他没有进鞋匠的家门，几乎没有见到他的聊天友。钟楼人和朋友们都敬佩他。一个那么有学问的人，和他们大家一样干活来帮助他的哥哥！

有一天早晨，托玛莎老太太在花园的栅栏边拦住了他。

“有消息了，加夫列尔。我相信我知道了我们的小鸟在哪儿。现在我不跟你多说，但是你准备好帮我忙。在你想不到的一天你会在大教堂看到她。”

建造祭台的工程竣工了。教堂内在唱诗堂和“赦罪门”之间的整个地方为这座光彩夺目、庞然大物的建筑物所占据。按照传统的习惯，托莱多人都赶来欣赏这密密摆满一排排蜡烛的台阶，手持长矛的雪花石膏的罗马圣徒列传人物，以及有无数皱褶的极为华美的帷幕，帷幕从拱顶一直挂到祭台的平台上。

“圣周五”下午，加夫列尔正混在一群虔诚的教徒中，

欣赏某些方面也是他自己的作品。大教堂以它纯洁无瑕的白色绽开了笑脸，虽然黑色的幔幕遮住了人物形象和供桌。光辉灿烂的圆花饰以它们色彩缤纷的花烛抹去了宗教仪式悲怆的面貌。在唱诗堂一个男高音哼出了耶利米的哀歌和东方先知的悠扬的曲调，这些为基督死去发出的悲歌没有引起回响地消失在中世纪的教堂中。这教堂是在一个尸横遍野，田地荒芜的时代，把四壁高墙庇护下的愉快生活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民主纪念碑。

加夫列尔感到有人拉他的上衣，他回过身看见了女花匠。

“来一下，外甥。我已经把她带来了。她在回廊等你。”

他出来后，托玛莎老太太指给他看了一个女人。她依在花园的石柱墩上，蜷缩着身子，裹着一条破旧的毯子，头上盖着一块头巾直挂到眼睛上。

加夫列尔好像从来就不认识她。他记起了多少年前那张红润的小脸，又惊讶地看看一张苍老的年轻人的脸，形容枯槁，颧骨凸出，耳朵深陷，眼睛上眉毛稀疏，没有了睫毛，眸子还美丽，但蒙上了一层没有光泽的不透明物体。她身上的一切都透露出贫困和沮丧。裙子是夏天的裙子，裙子下面露出一双比她的脚大得多的破靴子。

“叫呀，姑娘，”老太太说。“他是你加夫列尔叔叔，他虽然干了些糊涂事，可他是上帝的天使那么好心。多亏他我才去找了你，你该谢谢他。”

女花匠把萨格拉里奥往她叔叔面前推。但是这姑娘低着头，弯弓着背，往后退，仿佛无法忍受站在她家庭的亲人面前。她用可怜齷齪的头巾捂着脸，遮掩她的眼泪。

“姨妈，我们到屋里去吧。”加夫列尔说：“这年轻人呆在这儿不好。”

去回廊的楼梯上，他们让女孩子走在头里，她蒙着头往上走，也不看，似乎她的脚本能地会走那些台阶。

“今天早上我们从马德里到了这里。”在他们上楼的时候女花匠说道：“我把她放在了一个客店，过了一晌，傍晚才把她带到大教堂来。这时间最好，埃斯特万在唱诗堂，你有时间来安排……我在那儿呆了三天。哎，加夫列尔，我的孩子！我都见到些什么东西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呆在什么鬼地方！那是穷苦妇女的地狱！还说我们是基督徒！是帮魔鬼！……幸亏我在宫廷里有些熟人，就是那些来过大教堂的有钱有势的人，他们还记得我这个女花匠。要把这个倒霉的从魔鬼手中弄出来，我什么都缺，甚至缺钱。”

上回廊渺无人影。他们来到卢纳家族门口时，这女孩子仿佛刚从昏昏沉沉的跋涉中醒来，带着恐惧的表情往后倒退几步，似乎屋子里有巨大的危险在等待她。

“进去呀，孩子，进去呀！”托玛莎姨妈说：“这是你的家，你早就该回来了。”

她推着她走进了门。进了门，在门厅，她停止了哭。她吃惊地环顾四周，肯定对自己到了这里吓了一跳。她的眼睛惊愕地审视着一切，似乎对每样东西仍然在五年前的老地方感到惊讶，一切都井井有条，令人怀疑时间是否真的已经流逝。在这小天地里丝毫没有变化，似乎在大教堂的荫庇下这小小的天地凝固石化了。只是她，正在花季少女时离开了它，回来时已是人老珠黄，病魔缠身。

三个人在沉默中过了好一会儿。

“你的房间，萨格里拉奥，”终于加夫列尔温存地说：“还和你离开时一个样。进去吧，我不叫你，你别出来。你安下心，别哭。你要相信我。你不太熟悉我，但是姨妈可能已经跟你说了我关心你的命运。你父亲要回来了。你躲一躲，别出声。我再说一遍：我不叫你，你别出来。”

当只有女花匠和她外甥两个人的时候，他们听到姑娘压抑的呜咽声，她置身在自己早先的房间里不禁哭了起来。之后，发出她身子倒在床上的声音，她哭泣的喘息越来越压抑。

“可怜的小丫头！”老人说道，她差一点也要哭出来了。“是个好孩子，她为自己的罪孽很后悔。要是她父亲在那个无赖抛弃她时就去找她，她就少受点耻辱，少吃点苦。而她的身体？我相信，加夫列尔，比你还差……那些男人！表面上信誓旦旦，全是假话！诚信就是要对同类仁爱，有同情心，不对任何人使坏！这一点，有一天我就对我的女婿这个不要脸的说过。他看见我去马德里找这姑娘就生气，大谈家庭的荣誉，说如果萨格里奥回来，正经体面的人就不能住在大教堂，他不会允许他女儿在他家门口探头张望。这个贼种每天偷圣母的蜡烛，欺骗虔诚的妇女，用从来不做的弥撒的名义收钱。就这样顺顺当当，养得那么肥肥胖胖……还那么有荣有誉。”

老人稍稍停了一会儿，犹豫不定地看了一眼加夫列尔说：“怎么样？我们就开战？我去叫埃斯特万？”

“好，您去叫他。他大概在教堂里。您，会见时您敢在场吗？”

“不，孩子，那是你们的事。你了解埃斯特万，也了解

我。我要么不得不哭出来，要么因为他顽固最后动手打起来。你一个人处理比较好。为此上帝给了你那样的才能，就是没用好。”

老太太走了，加夫列尔一个人呆了半个多小时，透过一扇玻璃窗看着没有人的回廊。大教堂显得比往常更安静。死神每年在教堂外教民中散播下的悲哀的气氛比教堂内更浓重。丁子香园的孩子和妇女们正在下面观赏花烛祭坛。各家房间里似乎都没有人。加夫列尔看见他哥哥从窗前走过，一会儿就出现在门口。

“你有什么事，小加夫列尔？你怎么了？姨妈带的口信弄得我不安心。是你身体不好？”

“你坐下，埃斯特万。我很好，你放心……”

“木权杖”坐了下来，吃惊地看着加夫列尔。加夫列尔无法理解的严肃的神情和长时间的沉默让他很不安。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加夫列尔好像在整理他的思想，似乎不知从何说起好。

“你说话呀，老弟！你一下都说了吧！你让我很不安心。”

“哥哥，”加夫列尔严肃地说：“你很清楚我尊重你生活中的秘密，我一回到这里就发现了这秘密。你当时对我说：‘我女儿已经死了’，你向我表示希望我永远不要跟你谈起她，你可以说说我是否有过一回以最轻微的暗示触动你过去的伤痛。”

“行了，还有什么？你说到哪儿算完？”埃斯特万说，他听了这些话脸色沉了下来。“干什么在今天这样神圣的日子跟我讲那些伤我心的事情？……”

“埃斯特万，如果你紧紧抱住你的忧虑不放，我们就容易相互理解。你别做出那种样子，你冷静点听我说。你别

像个机器人一样，靠牵动我们爷爷和太爷爷的线你才动一动。我知道你是条汉子，你按你自己的思想办事。你和我信念不同。我暂不谈宗教信仰，这对你是一种安慰。你知道得很清楚，关于我的信念，我在这儿闭口不谈，免得我在这儿不能生活。但是，除此之外，你认为家庭是上帝创造的，是一个超自然起源的集体，我认为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各种需要的基础上的人的集体。对于违反家规的人，对于逃离家庭旗帜的人，你是永远谴责他，你判他一种忘掉他的死刑，而我则怜悯他的软弱，原谅他。你是维护卡斯蒂利亚式的荣誉，那种传统和野蛮的名誉比起不荣誉更残酷，更不幸，那是一种戏剧舞台上的荣誉，它的推动力永远不是发自人的感情，而是出于害怕人家会说什么，是出于希望自己在别人的眼里那么伟大，那么体面，而不问自己的良心怎么看。对于私通的妻子，处死她，复仇者的凶杀；对于私奔的女儿，鄙视她，忘掉她。这就是你们的福音信仰。我有另外的福音信仰：对于忘掉自己义务的妻子，鄙视她，忘掉她；对于逃跑的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关爱、支持、温存，直到争取他回到我们身边……埃斯特万，我们被我们的信念分离开，多少个世纪横亘在我们中间，但是你是我的哥哥，你爱我，我也爱你，你知道我只希望你好，我和你都有你十分看重的家姓，我正如你尽可能热爱的那样，热爱我们的穷苦的父母。现在我以这一切的名义对你说这种情况应该结束了，你不应该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地生活在你称为你的尊严之中，而想起你的一个女儿像个堕落的人一样在世界流浪也不惊慌不安。你那么善良，你在我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刻接纳了我，怎么可能，你想到你失去的女儿而你的生活却并没有苦涩味？

你怎么能睡得着，吃得下？你知道她现在怎么样吗？在你吃饭的时候，她会不会饿死？当你拥有你父母住的家，她要进一家医院是否容易？……”

埃斯特万听着他弟弟的话，他的脸部肌肉收紧了，带着一种阴沉的表情。

“你的努力都没有用，加夫列尔。你什么也不会得到。我曾经拒绝过你什么吗？我不愿意为我的兄弟付出一切吗？但是你别跟我谈起她，她深深伤害了我，破坏了我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怎么还没有死。几个世纪中，卢纳家族是大教堂的镜子，甚至赢得了历届大主教本人的尊敬，突然在卢纳家族的晚辈中间出了一个人，遭到所有人的嘲笑，甚至连最低级的侍童也可能在怜悯地看你，这些你都仔细想过没有？我吃了多少苦！多少回，我听到了人们在我背后的种种议论，我愤恨地独自一人在这间屋子里痛哭！后来，”他低声地补充说，仿佛痛苦使他的嗓子哽咽，“那个不幸的殉教者羞愧而死，就是我可怜的女人，为了不要看见我痛苦，为了不遭受旁人瞧不起，她离开这世界……而你要我忘掉这些？……再说，加夫列尔，我不会把我感受的东西表达得像你那么好。但是，荣誉……就是荣誉。是我住在这个家而不感到羞愧，晚上睡觉不怕在黑暗看见我们父亲睁大了眼睛，问我为什么在卢纳家族用几个世纪为上帝的教会效力争取来的屋檐下留有一个堕落的女人。是为了避免人们笑话我们家庭……让人家随便说：‘那些卢纳家的人，是多么倒霉不幸的人！’但是永远不让人说卢纳家族是没有廉耻的家庭。为了我们的亲情，兄弟，放了我吧，别再跟我谈这种事了。那些坏学说已经毒化了你的心灵，你不但不再相信上帝，甚至也不相信荣誉。”

“这是什么意思？”加夫列尔激动起来说：“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荣誉就是荣誉。’那好，子女就是子女。你，是个好操心担忧的人，你却不注意考虑那些人——我们自己生命的延续是怎么回事。你的宗教造就了上帝的子女后代，但是你们认为自己更优秀，更十全十美，当他们几乎没有给你们造成什么阻碍困难，你们就拒绝和咒骂这些上天的赠礼。不，埃斯特万，热爱子女和同情他们的欠缺过失应该高于一切操心担忧之上。那种灵魂的永生，那种一切宗教作出的骗人的许诺，只是一种对待子女的真理。灵魂随躯体死去，灵魂只是我们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思想是大脑的一种功能，但是子女们通过代代相传，经历几百年，使我们的生命永存，是他们使我们永垂不朽，因为他们保存了我们的某些特性。一个忘记了自己亲生的生命的人比一个以自杀放弃生命的人更该受到谴责。对于出自我们自身又使我们各种各样的能力和思想得以永存的骨肉应该有本能的亲情，在这种亲情面前，那些生活中的逆境，人们自己创造的法律和习惯势力算得了什么？我厌恶那些为了不扰乱夫妇间资产阶级的宁静而抛弃自己在外面生的子女的可怜虫。父道是动物责能中最崇高的，但是兽类比人有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尊严去履行自己的责能。任何种类的高等动物都不抛弃或者不认它的幼崽，而你们那样因害怕别人可能说些什么而不理会子女的人却很多。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有一个我爱得发疯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而她要求我忘掉这儿子，我宁肯扑灭我爱的激情也不抛弃那个小不点。如果我的儿子违反了人类的一切法律，他们把他送上断头台，我将陪送他上断头台，不怕人们的斥责，一刻也不会否认他是我所生。自从我们给了他

生命，我们就永远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在努力保存他的时候就向人类许下的休戚相关的承诺。谁要中断这种联系而逃之夭夭，谁就是胆小鬼。”

“你不会说服我的，加夫列尔，”埃斯特万使劲大声喊道：“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我再说一遍：你的所作所为是懦夫行为。既然荣誉——那种以流血来处理生活中冲突的过时又残酷的荣誉——在你是意义那么重大，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那个抢走了你女儿的人？为什么不像古代戏剧中的父亲一样把他宰了？你是个心地平和的人，没有学会谋害人的本领，而那个家伙是个职业的武夫。要是你运用你认为强大的家族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报了仇，那他就会残暴地对待你。但由于你本能的保守，由于害怕服苦役和社会所创造的各种惩罚，你没有去报仇。虽然你感到气愤，但是你害怕，你把这种害怕变成了最懦弱者的残忍。你的怒气只落在女儿身上……够了，埃斯特万，这不是一个男子汉当之无愧的事。”

“木权杖”固执地摇着头。

“你说服不了我，我不想听你的。那个女人不会回到这儿来的。不是她抛弃了我吗？那就让她继续走她的路。”

“她抛弃你是因为所有健康的人内在的一时冲动，这是人类保守的本能，诗人把这种本能美化为爱情。要是她在祭台前接受了一个男人的祝福之后抛弃你，你一定会满心喜欢，而无论她来看你多少回，你都会伸开双臂欢迎她。她抛弃了你去受人欺骗，陷入贫穷和忍受耻辱，眼看着她不幸，难道不比你看到她幸福时更值得你同情怜悯？埃斯特万，你反思一下你可怜的女儿是怎么陷进去的。你教给过她什么本

领去自卫抵御世界上的邪恶？她又有什么武器去保持你称之为荣誉的东西完好无损？你们，你和你女人，让那个男孩子进你们家，当做一种荣誉去欢迎一个盯上了你们女儿的公子少爷，你们给她树立了敬重钱财和高贵出身的榜样。可怜的女儿爱上了他，把他看做集人类完美无缺之大成。当发生了社会不平等的必然结果时，她不愿意舍弃，这是一种背叛世界上种种偏见的高尚品质，她甚至冒了忍受她的叛逆的一切苦果的风险，但是她失败了。这能怪罪谁呢？要怪她的无知，怪她远远脱离世界的生活，怪你们，你们没有多教她些东西，你们为贪心弄瞎了眼，让她在悬崖上做美梦，要怪所有的人，惟独不能怪她。不幸的人呀！她为以高尚的勇猛反抗社会的成见付出了越来越大的代价。她已在社会的战斗中丧生，现在只剩下应该扶她站起来的躯体，而你，是她的父亲，应该第一个去完成这正义的事业。”

埃斯特万，低沉着脑袋，继续做着否定的动作。

“哥哥，”加夫列尔郑重地说：“既然你死死坚持你的否定态度，我就只剩下给你说一件事。如果你女儿不来，那就我走。各人有各人顾忌。你怕人家的流言飞语，我怕我自己，怕我的思想在我孤独的时候会谴责我。自从我成了你的客人，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的女儿，自从我了解了在这个家里发生的事，我就有心让这不幸的牺牲品回到你身边。你不是不愿意她回来吗？那么就该是我走。要是你的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在挨饿，而我却在吃你的面包，那我就成了抢她面包的强盗。如果你照顾我的病让我留下，那个不幸孩子也许病得比我还重，而且在这世界上她找不到一只扶持她的手。如果她不回来，我就不是你的兄弟，我是个霸占属于另外一个

人的亲情和安逸生活的外来人。哥哥，各人有各人的道德观念，你的是教士们教育的道德观念，我的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道德观念，虽然它不那么冠冕堂皇，但也许更为严格。我以我的道德的名义，对你说：‘埃斯特万，我的哥哥，要么你孩子回来，要么我走。’我将回到世界上去，去像一头愤怒的野兽一样被追赶，去医院，去监狱，像一条狗一样死在公路边的水沟里。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我唯一确切知道的是我明天走，今天就走，对于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分钟也不多享受。我既然认为一小撮特权者霸占地球上的财物是不公正的，是偷盗，我不能明知故犯，把根据自然法属于一个不幸的女孩子的安逸生活据为己有。惟有和她分享，我才能享受这种安逸生活。”

埃斯特万已经站了起来，面带绝望的神情。

“但是，加夫列尔，你疯了？你想抛下我？你说这话居然那么冷静？在我遭受那么多灾难之后，你呆在这儿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快乐。我已经习惯于看见你，我需要照顾你，你是我唯一的家庭成员。过去我已经毫无志气，没有希望地活着，现在我有一个希望，就是看到你健康强壮。而你现在那么冷漠地说你要走？不，你不要走……那正是我的需要，女儿走了之后，兄弟也走。还不如一下把我宰了！我主上帝呀，把我带走吧！……”

这个教堂的淳朴的仆人以恳求的表情举起了双手，两眼饱含着眼泪。

“你冷静点，埃斯特万。让我们像男子汉那么谈话，不要呼天喊地，不要哭鼻子。你看着我，我很冷静，你别以为因为你那样子，即便你不接受我的恳求，我今天就不会走了。”

“但是，她呢？你这么关心地为她辩护，她在哪儿？”埃斯特万问道。“难道你见到她了？跟她说过话了？难道她在托莱多？难道以你那种不信神的大胆妄为，你已经把她带进这所大教堂了？……”

加夫列尔看到他哭天抹泪，为他威胁要走而沮丧，相信决定性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打开了萨格拉里奥的房门。

“姑娘，你出来，求你父亲饶恕。”

“木权杖”看见在那间房中央跪着一个女人，这间房他由于怕回忆起过去从没进去过。

他的目光是一种惊异的目光。然后他用眼睛盯着加夫列尔，似乎猜不透那个女人是谁。他的兄弟玩弄了什么把戏？

他在一种巨大的力量的推动下，抓住了那女人的双手，把手从脸上拉开，紧紧地看着她。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认出她。过了很长时间，他在痛苦的沉默中观察她。对他来说，在她被疾病折磨变了形的容貌慢慢地显出了旧时的形象。在她饱含眼泪，没有睫毛的眼睛中，他看到了某种令他回忆起他丢失的女儿蓝色双眸的东西。她青紫的、留着深深的裂痕的双唇在哀戚地颤动，老是低声地念道一个词：

“原谅我！……原谅我！”

眼看着那个被毁了的的女儿，父亲感到他的愤怒松了劲，垮了。他的眼睛表现出令人颓丧的无限的悲伤。

他背对着门，一直往后退到了房间门口，他女儿伸出双手，跪着跟着他往前。

“哥哥，行了，”加夫列尔气馁地说。“你比我行，按你的意志办吧！到此为止，这是你要的结果。但是，你别看她了！……你们留在这儿，该走的是我。”

第 六 章

缝纫机从早到晚在卢纳家族的家里响个不停。这种机械声和鞋匠的锤击声是仅有的劳作的响动，它们干扰着上回廊圣洁的宁静。

经历了整夜痛苦的咳嗽之后，当太阳升起时，加夫列尔起床了。在门厅里，他看到萨格拉里奥正在准备好缝纫机，以便进行一天的劳动。从回到大教堂的第二天起，她就拿掉了机器的罩子，默默地、坚忍不拔地工作，以此不被人注意地在丁子香园度日，希望让人们原谅她的过去。托马莎老太太给她供活，从旧房屋发出的缝纫机针来回走动声，时常和教堂乐师风琴的旋律交织在一起。

“木权杖”像个影子一样在他家稍现即逝。他总是呆在教堂或下回廊，没有必要，绝对不去她的房间。为了不看自己的女儿，他总是低着头吃饭，而他女儿就坐在餐桌的另一端，在父亲面前，她总现出要哭的样子。一种痛苦的寂静笼罩着这个家庭。惟有堂路易斯，由于他这种漫不经心的男人的大大咧咧，没有察觉到这种情况，还是兴高采烈地跟加夫列尔讲述他的希望和他对音乐的激情。他认为一切都自然而

然，没有什么使他感到意外，萨格拉里奥回来没有让他感到任何奇怪。

一吃完午饭，埃斯特万便逃离这个家，直到晚上才回来。晚饭后，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把他的兄弟和女儿撇在门厅。缝纫机又转动起来，堂路易斯弹起他的风琴，直到九点的钟声敲响，“银权杖”关闭塔楼的楼梯门，摇响他的一串钥匙，发出一种形同古代宵禁的钟声。

加夫列尔对他哥哥的固执感到愤怒。

“你会害死你女儿的。你的所作所为不配做一个父亲。”

“兄弟，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看见她。为了忍受我们家的这种种事情，我已经够尽力了。唉！你不知道，人们的眼光，让我多痛苦！”

其实，萨格拉里奥回到丁子香园所引起的风波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大。由于疾病和苦难，她变得那样丑陋，没有任何女人对她怀有敌意。她姨姥姥托马莎的有力保护令众人敬畏。而且，那些生性冲动的平庸女人，面对她现在的丑陋，不可能如过去她美貌并和士官生谈恋爱年代，在她们心中激起敌对的嫉妒。连“银权杖”的侄女马丽基塔对自己的孤芳自赏有了保障感到某种满足，从而对那个昔日曾吸引了所有来到上回廊的男人的注意力的不幸的她，也持轻蔑的宽容态度。

好奇心仅仅在一个星期中扰乱了丁子香园的平静。渐渐地，女人们已不再去卢纳家族门口探头探脑，看看那个俯身于缝纫机前的萨格拉里奥了，而这个姑娘继续过着她辛勤劳作又凄苦的生活。

加夫列尔很少离开他的住所。他整天陪伴在女孩身边，

希望以他的存在替代她父亲敌意的疏远。他看到女孩在自己家里如同在外面一样被瞧不起，一样孤单，感到很痛心。有时，托马莎姨妈来看他们，以她开朗的老年人的乐观精神鼓励他们。她外孙侄女的行为使她宽慰：为了不使固执的父亲讨厌她，也为了帮助维持这个家，她拼命地工作，这家也很需要她的帮助。但是，她也不应该为此不顾死活地干活。她要冷静和心气随顺，这种厄运也许会带来另一种命运。只要有中了邪似的加夫列尔在一起，一切她托马莎都能够对付。她以她的朗朗笑声和铿锵有力的话语，使这个阴郁的房间欢快起来。

有时，加夫列尔的朋友们放弃了在鞋匠家的聊天会，都拥到他家。他们忍受不了加夫列尔的缺席，他们需要听他的讲话，向他请教，甚至连鞋匠本人，在活不太急的时候，也会离开他的工作台，腰系围裙，头扎毛巾，带着满身的糍糊味儿，跑来坐在萨格拉里奥的缝纫机旁。

女孩用悲伤的目光敬佩地注视着她叔叔。从小她总是怀着某种崇敬的心情聆听她父母谈论这位云游远方非同一般的亲戚。她回忆起他，如同一个模糊的影子掠过她如痴如醉的爱情生活，当时加夫列尔在巴塞罗那定居前，在大教堂呆了几天，他讲述他的游历故事和外国的风俗人情，让大家十分惊异。现在，她重新见到他的时候，他老了，而且和她一样体弱多病，但是，他讲的话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一种神奇的影响，在那些精神僵化的人听来如同超自然的音乐。

处于忧伤中的萨格拉里奥，听加夫列尔谈话是她唯一的乐事。她和那些淳朴的人一样有兴趣，他们忘掉了自己的活计去找加夫列尔，渴望从他嘴里听到一些新鲜事。加夫列尔

代表了一个现代的世界，他远离大教堂许多年，甚至同它没有任何联系，最后他又回到了教堂，使一部分仍然生活在十六世纪的芸芸众生惊讶、震动。

萨格拉里奥的出现有点打乱了加夫列尔的生活。他话比过去多了，他忘记了躲进教堂的石墙内求庇护时的审慎沉默态度。他不再尽量不说话，隐瞒自己的思想。一个女人的存在似乎鼓舞了他，唤起了他昔日宣传鼓动家的热情，他的伙伴们看到了一个更加雄辩，更愿意向他们讲述新事物的加夫列尔，这些新事物打乱了他们传统的思想，甚至许多晚上使他们久久不能入睡。

他们谈论着，争论着，向加夫列尔请教，以澄清他们混乱的思想。缝纫机喀哒喀哒的响声盖过了人们的谈论声，它总在转动，如同搅动世界的普遍劳动的回声，与此同时，教堂里的万籁俱寂，使石头山城的内部充满神秘难解的宁静。

所有那些习惯于教堂的缓慢、按部就班、静悄悄又长时间中断活动的人们，都钦羡萨格拉里奥紧张的工作。

“孩子，您会过度劳累而死的。”年老的管风琴的鼓风手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和我做的工作有些相像，不停地给风箱鼓风！每做一次很多乐曲的弥撒——这是唐路易斯所喜欢的，最终我就会憎恶管风琴和发明它的人，因为我的双臂都要累断了。”

“这就是劳动！”钟楼人强调说，“劳动是上帝的一种惩罚！你肯定知道它的来历。这是主把我们的先祖从天堂赶出之后，加于他们的永恒的惩罚。这是一付我们将永久拖带在身的镣铐。”

“不对，先生。”鞋匠反驳道，“据我从报纸上读到的，

劳动是最好的品德，丝毫不是惩罚。惰性是恶习之源，而劳动是一种美德。加夫列尔先生，是不是这样？”鞋匠看着大师，如同口渴人渴望甘泉一样，等待着大师说话。

“劳动，”加夫列尔说，“既不是惩罚，也不是美德。它是一个为了保存我们自身和保存人类，我们都必须遵循的严酷的法则。没有劳动，便没有生命。”

他用昔日在社会的抗议集会上鼓动群众的那种热情洋溢的语调，对五六个男人和那个悲伤的缝纫女这么描述。缝纫女停下了机器，听他谈普遍劳动的伟大意义。这种劳动天天在使大地疲劳不堪，要战胜它，并迫使它供养人类。

这是一场一天二十四小时同大自然盲目的力量进行的战斗。劳动大军遍布全球，开垦各大洲陆地，登上岛屿，冲破大海，深入地心。这支劳动大军有多少士兵？谁能数得清！有数百万，数千万，数亿。天破晓时，没有一人缺勤，减员都会被替补上，穷困和不幸在大军中造成的空位立即得到补充。太阳一出来，工厂的烟囱就开始冒烟，锤子砸碎石块，锉刀侵蚀金属，犁耙撕裂土地，火炉燃起烈火，水泵驱动它的活塞，斧头砍伐森林，火车头在蒸汽冲击下奔驰，起重机在港口高歌，船只乘风破浪，拖网渔船拖着一网网鱼儿颠簸而行。任何人都参加这劳动的检阅。由于害怕饥饿，人人都在它驱使下奔忙着，迎战危险，在他们头顶升起太阳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晚上，也不知道是否将是他们生命的末日。每天当黎明的第一束阳光照到世界各地，各地的人力便汇集在一起。人们组成了村镇，形成了社会，或者靠自己的力量孤立无援地生活着。石匠用他的锤子砸碎石块，当他粉碎了石块，却由于吸入了看不见的分子而中毒。每打下一

锤，都敲走他的一片生命。矿工下到摩登时代的地狱，矿灯的火苗是他们唯一的向导。他们从远古的地层中采掘地球幼年时代的遗物：曾经为史前巨型怪兽遮阴但现已炭化的树木。他们见不到太阳和生物，与死亡搏斗。泥水匠也一样，他们不怕眩晕，双脚踏在脆弱的木板上或房檐上进行劳作，连飞鸟都为之敬佩，奇怪这些没有翅膀的动物，如何会出现在空间。

工厂的工人，由于一种偏离了正道的不幸的进步而变成了机器的奴隶。他们在机器旁如同多了一个轮子，一根肉体的弹簧，同不知疲劳的铁的肌肉组织拼体力，被活塞和车轮的震耳欲聋的节奏弄得一天比一天粗野，向我们提供许多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工业产品。

正是这千百万人在支撑着社会的存在。为了这个社会，他们同残酷无情的自然力进行拼搏。每天早晨，他们都重又投入战斗，把这种单调的、连续不断的牺牲看做他们生存的唯一使命。他们形成了劳工阶层大家庭，靠少数特权阶层的残羹剩饭过活，他们只能满足于特权阶层所不齿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酬劳金——永远是最低的酬劳来维持生存，无望有积蓄，无望能解放。

“这少数自私自利者，”说到这一点加夫列尔补充道：“伪造了真理，想说服占多数的被剥削者相信劳动是一种美德，人在地球上的唯一使命就是劳动，直至死亡。由大资本家创造的这种伦理道德，滥用科学，断言人体只有从事劳动才能健康，不活动必致死。但是，他们闭口不谈科学补充说的另一方面，即过度劳动对人们健康的损害，远远大于如果他们能悠闲地生活。恰当地说，劳动是保存生命的一种需

要，但不能说，是一种美德，因为休息和舒适的不活动，不管对人还是对动物，都比劳累和活动要惬意得多。关于天堂的寓言，以及《圣经》上说，上帝判处人以劳累和流汗水的惩罚求得生存，这两点表明，在任何时代，天经地义认为休息是人最惬意的状态，而劳动则应被认为是生存的手段。根据自卫的本能，人类只应该付出生存所需要的劳动。但是，人类的绝大多数劳动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且为少数剥削者的享用。剥削者要求绝大多数人尽力劳动，哪怕由于过分出力而死去。剥削者靠霸占生产的剩余价值而致富。他们关心的是人们付出超过自身需要的劳动，人们生产超过他们需要所要求的東西。这剩余部分就是财富。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少数剥削者利用宗教甚至哲学，发明了一种荒谬和反人类的道德观，赞颂劳累，称劳动是最美的美德，慵懒是万恶之源……对此不禁要问：如果说无所事事是穷人的一种恶习，那么，为什么在富人中它却是一种显贵的标志，甚至是精神高尚的标志？如果说劳动是最大的美德，那么，为什么资本家孜孜不倦地积累财富，以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后代摆脱实践这种美德？为什么这个用最诗意的观念赞美劳动的社会，却把劳动者排列在最末位？为什么这个社会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参加过这次或那次战役的士兵，而对实践劳动七十多年的老工人却不那么热情，没有任何人关注他，也不对他高尚的品德道一声谢？……”

大教堂的仆役们在听他们老师这番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他们崇敬他，就像普通百姓崇敬降临到他们中间来传播新思想的使徒一样。

由于不断接触加夫列尔，在他们被传统环境所僵化的头

脑中，孳生了一些鲜活的思想，如冬雨给大教堂花岗岩扶壁覆盖上微细的植物一样。他们直到此时之前一直甘心忍受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像夜游病人一样游移在把灵魂和本能分开的捉摸不定的分界线上，而那个社会战斗的逃兵的意外出现，如同一种冲击力，把他们推向深深的思索，他们只有在这位大师的指引下，摸索着前进。

“你们，”加夫列尔继续说，“你们没有遭受生活在完全现代化剥削中的人那样的奴役劳动。教会不要求你们作出巨大的努力，为上帝效力并不会以劳累的手段来毁灭你们，但是会饿死你们。那些坐在下面唱诗堂唱赞歌的人的所得，和你们这些用自己的双手为宗教效力的人的所得之间，有天壤之别。你们不会累死，这是事实。任何一个城市工人都会笑话你们的职业的轻松，但是你们因穷困郁闷消沉。在这个回廊里，有着和工人区一样的贫血儿童。我清楚你们吃什么和你们挣多少钱。教会现在给它仆役的支付和宗教全盛时代一个样，它认为，现在仍处在人们全身心地投入劳动，只希冀获准进入天国的时代，那时，人们建造教堂的补偿只是一份口粮和主教的祝福。而现在，你们这些需要营养的血肉之躯却被用土豆和面包来哄骗，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的肚子，在下面木头的塑像虚荣浮华地一身珠光宝气，而你们竟然没想到问一问为什么。不感到有需求的偶像一定得富裕，而你们这些无法满足你们的需求的人却生活在贫困之中。”

这些听众惊异地面面相觑，似乎这些话让他迷惑不解。他们好像受到了惊吓，在片刻的迟疑之后，他们的脸上显出教徒的信仰为之豁然开朗。

“说得对！”钟楼人阴郁地说。

“说得好！”鞋匠附和道，话语中透露出一直忍受的贫困生活的全部苦难，他的家庭人口越来越多，但除了他低效益的劳动外没有任何援助。

萨格拉里奥沉默无语，对叔父的许多话她都不懂，但所有的话她都喜欢，因为出自叔父之口的话都是好话，她听起来如同悦耳的音乐。

加夫列尔的名声在教堂的低层人中间传扬。大主教教堂的仆役都夸奖他的智慧。教士们在注意他。每当阴雨的下午，管理图书馆的受俸神甫在上回廊散步时，不止一次地试图让加夫列尔说话，但是，这个逃亡者心有余悸，正如他自己所说，对穿教士服的人，要冷冷地持既礼貌又有保留的态度，因为他害怕，如果他表达了他的思想，他们会把他驱逐出去。

在上回廊的教士中，只有一个教士赢得了他的信任。那是一个穿着破旧法衣、一脸苦相的青年人，他是托莱多众多修道院中给修女讲道、做弥撒的一个神甫。他一个月的全部生活费就七杜罗，他还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母亲。他母亲是一个从自己口中省出一点面包供给儿子上学的淳朴农妇。

“加夫列尔，正如您看到的那样，”小教士说：“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只是为了来这儿挣到比我家乡一个杂工挣得还要少的钱。他们装腔作势命令我，就为了这个？我首次做弥撒，那么铺张奢侈也是为了这个？仿佛我一和教会订亲，我就和财富联姻了。”

他的贫困使他成了堂安托林的一个奴隶。每月下旬，他几乎天天来到回廊，用他的恳求软化“银权杖”，促使他下决心借贷几个比塞塔。他对玛丽基塔说好话，而她对他，尽

管他的法衣破旧却不能不亲近他。

“他长得很好看。”她怀着对所有男人的热情对丁子香园的女人们说，“我喜欢他在加夫列尔身边时，听他们在回廊散步时的谈话。他们像是两位大老爷。他母亲给他取名叫马丁，肯定是因为他很像那个人们叫他埃尔格雷科的画家画的圣马丁像，我不记得这幅画现在放在哪个教区。”

要讨好堂安托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让这个吝啬鬼宽厚点，可怜的小教士着实受尽了罪，要是不及时归还可怜的借款，他就会大发雷霆。为了满足他的权威欲，“银权杖”喜欢有一个教士，一个和他一样的神职人员听任他摆布，以便让丁子香园的人看到，他不仅仅对平民老百姓发号施令。在他眼里，马丁只不过是一个穿着法衣的佣人。每天下午，他都会以种种借口把他弄到自己跟前，心满意足地让马丁长时间地陪他在他屋子前散步，其责任就是听他讲，并且支持他所说的一切。

有时，加夫列尔同情这个在精神上成为他人附属品的可怜的青年人。于是，他离开他的侄女，来到回廊参加到他们两人的聚会。过不多久，加夫列尔的朋友们就来找他，先是钟楼人，然后是鼓风手，之后是执杖人、打狗人或鞋匠。他们渐渐都加入以“银权杖”为核心的人群。堂安托林很高兴有这么多人围在他身边，他不认为吸引他们的是加夫列尔，而是他那令人敬畏的权威。由于他只承认和加夫列尔是平等的，所以他只对着他说话，似乎其他人只有静静听他说话的义务。如果有某个人说话，他就装作没有听见他，而继续冲着加夫列尔谈话。身上裹着一条大披肩的玛丽基塔，从她家门口注视着他们，当她看到大家聚集在她叔叔周围，陪着他

在回廊散步，她高兴地分享她叔父的骄傲。接近这么多男人，似乎使她感到眩晕。

“叔叔……堂加夫列尔！”她嗲声嗲气地说，“你们请进来吧，屋里更舒适些。你们瞧，尽管有太阳，午后还是凉的。”

但是，她叔父不理她这些话，继续沿着回廊有阳光的一边散步，就他所钟情的话题高谈阔论，谈论大教堂今天的贫穷和昔日的辉煌。

“我们所在的这个回廊，”他说，“你们以为建造它是为了用作今天住在这里的下层世俗人的避难所吗？不，先生们，教会虽然很慷慨，但建造这些带内院、小柱子林立的住房不会是为了‘权杖们’、执杖人等等。这回廊本应该和下回廊同样雄伟美丽，是伟大的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说时，堂安托林一只手摸一下四角帽），开始建造的，为的是让大教堂的受俸神甫，按修道院的规矩住在这里。但是，当时的神甫们都很有钱，都是些大老爷们，不可能被禁锢生活在这里。他们都表示反对。生性暴躁的红衣主教企图迫使他们就范，但其中一个神甫受同仁们的委派去罗马告状。身为王国总督的西斯内罗斯在所有港口布下警卫，那个受命去罗马的神甫在巴伦西亚上船前被俘。总而言之，打了很长一段官司之后，教士委员会的先生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住在大教堂外面，丁香园则没有完工，低矮的屋顶，扶手栏杆，一切都是临时性的。但是尽管回廊是这副模样，还是几位国王曾经在这里住过。伟大的君主菲利普二世在这里住过几天。那是什么样的时代！国王们有自己的王宫，却宁愿住在这样的屋子里，在大教堂里，住在上帝的身边……有其君，必有

其民。因此，当时的西班牙空前强大，我们是世界的主人，有钱有势，人们幸福地生活在尘世，并确信死后进入天国。”

“是这么回事。”钟楼人说：“那是鼎盛时代，为了恢复这时代，我们许多人上山打仗。啊，要是堂卡洛斯胜利了，那该多好啊！要是我们当中没有出叛徒……对吧，加夫列尔？你和我一样参加过战争，你可以证明我说得对不对。”

“别说了，马里亚诺，”加夫列尔忧伤地笑笑说。“你不知道你说些什么。你至今还不明白，你为之战斗和流血的事业，你和我一样，是盲目地去打仗……你不要摆出这副惊讶的面孔，你不要企图反驳。不信，那我们来看看：你跟堂卡洛斯一起战斗，你希望得到些什么？”

“我？首先，把每人自己的东西，还给每个人。王冠是属于他的家族的吧？就把王冠给这个家族。”

“就这些吗？”加夫列尔没精打采地问。

“这是最起码的。我过去和现在所要的是国家有一个好主人，一位正直的先生，一个出色的天主教徒，他不用法律的和宫廷的繁文缛节，而是一手拿着面包，一手拿着棍棒来管理我们大家。对无赖，用大棒打！对诚实人，伸出手击掌鼓励，说您是我的朋友！……一位不允许富人欺凌和愚弄穷人的国王，一位不让任何愿意劳动的人饿死的国王……就这些，我认为，我已说清楚了。”

“你认为过去曾有过这种事情，而你心目中的国王会重建这一切吗？这些他们给你们描绘成伟大和幸福的年代，恰恰是我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代，是西班牙衰落的缘由，是我们一切灾难的起点。”

“打住，小加夫列尔！”“银权杖”说，“你可能知道很多

事情，你的阅历比我广，读的书比我多，但是这骗不了人。关于这个问题，我略知一二，我不会允许你滥用马利亚诺和所有这些人的无知。你怎能说那些年代不好，怎能说那些年代要对当今我们发生的事情负罪责？真正的罪责是自由主义，是现时代的不信教，是把魔鬼引入我们的家门。西班牙，当它怀疑自己的国王，失去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它就如同一个瘸子丢掉双拐，就会倒在地上。没有王位和圣坛，我们便是无足轻重的人，自从我国爆发革命以来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便是明证。别人抢走了我们的岛屿；在其他国家人民中我们不起任何作用；西班牙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一败涂地；连一个比塞塔都没有了，那些在马德里高谈阔论的先生们，投票增加新的税收，我们总是上当受骗。在过去的年代里，什么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什么时候？……”

“发生过更糟糕、更丢脸的事情。”加夫列尔说。

“你发疯了，年轻人。你的游历腐蚀了你，我甚至认为你很少有西班牙人味道。诸位看看，他竟然否定人人皆知的东西，甚至连小学里教的东西也否定！……难道天主教双王是那样平庸吗？这一点你不用读书就会知道。你去唱诗堂，在那排矮座椅上，你会看到在历次战役中，信奉天主的君主依靠上帝的支持打败了摩尔人。他们收复了格拉纳达，驱逐了曾在七百年间使我们处于野蛮状态的异教徒。后来又发现了美洲大陆。谁能够成就这种伟业？是我们，除我们之外，没有别人。伟大的女王竟抵押了她的首饰，让幸运的哥伦布实现其远航。我想，这一点你反驳不了我。还有那个卡洛斯五世国王！你如何评价他？你还知道比他更加出类拔萃的人？他打过所有的欧洲国王；半个世界都归属于他：‘在他

的领地，太阳永不落’；我们西班牙人是地球的主人。这你也不能否认。我们更无需说菲利普二世了，他是位那样足智多谋的国君，可以任意摆布所有欧洲的国王，就像用一根线牵着他们一样……这一切都为西班牙增辉，为天主教增光。我们且不谈那些胜利和伟业了。他父亲在意大利帕维亚打了胜仗，他在菲律宾的圣金廷重创敌军。你如何评论勒潘托^①？在下面的圣器室里，还珍藏着堂胡安·德·奥斯特里亚^②乘坐的战船

的旗帜。这你看见过，在其中的一面旗上，有耶稣遇难的画像。那些战旗是那么大，那么大，大得把它们挂上拱廊时，不得不折起其边角才不致拖着地。勒潘托的业绩也是一钱不值吗？算了吧，加夫列尔，只有疯子才会否认这些事情。如果说为了不让摩尔人占领欧洲，危及基督教的信仰而不得不杀死他们，这事是谁干的？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威胁要霸占海洋，是谁挺身而出，阻拦了他们？是堂胡安统领下的西班牙。是西班牙的船只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环绕地球航行的人，是另外一个西班牙人，麦哲伦；在那个宗教和福祉的时代，一切伟大的事业，是我们，而且始终是我们完成的。我们更不用说智慧了！那些世纪产生了最著名的西班牙人，伟大的诗人和杰出的神学家。无一后人能与之媲美。为了表明宗教是一切宏伟事业的源泉，最优秀的作家都穿教士的法衣

① 指勒潘托战役，1571年西班牙与土耳其之间的一场海战。

② 堂胡安·德·奥斯特里亚（Don Juan de Austria, 1547—1578），在反对摩尔人的格拉纳达战役和著名的勒潘托战役中，功勋卓著。小说中还多次提到奥斯特里亚家族。

……我知道你会如何反驳我。在几个如此荣耀的君王之后，出现了另一些略微逊色的国王，衰落由此开始。对此我也略知一二，这我是从教堂图书管理员和另外一些大学问家那里听来的。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这些都是上帝的谋划安排，他要考验各国人民，考验每个人，把他们从顶峰降下来，如果看到他们坚持走正道，就再把他们提升上去……但我们不说这些了。如果说有过衰落，我们丝毫不想了解它。我们喜欢光荣的过去，天主教双王、堂卡洛斯国王和两位菲利普国王的辉煌的世纪。当我们在谈论西班牙重返盛世，我们是指他们的时代而言。”

“可是这几个世纪，堂安托林，”加夫列尔平静地说：“是西班牙衰落的世纪，我们的破败是从那些世纪开始的。您的气愤我并不奇怪，您在重复别人教给您的东西。这里有许多很有学问的人，一同他们谈起所谓我们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火气也不小。这是我国教育的过错。历史课是一派谎言，与其如此错误地而学历史，不如不懂历史。在学校里，用一种类似野蛮时代的观点教有关我国的历史，这种观点以物体的光泽来评价物体，而不是以其价值和实用性来评价。西班牙由于它扎实和积极的功绩，曾经是个强大的国家，并走向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些功绩并不为战争和政治的意外事件所泯没。但这些是发生在您所赞扬的那几世纪之前，在外国君主之前，那是在中世纪，它向人们预示大有希望，但这些希望在国家统一得到巩固后都化作泡影。我国的中世纪产生了一个有文化、勤奋和文明的人民，在世界各国人民中，是无与伦比的。在中世纪积累的物质财富足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从国外来了些建筑师，他们矗起了这座

建筑物，建成初期，它以新事物的夺目光辉使您惊异不已，但现在我们在它的废墟中行走。”

在争论的激情中，加夫列尔忘记了任何谨慎小心。他不怕理屈词穷的“银权杖”摆出一副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面孔，他想说服他；他感到无所畏惧，感到他做宣传鼓动时代那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他说呀说呀，他不再检点自己的思想，不为了考虑他周围的气氛而给他的思想寻找任何遮掩伪装。堂安托林惊讶地听他说，用冷漠的眼光盯着他。其他人都在听着，模模糊糊预感到这些发自大教堂的回廊里的见解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后果。给修女们讲道、做弥撒的教士堂马丁，躲在他那个吝啬的保护人的背后，眼睛里流露出强烈的同情，贪婪地听取加夫列尔说的话。

加夫列尔描述了西班牙罗马时代的人民，哥特人曾侵犯过他们，但没有造成重大影响。相反，征服者受到了哥特人的蜕化，在类似拜占庭帝国的神学斗争和王朝纷争中，失掉了力量，腐化堕落了。由于野蛮的游牧部落，西班牙的复兴没有从北方开始，而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而出现在南方。起初，入侵者的人数很少，但他们足以击败鲁德里科及其权贵们。说什么基督徒本能的民族精神起而反抗入侵者，西班牙的全部主力都撤到科瓦东加的崇山峻岭，再重新袭击征服者，这是一个谎言。当时的西班牙欢迎来自非洲的人：人民不抵抗就投降，一排阿拉伯骑兵就足以使一个城市大开城门。与其说那是一次征服，不如说是一次文明化的远征。从此，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不断地在海峡地区定居。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阿拉伯文化传过了海峡，

它刚刚诞生，就取得了胜利：那是一种由先知^①的宗教热情所创造的文明，它吸收了犹太教和拜占庭文化的精华，本身带有伟大的印度教传统、波斯的痕迹和许多神秘的中国的东西。亚述国王也曾从希腊进入欧洲，但由于希腊看到危及自己的自由，他们抵抗亚述人。这次东方人进入欧洲和那次不一样，而是从另一端，是从神学家的国王和好战的主教们奴役下的西班牙进入欧洲，这样的西班牙张开双臂欢迎入侵者。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占据了后来花费七百年才从他们手中夺回的土地。那不是一次使用武器来遏制的入侵，而是一种到处扎根的年轻文明的传播。宗教自由的原则——各伟大民族的永恒根基，正是随他们而来的。在被占领的城市中，他们接受基督的教会和犹太人的教堂。清真寺不惧怕全国林立的天主教教堂，它尊重它们，处于它们之中既不妒忌，也不想进行统治。从八世纪到十五世纪，欧洲最崇高和最昌盛的文明在中世纪得以建立和发展。正当北方民族大量死于宗教战争和过着野蛮的部族生活，西班牙的人口增长到三千多万，在西班牙人口中，各种族和各种信仰互相交叉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产生强大的社会震撼力的无穷多样性，如同当代美国人民的多样性一个样。基督徒和穆斯林、纯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毛里求斯人、西班牙传统的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混居在一起，由此产生了混居于阿拉伯区的西班牙人、混居于西班牙区的穆斯林人、改信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基督徒和信奉犹太教的人交融和人与神的交流。在这种多民族和多种族大量的交融之中，也融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习俗

① 指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

和当时全球已知的发现和发明，也融入了各种古代文明的艺术、科学、工业、创造发明和农作物，从这种碰撞中萌生出新的发现和创造力。丝绸、棉花、咖啡、纸张、柑橘、柠檬、石榴、甘蔗，以及地毯、金银线织物、绢纱、金银镶嵌制品和火药，也随之从东方传入。随着它们传入的还有十位数、代数学、炼丹术、化学、医学、宇宙学和韵律诗。濒临于被人遗忘的希腊哲学家，随着阿拉伯入侵者节节胜利而得以拯救。亚里士多德在著名的科尔多瓦大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西班牙阿拉伯人中产生了骑士精神，后来，尚武的北方人又把它据为己有，似乎它是基督教民族的一种品质。在法兰克人、盎格鲁诺尔曼人和日耳曼人的野蛮的欧洲，当时，平民住在茅屋，国王和侯爵们栖身于被篝火熏黑的石头城堡，受寄生虫的吞噬，穿的是粗毛织衣，吃的是史前人一样的食物，而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却筑起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像古罗马的高雅人士一样，聚集在澡堂里谈论着科学或文学问题。如果某个北方僧侣萌发了求知欲望，他便会来到西班牙的阿拉伯大学或犹太教堂；如果欧洲的国王们不惜重金能请到一个西班牙医生，他们便会相信能安然无恙。

当自治分子渐渐脱离了入侵者并产生了小的基督教民族时，阿拉伯人和古老的西班牙人（如果在不断的混同之后还能在两个种族间划清界限的话）就君子般地打仗，但是决胜后不相互消灭，而以长期的停战表示相互尊重，仿佛他们都希望推迟决裂的时刻，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多次联合起来。在各个基督国家，一种自由制度为主导。在那里，朝廷的出现要比北欧各国早得多，西班牙各族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调节自己的开支，他们把国君仅仅看做是一位军事首领。每

个城市都是一个小共和国，拥有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城市民兵实现了民主军队的理想。深入民众之中的天主教会和国内其他宗教和平相处，聪敏的资产阶级在内地创建了强大的工业，在沿海武装了当时的第一支海军，西班牙的产品在欧洲各国港口最为畅销。西班牙有着和现代世界各国首都一样人口众多的城市，整个整个的镇子都是巨大的纺织厂，全半岛的土地都得到耕种开发。

天主教双王既标志了国力的巅峰，也标志了它衰落的起点。他们的王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因为中世纪孕育的能量延伸到了这里；它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它的政策改变了西班牙的航向，把它推向了宗教狂热和谋求称霸全球的野心。对于当时的世界而言，西班牙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二到三个世纪，如同英国之与当今时代。假如当时继续执行宗教宽容、种族融合、发展工农业、以军事事业为优先的政策，那么我们现在该处于什么地位？

加夫列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此中止了他对以往岁月的热情描述。

“文艺复兴是意大利的，但更是西班牙的。”加夫列尔接着说，“在意大利，古代文学和希腊罗马艺术得到了复兴，但是，整个文艺复兴并非仅仅是文学的复兴。复兴意味着涌现出一个拥有农业、工业、军队、科学知识等的新社会的生活。除了西班牙，那个包容着阿拉伯人、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天主教双王的西班牙之外，哪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大统

领^①教给世人以现代化艺术；佩德罗·纳瓦罗是一位令人惊叹的工程师；西班牙军队是首先使用火器的军队，由此创建的步兵使战争民主化，因为这使得平民百姓优于身披铁甲的贵族骑兵。又是西班牙发现了美洲。”

“您以为凡此种种还不够吗？”堂安托林打断他的话，“你不是赞同我所说的吗？除了在那个事出有因称做天主教双王时代，在西班牙什么时候同时出现过这么多丰功伟绩？”

“我承认，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最后一个真正荣耀的时期，是绝无仅有的沿着康庄大道前进的西班牙消失之前发出的最后一束光芒。但是，在天主教双王驾崩之前，在阿拉伯的、基督徒的和希伯来人的西班牙的年轻而健壮的躯体四分五裂时，衰落就已经开始了。堂安托林，您的话有道理，那两位国王称为天主教双王确实事出有因。堂娜伊萨贝尔出于女人的狂热性创建了宗教裁判所。科学家熄灭了他们在清真寺和犹太教堂里的灯，把图书藏在基督教修道院里，因为他们看到这是多祈祷、不读书的时候。西班牙的思想藏身于阴暗处，由于寒冷和孤独而瑟瑟发抖，终将死亡。它的思想中幸存的便只有诗歌、戏剧和肤浅的神学研究。科学是一条通向火刑的道路。后来又降临了一场新的灾难：驱逐那些和西班牙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十分热爱西班牙

① “大统领”（Gran Capitán）是西班牙著名的军事家贡萨洛·德·科尔多瓦（Gonzalo de Córdoba）的别名，生于1453年，卒于1515年。他在反对受过洗礼的摩尔人的战争中赢得极大声誉，天主教双王委派他远征那不勒斯王国。他占领了托伦托，并战胜了法国人，被封为那不勒斯王国的统帅，但不久被费尔南多撤去职务后，隐居格拉纳达。

的西班牙犹太人，这些人在四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分散在多瑙河或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仍是西班牙人，他们还在用古西班牙语为失去的祖国痛哭：

我们失去了美丽的犹太故土，
我们也失去了西班牙，
——我们得以慰藉的巢穴。

那个民族奉献给中世纪科学一个迈蒙尼德^①，那个民族是西班牙工业和商业的支柱，但他们大批离开了我国。西班牙为其非凡的生命力所蒙骗，为了满足那种新生的狂热，竟采取了自杀性行动，还自认为能承受这种损失而没有任何危险。后来来了一个被现代作家称之为‘外国军团’的，干预我们全国人民的生活的奥斯特里亚家族占了统治地位，西班牙永远失去其特性而灭亡。”

“加夫列尔，”这位神甫打断他的话说：“你说的全是无稽之谈。真正的西班牙始于卡洛斯五世这位皇帝，在费利佩二世时代，西班牙仍然是一样荣耀。这才是应该成为我们楷模的正宗的西班牙，我们希望回到这个西班牙。”

“不对，正宗的西班牙，西班牙人的、不掺杂崇外思想的西班牙是基督徒和阿拉伯人、摩尔人、犹太人在一起的西

^① 迈蒙尼德（Maimónides，1135—1204）犹太教法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出生于西班牙，定居于埃及，著有阿拉伯语《密西拿评注》、希伯来语《犹太律法辅导》及融合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迷途指津》等，犹太人奉他为他们的柏拉图。

班牙，是宗教宽容的西班牙，是工农业大发展和自由城邦的西班牙，但是，它在天主教双王统治下，死亡了。后来出现的是一个条顿族和佛兰德的西班牙，已成了德国殖民地的西班牙。它充当外国旗帜下的一个雇佣兵，破落成与它利益不相干的工厂，为了所谓罗马日耳曼神圣帝国的诺言而流血和财产流失。我了解卡洛斯皇帝对于停滞不前、崇拜过去的人物所具有的魅力。那个堂卡洛斯可是位伟人呀！他勇于战斗，谙于政治，他作为一国之主，生性快乐，不拘礼节，能吃能喝，喜欢搂抱姑娘的腰肢。但在他身上丝毫没有西班牙人的气息。他看重母亲的遗产仅仅是为了挥霍它。西班牙是日耳曼主义的一个奴仆，随时准备如数向他们提供他们所要的人，提供贷款和交纳赋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这北方邻国消磨尽了由西班牙阿拉伯文化在几个世纪中在这片土地上积聚的全部富裕生活。自由城邦消失了；这种生活的捍卫者在卡斯蒂利亚和巴伦西亚走上了断头台；西班牙人丢下了犁耙和织布机，背着火枪满世界跑；城市民兵改变为不知为什么缘由和目的而转战于欧洲大地的兵团；工业城市沦落为农村；教堂变成了修道院；孚众望、有涵养的教士，变成了只会俯首听命地照搬日耳曼狂热主义的修道士；由于缺乏劳动力，田野荒芜；穷人梦想靠抢劫一座敌人城池发财致富，因此放弃了劳动；勤奋的资产阶级变成了一帮机关办事员和法庭职员，他们抛弃了商业，把它看做是异教徒专长的低下的职业；西班牙雇佣军既战功显赫又衣衫褴褛，偷盗和不断发起反对长官的暴动是他们惟一的饷银来源，他们成了一帮卑鄙可怜的地痞流氓，滋扰着我们的国家，从他们中产生了打架斗殴者、手持气弹枪的乞丐、拦路抢劫者、云游四

方的化缘人、饥不可忍的绅士，等等，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写进了流浪汉小说。”

“但是，加夫列尔你这个鬼东西！”“银权杖”悻悻地说，“你能否认堂卡洛斯和堂费利佩二世是两个伟大的国王吗？前者修建了托莱多的城堡，后者曾在我们这个回廊里住过……”

“我不否认他们是两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两位伟大的君主。但是，他们永远扼杀了西班牙。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两个德国人。费利佩二世只是披上了一件虚伪的西班牙主义外衣来继续推行他父亲的日耳曼政策。这种伪装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危害，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把他崇敬为西班牙最正宗的代表。面对昭示那个时代的荒谬推测和天大的错误，有人竟欣喜若狂。有许多天主教徒，因为费利佩二世冷酷无情地铲除异教徒，希望给他封圣；在这个国王心目中，只有他自己的天主教；他是日耳曼君主专制主义的继承人、教皇的永恒的铁锤。在妄自尊大心理的驱动下，他不断地徘徊于分裂和异端的道路上。他之所以没有和教皇决裂，是因为教皇惧怕曾两次进入罗马的西班牙士兵永久驻扎在那里，屈尊同意了他所有的无理要求。他们父子两人剽窃了我们的民族性，他们以此为伪装，牺牲我们的生命以实现他们纯属个人的计划，即复辟大卡洛斯君主专制主义，并按照他们的喜好和形象塑造天主教。由于他们不断地和伊斯兰教及犹太教发生摩擦，他们甚至扼杀西班牙古老的、宽容的和文明的宗教精神。那时的西班牙教会，它的神甫在城市，与犹太教的法律博士及教士和平相处，它用道义的刑罚惩处那些由于过分妒忌而扰乱非基督徒的宗教活动的人。外国史学家认为，宗教

不宽容是西班牙土地上自发的产物，其实，它是由日耳曼的君主专制主义输入给我们的。正是德国的修道士，他们带着鲁莽的虔诚和疯狂的神学来到这里，而不像在西班牙一样，受到阿拉伯犹太人文化的锤炼。由于他们的不容让，才引起了北方各国的宗教改革。他们被这些国家驱逐后，来到这里，在这块新土地上重又进行他们没有文化和狂热的活动。这是一片为他们准备好条件的沃土。在那些自由城邦，即共和式的城市消亡之时，国家也消亡了。在短短的时间内，外国的种子生产出了一大片森林，即至今尚残存的宗教裁判所和狂热性的森林。现代伐木者不停地砍伐着，但是，他们人数太少，他们累倒了。面对四个世纪的参天大树，人的双臂不会有太大能力。火，只有火才能最终摧毁这可恶的赘生物。”

堂安托林惊讶地睁大着两眼。他已不再愤怒，而似乎被加夫列尔的话吓住了。

“加夫列尔，我的孩子！”他大声叫道，“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嫩，你想想你是在什么地方，看你说了些什么。我们这里是西班牙的大主教教堂呀。”

但是，当加夫列尔打开了回忆往事的闸门，他冲动起来，在宣传鼓动家的热情的驱使下，他收不住自己的话题。昔日演讲的沸腾的热情在激励着他，他如同以前在群众大会上一样滔滔不绝地讲着。那时候，在掌声、抗议声和抵挡警察的人潮中，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演说。

神甫的惊讶更刺激了他。

“费利佩二世，”他继续说，“从骨头里都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他沉默庄重、他思想迟缓但深邃，都不是西班牙

牙人的，是佛兰德的^①。毁掉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国王们的无动于衷，是一种与这片土地毫无情感联系的外国的人的感情。他曾经说，‘我宁愿在尸体上，也不愿在异教徒上称王。’这些尸体其实就是西班牙人，他们被判定不准思考，或说假话，这样隐瞒自己的思想。种种古老的行业都已消失。除教会以外，唯一的前途就是到美洲去冒险（美洲对西班牙民族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它成了国王的金库），或者去当一名欧洲的职业士兵，为重建神圣日耳曼帝国，为使教皇服从皇帝和为扑灭宗教改革而征战。这种种事业同西班牙都毫无关系，但它们却成了西班牙人外逃亡命的畅通出口。手工业工匠们由于加入军队而消失了，城市中到处是残疾和老兵，他们拖着生锈的剑，这是个人价值的唯一证据。行业会和中产阶级消亡了，只剩下那些以做国王的奴仆为荣的贵族，还有一群只求有饭吃和能看古罗马那种残酷的游戏的贱民，他们为能得到修道院的布施便心满意足，以看到宗教裁判所以对异教徒的火刑为乐。

“之后就是毁灭。在那些置西班牙于死地的恺撒大帝们之后，是那些恺撒小帝们：狂热的费利佩三世使出最后一招驱逐了受洗礼的摩尔人；堕落的费利佩四世，他爱好文学，写些诗文，又向修女们求爱；还有那个可怜的卡洛斯二世……

“堂安托林，在西班牙从来没有过如此的宗教气氛。”加夫列尔说：“教会主宰一切。宗教法庭甚至可以审判国王，而非宗教的司法却不能动最低层的教堂司事一根毫毛，哪怕他在公共生活中犯下最大罪行。只有教会能审判教会的人。

^① 佛兰德指古时西欧一地区。

据巴里奥努埃沃^①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武装到牙齿的修道士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马德里大广场的绞架下，从国王的司法人员手中劫走了一个因谋杀罪被判刑的他们的同道。宗教裁判所不满足于烧死异教徒，还审判和惩罚粮食走私犯。被吓怕的文人，只好躲进惬意的文学中寻找他们思想最后的避难所。他们只是写一些流浪汉小说和剧本，在这些作品中，赞颂一种仅在诗人的想象中存在的残酷的荣誉，与此同时，最大的腐败却普遍存在于人们的习俗中。对于国外宗教革命所宣扬的东西，西班牙伟大的天才们却不知晓，或佯装不知。最大胆勇敢的克维多^②仅仅敢于这样说：

对于宗教裁判所……

请沉默！

这是西班牙思想悲哀的墓志铭，它宁愿死亡，因为真话不能说出。为了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能平静地生活和维持下去，诗人们都寻求教会的庇护并披上它的法衣。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莫雷托、蒂尔索·德·莫利纳、米拉·德·阿梅斯夸、塔雷加、阿根索拉、贡戈拉、里奥哈，等等，他们都是神甫，许多人都是经历了动荡不定的生活。蒙塔尔班曾是宗教裁判所的教士和职员，甚至可怜的塞万提斯在其晚年，也不得不穿上圣方济会的法衣。西班牙有一万一千所修道

① 巴里奥努埃沃（Barrionuevo），西班牙小说家，卒于1916年。

② 克维多（Quevedo，1580—1645），西班牙诗人、作家，以讽刺诗著称，又是警句派的代表。

院，十多万修道士和四千修女，另外还应加上十六万八千名神甫和不计其数的隶属于教会的仆役，如差役、宗教裁判所的使节，狱吏和书记官、教堂司事、总管、圣谕看守、殿堂看守、山僧、送信人、六人歌舞班成员、唱诗班人员、办事修士和见习修士，我哪知道还有什么人呀！……相反，全国的人口，在两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内，从三千万下降到七百万。由于宗教的不宽容而驱逐犹太人和受洗礼的摩尔人，宗教裁判所引起的恐惧，在国外的不断征战，想不劳致富而移民美洲，饥饿、缺乏卫生条件和荒弃田地，等等，都造成了这次人口锐减。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下降到一千四百万杜卡多，而僧侣的收入却上升到八百万。教会拥有国家财富的一半多。这是什么时代！您说呢？堂安托林！”

“银权杖”冷冰冰地听他说，似乎对加夫列尔已经有了一个定论，而对他的话并不太在意。

“那时的人即使再坏，”他慢条斯理地说，“也没有今天的人坏。至少没有任何人到教堂行窃，每个人想到天国是唯一的真理，也都安于贫困，信仰上帝能够得到属于他们的东西。难道你不信上帝吗？”

加夫列尔对此避而不答，继续谈论那个时代：

“那是一个蛮荒、停滞的时期，而欧洲却在发展，在进步。原来处于文明领先地位的民族落在了最后。在西班牙的傲慢和从日耳曼专制皇帝那儿继承来的野心的驱使下，西班牙的国王们，仅仅依靠一个七百万人口和饷银低、忍饥挨饿的军团，发动了企图统治全欧洲的疯狂的冒险。美洲的黄金落入了荷兰人的腰包，在这项事业中，堪称堂吉诃德式的事业中，西班牙民族屡屡挨打。西班牙越

来越天主教化，越来越穷，越来越野蛮。它妄想征服世界，但国内却整个整个地区成了无人区。许多古老村镇消失了，道路不见了；没有任何人确切知道西班牙的版图，相反，很少有人不知道天国和炼狱的情况。较为肥沃的土地，不是由农场而是由修道院占据，在为数不多的公路边是强盗团伙宿营地，当他们受到追捕时，便逃匿到寺院里，在那里，由于他们信教和他们为自己的罪恶灵魂委托做许多弥撒而受到尊敬。

“愚昧是可怕的。国王们甚至在战事上也听从教士的参谋。面对荷兰部队驻守西班牙佛兰德要塞的许诺，卡洛斯二世把这件事作为一桩道德良心的案件向神学家请教，因为这有助于传播异端邪说，因为他最终宁愿这些要塞落到法国人手中，尽管法国人是敌人，但他们毕竟是天主教徒。在萨拉曼卡大学，诗人托雷斯·德·维利亚罗埃尔^①没有见到过一本地理书，当他讲到数学时，学生们说，那是占卦巫术，只有涂上巫师用的油膏才能弄懂的魔鬼的科学。宫廷的神学家们反对连接塔霍河和曼萨纳雷斯河的运河计划，说此项工程违背上帝的意志，因为倘若上帝说了连起来，两条河早就连接起来了，而由于某种原因，自世界形成之时起，这两条河就是分开的。马德里的医生们请求费利佩四世允许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因为城市的空气十分稀薄。如果不浸透脏物垃圾发出的蒸气，就会发生大灾大难。’一个世纪以后，塞维利亚的一个著名神学家在一个公众集会上提出挑战，要大家就

^① 托雷斯·德·维利亚罗埃尔 (Torres de Villarroel)，十八世纪西班牙文学家。

下述论点同他展开辩论：‘我们宁愿跟着圣克雷芒^①、圣巴西勒^②和圣奥古斯丁^③去犯错误，也不跟着牛顿和笛卡尔^④去蒙对。’

“费利佩二世曾以死刑和没收财产威胁那些出版外国书籍或传播手抄本的人；他的继任者们禁止西班牙人写有关政治题材的著作。由于缺少思想自由，所以只能从事艺术和诗歌创作。戏剧和绘画达到了几乎超越其他民族的水平。这是西班牙天才宣泄的阀门，但是这艺术的春天只是昙花一现，在十七世纪中叶，就出现了既荒诞又丢丑的衰落。

“那两个世纪的贫困是骇人听闻的。作为世界的主宰的费利佩二世，竟以六千雷亚尔出卖贵族头衔，并在法令上加注说明‘不要过多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和出身’。在马德里，人们抢劫面包店，为抢夺面包而匕首相见。卡斯蒂利亚省长，在刽子手的陪同下，走遍全省各地，掠夺走农民们不多的一点点收成。税收官员从村镇找不到可征收的东西，就拆掉房屋，变卖木料和砖瓦。居民们远远看到国王的代表们便逃往山里，村子成了无人村，破败衰落，饥饿甚至也进到王

① 圣克雷芒 (San Clemente, 30—101)，教皇 (88—97 或 92—101) 早期教父，相传被缚于铁锚投入海中而殉教。

② 圣巴西勒 (San Basilio, 329—379)，希腊教父，制定隐修院制度，其祭祀节日为 6 月 14 日。

③ 圣奥古斯丁 (San Agustín, ?—604)，罗马本笃会圣安德烈隐修院院长，597 年率传教团到英格兰，同年任英格兰坎特伯雷首任基督教大主教。

④ 笛卡尔 (Descartes, 1596—1650)，法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解析几何学的奠基人。

宫，作为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君主卡洛斯二世，有些天也不能供应仆役的饭食。英国大使和荷兰大使不得不带着全副武装的仆人在马德里郊区寻找面包。

“与此同时，这无数的修道院——半个多西班牙的主人和财富唯一的拥有者，向那些尚有力气到那里找施舍的人布施稀粥和修建孤儿院和医院，以表示它们的仁慈，在这些孤儿院和医院，虽然人们会因贫困而死去，但确信会进入天国。在城市中，没有比修道院和医院更为繁荣和富丽的建筑物了。古老的工业已经消失。以生产面料而闻名遐迩的塞哥维亚，当时有近四万人在此从事生产，但它的居民几乎不到一万五千人。后来毛纺毛织已经忘得那么干净，以致在费利佩二世想恢复这种生产时，不得不招进德国工人。

“以集市和工业著称的塞维利亚、巴伦西亚、梅迪纳·德尔坎波也是如此。”加夫列尔继续说，“在十五世纪，塞维利亚拥有十六万台丝织机，而到十七世纪，它只有六十五台。相反，同样是事实，各大教堂有一百一十七位受俸神甫，六十八座修道院，四千多修道士，在主教辖区有一万四千名神职人员。而托莱多呢？十五世纪末，在它的丝织、毛织厂和兵器厂，有五万名工人，另外还有更多的鞣皮工人、银匠、首饰工匠和制手套工人。十七世纪末，托莱多的居民不足一万五千人。一切都死亡了，一切都破产了；二十五座有名望的家族的住宅落到修道院手里；在城市里，最富有的当属修道士、大主教和大教堂。西班牙国力在奥斯特里亚家族覆灭时是如此之衰竭，已经到了被欧洲列强瓜分的边缘，另一个和我们同样笃信天主教的国家波兰，也处于和我国相同的境地。只是由于各位国王之间的不和才拯救了我们。”

“如果那些时代如此糟糕，”“银权杖”说，“那么，加夫列尔，西班牙人为什么表现出那么大的克制？为什么他们没有如同在现在这个毁灭的时代那样进行起义和暴动？”

“他们应该做什么呢？两代恺撒大帝式的专制统治，向西班牙人灌输了盲目服从上帝的代表——国王的思想。教士们以教会和王权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教给西班牙人这种信念。甚至那些最杰出的诗人，也在他们的戏剧中颂扬对君王的奴隶主义，腐蚀人民。卡尔德隆声称，公民的财产和生命不属于他们自己，因为这些是属于国王的。此外，宗教贯穿于一切，是生存的唯一目的。由于西班牙人总是想着天国，他们最终习惯于尘世的贫苦。过分的宗教意识使我们经济上破产，并且几乎毁灭了我们这个民族，对此您不必怀疑。至今我们仍然承受着这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病痛的后果……为拯救这个国家免于死亡，曾经做了些什么？召唤外国人，波旁家族的人来了。你们瞧，我们竟然下降到了连自己军人都没有了。在这片国土上，从古代西班牙塞尔梯贝里亚时代以来，如果说我们没有别的长处，我们总有战斗的头领。因而在王位继承战争^①中，不得不招来英国和法国的将军，甚至军官，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开炮，会指挥一个连队。没有人能胜任部长，费利佩五世和费尔南多六世所有的执政者都是外国人；外国人来振兴不景气的工业，来垦殖荒废的土地，来修建古老的灌溉系统，在野兽和盗贼出没的荒山野岭

^① 指发生在费利佩五世登基之后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

建立移民点。以自己的方式殖民了半个世界的西班牙，却反被欧洲人发现和殖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可怜的印第安人，受酋长般的修道士的指挥，破旧的衣服上披着僧侣的披肩和装饰着奇异的古文物。反教会主义是修复如此重大创伤的唯一补救办法，而这种精神也是由外国殖民者带来的。费利佩五世想借助穆斯林民族的力量废除宗教裁判所，并结束持续了一千年的海战，这场海战使地中海沿岸的居民纷纷逃离，因惧怕柏柏尔^①和土耳其海盗。但是本地人反对殖民者的一切改革，首任波旁国王看到王位面临的危险，不得不改变主意。后来，他的一个接一个的继任者更深地扎根于本国，敢于继续推进他的事业。卡洛斯三世，为了在西班牙传播文明，只好查究教会，限制其特权和收入，关心尘世的事情而忘掉天国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纪，当历届政府触动教会利益的时候，也可看到同样的情景。主教们提出抗议，在致教徒的文告和信件中他们说什么‘迫害可怜的教会，其财产遭抢劫，其人员受侮辱，其豁免权被践踏’，但是，在废除产业永久占有权之前，西班牙觉醒了，享受着现代史上唯一的繁荣时期。于是欧洲由哲学家式的国王们统治，卡洛斯三世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英国革命的反响尚在世界上回荡。君主们都希望受人爱戴，而不愿被人惧怕。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反对愚民，几乎强制推行王室的进步改革。但是，君主制这大祸害有其传承性，是和一个家族相联系的权力。一个有良知和正直心愿的人可以生出一个低能者：在卡洛斯三世之后，卡洛斯四世继位统治，似乎这还不够，在卡洛斯三世死

① 柏柏尔人为北非土著居民。

后一年，爆发了法国革命，这次革命如此大胆勇猛，使欧洲各国的国王都要发疯了。西班牙的波旁家族丧失了理智，似乎永远不会再恢复。他们离开正道，走入歧途，面对革命的危险，他们重新抱住教会，把它作为唯一的救星，他们没有也不会回到正道。耶稣会教徒、修道士和主教又成了王宫的顾问，现在仍然如此，就像卡洛斯二世向一个神学家会议请教军事和政治计划的时代一样。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击败了人但没有击败思想的骗人的革命。我们也前进过，但是羞羞答答地，并伴以混乱的后退，如同一个战战兢兢前进的人，突然听到一点响动，就跑向他的出发点。变革更多的是外部的，而不是内在的。今天人们的心灵仍然是十七世纪的心灵。宗教裁判所的火刑造成的恐惧和胆怯依然存留在他们的心灵中。西班牙人就是有一副奴颜媚骨，他们的傲慢和阳刚是外来的。他们没有白白地在教会的奴役下生活了三个世纪。他们进行革命，能够反抗，但是在教会的门槛前就永远止步不前，因为教会以武力主宰了他们，现在不用武力也继续主宰着他们。堂安托林，请您放心，不用害怕他们会进到这里来。尽管平公而论，他们会有许多关于过去的问题要向您讨教。是因为他们和过去的时代一样笃信宗教吗？您知道，并非如此。当您发现，由于没有人民的支援，教会昔日的伟大辉煌都在消失，您发发牢骚也是情有可原。”

“这是事实。”“银权杖”说，“现在没有信仰；谁也不会为教堂这上帝的家园作出牺牲。除非在临死时，感到害怕，有些人才会想起以他们的财产来援助我们。”

“没有信仰，这是事实。西班牙人，在那种几乎将其置于死地的宗教狂热之后，现在生活在一种永恒的漠然之中，

这不是出于科学的思考，而是由于思维的软弱。西班牙人知道，以后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狱。他们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别人教给他们的，但他们只是随波逐流，不想为选择天堂或地狱作出努力。西班牙人更多地做宗教活动，而较少对它进行思考。既不怀疑，也不相信，接受既成定规的东西，生活在精神的梦游之中。偶尔思想清醒时，会产生一种批判观点，但马上会被恐惧所扼杀。宗教裁判所还活在我们心目中；现在我们不害怕火刑，但人们会怎么议论使我们恐惧不安。停滞的和抗拒任何创新的社会就是现代的宗教裁判所。谁要是脱离开普遍存在、千篇一律的粗俗发出一个不协调音，就会招引广大惊愕的人的无声的愤怒，并遭受惩罚。如果他是个穷人，就断绝他的生路，让他饱尝饥饿之苦；如果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就破坏他的形象，在他周围制造一片空白。他必须改邪归正，墨守陈规，由此，出于恐惧，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相互连在一起，别产生古怪的想法，不要存在独立思考，连学者们也要把从研究得出的结论藏在内心，在日常生活中遵从愚蠢之徒的做法和想法。只要这种局面不改变，在这个国家革命家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也许会从表面上改变土地的面貌，但是，一旦锄头深入土地，便会碰到几个世纪结成的坚硬顽石。在失掉宗教信仰的时候，民族性并没有改变。信仰死亡了，但表面上具有生命的尸体尚存，仍占据着原来的位置，以其僵硬的木乃伊阻拦前进的步伐。还是那些革命者，为了不发出不协调音，维持着这种生活假象。他们模仿外国胜利者尊重他人和宽容的态度，但是，面对外国人肆无忌惮地破坏和践踏我们历史的惊人的不恭行为，他们却不吸取教训。堂安托林，与前几个世纪相

比，教会已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但是您不必担心局势会进一步恶化。水位的标尺已经升到了最高点，不会再超过了。在西班牙，只要人们还害怕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只要他们为新思想而恼火，只要他们为邻人说的话而发抖，你们诸位就嘲笑革命吧，因为尽管发生了多次革命，水决不会升高到你们嘴边，使你们陷入困境的。”

听到这里，堂安托林笑了。

“哎呀，好家伙，小加夫列尔，你大概是发疯了。你周游各国，读了那些书，把你的思想扰乱了。开初，我感到愤怒，我以为你属于那样的人：他们希望爆发一次革命，以便夺去我们所剩无几的东西，宣布那个短命的野鸡共和国，取消教会的预算。但现在我看，你走得更远，你对什么都不满，你觉得一切都非常糟糕……对此我感到好笑。你并不是可怕的敌人，因为你是言过其实。我觉得，你的头脑和你的内心都有毛病……但是小伙子，你还觉得我们这里发生过的革命是区区小事吗？你还认为我国还是和你描绘的那些年代一样野蛮吗？因为……”神甫带着讥讽的口吻补充道，“我听到人家说过许多有关我国的进步，我知道，已经有铁路，城郊烟囱林立，甚至许多不敬神的人拿它们与教堂的钟楼相比，加以赞扬。”

“噢！”加夫列尔带着无动于衷的表情说，“这些方面的进步是有一点。历次政治革命使西班牙与欧洲有了接触。进步的潮流赶上了我国，就像席卷亚洲和大洋洲的各国那样席卷我国。今天谁都摆脱不了这个潮流。但我们却是惰性、无力地顺流而下，如果说我们有所前进，那是由于潮流的带动，而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勃勃生气，与此同时，其他较坚

强的民族却在不停地游呀，游呀，越游越远。我们在哪些方面为这种进步做出了贡献？我们的现代化生活又表现在哪些地方？为数不多的劣质铁路是外国人修的，产权属于他们；铁轨间杂草丛生，这表明，大篷车和四轮马车的那些时代的宁静仍继续保持着。那些最重要的工业、冶金业、矿山也是外国人的，或者是依附于外国人的西班牙人的，这些西班牙人托庇外国人的慈悲而活着。当今的工业在野蛮的保护主义的庇护之下勉强生存，这种保护主义强调品种，助长次品，即便如此，这工业仍然找不到资本。在农村，金钱继续像宝贝一样保存在大瓮里，或者像前几个世纪一样，用来在民间放高利贷。最胆大的人才敢于用来购买公债，而各级政府依然挥霍无度，因为他们有把握总会找到出借钱的人，并把这种贷款夸为国家繁荣的表现。在西班牙有两百万公顷未耕种的土地，两千六百万公顷旱田，只有一百万公顷水浇地。旱田农作物是我国的全部农业，这昭示西班牙人的懈怠必然造成饥饿，是持之以恒的狂热主义的一种表现，这种狂热主义更相信能祈求上天降雨，而不相信人类的进步。河流从被烈日烤焦的地区附近滚滚流向大海；冬天，河水溢出河岸，但不是为了促进生产，而是以洪水汹涌之势摧毁一切。有用于建造教堂和修道院的石头，但从来不把石头用于修筑河堤和水库。修建钟楼，砍伐能带来雨水的树木。堂安托林，您别再反驳我说，教会很穷，教会没有任何过错。你们这些人是穷，陈旧的、传统教会的人，以西班牙的方式信奉宗教的人是穷，因为这里有个时兴什么的问题，信徒们跟最新的事物走；但是，那是耶稣会的教徒，他们是天主教最现代化的表现，这种最新颖的流派，耶稣圣心会和其他法国式的偶像崇

拜，挪用以前应该归大教堂的钱到处建造宫殿和教堂，这成为国家富裕的唯一表现。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国进步的题目上吧。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墨守陈规比干旱之与我国农业更坏。他们拒绝一切科学发明和应用，认为这是坏东西。‘过去的年月是好的。我的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耕种的，我就应该这么耕种。’愚昧无知变成了国家的光荣。眼下不应该等待挽救措施。在其他国家，大学和高中培育出改革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战士，而这里的学校仅仅造就了一个渴望生存的僧侣无产阶级，他们争相学得专业和得到公职，惟一的希望是能够闯出路子，和维持现状。经过几年的学习（如果还学习的话），不是为了得到知识，而是为了得到一张文凭，一张批准挣得面包糊口度日的纸片。他们学习老师所宣讲的，而没有任何进一步探究的渴望。大部分教师是在职的医生和律师，每天到讲坛上坐一个小时，像留声机一样地重复着几年前讲的那些东西，然后马上去看他们的病人和处理他们的案件，而对他们找到工作后在世界上所写出的书和所发表的言论一无所知。西班牙文化是二手货，纯外国的，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即使这种文化也只有极少数人阅读，因为其他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图书室里只有他们年轻时学过的课本，他们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欧洲思想的进步。父母们抱着尽早确保子女前程的愿望，在他们刚刚会说话时，就把他们送进学校。其他国家的那种理性完全成熟的成年大学生，在我国不存在。大学里充满了儿童，在高级中学只能看到穿短裤的孩子。西班牙男子在第一次刮胡子时，已经读完了硕士学位，并在向博士迈进。最终在教授身边还将坐着保姆。在其他国家的同龄儿童还在打陀螺的时候，我国的儿童

已接受了科学的洗礼，一旦获得了宣示其学识的学位就不再继续学习。他们就是那些将指引我们和拯救我们、明天将成为立法委员和部长的知识分子。行了，伙计，这是多么可笑！”

加夫列尔自己没有笑，但是“银权杖”和其他人都赞赏他的话。所有这些抨击现时代的话，都使神甫感到高兴。

“你这个鬼东西！”他对加夫列尔说，“你在发疯的时候，会受到众人的喜爱。”

“堂安托林，这个国家已经枯竭。这里一切都荡然无存。从我们衰落之日起，消失的城市已不计其数。在其他国家，人们精心保存着过去的遗址，把它们当做历史的有力见证。他们清理、保护、维持和加固这些遗址，并修筑道路以便让人都能去观赏它们。我们这里曾经历过罗马艺术、拜占庭艺术、阿拉伯艺术、穆德哈尔艺术^①、哥特艺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以及所有的欧洲艺术。但是，在我们的农村，野草荆棘遮掩了这些遗址，使其面目全非；在城市，人们的野蛮行径使它们破残不堪。人们时时刻刻都在怀念过去，然而，他们却轻视过去的遗迹。真是一个充满梦幻又遭遗弃的国家！西班牙不成其为国家，而是一个凌乱不堪、积满尘土的旧物陈列馆，这个陈列馆今天吸引着全欧洲的好奇者，而在这陈列馆里，连遗址遗物都变成了废墟。”

青年教士堂马丁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加夫列尔，似乎在对加夫列尔说话表达出他热烈的赞同。其他人都低着头，静静

^① 指十三至十六世纪西班牙流行的保留了基督艺术要素又采用阿拉伯装饰的建筑风格。

地听，也同样感受到那些话的魅力。在回廊的沉稳而迂腐的氛围中，这些话显得那样大胆。只有堂安托林在笑，因为他觉得加夫列尔的想法，尽管是些胡言乱语，倒也十分有趣。天色已近黄昏。太阳已消失在大教堂屋顶的后面。“银权杖”的侄女一再从她家门口叫唤他们。

“孩子，我们现在就回去。”神甫说，“不过，我还得对这位先生说几句话。”

他对着加夫列尔继续说道：

“但是，上帝的子民呀……不，我不应该这样称呼你，因为你极不听话，你把一切看得都很坏。如你所说的，所谓陈旧的西班牙教会已经变得很穷，而你认为革命还不够。你想要什么呢？你希望怎么来整治这一切呢？把你的秘方说出来给我们听听，我们就走了，因为天气凉下来了。”

他笑着，像对待一个孩子一样，用父亲般遗憾的目光看着加夫列尔。

“我的处方！”加夫列尔大声喊道，但并不理会神甫的表情，“我没有任何处方。人类的前进才能提供这种处方。地球上的所有民族都经历过同样的演变进化。开始他们受刀剑的支配，后来被信仰支配，而如今则受科学的支配。我们曾经被武士和神甫所统治，但是我们停留在现代生活的大门口，既没有力量也不希望握住科学的手，而只有科学才能为我们指引方向。由此造成我们这种悲惨的局面。今天，科学就是农业、工业、艺术和职业、文化和各国人民的福祉……甚至战争本身。西班牙生活在远离科学这太阳的地方。最多也只能看到从外国折射来的一束苍白、冰冷的和微弱的反光。信仰这病魔使我们没有了力量；我们就如同这样的人，

在年轻时得了一场病之后，变得终身贫血，不可能恢复元气，注定要未老先衰。”

“呸！科学！”“银权杖”一边向他家走去一边说，“我知道这玩艺。这是所有宗教的敌人的永恒的音乐。没有比热爱上帝和他的事业更好的科学。晚安。”

“祝您晚安，堂安托林，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脱离信仰和刀剑。有时信仰引导我们，有时刀剑驱赶我们。但是，科学根本谈不上，甚至连一天也没有支配过西班牙。”

第七章

从那天下午以后，加夫列尔为了不再和“银权杖”发生争论，一直避免在回廊里的聚会。他对自己胆大有余感到后悔。当他独自一人时，他反复思考过如此放任地说出自己的思想所面临的危险。他害怕被赶出大教堂，重又冒险去闯荡世界。他对自己喜欢冲撞过去的偏见而自谴自责。改变那些可怜人的思想，他会得到些什么？争取人类的解放，要改变那些像软体动物一样附着在昔日岩石上的人，这负担有多沉重？

在加夫列尔看来，大教堂是昔日种种疾病留下的一个巨大肿瘤，使西班牙的皮层肿胀。已经毫无办法，无计可施。它不是一块能发育的肌肉，而是一块脓肿，只等到时候摘除，或者由于它内部致命的病菌的作用而坏死。加夫列尔已经选择了大教堂这昔日的遗物作为他的避难所，他就必须沉默，小心谨慎，以免别人指责他忘恩负义。

另外，他的兄长埃斯特万也打破了自他女儿回到这里之后一直保持的冷漠缄默，也劝告他谨慎从事。

堂安托林曾经把埃斯特万叫去过，以他自己的方式叙述

他和加夫列尔的谈话。

“埃斯特万，他有一些非常可怕的想法。”神甫说，“并且极其冷静地在这神圣的教堂里宣扬这些思想，仿佛就在外国的那些可诅咒的俱乐部里一个样。你兄弟是在哪里学会了那些东西的？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可恶的异端邪说……你告诉他，一切我都忘掉了，因为从小我就认识他，因为我记得他曾是我们神学院的荣耀，特别因为他有病在身，让他离开教堂是不人道的。但是，这种违反常情的事不能重演。嘘！如果他愿意失去灵魂，那就让他把那一切荒谬绝伦的东西保存在头脑里！但是，在这所神圣的教堂里，尤其是在众人面前，一句话也不要说，你听明白了吗？一句话也不要说。他就差在这大主教教堂里举行集会了。再说，你的兄弟应该想到，此时是在吃教会的饭，因为你住在这里，你在供养着他，除此之外，在谈论上帝最智慧的事业的时候企图从中找缺点，这是很不恰当的。”

最后这个评论给加夫列尔的印象最深，因为伤害了他的尊严。堂安托林说得对。他只不过是教堂的一条寄生虫，当他藏身于大教堂时，他应该感谢大教堂，应该沉默。当他躲藏在那里时，他不是已经认为他已经死了吗？……他活着就像一具行尸走肉，而对某些宗教派别来说，这是最完美的人。

他会像所有人一样地思考，或者，与其如此，还不如不思考。他可能像花园里的草和回廊扶壁上的菌类一样漠然地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尽力避免与丁香园他的朋友和敬仰者见面。他不再造访鞋匠的住处，当他看到同伴们在回廊里转来转去试图进

他们卢纳家族的家门时，他便丢下萨格里拉奥一个人，自己上楼到乐师的阁楼里去。

大教堂的仆人们坐在缝纫机周围，白白地等着老师下来。他很满意，因为那些人虽然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但却看不到他。他们一边望着他那空空的座位，一边和女孩聊天，当女孩谈到他叔父时，便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乐师看到加夫列尔又来看望他时，感到高兴。加夫列尔是唯一敬重他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乐师如发生月蚀一样，黯然失色，这位可怜的艺术家长受过孤独之苦，他失望，他像孩子一样地生气，犹如广大听众蔑视他，背弃他。他对加夫列尔宠爱有加，仿佛他是他的爱妻。他虽然对事漫不经心，但他关注加夫列尔的咳嗽，向他推荐自己凭空想象出来的药方，为他病情的发展感到不安，一想到死神会夺去他唯一的听众，他便不寒而栗。

他把加夫列尔不在期间他所研究的所有乐曲一点一点地都给他作了介绍。当病中的加夫列尔咳嗽得厉害时，他就停止弹风琴，就和他的朋友进行长谈，话题始终是他永远关心的音乐艺术。

“加夫列尔，”一天下午乐师说，“您是那样善于观察，知识又如此渊博，难道您没有看到西班牙是悲伤的，它没有真正的诗歌中的温馨的缠绵情意？……这不是忧郁的，这是悲伤的，是一种孤傲和狂野的悲伤。它或者纵声大笑，或者号啕痛哭；它没有那种区分人与野兽的温柔的微笑和智能的欢乐。它笑的时候，并非由衷的笑；它的内心总是阴郁的，带着一种洞穴的阴暗，在这洞穴里激情如同寻找出路的困兽在骚动。”

“对，您说得好：西班牙是悲伤的。”加夫列尔回答说，“虽然它已不再像过去穿丧服，也不在剑柄上挂念珠，但它内心仍戴着孝，它的心灵是阴郁可怕的。可怜的西班牙在三个世纪中经受了宗教法庭施火刑和被用火刑的苦恼，至今这种惶恐生活的阴影仍在延续。在西班牙没有欢乐。”

“没有欢乐，没有。这一点在音乐中比在其他生活的表现形式中看得更清楚。德国人惬意欢快地跳华尔兹，或者手里端着啤酒杯嘴里哼着《我们年轻人多快活》这首赞美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的大学生之歌。法国人纵情欢笑地歌唱，轻松潇洒地跳舞，用笑声和猴子般的动作对他们的舞姿表示敬意。英国人怀着对自己健康强壮的身躯的满心喜悦，把体操变成舞蹈。所有这些民族，当他们有那种诗一般温柔的伤感时，便唱起能安慰心灵和抒发想像力的柔和的民谣、浪漫曲、叙事歌谣……而在我们这里，民间舞蹈有许多僧侣教士色彩，使人回想起那些神圣舞蹈家举行圣事活动中的冷漠僵硬，或者女祭司那种疯狂的扭摆，一直跳到双目圆睁、口吐白沫倒在圣坛前。而歌曲又如何？这些歌曲，作为多种文明的产物，是极其优美动听的，但是充满着悲哀、绝望和阴郁，暴露出一个病夫民族的心灵，他们除了观看斗牛场流着人的鲜血和劣马踢腿踹蹄作垂死挣扎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娱乐活动。这就是西班牙的欢乐！这就是安达卢西亚的喜悦！……请您原谅我的笑。一天晚上，我在马德里参加了一个安达卢西亚的节日，这是最地道的、最西班牙式的节日。我们玩得都很尽兴。我们喝酒，喝了又喝。随着酒杯不停地流传，人们双眉紧锁了，脸孔愁苦了，表情严峻了。‘喂！来呀！这是人间的欢乐！’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欢乐

的影子。男人们皱着吓人的眉头相对望着，女人们带着呆滞茫然的目光在那里跺脚、击掌，仿佛音乐掏空了他们的头脑。舞女们像竖立的蛇一样扭曲摆动着腰肢。她们双唇紧闭，目光冷酷，严肃、傲慢、难以接近，如同在神圣的宗教仪式上演出的歌舞演员。时不时地在这单调、令人昏昏欲睡的旋律中，会响起尖厉刺耳的歌声，这歌声酷似一声咆哮，一个肝肠寸断的人发出的呼叫。而诗歌又如何呢？像牢房一样凄楚，有时也很美，但是，犹如探身于铁窗牢门的囚犯所能唱出的囚歌。他们唱的是痛打叛逆的女人，用鲜血洗清对母亲的侮辱，哀叹那个把头戴卡拉尼亚斯草帽、身披绶带的骑士们送去服苦役的法官，在祈祷室等待最后一缕曙光的死囚的诀别；完全是一首揪心、夺去欢乐走向刑场临死的诗歌。连那些赞美女性美的颂歌都带有威胁性和血腥味……这就是在西班牙扩张时期娱乐人民的音乐，而且也许在以后几个世纪，这种音乐将继续使人民欢乐……加夫列尔，我们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这种状况已渗入我们的骨髓。如果不是在威胁别人或者自己在哭泣，我们就不会唱歌。歌曲中含有越多的哀叹、痛苦的啜泣和垂危人的喘息，就越优美动听。”

“这是事实。西班牙人民不得不努力成为这种样子。西班牙人民闭着双眼相信国王和教士是上帝的唯一代表，并按照他们的形象塑造自己。人民的快乐是修道士们的那种快乐，一种粗俗的快乐，充满着肮脏笑话、粗俗语言和如同打嗝一样的哈哈大笑。我们的流浪汉小说是在修道院集体食堂里讲的故事，是那些解开法袍，双手交叉在便便大腹上，三重下颏垂落在披肩上的教士们在消食时编造出来的故事。这种笑声总是产生于同样的笑料：荒诞可笑的贫困，绅士们作

为唯一家具的涂漆便盆，由于饥饿而从同伴手里抢夺他充饥的硬面包的花招，从头戴面纱的女人那里窃取钱包的伎俩，这些女人在寺院里卖淫，并为我们黄金时代的诗人充当为我们描绘一个骗人的荣耀的世界的模特；她们是生活在栅栏和愤怨之间的奴性的女人，比享有完全自由的现代女性更不道德，更放荡。西班牙的悲哀是它的国王们造成的，那些阴郁的病夫梦想霸占世界，而他们的人民却在忍饥挨饿。当他们发现事实与他们的希望相违时，就变得多疑和极度狂热，认定他们的失败是上帝的惩罚，以痴迷的虔诚安抚神明。当费利佩二世得知‘无敌舰队’覆没，成千上万人牺牲，半个西班牙在痛苦的时候，他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朕派遣无敌舰队是去和人打仗的，而不是和自然力打仗的。’他继续在马德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祈祷。国王们的冷漠又凶残的悲哀笼罩着整个国家。在几个世纪中，黑色成为西班牙宫廷喜爱的颜色是事出有因。国王乡间行宫阴沉的森林和冬天的昏暗树林，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喜欢散步的地方。他们乡间宫殿黑色屋顶，带着风向标的平顶塔和阴森的回廊，仿佛是一座座修道院。”

躲在那间旧房中的加夫列尔只有乐师这一个听众，此时忘记了为能保持在大教堂的平静生活给自己规定的谨慎小心。在这位艺术家面前，他可以无顾忌地说话，热烈地谈论着西班牙国王和他们传播给这个国家的悲哀。

忧郁症是大自然给予西方衰落的专制君主们的惩罚。如果一个国王，比如费南多六世，有某种艺术爱好而不喜欢生的乐趣，他会听着法里内利模仿女声给他唱女高音咏叹调而悲伤地死去。如果他们天生厌烦听女人讲话，他们就会成天

呆在马德里附近的森林中，手拿猎枪追捕野牛，打猎后休息时，累得直打呵欠，而此时，王后则远远离开他，依偎在某个侍从的怀里。

在同宗教裁判所亲密接触的三百年间，国王并没有逃脱惩罚，作为教皇的代表，在主教、耶稣会士、忏悔神甫和修士会的启示下行使权力，他们这些人只给西班牙王室以表面的权力，把它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神权共和国。天主教的悲伤渗透到了西班牙国王的骨髓之中。当凡尔赛宫的喷泉在大理石雕刻的仙女中间歌唱，路易十四的骑士们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如同厚颜无耻的异教徒，围绕在袒露美丽体态的女人的周围，献媚调情时，西班牙王室成员却穿着黑色服装，腰挂念珠赶赴火刑场，并佩戴着宗教法庭绿色腰带，以充当焚烧教徒的行刑者的法警而感到光荣。文艺复兴肉体美的春风激发人类敬慕阿波罗，崇拜被犁耙从中世纪灾难的瓦砾中发掘出来的维纳斯女神，而对西班牙君主制来说，美的最高典范是被处死的犹大，破旧的大教堂里的布满尘土、黝黑的基督像，基督的嘴呈青紫色，身体收缩流淌出许多鲜血，瘦如骷髅，骨头突出的双脚鲜血淋淋。那流淌出的许多鲜血，是怀疑在萌发，信仰在消退，为了强制推行信条而把手伸向宝剑时，受宗教爱戴的液体。

因此，西班牙王室才由于悲伤而打呵欠，把忧郁症一代代传下去。这是至高无上的天主教王权。如果时而在王室中会出现一个快乐和对人生满意的人，那是因为在母亲血管的蓝色液体中注入了一种平民的血液，正如同阳光照进了病人的卧室。

堂路易斯在听加夫列尔讲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这些

话。

“是呀！我们是一个悲伤的民族。”这位艺术家说。“那些黑色年代的忧郁情绪依然在我们中间存在。我时常想，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生活在那个时代该有多难。宗教裁判所偷听人们的谈话，想猜透人们的思想。进入天国是生活的唯一理想，而进入天国却越来越难！为了自己得救，必须向教会交钱；贫困是最佳状态。除了物质方面的牺牲之外，时时刻刻的念经，每天去教堂祈祷，参加教友会的活动，在教区教堂的拱顶下忍受笞刑，犯了罚入地狱的罪孽的呼声打破睡梦，提醒死亡已近在眼前。除了这种惴惴不安的生活外，还有渺茫无期的得救升天，因最轻微的过错坠入地狱的威胁，永远不能彻底安抚的凶狠而有报复心的上帝。除此之外，还有肉体的威胁：对火刑的恐惧，使受上帝启示的人胆怯、变得邪恶。”

加夫列尔说：“是应该这么理解受俸神甫略伦特^①在解释他为什么担任宗教裁判所秘书时的可耻的自白：‘到了要焚烧的时候，我为了不被焚烧，就站到了烧人者一边。’那些聪明人也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去抵抗和造反？主宰生命和财富的国王，也只不过是主教、修道士和宗教裁判所使节的奴仆。西班牙的君主，除波旁王朝早期的几个国王外，都是教会的奴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西班牙一样如此明显地存

① 略伦特（Llorente，1756—1823），西班牙历史学家，神甫和宗教裁判所秘书长。他因企图对宗教裁判所进行改革而被革职。该裁判所被取缔时，他接收了该所的档案，写了著名的《从费尔南多五世至费尔南多七世宗教裁判所的批判史》。

在过宗教和君主制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宗教可以没有国王而存在，但是，君主制不能没有宗教而生存。幸运的武士、创立一个王权的征服者不需要教士；只要用他的剑和他的英勇业绩的威望就足够了。但他临终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继承人，他们不像他一样具有荣耀和令人尊敬的威慑力，于是，他便讨好教士，把上帝作为维护王权的神秘同盟者。历朝历代的开国者以武功治国，而他们的继承人则用上帝的天恩执政。对西班牙人民来说，君主和教会是一体，是一切。信仰把他们变成了带着任何革命都砸不碎的精神枷锁的奴隶。这种信仰的逻辑是坚不可摧的。当他们相信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管理世间一切琐事并恩准国王统治国家，他们就只有服从上帝，否则就得入地狱。那些在世上一帆风顺的人，会颂扬上帝，因而发财发福；上帝造就了国王，免得人们为治理自己而操劳；那些受苦的人一想到生命是一种短暂的考验，经考验后可以在天国得到一个小小的空间，从而得以自我安慰。宗教是君主制的最好帮手。如果有国王之前不存在宗教，他们也会创造宗教。证据就是在疑虑时期，比如现在，他们继续紧紧抓住天主教，因为天主教是王权最强有力的支柱。按常理，君主们应该说：‘朕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朕有实力，是因为军队支持朕。’但是，先生，他们不是这么说，宁愿继续上演古老的戏剧说：‘朕能成为国王，是由于上帝的恩典。’小暴君离不开大暴君的膝下。他不可能自立。”

加夫列尔沉默良久。憋得喘不过气来，低沉的咳嗽喘息声震得他胸脯激烈起伏。乐师惊恐不安地走近他。

“不用害怕。”渐渐恢复常态的加夫列尔说，“每天都是这样。我有病，不该说这么多话。另外，这些事使我激动。”

我愤怒的不仅是我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君主专制和宗教的荒谬言行……但是，我对一个有王室血统的人感到过遗憾和深深的同情。您相信吗？在我周游欧洲中，我在很近的地方看到过他。我不知道护卫他的马车的卫兵在认为可能是一次谋杀的情况下，怎么会不把我挡得远远的。当我想到那些晚一步来到一个不相信上帝起源的世界的国王时，我感到是同情。他们是从一个王朝的被蛀的、枯萎的树干上长出的新枝，在他们可怜的浆液中仍带着枯死的树枝的弊病……他是一个年轻人，和我一样的病人，他的病不是生活的厄运造成的，而是在摇篮里就有的；在出生前，他就注定要和出生后浸入他体内的疾病作斗争。堂路易斯，请您想一想，假如我现在身强力壮，为了保存我的利益我生下一个儿子，难道这不是冷酷地预谋对未来进行一次袭击吗？……”

这位革命者这样描绘那个病态青年：他身材瘦弱，通过营养和锻炼人为地使他强壮；深深的黑眼窝里有一对失去光泽的、憔悴的眼睛，下颌像一块僵死的肉垂挂着，连托住它附着在脑袋上的力气都没有。

可怜的少年！他干什么要出生呢？他走过人世会留下什么呢？为什么多少回拒不让强壮的人出生的大自然会如此慷慨地让一个垂死的痼病的患者在没有爱情的结合中诞生？对他来说，拥有马匹、马车、向他致敬的穿制服的仆人和向他高呼万岁的笨蛋，毫无用处。对他来说，最好是不要来到这个世界；留在尚未成为特权者的境界。情况与堂吉珂德的侍从相像，当他终于在巴拉塔里亚过上富裕生活时，他身边的雷西奥医生限制他的饮食，这个可怜人不能完全自由地享受他有限余生的甜蜜生活。

加夫列尔补充道：“在他生命最后的每一分钟，他们给他几千杜罗；但是，金钱不能给他提供一滴新鲜血液，医治好他血管里遗传的毒素。他身边有许多美女；但是，当他感到青春的愉悦，生命之春的精力，一个只有在爱情的斗争中表现出色并取得胜利的家族的传宗接代的意向沿着脊梁上升时，他不得不在母亲监视的目光下保持冷淡和节制，因为母亲知道，肉欲的冲动可能迅速毁掉一个虚弱而枯萎的生命。这样多的清规戒律，如此伤心痛苦的禁欲节制，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死亡。这个可怜的人何必出生呢？有时候，大地的伟大创造等于创造一种不幸。公德观念是对一个病人最残酷的折磨；它迫使病人强颜欢笑，强迫他装出他不具有的健康的体魄。谈论国王的病情是一种犯罪，朝臣和那些受王权荫庇的人认为，稍微涉及君主健康的言论，都是一种亵渎行为，一种应受到惩罚的罪行，似乎君主不是一个常人，不是和大家一样置于死神的名下的人。”

“我不关心政治，”乐师说：“国王和共和国对我都一样；我是艺术的一名臣民。我不知道君主制在您所见到的那些国家是怎么回事，但是在西班牙，我看到它是已经死亡的东西。人们把它当做过去那么多造物中的一件东西而容忍它的存在，但它不会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人准备为它作出牺牲。我相信，连那些在它的荫庇下生活并且其利益和王室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人，也只是热情在口头上，而不是在内心。”

“堂路易斯，就是这样。”加夫列尔说，“将近一个世纪前，君主制在西班牙已经寿终正寝了。最后一位受人民爱戴的国王是费南多七世。爱其民者，此其君也。后来，国家从

传统中解放出来，曾一度辉煌；但是，后来的国王们没有进步，相反，他们反而倒退了，越来越远离早期几位波旁国王的改革和反教权的倾向。今天，如果在教育一个王子时，他的老师们说‘我们想使他成为一个卡洛斯三世’，对此连皇宫里的石头都会愤怒。奥斯特里亚家族像这些寄生植物一样复活了，这些寄生植物在被拔除之后，过些时候会重新长出来。如果要在王室里寻找过去的楷模，人们会记起奥斯特里亚家族的恺撒们。要彻底忘掉波旁王朝早期的历位国王？！他们从道义上处死了宗教裁判所，驱逐了耶稣会士，促进了国家的物质繁荣！不再去怀念那些作为阿兰达^①和弗洛里达布兰卡^②的导师来西班牙传播文明的外国修道院院长！当时耶稣会士、修道士和教士如同在卡洛斯二世的鼎盛时期一样地发号施令。以一个阿兰达的伯爵，伏尔泰^③的朋友，作为顾问，这在过去是一种耻辱，对此人们闭口不谈……是呀，堂路易斯，您说得对。君主制是寿终正寝的东西。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具尸体和一个活人之间一样的关系。西班牙由来已久的惰性，拒不改变态度，所有安于现状的民族对新生事物的恐惧，是造成那种制度继续存在的缘由，这种制

① 阿兰达（Aranda, 1718—1799），卡斯蒂利亚会议（古西班牙最高法庭和国王的咨询机关）主席，深受法国哲学家学说的影响，积极参加驱逐耶稣会士和限制宗教裁判所权力的活动。

② 弗洛里达布兰卡（Floridablanca, 1728—1808），西班牙政治家，卡洛斯三世的大臣，为发展公共教育和工业、建立海军和驱逐耶稣会士做出过贡献。

③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

度在西班牙，甚至没有如在其他国家那样，取得军事成就和土地的回报，以此证明这种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

那天下午，在乐师陋室的谈话以此结束。

丁子香园加夫列尔的敬仰者对他的钟爱，重又吸引了他。他们窥视他，追踪他，因他不在而伤心痛苦。用鞋匠的话来说，没有他，他们就不能活。他们已经习惯于听他讲话，他们有一种“受启蒙教育”的愿望，他们恳求老师不要抛弃他们。

“现在我们在钟楼里聚会。”钟楼人说，“‘银权杖’不喜欢我们的聚会，他甚至威胁鞋匠说，如果这种闲扯聊天在他家继续进行下去，就把他撵出丁子香园。他不会来找我麻烦，因为他了解我的性格。再说，如果他在上回廊发号施令，那么我就在我的钟楼里发号施令。如果他用他的特务手段来烦恼我们，我会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这个吝啬鬼！”

他一反自己粗鲁和沉默寡言的性格，带着亲切的感情补充说：“来吧，加夫列尔；我们在我家里等你。在你陪伴你的侄女或者听那个狂人堂路易斯谈话感到厌倦了，你就上来待一会儿。听不到你说话，我们的日子就很难过。打那天下午听到你的谈话后，堂马丁很兴奋。他想见到你；他说，为了听到你的声音，他甘愿走遍整个托莱多。他希望你一旦决定和朋友们聚会，告诉他一声；他还说，堂安托林在和他谈话时，抓不到你的辫子，无中生有地把你说成是疯子和异教徒……他确实是个没有教养的人，在完成了一定学业之后，只能做些卖门票和剥削穷人的勾当。”

加夫列尔经常参加钟楼人家里的聚会。上午大部分时间他都陪着他的侄女，缝纫机喳喳的响声给他催眠，看着布料

在机针的跳动下一点一点地通过，散发出新衣裳的化学香气，使他进入甜蜜的梦乡。

他看着萨格拉里奥，她总是忧伤地、默默地又坚毅地投入工作。当她有时抬起头整理线团时，她的目光和加夫列尔的目光相遇，脸有了生气，绽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在她父亲因气愤而孤立他们的情况下，他们感到他们需要相互接近，似乎有一种危险在威胁着他们。疾病把他们俩连在一起。加夫列尔看到她离家出走后世人是怎么回应她的，他对这个可怜女孩的命运感到难过。疾病的后遗症经常以剧烈的疼痛折磨她，但她竭力不流露这种痛苦。她微笑时，在她惨怛的紫色的双唇间露出由于吸收了汞发黑、断裂的牙齿。她头上已有几处头发脱落，靠她昔日的秀发留下的几缕金发遮盖着，但她很艺术地加以梳理。她那白皙、天鹅绒般的皮肤上长了些红斑，这些奇怪的损伤的皮肤有时会肿胀形成脓肿。尽管如此，在她昔日美貌的遗存间依然绽放出她年轻人的青春活力，给她的眼睛增添光泽，使她的笑容楚楚动人。许多夜晚，当加夫列尔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不停地咳嗽，胸部和头部为冷汗浸透时，他会听到隔壁房间她侄女的呻吟，为了不让家里人觉察她的痛苦，她的呻吟是怯声怯气的、压抑的。

“昨天晚上你怎么啦？”第二天早晨加夫列尔问道，“你哪里不舒服？”

萨格拉里奥在多次否认后，终于说出了她的病痛。

“是我的骨头痛。一种我一躺到床上就使我毛骨悚然的剧烈疼痛，似乎是有人一块一块揪掉我的骨头……您的身体怎么样？我听到您整夜都在咳嗽，好像您都喘不过气来了。”

这两个身心残疾的人都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在惦记着另一个人的痛苦，在两个心灵间形成了一股爱怜的暖流，相互吸引，但这不是出自性的激情，而是出于他们的不幸所产生的手足间的同情。

许多次，萨格拉里奥让她叔父出去走走。她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离她很近，痛苦地咳嗽着，凝视着她，仿佛把她当成一个崇拜的偶像，这使她很痛心。

“您站起来活动活动吧。”女孩高兴地说：“看到您总是这样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里和我作伴，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您所需要的是生活和活动。您去找您的朋友吧。他们在钟楼人屋里等着您。往后，他们会怪我，以为是我把您留在家里。叔叔，出去散步吧！去谈论那些如此使您兴奋，使穷苦人听得目瞪口呆的事情吧！上楼梯时您要小心。慢慢走，歇歇脚，别让咳嗽病又发作。”

加夫列尔在钟楼人的屋里度过了上午最后几小时。早先粉刷的墙上挂了几张发黄的版画，它们反映了卡洛斯之战的轶事，是这场旷野惨烈的战役的纪念。几年前，这场战役还让马里亚诺感到骄傲，而现在已无人谈起。

在那里，加夫列尔见到了他所有的崇拜者。连鞋匠也为了不错过这种聚会而夜里干活。堂马丁神甫为了不让“银权杖”看见他，也偷偷地上楼来。这是一个小小的集体，他们怀着新事物所诱发的热情，聚集在这个病歪歪的使徒的周围。

加夫列尔回答那些人的往往反映他们思想质朴简单的问题。当咳嗽向他袭来时，他们都围在他身边，他们甚至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能使他恢复健康。加夫列尔激动又兴

奋，终于向他们讲述了他的生活和种种苦难遭遇。这种牺牲精神更使这些人热情澎湃。这些在大教堂安居、平静和安全生活有保障的人感到自卑，敬佩那位斗士的冒险和坎坷生活。对他们来说，他是卑微的人和被压迫者的新宗教的殉难者。此外，他的天真无邪使他成了他越来越憎恨的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

对他们来说，加夫列尔的话是唯一真理。但是，比其他人都粗俗和沉默的钟楼人，却是最敢于讲话的人。他那种自幼对加夫列尔表现出来的热情，他那种狗对主人般的忠诚，使他跨跃式地前进，一下子便能接受了最遥远的理想。

“加夫列尔，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什么样的人。”他坚定地说，“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吗？那么我也会成为这样的人……总之，我认为我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者。你不是希望穷人能活命，富人要干活，每个人都应拥有他挣到的东西，我们大家都互相帮助吗？过去，在我们背着枪，戴着贝雷帽走遍世界的时候，我也用自己的方式考虑过这问题……说到宗教，过去它使我们发疯，现在我对它毫不关心。听了你的话后，我明白了，宗教有点像是那些聪明人制造的一种花言巧语，让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安于尘世的贫困，等待进入天国。他们想得不错。末了，那些死后找不到天国的人是不会来告状诉怨的。”

有一天，加夫列尔想上顶屋去看看。那时正是春意盎然，暖融融的天气，湛蓝的天空似乎都在吸引他。

“我从小就没有看到过那口大钟。”他说，“我们上去吧；我要最后看一眼托莱多。”他在他仰慕者的簇拥下，几乎是被他们抬着缓慢地沿着窄小的螺旋形楼梯往上爬。在上面，

习习和风在大钟筑成笼子的巨大的栅栏间簌簌地吹着。在拱顶的中央，悬挂着那口著名的大钟，恰似一只极大的铜杯，周围布满了深深的裂纹。那个造成大钟裂纹的像一根柱子一样鑿凿的钟舌悬在钟的下面，另一个较轻的钟舌占据了它敲钟的位置。大教堂的发黑而粗俗的屋顶在加夫列尔脚下向外延伸。在对面的一個山冈上，矗立着阿尔卡萨尔城堡，它比教堂更高大，似乎保留着建造它的天主教的恺撒、信仰的维护者的帝王精神，它希望把教会置于它的脚下。

在大教堂四周布满鳞次栉比的城市建筑，但这些房屋被高低起伏的钟楼、圆顶或半圆顶的教堂建筑群所淹没。放眼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不可能不看到小教堂、教堂、修道院和古老的医院。宗教吸干了几个世纪辛勤创造的托莱多，但在它石头的躯壳下，仍保留着这座已死亡的城市。在一些钟楼上飘扬着一面饰有白色圣杯的小红旗。这标志着又有一个新神甫主持了首次弥撒。

“我从来没有上来过，”坐在加夫列尔身旁的几块木头上的堂马丁说，“也从没有看到过那些小红旗。教会增加新成员的工作永远也不会停止。总会有被迷惑的人来充实教士的队伍。真正有信仰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进入教会天地的人是只看到表面上教会依然是胜利者的统治者，并认为，在教会内部，会有一个奇妙的前程在等待他们……不幸的人呀！我也是在音乐和唱诗班歌声中被引向圣坛的，仿佛我是在向胜利进军。我的眼前一片香烟缭绕；我的家人看到我竟然成了神甫，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这场好戏演出后的第二天，当蜡烛已熄灭，香炉不再冒烟，教堂恢复了它那庸俗的面貌，此时只有贫困的生活，为谋生而施展计谋，一个月就七杜

罗！为这点钱每时每刻要忍受几个由于与世隔绝而脾气暴躁的可怜的女人，她们粗俗得像女仆，她们的生活就是在修道院的探访室里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或制作一些没有营养的甜食以馈赠受俸神甫先生们和修道院的各家施主……竟然还有些教士妒忌我，他们饿得像狗一样冲我叫，因为我有一个幸运的管理修女的职务，把我看做是红衣主教宫的一个谄媚者，要不然他们无法理解，我这么年轻却捞到了这样的俸禄，让我每月有七杜罗，生活在托莱多！……”

加夫列尔点头表示同意教士的怨言。

“是呀，你们是一些受欺骗上当的人。教会拥有巨额财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那些穿着法袍梦想爬上主教职位的可怜青年人使我想起了那些移民，他们奔赴那些几百年来以开发闻名于世的遥远的国家，而他们发现，这些国家比自己的祖国更贫瘠。”

“您说得有道理，加夫列尔；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它的乳房中还有足够的奶水供所有人享用，但是，只有很少的人抓着奶头，吃得饱饱的，肚子都要炸开了，而其他人却挨饿哀嚎。说到教会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简直会笑死人。完全是一派谎言；在任何一个机构，都没有如此残酷的专制。起初，教皇和主教是由信徒选举产生，他们滥用权力则会被剥夺权力。现在存在着教会贵族，即受俸神甫以上的神职人员，以及搞到主教职位的人，对后者，没有人要他汇报工作，连上帝都不敢对他哼一声。在世俗世界中，职工失业，部长被革职，军人被降级……甚至国王也被废黜。但是，一旦教皇和主教受过涂油礼并时常和圣灵保持交流，有谁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呢？如果您要求公正，人们会

把您送到同样由教会贵族组成的法庭。在人世间，没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土耳其苏丹也因害怕伊斯兰闺房革命，而在某种程度上办事认真负责。可是在这里，在教会的闺房中，我们还不如女人。如果出现这么一个教士，他对种种迫害感到厌倦，复活了在教士服下的男子汉气概，给专制者打了一记耳光，那么他们就宣布他为狂人。真是虚伪至极！他们力图表明，在教会中，人们生活在最美好的世界，只有缺乏理性的人才会反对教会制度。”

堂马丁沉默了好一阵，似乎沉浸在他的回忆中，然后他接着说：“您也该嘲笑西班牙教会现今的贫困状态。它的情况同那些破产的大领主一样，他们虽然还能舒适地生活，但回想他们过去的富有，就认为自己非常可怜。教会在眷恋它拥有一半西班牙财富的年代。与那些年代相比，它是贫穷的；但是，与现代国家的天主教会相比，它仍然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是受到最优惠待遇、从国家得到最大好处的机构。从国家预算中攫取四千一百万，它还觉得这数目太小，但这是国家的一项巨大开支，因为国家只拨九百万用于教育，一百万用于救济穷困。为了和上帝保持交流，西班牙人要花去五倍于读书识字的费用。但是，这四千一百万只是一个障眼法。我的贫困处境使我好奇：我曾经想弄清楚，西班牙的全体教士有多少收入，而到我们这些普通一兵手里是多少。除了那四千一百万以外，教会的募集和津贴补助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树林。它的根扎到每个部，它的枝杈伸展到国家大厦的每个院子、走廊和屋顶。从国务部收取无任何作用的国外传教团的活动费；从国防部和海军部收取军队教士团的费用；从教育部和司法部收取维持罗马教廷奢侈生活的

费用，因为在西班牙我们还维持教廷使节的费用，如同我讲阔气雇一些仆人，却硬要邻居有义务供养他们；收取教堂、教会图书馆费，寺院修缮费，还有费尔南多波岛的殖民及其他意外费用，还有我也说不清的多少补充费用！除了国家给教会的经费以外，还要考虑到西班牙人民自愿为教会付出的钱。十字军东征圣谕^①每年带来二百五十多万比塞塔；另外还应该考虑到各教区从信徒身上收取的钱财和各教会传教的年收入（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以及市政府和议会的教会预算拨款……总之，整天都在哭穷的教会，每年都从国家手中和全国百姓手中拿走三千多万比塞塔，几乎是军费的一倍，尽管如此，各教堂的司事人员还在抱怨当今时代，说什么一切都给军人耗费了，他们跟随该死的自由派走，由此发生的一切都是军人的过错。加夫列尔，三千万比塞塔呀！这是我仔细计算过的。我是教会的一个成员，每月只挣七杜罗，大多数西班牙教区神甫的收入比一个看守人员的收入还少，数千名教士悄悄地从一个教堂到另一个教堂，寻求做一次弥撒，以便能弄口饭吃。如果说没有成群结队的教士上公路抢劫，那是因为他们害怕宪警，他们挨饿两天之后，第三天才能吃上一块硬面包！总会有一些残羹剩饭可充饥。没有一个教士饿晕在街头；但是，有许多教士是在糊弄自己的肚子过日子，装出有足够营养的模样，直到得了任何疾病就把他开除出这个世界……那么，所有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都落到了教会贵族，那些真正的僧侣阶层手里去了，因为在教

① 原指教皇免除十字军东征参加者和赞助者交费的圣谕，后为在西班牙免除教徒捐助宗教活动的交费。

会里，我们是下层人。加夫列尔，这是多么大的欺骗呀！放弃爱情，抛弃家庭，逃离世俗欢乐、剧院、音乐会和咖啡馆；被人们，甚至被那些自称宗教徒的人视为怪人，一种介乎女人和男人之间的人；拖着长裙，任何时候都穿得像一个阴沉滑稽可笑的人物，付出这么大的牺牲，而挣的比公路上的凿石工人还少。我们活得安逸悠闲，的确，我们不会从脚手架上掉下来，但我们比许多工人更贫困，为了这身教士服的声誉，我们既不能公开承认我们的贫困，也不能乞求施舍。另外，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实际有益的事，而又让国家付出那样高的代价，人们为什么要救济我们呢？……宗教在西班牙的统治地位结束后，只有我们这些下层神职人员忍受其后果。教士是穷苦的，教堂也穷；但是，枢机主教每年保持数千杜罗的收入，教会的参谋部继续安心地唱它的赞歌，因为它看到这没有危及配额收入。至今，革命仅仅损害了普通神职人员。教会的权力已告结束，它已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尸体，但是，那是一具将费很大力气才能搬动的硕大的尸体，为保存它，要耗费许多钱财。”

“这是事实，教会已经死亡了。我们要反对的是它的遗体。平民百姓认为，教会仍然活着，因为还看得到它，摸得到它；但他们不知道，宗教的生命一个世纪相当于一分钟，从它断气到埋葬，要经过一代又一代，许多代时间。在耶稣诞生数百年前，非基督教文化已经死亡。雅典的诗人们在舞台上嘲讽奥林匹克神；哲学家藐视奥林匹克神。但是，基督教还需要许多年的宣传和恺撒大帝们的政治支持才能消灭非基督教文化。即使这样，它也并没有根除，因为教义如同人一样，人在死亡后，也会把他的某些东西永远遗留给继承他

的家人。各种宗教都不会突然消失；它们是在慢慢地消亡，把它们的一部分信仰和礼仪渗入到代替它们的宗教之中。我们生在诸多变革的时代之一：我们目睹着整整一个信仰世界的死亡。它的垂死将会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两个世纪，或许不到，一直到人类对自然界的奥秘的恐惧与不安在人类自身形成一种新的表现形式那么长时间。但基督教的死亡是肯定的，不容置疑的。有哪种宗教是永恒的？现在消亡的征兆到处可见。那种驱使广大十字军的好战的信仰在哪里？那种以天使般的耐心在二百年间建造起教堂以便在一座石山下置放祭品的情热又在哪里？今天还有谁鞭笞、折磨自己的肉体，居住在荒漠中，时刻在思念死亡和地狱？……在西班牙，三个世纪的教会的不宽容和极度的压制，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在宗教上最冷漠的民族。常规的宗教仪式仍在继续，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信口雌黄，但是，谁也不会费心去了解他的信仰的真谛；人们不假思考地接受一切；他们称心满意地生活，相信临终时能有手持十字架的神甫在他身边拯救他的灵魂就知足了。过去年代里，教士、修道士和宗教法庭法官抓得那么紧，以致这信仰机器散成无数小块，没有任何人能收拾这个需要通力合作才能修复的机械装置……马丁朋友，这是一种幸运。如果宗教不宽容政策再持续一个世纪，西班牙就会落得像非洲穆斯林那样的下场，他们在成为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的阿拉伯文明传播者之后，现在却由于对宗教的极度虔诚而生活在荒蛮状态。”

“您知道天主教为什么会保持表面上的强大吗？”年轻神甫说，“因为从很早以前，它就在拉丁语系国家占据了人类生命必经的各条大道。”

“的确如此。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天主教那样无微不至；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它那样潜伏好来迎接人们到来；没有任何一种宗教像它那样在其盛行时期，如此准确地选择好阵地，以便在它衰败到来时也能坚守。只要活动，就不可能不遇到天主教。它从很早以前就知道，人当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本能地不信宗教。当他生活得很好，他很少去关心所谓的永生。只有在死神向他展现出无底的森森黑暗，在他以其有理智的动物的傲慢同生命的被彻底消灭进行抗争时，才会相信上帝，才会在这极度胆怯的时刻惧怕上帝。他希望自己的灵魂不死，并接受宗教虚构的天国和地狱。正如您所说的，教会怕人们健康时不信宗教，所以它占据了所有的生命之路，使得人不习惯没有它而生存，不要只在临死时才呼唤它。死人为教会带来了许多金钱；死人是它最好的产业，但是它同样要统治活人。什么都逃不过它的专制和监视。对人间的一切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它无孔不入：它干涉公共生活和私生活，它为来到人世的婴儿作洗礼，随同儿童上学，垄断爱情，只要这种爱情不请它祝福，便宣布这种爱情是丢人的和可憎恶的。教会把土地分为两个等级：圣土葬那些死在它怀抱中的人，露天的脏土埋异教徒。它对服饰横加干涉，宣布什么是诚实的、基督徒的仪表，什么是令人厌恶的装饰；它为夫妻在床上房事限定戒规；甚至干预饮食，创造出一种天主教烹饪术，规范人们应该吃什么，哪些食物不能掺杂，并禁用某些食品，虽然这些食品是一年中其他时间的美味佳肴，但是在特定的日子里，是对神明的最可怕的亵渎。人一生下来，教会就伴随着他，甚至在把他埋入坟墓后，也不离弃他。它紧紧抓住人的灵

魂，让人在空间朝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一直把人送上通往天国的道路，这一切都以死者的继承人对教会奉献的祭品的情况而定。任何一个独裁者都想象不出比这更强、更全面的专制统治。”

已经是中午了。钟楼人已经走了。人们听到了铁链和滑轮的吱吱响声，一声沉闷的巨响使整个钟楼震颤。金属和石头都激起回响，甚至太空似乎都震动了。他刚刚敲响了大钟，几乎把靠近大钟的人的耳朵都震聋了。不一会儿，从对面的城堡，响起了威武雄壮的鼓号声。

“我们走吧，”加夫列尔说。“这个马里亚诺本来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免得我们大吃一惊。”

他脸带着讥讽的微笑补充说：

“总是老一套。寄生虫是最炫耀和最鼓噪的人。他们不会做有益的事，只会喧闹。”

圣体节到了，但没有任何意外事件扰乱大教堂的平静生活。有时人们会在回廊里谈起主教大人的健康状况。他对教士会严重不满弄得他不得不卧床休息。甚至他的病发作过一次，令人为他的生命担忧。

“是心脏的问题。”熟悉大主教宫内事情的塔托说，“看到堂塞巴斯蒂安病成那副模样，堂娜维西塔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还咒骂那些受俸神甫。”

“木权杖”和家人坐在桌子旁时，谈起以往在托莱多是那样闻名的圣体节的衰败。他那种强烈的抱怨情绪，使他忘记了在自己女儿面前一直保持的苦涩的沉默。

“你不会了解我们的圣体节。”他对加夫列尔说，“关于圣体节，我们现在所能保留的，只有那些挂在教堂外面的有

名的壁毯。现在不再把巨人模型排列放在‘赦罪门’前了，圣像游行也是马马虎虎。”

教堂乐师也抱怨说：“埃斯特万先生，那弥撒又怎么样？那么个隆重的节日，举行这么一个弥撒！为了不多花钱，就在教堂外用几件乐器演奏罗西尼的最短的弥撒曲。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只弹风琴。”

根据古老的习惯，圣体节的前夕，晚上步兵学校的乐队要在大教堂前演奏。整个托莱多的市民都去那里听小夜曲，这是这个城市单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全省和马德里，外地人都要赶来看第二天的斗牛。

钟楼人马利亚诺邀请了他的朋友们到教堂正门的希腊罗马式走廊里听小夜曲。当丁香园的灯光熄灭，堂安托林关上临街大门之后，加夫列尔和他的朋友们小心翼翼地溜到了钟楼人的屋里。萨格拉里奥也去了，那是因为她叔父坚持要求，几乎是硬把她从缝纫机旁拖走的。她也应该消遣片刻；偶尔见见世面对她有好处；她过着那种压得喘不过气的辛劳生活，实际是在自杀。

大家都在走廊里坐下。鞋匠带来他的妻子，她总是抱着一个紧抓着她那松弛乳房的小孩。塔托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第二天斗牛表演中的斗牛士和持矛手。马利亚诺站在他敬佩的伙伴身边，而和他一样缺少教养的妻子则和萨格拉里奥在交谈。

人们都为堂马丁没有到场而感到遗憾。他可能正在下面广场上的人群中来回走动，一定正怀着恐惧的心情想着，为了给修女们做弥撒，他必须在天亮之前起床。

市政府大楼饰满光环，反射在大教堂的正墙上，使石头

发出火烧的红色光芒。

一群群手持鲜花，身穿白罩衫的姑娘漫步在小树丛中，仿佛是初夏的使者。手扶着刀柄、穿着土耳其式宽裤的士官生们，摇动着细高身材，跟随着她们。大主教宫大门紧闭。从广场的红光上面，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空间，那是一个乌黑、明净而深邃的、无数星星闪烁的夏空。

当乐声停止，灯光开始熄灭时，大教堂的居民迟迟不愿离开他们的座位。他们待在那里很舒适。夜晚是热烈的，他们平时在丁香园过着闭塞和沉寂的生活，现在，他们站在那个阳台上，整个托莱多就在他们脚下，放眼无垠的苍穹，他们感到自由的喜悦。

萨格拉里奥自从回到父亲家，从未走出过上回廊，这时，她惊奇地观望着天空。

“这么多星星！”她仿佛是在梦中喃喃自语。

“今天晚上星星更多了。”钟楼人说，“夏季的天空像一块星星的庄稼地，只要天气好，星星的收获会增加。”

加夫列尔听了他的伙伴们憨厚质朴的话笑了。他们大家都敬上帝，上帝是那么细致和有预见，创造了月亮，在夜晚为人们照明，创造了星星不使天空一片漆黑。

“那么，”加夫列尔问道，“既然创造出月亮为我们照明，为什么不是每天都有月亮？”

一阵长久的沉默。大家都在思考加夫列尔的问题。钟楼人，由于和这位老师交往最深，敢于向他提出他们大家所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天空？在那一片蓝色之外还有什么？

广场上已空无一人，一片昏暗。除了像金色的粉末一样散布在天空的星体闪烁的光芒，没有其他光亮。从辽阔的苍

穹似乎降下一种宗教的寂静，降下一种深入那些普通人心灵的压倒一切的威严。寥廓的天空以其令人目眩的高远空旷使他们心醉。

“你们，”加夫列尔说，“看不到天空之大，就不能理解它。他们教给你们说有一个极小的、发育不全的世界的起源，那是一些衣衫褴褛、愚昧无知的犹太人在亚洲的某角落臆想出来的世界，它被写在一本书中，而且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承认。那个人格化的上帝，他的外形和激情和我们一样，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工匠，他在六天中创造了世上万物。第一天创造了光，第四天造了太阳和星辰。如果还没有造出太阳，那么，光从何处而来？难道在光和太阳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这样的荒谬之说多少个世纪被人们接受，似乎是不可能的。”

听众们都摇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像加夫列尔每次对他们说话一样，这个谬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你们想洞察天空，”加夫列尔接着说，“就必须摆脱人类关于距离的概念。人对一切都是以自己的身高来丈量，对体积的大小则以自己的视力所及来测量。在我们看来，这座教堂非常高大，因为它的大殿中，我们就像蚂蚁；但是，从远处看，大教堂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瘤子；同我们所说的西班牙大地相比，它比一粒沙子还小，是地球表面的一个原子……什么都算不上。我们看到三四十米的高度就会使我们头晕目眩。现在我们会认为我们已经很高了，因为我们已经接近大教堂的屋顶，但这个距离对寥廓的天空而言，是太小了，比如一只蚂蚁，在一块卵石上它会犹豫不决，不知如何下去。我们的视力很短。我们是以米来计量

的，我们只能理解很短的距离，我们必须发挥极大的想像力才能理解这天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弄错，当我们谈到天空时，很多情况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说法。如何才能使你们理解世界的无比巨大呢？……你们不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以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是平面的，而天空是一个玻璃制的穹隆屋顶，上帝在这屋顶上钉进了一颗颗像黄金的钉子一样的星星，太阳和月亮漫步其间是为我们照明。你们要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且在太空中转动。”

“是的，这我们知道一点。”钟楼人带着怀疑的口气说，“在学校里，老师是这样教我们的。但是，你当真认为地球在转动吗？”

“因为人太小，你们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因为你们如鼠目寸光的极微弱的视力看不到世界巨大无比的传动装置，但你们不要怀疑这种装置。地球在转动。你们站在原地不动，在二十四小时内便可绕地球转一周。脚不离开地面，我们大家每小时在跑四百菜瓜，连最快的火车都达不到这种速度。你们感到奇怪吗？其实我们跑得还要快，只是感觉不到而已。我们的星球不仅自转，而且同时以每小时十万公里的速度绕太阳转。我们每秒钟在跑三万米。人们永远也造不出飞得这么快的炮弹。你们抓住了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飞行的炮弹在遨游太空，你们为自己的渺小所欺骗，自以为在一座死气沉沉的大教堂中静止不动地生活着……这种速度同其他速度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环绕其转动的太阳，靠吸引力把地球和其他星球带在它的周围，它带着我们在无垠的太空中行走；它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飞向未知的地方，不但没有和其他物体相撞，而总有空间往下沉，这种运动持续了千百

万个世纪，而太阳和跟随它神游的地球没有同一个位置经过两次。”

大家都惊奇得张大了嘴巴听加夫列尔讲话。他们明亮的眼睛由于所说的头晕目眩显得迷茫。

“这会使人发疯。”钟楼人咕哝着说，“那么，加夫列尔，人是什么呢？”

“什么都不是，这个在我们看来那么巨大，并被我们播下宗教、天国和上帝的启示的地球也一样。是蚂蚁的梦幻！甚至还不如！同我们的地球相比，我们觉得太阳硕大无朋，但它只不过是无限高远空旷的空间的一粒原子。你们所说的星星，是和我们的太阳一样的其他太阳，它们周围也有像地球一样的行星，由于它们太小，所以看不清楚。有多少太阳？人们正在改进他们的光学仪器，随着太空领域探索的进展，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太阳。那些刚刚出现在太空的太阳，一旦发明出一种新的望远镜，它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在它们之后，在黑沉沉的空间还会有另外的太阳出现，这样已持续了许许多多世纪。数也数不清：它们密得像烟囱冒出的烟尘或云彩的蒸气的分子。我们的极端渺小使我们看重星球之间的巨大距离。有些星球和地球一样是有生物的世界，另一些曾经有过生物，可现在却孤独地在空间转动，等待着一次新的生命演变；许多星球正在诞生。但是所有这些星球只不过是宇宙间发光气体的微粒子。空间布满了能燃烧一百万、三百万和四百万个世纪的火炉，散发着光和热。银河只不过是我们能看到的一团星云，但是，各个天体之间的距离能容纳一万三千个像我们这样的太阳，它们都有自己的行星，又不会相撞。”

加夫列尔还谈到声和光的速度。同无垠的太空的距离相比，它们的速度是微不足道的。离我们的太阳最近的太阳是那样遥远，我们的声音传到那里，需要三百万年的时间。一个声音要传到北极星，要花费四十万个世纪。可怜的人类永远也不能以音速航行！^①

像我们的太阳一样，那些太阳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未知的方向逃去，但是，它们离我们是那样遥远，经过三四千年，人类都看不出它在空间的移动的距离会超过一个指甲的大小。无极的空间会造成错觉。太阳是一个燃烧着的气体的气泡；地球是一个觉察不到的沙分子。

北极星的光线需要半个世纪才能为我们的眼睛看到。北极星可能在四十九年前已经消失了，但是，你们还会在天空看到它。这是邻近我们的星星之一。望远镜能看到遥远的星球，它们的光线在经历三千年的行程后，才能到达望远镜的镜片。

这些不计其数的星球如同人一样，都经历诞生、变化和消亡的过程。如同在地球上一样，在空间没有静止。一些星星熄灭了，另一些光亮暗淡了，而还有一些正焕发出青春的光芒。死亡的星体在物质的燃烧中熔解，形成新星球。这是在亿万个世纪期间的一种形式不断的更新。这亿万个世纪对于星球的生命来说，只相当于我们生命的有限的几十年。在这些难以测量的距离之外，空间始终是空间，到处有新的星体的旋涡，既没有界限，也没有阻碍。

加夫列尔在一片庄重的寂静中讲述着。听众闭着眼睛，

① 此小说写成于1903年，作者尚未预见超音速的飞行器。

似乎如此宏大壮观把他们怔住了，并感觉到高空的眩晕。他们用想像力来追随加夫列尔的描述。他们有限的天资想为无限的空间设定一个极限；他们单纯天真地猜想，在难以测量的距离之外，有一个千万里厚、精细物质的拱顶。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杰作终该有个极限。在这拱顶后面还会有什么呢？想象出来的屏障突然掉下来了，他们重又在永远无垠的空间，在这始终有着新的星体的空间遨游。

加夫列尔绝对肯定地讲述着这些星体及其生命，他以光谱分析揭示其他星体和地球相同的构成。如果在我们这颗微粒子上出现了生命，在其他天体上也必然存在生命，尽管其形式会不相同。在某些行星上生命可能已经消失，在另一些行星上也许行将诞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千百万个星球上，曾经有过，或者有着生命。

各种宗教要解释世界的起源，在高远空旷的宇宙面前，就显得苍白，渺小无力。这些宗教，如同大教堂的钟楼，以其庞然大物的躯体，遮盖了大部分天空，隐没了千百万星体。然而，与它所隐没的无垠的宇宙相比，它所隐没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比一个分子的微乎其微的部分还要小，几乎等于零。各种宗教就是如此。它们之所以貌似伟大，是因为它们离人很近，向人隐瞒了无垠的宇宙。当人们超越宗教，看到了无垠的宇宙时，他们便会嘲笑宗教的那种小人国人的傲慢。

“那么，”年老的鼓风手指着大教堂，怯生生地问道，“在这里他们教了我们些什么呢？”

“什么也没有教。”加夫列尔回答说。

“我们这些人又是什么呢？”打狗人问道。

“什么也不是。”

“而统治者、法律和社会习俗呢？”钟楼人问。

“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萨格拉里奥用那双由于深深地观察着天空而睁大的眼睛盯着她叔父。

“那上帝呢？”她柔声地问道，“上帝在哪里？”

加夫列尔站了起来。他身子靠在走廊栏杆上，背后布满繁星的天空衬映出他黝黑而充满朝气的身影。

“上帝就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一切。他是发生变化的生命，在表面上他一直在死亡，实际他一直在惊人地变化更新，直至无穷。这种无限性以它的博大使我们畏惧，我们的思想无法容纳下这种无限。他是有生命的物质，受到自身存在的绝对一致的、没有分裂、没有二重性的力量的鼓舞；人类是上帝，世界也是上帝。”

他沉默片刻之后，又坚定地补充说：“但是，如果你们问我有关宗教按人的样子造出的人格化的上帝——这个上帝按照自己的长处创造了人，派遣其子孙到一无所有的尘世，指导我们的行动，守护着灵魂，并把灵魂分为下降到人世的和拯救人世的——那么，请你们在这无边无际的空间找一找，找出渺小的他暗藏在什么地方。即使你们能长生不死，你们活数百万个世纪，从一个星球跳到另一个星球，也永远找不到暗藏这个失势暴君的威严的地方。这个有报复心和随心所欲的上帝是人的头脑中想出来的，而头脑是人类最新的器官，是最后发育起来的器官……当人们创造出上帝时，地球已存在了亿万年。”

第八章

圣体节的早晨，加夫列尔出门来到回廊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堂安托林，他正在检查门票簿， he 把它们整齐地排列在扶手栏杆的石面上。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加夫列尔为了讨好“银权杖”这么说，“准备好有大笔收入，外地游客会来的。”

堂安托林凝视着加夫列尔，似乎怀疑他的诚意。但他发现加夫列尔并非嘲讽，于是便有些满意地答道：“节日筹办得不错。有许多人都想看到我们的珍宝。啊，孩子！这正是我们很需要的！你对我们的不幸感到高兴，所以你可以感到满意。我们目前生活十分拮据。同往日的圣体节相比，我们今天的节日不值得一提，但是，为了支付这个非凡节日那点钱，教堂财务管理处不知要怎么勤俭节约呀！”

堂安托林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紧紧瞧着加夫列尔，似乎他刚刚萌发出了一种绝妙的想法。开始，他皱起眉头，似乎在对这想法思之再三；然后，他的脸上渐渐流露出一丝奸笑。

“加夫列尔，说到这儿，”他以一种亲切又略带挑衅的语

气说，“我记得，在圣周搭花烛祭坛时你跟我说你必须帮你哥哥挣钱。今天你有一个机会，那钱不会多，但是，有一点是一点。你愿意参加拉圣体彩车吗？”

加夫列尔本想傲慢地回击居心不良的教士，他猜出了教士要给他制造麻烦的意图。但是，很快那种要战胜“银权杖”的愿望使他动了心，就接受了这建议。他想以同意教士愚蠢的想法让他感到惊奇。另外，他还想，为他哥哥，他的慷慨大度作出这点牺牲也值得。既然他不能拿出许多钱来帮助兄长，他应该表现出他愿意出力的愿望。面对能给家中带去几个比塞塔的希望，他那点自尊心的顾虑也就烟消云散了。

“你不想做。”神甫以讥讽的口气继续说，“你太嫩了，抬着主的圣体在托莱多的街上出游，你的尊严将会遭受巨大损害。”

“这您就错了。要说愿不愿意，我的确是愿意的。但是对于一个病人来说，这工作太重了。”

“这个你不用担心。”堂安托林坚定地说，“至少有十个人来拉车，其中有些人真有力气。你去是凑个数。我会嘱咐他们适当照顾你的。”

“那就一言为定，堂安托林。您就算我一个。只要有机会，我是愿意挣一天工钱的。”

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任何人都不注意他的情况下，走出大教堂。在托莱多各条街上走走，自从把自己关闭在大教堂以后，他从未上街看看。此外，他这个彻底否定宗教的人抬着上帝的圣体在笃信天主教的人群面前游行，这种极具有讽刺意味的情景，强烈地挑逗着他的虚荣心。

这样的场景使他绽露笑容。这几乎是一种象征。“银权杖”肯定也会高兴，他会把这看做是宗教的一个小小的胜利，因为宗教迫使它的敌人把它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但加夫列尔对此看法不同：在圣体车里面，他代表着隐藏在一种外表排场隆重、壮丽辉煌，但没有信念和理想的宗教内部的怀疑和否定。

“堂安托林，我们就这样说定了。过一会儿我就下到教堂去。”

于是他们便分手了。加夫列尔平静地喝完他侄女送来的牛奶后，就下楼来到大教堂中，对他的家人一点没提关于他想去做的事。他怕他哥哥会反对。

在下回廊，加夫列尔碰到了“银权杖”。他正在和女花匠托玛莎谈话，手里拿着一束红绸带捆着的麦穗，生气地给女花匠看。这束麦穗是他从“欢乐门”旁的圣水池中捡来的。每年的圣体节，他都会在同一地点看到同样的献礼。一个陌生男子把当年开镰收割的麦子奉献给教会。

“他一定是个疯子。”神甫说道，“要这干什么？这束麦穗又有什么意思？作为丰收年成的什一税，至少送一大车麦子还可以！”

在神甫鄙夷地把麦穗扔到花园的一个花坛里时，加夫列尔怀着敬佩的心情想到那种返祖力量，这种力量复活了在天主教的圣殿中异教徒奉献供品，他们把在夏季沃土上生长出来的首批果实奉献给上帝。

当加夫列尔进入教堂时，唱诗班已经结束，正开始做弥撒。老百姓在圣器室门口评论着节日期间的重大事件。主教大人没有来到唱诗班，他也不会参加圣体出游仪式。据说他

病了，但是教堂里的人面带微笑地回忆起，昨天下午他还在散步的时候到过僻静的平原圣母院。那是因为他不愿看到教士委员会。他对这个委员会气愤极了，他拒绝在唱诗堂主持教士会会议，以表明他的蔑视。

加夫列尔走遍了各个殿堂。今天来这里的教徒比往日多，但尽管如此，大教堂仍然显得空荡荡的。在唱诗堂和主祭坛的交界处，有几个戴着精心浆洗的尖角帽的修女，跪在地上照顾着几群女孩，孩子们着黑色的衣服，根据来自不同的学校，系戴红色或蓝色的带子。几个身材魁梧、秃顶的军校军人，把军帽托在军上衣胸前，站在那里听弥撒。在这个听着音乐显得漫不经心、四散的人群中，贵族女子学校的小姐们格外突出，这是一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或者是女性全面发育时期的高傲女性，她们目光灼热，个个穿着黑色丝绸服装，头上裹着丝织花边头巾，鬓边戴着鲜艳夺目的玫瑰花，恰似从戈雅的画中逃出来的带有俗气的贵族夫人。

加夫列尔看到他侄子塔托穿着一件鲜红外衣，俨然像一位意大利佛罗伦萨贵族，他不停地用棍子敲击石板，在轰赶狗。他和一群山区牧民在争论着什么。这些牧民中，男的黝黑的身体扭曲得像葡萄藤似的，穿着棕褐色外套，脚穿凉鞋，打着绑腿；女人们披着红头巾，身穿代代相传的打着补丁的污秽不堪的裙子。他们从山上下来观看托莱多的圣体节。他们在大教堂各个厅殿间来回行走，两眼流露出惊讶，脚步迟疑，每当风琴响起，他们就吓得颤抖，似乎害怕会被赶出这个像他们从故事中听到的神奇的教堂。女人们用一个指头指点着彩色花窗、正门上的花饰、“集市门”大钟上的镀金武士、大风琴的运风管道，个个看得惊呆了，张大了

嘴，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在他们眼里，穿着红色衣服的打狗人俨然像一个王子，由于敬畏，他们都吓得听不懂他的话。当塔托用他的木棍恐吓一只贴在它的主人脚边的大猎犬时，那些朴实的山区牧人决心早点离开教堂，也不愿丢弃他们森林生活中的忠实伙伴。

加夫列尔从唱诗堂的护栏望下去。只见高席位和下排座椅上都坐满了人。这是一个盛大节日，在座的不仅有受俸神甫和受俸教士，还有历代国王小教堂的神甫和阿拉伯区西班牙人专用祈祷室的受俸教士。在托莱多大教堂内，这两个是传统上自主的小教堂。

加夫列尔在唱诗班中发现了他的乐师朋友，他穿着褶皱分明的白法衣，手中挥动着一根小小的指挥棒。在他周围，聚集着十几名乐师和歌手，每当在上边为它们伴奏的风琴响起时，歌声和乐声都给淹没了。当低弱的音乐声越来越弱，消失在凄怆的高大的厅堂中时，乐队教士仍带着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指挥着。

在大祭坛上，方形彩车上，摆放着由比利亚尔潘多大师制作的遐迩闻名的圣体画，那是一个精雕细刻的哥特式神龛，在教堂大蜡烛照亮下闪烁着金色光芒，这杰作是如此精细轻巧，稍有一点动静，它的顶饰便像谷穗一样摆动起来。

应邀参加圣体出游的来宾陆续来到大教堂，有身穿黑色礼服的托莱多市的大人先生们，穿着节日盛装、胸前佩戴着他们全部勋章的军校的教师，身穿令人回忆起本世纪初的陆军士兵一样的制服的宪警的军官。穿着天使服装的孩子们轻快地跳跃着、摇摆着穿过各厅堂向前走，那是一群蓬巴杜侯

爵夫人式^①的天使，穿着锦缎上衣、红跟皮鞋，佩着丝织花边绶带，黄铜翅膀挂在肩胛上，白色假发上还有羽毛的顶饰。为这个节日，大主教教堂拿出了它的传统服装。教堂仆役的礼服全是十八世纪教会最后昌盛时期的服装。两个为彩车开道的人带着布满灰尘的髻发，穿着黑色长袜和上衣，就像上个世纪的低级教士，执杖人和“木权杖”们戴着精心浆洗的领圈和假发；那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丁子香园的人员全都穿上绸缎和天鹅绒的服装。连辅祭们也穿上了金色法衣。

大祭坛挂着“坦托·蒙塔”壁毯，那是带有标志和徽记的天主教双王的著名壁毯，是西斯内罗斯送给大教堂的礼物。助理主教在讲弥撒，身穿传统的十字襟和大法袍的他和他的助祭们个个汗流不止，因为这种厚实华丽的凸绣法衣，就像古代的盔甲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圣体出游即将开始，大教堂行动起来了。圣器室的大门一开一关都发出巨大的响声；人们忙着从一边走到另一边。在那种安适而单调的生活中，一年一度的圣体出游主要街道的盛事，产生了和一次冒险远征外域所引起的同样的混乱和激动的群情。

弥撒结束时，风琴开始奏一支喧嚣无序的进行曲，有点像野蛮的舞曲，与此同时，圣体出游仪式正在安排出行。大教堂外响起了阵阵钟声。在教堂的“平地门”前，军校乐队中止了演奏进行曲，在士官生连队立正不动时，人们听到了

① 蓬巴杜侯爵夫人（Pompadour，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密友，在宫廷中颇有影响，促进法奥结盟。

军官的口令声和枪托整齐的撞击声。

堂安托林，手持大银杖，身披白锦缎透明法袍来回到处召集大教堂的人员。加夫列尔看到他汗水淋漓、面孔通红地向他走过来。

“到你的岗位上去，时候到了。”

他把加夫列尔带到大祭坛的圣体画旁边。加夫列尔和其他八个人掀起一块罩布钻进一个框架，罩布盖住了他们两侧。他们在这架子里必须猫着腰。他们的任务就是推着架子靠暗轮滑动。他们只管推；在外面另有两个人，戴着白色假发，穿着黑色衣服，负责一前一后掌舵，引导圣体车沿着弯弯曲曲的街道前进。加夫列尔被他的伙伴安排在中间。他将负责告示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起步。十分壮观的圣体画摆放在一个平台上，平台上还有一个大平衡锤。在平台和彩车之间，有个一拃多宽的间隙，通过这间隙加夫列尔可以露出他的眼睛，向前面的掌舵人发出指令。

“注意！……前进！”加夫列尔根据外面的一个信号发出号令。

圣体车顺着铺在大祭坛台阶上的斜坡木板缓缓移动。行进到铁栅栏时，车子停了下来。人们跪倒在地，堂安托林和木权杖们在人群中开辟一条通道，身穿红色长法衣的受俸神甫和头戴金色主教帽的助理主教，以及头戴没有任何装饰物的白亚麻法冠的高级教士们，沿着通道向前走去。众人都在圣体龕前跪下，风琴停止演奏，在嘶哑的长号的伴奏下，人们唱起了一首颂扬圣体的赞美诗。圣体画周围升起着缕缕蓝色香烟，守护着金光闪闪的圣体龕。唱完赞美诗后，大风琴再度响起来，彩车继续前进。整个圣体车从基座到顶部都在

颤抖着，这种颤动使得挂在哥特式装饰上的小铃铛发出银铃般的丁零声。加夫列尔抓着圣体车的一根横梁往前走，眼睛注视着舵手，他感到他的腿和那些推车人的摩擦，这圣体车类似印度斯坦偶像车。

从“平地门”（这是大教堂唯一的和街面平的门）走出了大教堂，这时加夫列尔才能看清整个圣体出游的场面。他看到宪警的骑兵们在前面开道；之后是身穿红色服装的市里的鼓手和大教堂十字架罩及其周围的杂乱无章的各教区教堂的十字架，大教堂的十字架罩非常大，非常重，上面有一个饰满各种绣像的圆球。再后面，整个街中心没有人，两侧有两排手持大蜡烛的教士和军人；助祭提着香炉，身边有拿着亚洲香料船形香炉的洛可可式^①的天使协助，还有穿着昂贵的传统法袍的受俸神甫。走在圣体车后面的是政府要员，士官生营断后，他们手持步枪，露着的光秃的脑袋随着进行曲的节拍摇晃着。

加夫列尔痛快地呼吸着大街上的空气。他见过欧洲的各大都市，在他长期被关闭在大教堂之后，这时他非常赞赏这个古老城市的街道。他觉得那些大都市人口稠密，甚至感到现代化的喧闹对那些习惯于安定生活的人所产生的头晕目眩。

各个阳台上都挂出古老的壁毯和中国绣花丝披巾；街道上支起了凉篷，路面上铺着一层沙子，为了使圣体车能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上滑行。

上坡时，圣体车艰难地向上爬行着。藏在车里的人都大

^① 指十八世纪法国盛行的一种浮华的艺术风格。

汗淋漓，喘着粗气。加夫列尔咳嗽着，关在这活动的地牢中，脊背疼痛，庄严的圣体出游在财务主管神甫的命令指挥下走走停停。他身穿红袍，手执权杖，指挥着出游仪式，他常常因为游行混乱的行动指责圣体车的舵手和推车人。

除这些痛苦之外，加夫列尔为他这次不寻常游遍全城而感到满足。当他想到，那些虔诚地跪着的人们，如果他们认出那个从圣体车下露出一对眼睛的人，可能说些什么，他便欣慰地微笑。那些穿白色裤子、系戴红色胸巾、腰佩利剑、大腿上插着两角帽的军官在护卫着上帝。肯定他们得到他还活着的消息，可能其中某个军官听到别人谈起过他，或许把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敌人在自己脑子里记住了他的名字。一个被罚入狱的人，一个被众人唾弃的人，一个像冒着危险在教堂拱顶筑巢的鸟一样藏身在大教堂某个角落里的人，竟然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城市中引导上帝出游！

过了晌午，圣体车回到了大主教教堂。加夫列尔从“圆面包门”边走过时，看到外墙上挂满了有名的壁毯。唱完告别曲后，教士们迅速地脱下法衣，没有说一声道别，乱哄哄地夺门而走。午饭比平时要晚一些，那个不寻常的日子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规律。在整个上午都是那样人声嘈杂，灯火通明的教堂，一时间变得空无一人，陷入了一片沉寂和黑暗。

埃斯特万看到加夫列尔从圣体车出来时很是生气。

“你想找死呀！这不是你干的活。你怎么那样任性呀？”

加夫列尔微微一笑。是的；是他任性，但他不为此感到后悔。他遍游了全城而未被别人看见，他的哥哥有钱可以维持两天日子。他想工作，不想成为一个累赘。

“木权杖”动情了。

“可是，傻瓜，我跟你要什么了吗？我只需要你安静地生活和身体好起来，别的我还需要什么？”

“木权杖”似乎想以另一种让他弟弟高兴的牺牲来回报加夫列尔所付出的牺牲，他在回到丁子香园时没有满脸怒容，而且吃午饭时还和他女儿讲话。

下午，上回廊几乎空无一人。当堂安托林得知有许多外来游客在等待他，便兴冲冲地带着门票本赶紧下去。塔托和钟楼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偷偷地顺着钟楼的楼梯溜走了。他们要去看斗牛。为庆祝节日被迫停止工作的萨格拉里奥已经到鞋匠家去了。当鞋匠正在向女仆们、军校的士兵及乡下佬展示那些巨人模型时，萨格拉里奥在帮鞋匠的老婆，那个被贫困和众多子女压得喘不过气的可怜的女人缝补衣服。

当乐师和“木权杖”下楼到唱诗堂去的时候，加夫列尔走出家门来到回廊。他只看到一个士官生手扶刀把，在回廊里散步，他几乎是横挎着刀，如同摩尔人统治西班牙时期的直剑一样。从他所穿的肥大的裤子和他的马蜂腰，加夫列尔认出他就是塔托断定的那个使用束腰的士官生。他就是那个小胡安，红衣主教的侄子。他经常在回廊散步，等待机会和圣母殿司事漂亮的女儿莱奥卡迪娅说说话。对她父亲，他一点都不害怕，但这位未来的战士有点敬畏她的外祖母托玛莎，她看不上这样的关系，并威胁说，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红衣主教叔父。

加夫列尔曾经和士官生多次谈过。每当这个年轻人在回廊碰到他的时候，总会走近他，没话找话谈谈，以这种聊天证明他是有事才来丁子香园的。但加夫列尔在圣体节下午看

到他在那里，感到奇怪。

“您不去看斗牛？”加夫列尔问他，“军校所有的士官生可能都去斗牛场了。”

小胡安微笑着摸摸胡子。这是他喜欢的动作。然后他得意地抬起饰有军士长军衔肩章的袖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官生，而是一名优等生，虽然对于梦想得到将军衔的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但这毕竟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他没有去看斗牛，尽管他是一个真正的斗牛爱好者，但是，为了整个下午能在丁子香园的一片寂静中，站在女友家门口和她聊天，他甘愿作出牺牲。她外祖母下到花园里去了，蓝衣圣母殿司事不久也会出来，以便给他自由活动的余地，又仿佛司事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个美好的下午，加夫列尔朋友！他比那些每个星期天都泡在咖啡馆或像傻瓜一样在大街上散步的新入校的士官生有更加严肃和重要的事情。在阿尔卡萨尔城堡中，没有人不羡慕他的未婚妻，连教官们也羡慕。

“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加夫列尔高兴地问。

优等生带着大人物的表情回答。婚礼前有许多事情要做：说服他的叔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继续跟随他的好运，一直达到一定的高度。对于重大的事情，他秘而不宣。这是不几年内的事。

“加夫列尔朋友，我是块年轻将军的料。这是家族的荫庇。我叔叔说，当他还是个侍童的时候，他就确信能成为红衣主教，而他如愿以偿了。我会晋升得非常快。另外，您也知道，托莱多的一个大主教不是等闲之辈，我叔叔在王宫里有熟人，他能像一个将军一样在国防部发号施令。与其说他是神职人员，不如说是军人！作为明证，这里有一份他写的

东西：对圣母的祈祷词，是为士兵们进入阵地前诵念用的。”

“小胡安，您真的热爱军旅生涯吗？”

“非常热爱。从我识字和会看书起，我就想成为我在小人书上看到的名将一样的人，他们骑着高头大马，手持利剑，帅气英俊。请您相信，没有天赋热情，谁也不会从军。在神学院里，关闭着许多违背自己意愿的人，但是，没有任何人是强迫去当军人的：进入军校的人，是因为他有发自内心的愿望。”

“所有的人都和您一样确信自己会成功？”

“噢！全都是。”红衣主教的侄子微笑着说，“只是大多数人并不是都有同样的创业机遇。但是在我们这些士官生中，没有一个人甘愿一辈子在后备团苟且当个上尉，或者到老死最多晋升为少校。我们大家首先重视一个人由于军服、冒险事业（您知道，女人们都渴望我们这样做），和快乐的生活而增光添彩的青春年华，在任何场合下，都受人敬爱，比平民百姓高出一等；然后，当一个人年老了，发胖了，开始秃顶了，带上将军的绶带、搞政治，谁知道会不会坐上国防部长的位子！这是所有人的想法。没有人不相信，将来会有一条高官的绶带在等待着他，他只需把它摘下来系在腰上。我明确地知道它在等着我。其他人在幻想得到它……我们就是这样活着。”

加夫列尔微笑着听士官生述说。

“你们和那些神学院可怜的学生一样，都是受骗上当的人，相信在学院门外等着他们的是主教法冠和优厚的俸禄。这是在曾经辉煌过的东西消失后，至今还在产生的诱惑力。咱们来看看……除了前程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外，你们为什么

要当军人？……”

“为了荣耀！”士官生用军校校长演说中的话响亮地回答说，“为了祖国，我们肩负着保卫祖国的使命！为了我们国旗的荣耀！”

“荣耀！”加夫列尔讥讽地说，“这我懂得。多少回我看到你们是如此年轻，如此不成熟，如此满怀空想，在我的心中会重新泛起一种可称之为士官生的心态。我能猜出你们进军校前在想些什么，我能预见到你们走出校门时在等待你们的痛苦欲绝的失望。战争故事和艺术作品描写的军人的威武曾诱惑你们童年的心灵。然后是爱不释手的十分诗意的战争读物；拿破仑·波拿巴高举着他的旗帜在枪林弹雨中冲过意大利阿科莱桥，同上帝一样伟大；另外还有我们的家喻户晓的将军：征战卢恰纳的埃斯帕特罗^①，征战非洲的奥东内尔^②，还有超过所有这些人的普里姆^③，这个近乎传奇式的军事首领挥舞着大刀，指挥各卡斯蒂列霍斯营的军队。‘我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孩子们说，‘他能做到的事，别人也能做到。’一时的激情当成了命中注定，每个人都认为上帝造就自己就为了做著名的军事首领。生活在托莱多的人，都

① 埃斯帕特罗（Espantero, 1792—1879），西班牙维多利亚公爵和贝尔加拉的郡王。在当修道院学生时拿起武器反抗法国入侵，后又跨海征战美洲。

② 奥东内尔（O'Donnell, 1809—1863），西班牙的卢塞纳伯爵和得土安公爵。1859年指挥非洲战争，赢得了得土安公爵的称号。

③ 普里姆（Prim, 1814—1870），西班牙将军，雷乌斯伯爵，卡斯蒂列霍斯侯爵，在摩洛哥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表现突出。

会幻想着荣耀，冒险创业，进行重大战役和赢得轰动一时的胜利。但是，当他扛着两个星的肩章来到团部时，在卫兵向他敬礼之前，在军营门口迎接他的首先是丑陋和令人讨厌的现实。梦想在三十岁前能荣誉加身，成为著名军事首领的人，一心只想着战略上的协同配合和独特的防御工事的人，却不得不去管那些来自农村身体健壮有余的、粗野的青年人的清洁卫生和军风纪律问题，检查饭食，说说内裤衬衫，估计皮靴和凉鞋能使用多久等等。一个在家里从未进过厨房，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认为除了向士兵发号施令、列队操练之外，其他都是妇女们的活计的人，参军后首先面临的是要做炊事员、裁缝和鞋匠等，由于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必要的熟练技能，要经常忍受长官的训斥。”

“确实是如此。”小胡安笑着说，“但是，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军队，而军队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不讨论军队是否必不可少。我只是想说，你们（如果不包括您，因为您是顺利地进校的，是说您的同学）是一些受骗上当的人，他们在努力奋进，却不知道自己在受骗，不知道生活中的失败，他们会和另外一些更穷，更没有毅力的青年一样，会走进教会这条路。教会已经完了，因为已经没有了信仰；军人的荣耀在西班牙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现在没有征服他国的战争，很幸运我们骁勇战斗的强国特性在几百年前就消失了。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战争的话，那就是内战或殖民地的战争，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没有光辉、没有好处的愚蠢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人们就像在特尔莫皮拉或奥斯特利茨死掉一样，因为只有一回就丢掉了性命，但是他们既不会因此扬名，也不会获得公众敬仰而得到安

慰，更没有你们所说的荣誉的桂冠。你们出生得太晚了。昔日的光辉以及其海市蜃楼的幻景吸引着你们，但是你们应召太迟了。你们是一个必须过和平生活的民族的战士，正如那些神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创造不出奇迹，没有信仰而只有思想上的循规蹈矩和惰性的国家的未来的教士神甫。”

“但是，即使我们不必发动海外战争，即使征服战已告结束，我们至少还可以去保卫西班牙国土的完整，保卫家园。难道您认为，”士官生生气地补充说，“我们不会为祖国捐躯吗？”

“我不怀疑这一点，这是我们西班牙人为之效力的地方：英勇地死去，但终究是死去。两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历史只包含着壮丽的牺牲。‘某地的光荣失败’，‘另一个地方的壮烈惨败’。我们从陆上和海上都造成了让世界惊愕的事件，我们闭着眼睛把自己抛入危险之中，我们却以中国人的克制，毫不回避地伸出我们的头颅。但是，那些民族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们蔑视死亡，而在于他们保持生命的能力。波兰人曾使土耳其人害怕，而且是欧洲最好的士兵，而波兰早已不存在……假如一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可能会侵犯我们，（请您注意，我说的是‘可能会’，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想要和可能不是一回事），在这里我就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西班牙人不怕死，但请您相信，入侵者只需用两个野战营就足以摧毁我们所有的战争手段。这一切会在两天内被毁掉，会给我国造成多大的牺牲呀！……”

“那么，”士官生讥讽地说，“就应该取消军队，使国家陷入不设防的境地。”

“眼下还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要欧洲是一个武装起来

的欧洲，甚至最小的国家都有一支军队，西班牙也会有他的军队。并不会由西班牙做出榜样，而且这种榜样也毫无用处。这如同一个只有几千比塞塔的人，为了补救社会不公正，他作牺牲，献出这些钱一样。”

由于士官生面露讥讽甚至是挑衅性的表情，加夫列尔沉默好久之后，温柔地说：“无疑我的话刺痛了您。请您相信，我很抱歉，因为我并不喜欢伤害任何人的信仰，尤其是那些构成我们生活的理想的信仰。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您对社会问题毫不在乎，不是吗？您不了解社会问题，而且丝毫不关心。您所有的军校同学也一样。但是，造成你们在名望、热爱祖国和国旗问题上痛苦的唯一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上普遍的社会混乱。财富就是一切；资本是世界的主人。科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接班人在指导人类，但是，富人占有了科学发现发明并把它们垄断起来，以使他们的专制暴政永存。在经济领域中，他们成了机器和其他进步的主人，把机器和进步用作奴役工人的锁链，迫使工人超限度地生产，而把工人的工资严格限制在最低的必要水平。在国家生活中也是如此。今天，战争只是一种科学的应用。最富有的民族掌握了杀伤手段的最重大成果，他们有成群装甲舰，数以千计的巨型大炮，他们养得起几百万武装起来的人，并配备一切现代化先进装备，而所有这些并不破坏他们的财富繁荣。贫穷的民族别无选择，只有沉默或者无用地表示义愤，正如被剥夺财产继承权的人面对非法占有财产者。世界上最怯懦或最安分的民族，只要有了钱，也能成为不可战胜的斗士或光荣的征服者。火药的发明使骑士的勇敢告终。随着工业主义的出现，种族的残暴也寿终正寝。即使熙德复活，他也会被关进监

狱，或者去拦路抢劫，因为他无法调和当代生活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即使‘大统领’是现在的国防部长，我们看他如何将如何运筹帷幄，以他的使国家枯竭的军事预算，以他的军团重新在意大利进行一场战役。是金钱，是可恨的金钱！扼杀了士兵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个人的勇气、主动精神和独创性；它使工人一无所有，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士官生专注地听加夫列尔述说，第一次明白了，在军事大国中，除了君主的尚武和军队的价值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他突然间看清了财富是一切战争机器的基础和手段。

“那么，”他沉思地说，“如果外国人不再进攻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怕我们……”

“不是，这些万能的强国之所以让我们平静地生活，是因为有它们的野心和追求，保持某种平衡。正如那些大资本家，由于他们忙于宏伟的理念和开发，有意无意或因不屑一顾而允许在他们周围存在一些不起眼的工业。您以为瑞士、比利时和另一些小国能平静地居于大国之间，是因为它们有军队吗？它们即使没有一兵一卒，也照样会生存。西班牙尽管有军事力量，也不过是欧洲小国中的一员。经济贫困和人口少迫使我们低声下气。当今有两类军队：为征服别人而组建的军队和仅仅用来维护国内秩序的军队，后者只不过是一支拥有火炮和将军的人数多一些的宪警部队。西班牙的军队无论如何增加军费和增员，都超不出第二类的范畴。”

“就算我们是这类军队，”士官生说，“它不是军队吗？我们在维护国内秩序，在维护祖国的安宁。”

“可是，用更少的人力和财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荣耀呢？你们这些充满幻想、骁勇好战和满怀创新精神的青

年人，会甘心从事这种守卫和关心人民的职业吗？你们的前途和大教堂的神职人员的前途一样的单调。天天做同样的事情：教士兵做这样或那样的动作，在咖啡厅玩多米诺骨牌或打台球，穿着军服去追求女人或在军旗室的椅子上打个盹。你们所能遇到的非常事件不外乎是，一次反对消费品税的骚乱，一次罢工或一次抗议税收的罢市，这时你们便会向手握石块和棍棒的人群开火。如果在您的生涯中有机会下达射击令的话，请您相信，那是在对付西班牙人。各国政府并不想要军队，它们知道，对于国家的对外防御，军队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的财力维持不起，只需要一个这样的雏形机构就够了：它存在于混乱之中，不断受到自相矛盾的改革的震荡，照搬外国的新成就，如同一个家境贫寒的女孩子效仿贵夫人的华丽装饰。请您相信，对那种卑微、单调的生活，毫无愉快惬意可言，唯一的荣耀就是枪杀抗议的工人和激愤的人民。”

“可是，那自由呢？政治进步呢？”士官生问道，“我听军校的一个老上尉说，西班牙之所以有自由制度，是由于有军队。”

“远不止这些。”加夫列尔说，“毫无疑问，这是军队对西班牙最重要的效力。假如没有军队，谁知道内战会把这个对改革是那样停滞不前和畏怯的国家带到何处去……我再说一遍：我不否认这种贡献；但请您相信，自由和政治专制制度之间的内战不会重演，就像不可能再次成功地产生争取独立的游击队一样。通信工具和军事的进步已经扼杀了山地战争。当今时兴的毛瑟枪后面需要一个装备良好的仓库，要有弹药库，而这些都是和小股部队的战争相悖的。”

“但是您大概会承认，我们总是有点用处，我们对国家在做出很好的贡献。”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如果你们人再少一点，我会进一步承认得更多，你们耗费着大部分预算，然而你们却生活在一种体面和隐蔽的贫困中，但终究是贫困。一个中尉的收入比某些工人的收入还少，而他必须穿着笔挺的军装，显得干净利落，当需要消遣时，还要进出富人去的场所。他面对的只是多年的企盼，带着尊严承受隐蔽的贫困，直到一次晋升会给他每月多发几个杜罗。你们痛苦地过着佩剑的无产者的生活，劳动者又为眼看你们的无所作为而抱怨，他们忘记了其他不必要的费用却专盯着军人。请您相信我：对于现代化军队而言，你们人数太少，组织不善；作为国内的警卫部队，你们人数大大多余，费用很高。这不是你们的过错。错在你们作为军人生不逢时，因为西班牙已经无力，幸好是这样，从事冒险事业了。如果西班牙要复兴，它必须走向不是动刀舞剑的方向。因此我说，那些在他们认为其前辈已找到了荣耀的地方寻找荣耀的青年人走错了路。”

“银权杖”的出现打断他们的谈话。他挥动着他的一串钥匙，气喘吁吁地、由于激动而面色苍白地跑过来。

“主教阁下要来了。”他急匆匆地说，“他已到了拱形门。下午他想在花园里度过。真是心血来潮！……今天大家都在说，他又痛得受不了了。”

他跑着去打开连通丁香园和下回廊的特诺里奥楼梯。

对叔父的意外到来，士官生感到惊慌失措。他不想让叔父看到他在这里，他害怕红衣主教的脾气，就向通往钟楼的

楼梯逃去。他向楼梯的座盘走去，牺牲了与女友见面的机会，也不愿意碰见堂塞瓦斯蒂安。

加夫列尔只剩独自一人呆在回廊里，把身子贴近一根小柱子，从远处等候可怕的枢机主教走过。他看到红衣主教从通向巨人模型厅的门里走出来，两个侍从跟随其后。加夫列尔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察他。他身材高大，尽管年老了，但身板挺直。在红色滚边的黑色法袍上，挂着一枚金十字架。他面带威武地拄着一根权杖，帽子上的金穗垂落在肥胖的后脑勺上，脸上肤色紫红，盖着一头白发。他那小而深邃的眼睛四处张望，希望找到一点毛病，一点违背成规的毛病，以便他可以大喊大叫发威，排遣他的坏心情和集中在他紧锁的眉宇间的愤怒。

红衣主教从特诺里奥楼梯处消失了，为他引路的堂安托林在打开栅栏后，吓得浑身颤抖着等待他的命令。丁子香园的寂静和孤独没有改变，似乎人们都躲在家里，一动不动地待着，猜测着正在发生的危险。

加夫列尔探身到栏杆外，看见红衣主教进到下回廊，走过两个游廊，一直到花园门口。大主教稍微使一个眼色，便让两个侍从停了下来，而他独自一人沿着花园的中央甬道向凉亭走去。托玛莎手里拿着长筒袜，正在凉亭两堵树墙间打盹。

老太太给脚步声惊醒了。当她看到红衣主教时，不禁惊叫起来：“堂塞巴瓦斯蒂安！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想来看看你。”红衣主教一边慈祥地微笑着，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不能总是你去找我。我欠你好多次回访，所以我就来了。”

他把一只手伸进法袍里，掏出一只金烟盒，点了一支烟。他像一个习惯于时时刻刻以严厉的脸色让人尊敬的人一时间得到了自由一样，惬意地伸开双腿。

“可是，您不是病了吗？”女花匠问道，“我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到宫里去向堂娜维西塔打听您的健康状况。”

“别说了，傻瓜；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像现在这样好，特别是从今天早上起。为了不接触他们，我不出席唱诗班给了那些人一记耳光，这使我的心情特别舒畅。为了更表明我的意图，我就来这儿看你。我想要他们知道我身体很好，关于我得病的传闻是不确实的。我要让托莱多人都知道，大主教不想见他的受俸神甫，他这样做是出于尊严，而不是出于傲慢，因为与此同时他下来看他的老朋友女花匠。”

当这个可怕的大人物想到他此次拜访可能让教士会的人不高兴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地笑了起来。

“托玛莎，你不要以为，”红衣主教继续说，“这次我只是顺便来看你的，今天下午我在宫里很忧伤，很烦闷。维西塔忙于招待马德里的女友们，于是我感到那种每当回忆往事时便会出现的不适。我感到需要来看看你。另外我想，大教堂的花园总是凉爽的。花园外，热得像火炉一样。啊，托玛莎，我看你多结实呀！你是那样瘦瘦的，很机敏，你比我保养得好！你不像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一样浑身都是脂肪，你也没有使你夜不成眠的病痛。你的头发还几乎全是黑的，你的牙齿一颗不缺；你不需要像我这个红衣主教一样装一口假牙……可是，托玛莎，无论如何，你我都老了。尽管主想留住我们，但我们余年不多了。谁也回不到过去的时代了，那时，我穿着红色法衣上楼去找你那任教堂司事的父亲，抢走

你的午餐！是吧，托玛莎？”

两位老人，忘记了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同，怀着走向坟墓的人那种无可奈何的友好情意回忆着往事。一切都和他们童年时代一样：花园、回廊，大教堂也没有变化。

主教大人闭着眼睛，以为自己还是半个世纪前顽皮的侍童。他吐出的蓝色烟圈，仿佛把他的思绪带回到往事无穷的旋涡中。

“你还记得你可怜的父亲怎么嘲笑我吗？‘这个毛孩子’他在圣器室里说，‘活像西克斯图斯五世^①’。‘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问我。而我总是同一个回答：‘托莱多的大主教。’这位好心的司事很少嘲笑我表示我抱负时的坚定信心！托玛莎，请你相信，当任命我为主教的时候，我非常想念他，为他已去世深感遗憾。要是他看到我头戴主教法冠，我看见他流出高兴的眼泪，我会多愉快……我一向爱你们，你们是一个出色的家庭，多少回你们使我免于挨饿。”

“别说了，大人；别说了，别提那些事了。该是我感激您，尽管您的职位那么高，仅仅在教皇之下，可是，您是那么好，那么平易近人……说真的，”老太太为她的坦诚而感到自豪地说，“您这样为人，丝毫没有损失。像我这样的女友，您一个也不会再有了。围着您转的只有阿谀奉承者和无赖，世上所有大人物周围都是如此。假如您只落得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士，谁都不会正眼看您，但托玛莎还继续是您的朋

① 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o Quinto, 1520—1590），意大利籍教皇（1585—1590），整顿教廷中央行政机构，进行反宗教改革运动，积极干预法国的宗教问题。

友，永远为您效劳。我之所以这样喜欢您，是因为您是一个纯朴和善良的人。假如您像其他大主教那样妄自尊大，我就吻一下您的戒指，再见了。红衣主教待在他的宫里，而女花匠就待在她的花园。”

大主教用微笑来表示他对这个善良女人的强烈的坦诚的赞许。

“在我的心目中，您永远是堂塞瓦斯蒂安。”女花匠继续说，“当您对我说不要用阁下称呼您，不要像众人对您那样对待您，这比您送我一块萨格拉里奥圣母的披巾还要令我感激您。我就不喜欢那么多称呼礼遇，我真想大声喊出来‘什么阁下、最尊敬的大人都见鬼去吧，我们从小为了争食不知厮打多少回，因为这个大个子小偷只要看见我手中有块硬面包和杏子，他没有不想一口吞掉的！’谢谢您，从您得到大教堂俸禄起，我一直用‘您’称呼您，因为对一位神甫，像对一个侍童那样以你相称就不好了。”

两个老人陷入了沉寂。他们用温柔的目光环视花园，仿佛从每一棵树上或每一个被枝叶覆盖的连拱上他们都能找到一段回忆。

“您知道我现在想起什么了吗？”托玛莎说，“我又想起了不几年前，至少是四十年或者五十年前我们就在这里，就在这个花园里，见面的情景。我和我可怜的姐姐在一起，她刚刚和花匠卢纳结婚。在回廊里，那个后来成了我丈夫的人围着我转。我看到一个英俊的年轻士兵，一个军士长走进凉亭，他走过时靴上的马刺发出重重的撞击声，手持弯刀，头戴一个像看守纪念碑的犹太人戴的有羽饰的头盔。那个人就是您，堂塞瓦斯蒂安。您来托莱多是为了看望您的受俸教士

叔父，而不见到您的女友托玛莎，您不想离开这里。您多么帅气呀！这是真的；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讨好您。在女孩子眼里，您有点滑头滑脑！我甚至记得您对我说什么，几年不见，您觉得我真漂亮又水灵。我这些回忆不会使您不高兴，是吗？那是士兵对女人说的恭维话。当时我就是这么说的！您走后，我姐夫说：‘这孩子永远不会穿法衣，他的受俸神甫叔叔想让他成为一个神职人员那是白搭。’”

“那是年轻人的狂热行为。”红衣主教回忆起那个傲慢的龙骑兵军士长时，微笑着说，“在西班牙，男人只有三个体面的职业：从军、进教会和入法学界。那时我热血沸腾，想当一名士兵，但是，我不幸地碰上了和平年代。我的军旅生涯将是漫长的，为了不使我的叔父在晚年感到难过，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转入教会重头学起。在这个或那个岗位都能为上帝和祖国效劳。但请你相信，我虽然身为红衣主教，但经常怀着羡慕的心情回想起那个你曾经看到的军人。那是多么幸福的岁月啊！军人手中的利剑仍吸引着我。当我看到士官生时，我甘愿把我的牧杖和十字架交给他们，和他们中的任何人交换。也许我会比他们每个人干得都更出色！啊，如果光复战争的年代又回来了，神职人员都去杀摩尔人，那么，我可以成为一个何等伟大的托莱多大主教呀！……”

堂塞瓦斯蒂安挺起他那年老肥胖的身躯，怀着他最后一点活力的傲慢表情，伸展开他的臂膀。

“您一直具有男子汉的气概。”女花匠说道，“我多少回对那几个对您说三道四的小教士说：‘你们不要和主教大人玩把戏，说不定哪一天他会来到唱诗班，一边说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一个一个把你们全都打出去。’”

“我曾经不只一次想这样做。”大主教坚决地说，两眼闪射出坚毅的目光，“但是，考虑到我的职位和我的神甫的和平特性，我制止了我自己。我是天主羊群的牧人，而不是以其凶狠恐吓羔羊的狼。可是，有时一个人可能忍无可忍，愿上帝饶恕我！我真想举起法杖打那些栖身在大教堂的背叛的羊羔。”

大主教说到他与教士委员会的斗争时，十分激动。想起他那些怀有敌意的下属，花园的宁静给他带来的恬静的心情消失了。一如既往，他需要向女花匠诉说自己的苦衷，而且是怀着那种驱使大人物同平民百姓推心置腹交谈的本能的仁慈和蔼的态度。

“托玛莎，你不知道这些人让我忍受的痛苦。我想管治他们，因为我是主人，因为依照纪律，他们应该服从我，而没有纪律，也就不会有教会和宗教，众人就会抵制我，不服从我。我的命令是勉勉强强执行的，当我想让人服从我，但是连最低级的教士都会以他那所谓的权利激烈反对我，如有必要，还要上诉梵蒂冈法庭和罗马教廷。咱们来看：我是主人，还不是主人？难道牧人要和他的羊群商讨，并向它们请教来指引羊群走正道？……跟他们的诉讼案件和问题使我头昏脑胀。在他们当中连半个真正的男子汉都没有，全是散播流言飞语和胆小怕事的人。当着我的面，他们眼睛看着地，面带微笑，赞扬他们的大主教，等我刚转过身，他们就变成了企图吞噬我的毒蛇，口似蛇蝎，无中生有地恶毒攻击人。唉，托玛莎！我的孩子！可怜可怜我吧！我相信，每当我想到这些，我就会病得很厉害。”

大主教带着痛苦的表情站起来，面色苍白，好像他的内

脏不断给针扎一样地翻腾。

“您不要往心里去。”女花匠说，“您在他们众人之上；您会战胜他们的。”

“我当然会战胜他们，这绝对错不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屈居下风。这些老娘们的计谋对我倒没什么，我知道，最终我将会看到那些可恨的敌人跪在我的脚下。可是，托玛莎，可恨他们的嘴！他们对那些在这世上我最爱的人说东道西！这使我痛心，能要我的命。”

他又坐下来，并移近女花匠，以便和她悄悄地说话：“你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过去。我把我的过去都告诉你，因为你让我很信任你。另外，你很精明，不知道的事情，你都能猜出来。你知道维西塔在我心中的地位，无疑你不会不知道那些卑鄙的家伙对她说了些什么。你别装傻，你知道，大教堂内所有的人甚至外面的人都听到过那些污蔑诽谤，并信以为真。你是唯一一个可能不相信这些污蔑诽谤的人，因为你了解实情……但是，唉！实情我又不能说出，我不能公开宣告：我这身法衣不允许我这样做……”

他用起皱纹的手一把抓住法衣，仿佛要把它扯破。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堂塞瓦斯蒂安凶狠的眼光看着地面，攥紧双手，似乎要抓住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他一阵一阵地感到病痛的折磨，并痛苦地叹息着。

“您为什么去想那些事呢？”女花匠说，“您的身体不适，为了这点事，您不必费神下来看我。您最好还是留在您的宫里。”

“不；你可以使我散散心，因为我向你倾诉了我的苦衷，我能得到一些安慰。在上面，我只是一个人恼火，我得做出

巨大努力才能吞下满腔的愤怒。我不想让我的侍从们知道，因为那样他们会很开心；我不想让我那可怜的维西塔知道任何事情……而我又不会掩饰！我生气时，我不会强装快乐！……我遭受了多大的痛苦呀！不能说我是个男子汉，我是个弱者，我是血肉之躯，我自己背着我所犯错误的后果，尽管诽谤对我紧追不放，我也不愿意离开他们！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性格行事，尽管我犯有罪孽，我希望我是个好人。我可以如同另外一些人为保留他们圣人的名声所做的那样离开我的子女，抛弃他们；可是，我是个男子汉，我为此感到自傲：我是一个既有缺点又有优点的人，我不比大多数多一个缺点，和少一个优点。父子亲情在我的心中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宁愿丢掉法冠，也不愿抛弃我的子女。你应该记得，小胡安的父亲死的时候，我成了什么样子，小胡安后来成了我的侄子。当时我以为我死了。他是一个那么英俊，有那样光辉前程的人！我可以让他当法官、高级法院院长、部长等等！但是在二十四小时内他就离我而去，似乎老天要惩罚我。的确，我还有侄子，可是，这个小胡安一点儿也不像他父亲，我坦白地对你说，我不太喜欢他；在他身上我只不过隐隐约约看到我亲儿子的影子。我的过去，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代，只给我留下了维西塔，和故世的她长得一模一样，我热爱她！这帮无赖用他们污蔑诽谤来破坏我这可怜的一点点幸福……我恨不得宰了他们！”

在对任主教头几年美好回忆中，在安达卢西亚一个主教区，春暖花开时光，他又一次向托玛莎讲述他和某位虔诚的千金小姐的关系。那位千金自幼对世界感到恐惧。对天主的虔信把他们俩连结到一起，但是，不久生活本身复活了他们

的良知，为他们近似神秘的关系开辟了道路，以至于达到了肉体的结合。他们在教会生活的神秘剧中彼此忠贞不渝，谨小慎微地相爱着，而这种关系的秘密，直到她死时，给他留下两个孩子，也没有向外泄露。堂塞瓦斯蒂安，一个充满强烈激情的男人，怀有热切的父权意识。两个孩子酷似死去的可怜的她，那是对完全献身于事业的生活的唯一的田园诗般的纪念。敌人基于他女儿在大主教宫里的存在所散布的污蔑诽谤简直使他要发疯。

“他们认为她是我的情人！”他以狂怒的语调说，“我那可怜的维西塔是那么善良，那么和蔼，对一切都温顺，但却被那些卑鄙的家伙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女人！说成是一个我从贵族女子学校领来供我消遣的情人！……似乎我，又老又有病的我，还在想那种肮脏的勾当。这帮下流货！……卑鄙的家伙！至少他们是在犯下许多罪行！……”

“让他们去说吧，上帝在上面，他在看着我们每个人。”

“这我知道，但这不足以让我平静。托玛莎，你也有子女，你知道爱他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反对他们的行为使我们伤心，而且攻击他们的言论也一样使我们伤心。……我受了多少日子的苦呀！你知道，我从小全部期望就是成为今天的我。我看着唱诗堂的宝座，并想着假如我能坐在那座位上享受枢机大主教的巨大幸福有多好！行了，我已经坐上了宝座。我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历程，披荆斩棘，受尽皮肉之苦。我知道我是如何能走出深渊，登上主教的位子的！然后……我成了大主教！我成了红衣主教！我不可能再更高升了！那又有什么呢？幸福总是像指引古以色列人的光云一样走在我们前面。我们看到了这片光云，甚至能摸到它，但它

不让人抓到。我感到同我过去为了有所成就而奋斗并自认为是最不幸的人的时代相比，我现在更不幸。现在我没有青春年华，在我目前所处的崇高地位，众目睽睽，我不能进行自卫。唉，托玛莎！可怜可怜我吧；我是值得同情的。身为父亲而不得不把它作为一种罪恶隐瞒起来！我越是临近死亡越是满怀亲情爱自己的女儿，可是不得不承受人们把如此纯洁的亲情看做丑恶的痛苦！……”

堂塞瓦斯蒂安那种吓倒整个教区的可怕的眼睛蒙上了泪水。

“此外，我还有其他痛苦。”他继续说，“但是，那是一个有预见的人害怕未来的痛苦。我死之后，我的一切都将归我的女儿所有，小胡安现在就拥有他母亲的财产，她很有钱，另外，他有他的学业前途和我的朋友们的帮助。维西塔将很富有。你知道，我的敌人用他们所说的贪婪来指责我。我不贪婪；作为有预见的人，我呵护我亲人的福利。我有许多积蓄；我不是那种在他的宫门前分发面包的人，我也不想以施舍扬名。在埃斯特雷马杜拉我有几个牧场，在拉曼恰有许多葡萄园，还有房屋，特别是公债券，许多的债券。作为一个正直的西班牙人，我愿意用我的钱来帮助政府，如果这些钱能够赢利，就更加乐意。我不确切知道我有多少，大概有两千万雷亚尔吧，也许更多。这一切都是我积攒起来的，通过正当商业活动增加的。我不能抱怨命运，主帮助了我。这一切都是给我可怜的维西塔的！能看到她嫁一个好人我会很高兴，可是她不愿意离开我。教会对她有吸引力，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托玛莎，你别为此感到奇怪；我，作为枢机主教，当我看到她那样的专致于我的信仰，我就担心害

怕，并竭力想把她引开。我喜欢信教的女人，但不喜欢只在教会中感到好的虔诚的女人。女人应该生活，应该享乐，应该做母亲。我从不喜欢那些修女。”

“大人，让她去吧。”女花匠说，“她喜欢教会毫不奇怪。依她的生活方式，她不可能有别的爱好。”

“眼下我什么都不怕。我就在她身边，我不在乎她和那些小修女们来往。可是，明天我会死去，你想，可怜的维西塔，腰缠万贯，孤身一人，又那么酷爱宗教生活，这是多好的一块肥肉呀！那些精明人会怎么样盘剥她呀！……我见识很广，我是上等人，我不事声张。现在不乏猎取遗产的宗教团，据它们说，那是为了给上帝增添荣耀。另外，这里还有那些戴着大帽子的外国修女，她们窥伺着劳动阶层的人。当我想到她们可能降临到我女儿头上时，我就惊恐不安。我信奉古式天主教，纯西班牙宗教精神的天主教，一种西班牙的天主教，如同有人所说的，是没有现代外国风味土生土长的面包。为了养肥耶稣会士和那些不会讲西班牙语修女而节衣缩食地生活，是可悲的。我不想让我的钱财遭到那些箴言宣讲司事们的钱财同样的命运。因此，在我和那帮无赖的敌人进行抗争的烦恼之外，又增添了我女儿脆弱的性格给我带来的痛苦。也许他们骗住了她，某个无赖在耻笑我。以宗教的名义攫取我的钱。……”

在他凄楚思绪的刺激下，他甩出了一句淫秽的地道的下流的咒骂，这是又回到了当兵的岁月。在女花匠面前，他没必要克制自己。老太太已经习惯了他脾气的发泄。

“咱们来看看。”在沉默了好一阵之后，他急切地说，“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我像我的敌人想象的那么坏吗？”

我活该让上帝惩罚我的错误？你有一颗上帝的心灵，淳朴又善良，你以你的直觉比所有的神学博士更明白这一点。”

“堂塞瓦斯蒂安，您是个坏人？天哪！您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分毫不差。也许比许多人要好，因为您朴实，一根肠子到底，既不欺骗人，又不虚伪。”

“一个人，这是你说的。我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我们这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的人，如同是教堂正墙上的圣徒，从下面看令人敬仰；近看，由于岁月的蚀损而形象难看，令人恐惧。不管我们想如何把自己神圣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对于我们周围的人来说，我们毕竟只是人而已，是有血有肉的人。在教会中，摆脱七情六欲的人极为罕见。又有谁知道，这少数得天独厚的人会不会受到虚荣浮华这魔鬼的侵扰，在他们生活中实行极端的禁欲主义的同时，会不会想到他们高居圣坛的光荣！……一个能做到控制肉欲的教士，会沦落为贪婪的人，这是教会内的通病。我从没有因这种通病而积蓄，我是为我的亲人而积蓄，从不为我个人。”

大主教沉默良久，可是，在他向这个纯朴的妇女倾吐心声的无法抑制的热望驱使下，他又接着说：“我相信，到我死的时候，上帝不会鄙弃我。他无量的仁慈会宽恕人生活中的一切卑微小事。什么是我的罪孽？我爱过一个女人，如同我父亲爱我母亲一样；生育了儿女，如同使徒和圣徒生育过儿女一样。那又怎么样？教会的独身是人们造出来的，是在主教和教士大会上通过的一则信条；但是，肉欲和人的需求比它要早许许多多世纪，可以追溯到夏娃、亚当的伊甸园，谁越过这道屏障并非由于恶习，而是由于不可抗拒的激情，是因为他不能战胜创建一个家庭和有妻室的感情冲动，毫无

疑问，这有违教规，但他不是不服从上帝……在死神临近的时候，我有一种恐惧感。在许多夜晚，我像孩子一样感到困惑、战栗。我以我的方式为上帝效了力。过去，我用利剑来捍卫他，同异教徒打仗；现在我是一个神甫，每当我看到无情的岁月在削弱上帝的荣耀，我为他战斗。主会宽恕我，把我拥抱在他的怀里。托玛莎，你那么善良，在你粗鲁的外表下，你有一颗天使般的心灵，难道你不相信是这样？……”

女花匠微微一笑，她的话语缓慢地穿越傍晚暮色沉沉中的寂静。

“堂塞瓦斯蒂安，您冷静一下。在这座教堂里我见到过许多圣徒，但他们都不如您。他们为了自己得救，抛弃了他们的子女。为了保持所谓的灵魂的纯洁，他们背弃了家庭。请您相信我：这里没有圣徒的位置，只有人，大家都是人。不必为自己跟着心灵的冲动走而后悔。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塑造了我们，他不无原因地赋予了我们家庭的情感。至于其他的，什么贞操呀，独身呀，以及别的等等琐事，都是你们为了自己突出于普通人所编造出来的。您要做一个普通人，堂塞瓦斯蒂安，您越是普通，您就越优秀，主就越会在天国欢迎您。”

第九章

圣体节之后不久，一天上午，堂安托林去找加夫列尔。他以保护人的神气微笑着对加夫列尔这么说。

他整夜都在想着他。他看到他无所事事，在回廊里踱步，他很痛心。没有工作才使他产生那些邪恶的念头。

“咱们来看看，”堂安托林补充道，“每天下午你和我一起去教堂展示珍宝室和其他珍贵文物，你觉得是否合适？有许多外国人来，他们向我提问时，简直让人听不懂。你懂他们的语言：据你哥哥讲，你会法语、英语，我也不知道你会多少种语言。大教堂由于能为外国人提供一个翻译可能会有许多收入；你帮了我们忙，而你不会损失任何东西。看到生人面孔也是一种消遣。至于补偿……”

堂安托林说到这儿停住了，用手挠挠四角帽下面的脑袋。也许他看到要从管理处的资金中拿出一点来。如果一开始不可能给，因为大教堂的岁入微薄，很紧，但以后会给的。他以焦灼的目光等待加夫列尔的回答。加夫列尔表示同意。他毕竟是大教堂的一个客人，他多少欠大教堂的情。从那天下午开始，在唱诗班唱诗时，他下到教堂向外国人展示

教堂的珍宝。

总有一些旅游者手持堂安托林的不同颜色的门票，等待欣赏贵重珍品。“银权杖”看到外国人，没有一个他不认为是勋爵或公爵，但又很多回对他们穿着不讲究感到奇怪。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大人物才能有外出旅游的闲情逸致，所以，当加夫列尔肯定地说，那些人中间许多人是伦敦的鞋匠或巴黎的店员，他们利用假期到摩尔人的古老国家旅游一次享受享受，这时他就睁大了惊讶和不信的双眼。

有五个身穿唱诗班白色法衣的受俸神甫从殿堂走过，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钥匙。他们是珍宝室的保管员。各人打开归他监守的门锁，吃力地转动大门。藏着古代珍品的小教堂敞开了。在像是博物馆里的巨大橱窗里，陈列着大教堂的古老财富：实心的银人像；顶端装饰着形状有趣的小人的大圆球，这全是用金银等贵金属制作的；精工制作的象牙的乐器用的弓子；金的大小圣体盒；镀金凸纹花饰大盘，绘有神话故事，这些故事情节在天主教堂那个污秽陈腐的角落里重又唤起非基督教的欢乐。圣母胸部、冠冕和披巾上的各种宝石五光十色。那些钻石之大都让人怀疑是真的，鹅卵石那么大的绿宝石，以及紫水晶、黄玉和珍珠，许许多多珍珠，成百上千颗珍珠像雪珠般缀在圣母的衣服上。外来人对这些珍宝感到惊讶，珍宝数量之多，使他们看得眼花缭乱。而加夫列尔已惯于天天都看到，因此他看这一切都显得冷漠。珍宝室呈现出一副令人惋惜的老朽的面貌。这些珍贵的财宝随着大教堂一起衰老了。钻石不再璀璨夺目，黄金制品似乎失去了光泽，蒙上了灰尘，银器变黑了，珍珠暗淡无光，死气沉沉。香炉里升起的缭绕香烟和大教堂陈腐的气氛给一切都涂

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

“教会使得它接触到的一切都在衰老。”加夫列尔自言自语说，“在教会的手中，珍宝在失去光泽，如同金银首饰宝贝落到高利贷者手中一样。钻石戴在吝啬的老妇胸前黯然无光，最美丽的画卷放在教堂的圣坛上也会失去光彩。”

看过珍宝室之后，接下来是八角楼展室，那是一个深色大理石建造的八角形祈祷室：圣徒遗骸万神殿，那里放在金、银的器皿中陈列着最令人恶心的人体骸骨，露出可怕笑容的骷髅，成了木乃伊的手臂，缺损的椎骨。在这放弃信仰的年代展示过去那种轻信而粗野的虔敬，显得是那樣的荒谬，以至如此苛求的堂安托林本人，在谈及他的大教堂的光荣时，如同站在了托莱多大主教面前，他压低了嗓门，一边指着圣女莱奥卡迪娅的披巾残片，匆匆介绍几句。他明白很难解释那些幽灵穿的是什麼面料的服装。

加夫列尔忠实地翻译“银权杖”的解说，好多时候他以深沉的讥讽的语气加以强调。与此同时，那些护卫参观者队伍的受俸神甫中有几个则漫不经心地走开些，以免别人提问。

有一天，一个冷漠的英国人打断翻译的话问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圣米格尔^①的翅膀的羽毛呢？”

“没有，先生；很遗憾。”加夫列尔严肃地答道，“但是，您在别的教堂可能会找到。我们这里不可能一应俱全。”

在阿拉伯和哥特式建筑交融的教士会大厅里，参观者欣赏两排头戴金色法冠和手持金色法杖的托莱多大主教的壁

^① 圣米格尔 (San Miguel)，大天使，其祭祀节日为9月29日。

画。加夫列尔提醒他们注意那位中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塞鲁布鲁诺^①，因为他有一颗大脑袋而得此名。但是，使外国游客最为惊讶的却是衣帽间。

那是一组巨大的旧木架和旧木柜。在那些木架和木柜顶上的墙壁上，有积满灰尘和破裂的巨幅画，那是教士会弃置在这个角落的安达卢西亚式的绘画复制品。在木架上排列摆放着家用的古老椅子：一些是简朴的西班牙式的直线条椅子，配有抽纱流苏的垫子；另一些是椅子腿弯曲的希腊式的椅子，上面镶嵌着象牙。在木架里按色调分类堆放着法衣，为了让人鉴赏精美的绣花工艺，把小披肩都露在外面，在不大的一块块面料上，众多的人物形象和十字褙，色彩鲜艳，栩栩如生。古代绣花工的令人惊叹的工艺，在丝绸上绣出了一幅幅生活景象的油画。在一条小披肩上或一件法袍的饰物上足以再现出《圣经·创世纪》或耶稣受难始末的全部故事。锦缎和丝绸更增添了绣织品的富丽多彩。一件法袍就是一个康乃馨怒放的花园；另一件则是一个由玫瑰花或曲折的丝线和金属花瓣组成的花坛。圣器司事从深深的架子中取出大祭坛闻名的前帷幕，似乎是取出布和木头制作的书卷，其中有各个节日专用的帷幕。圣胡安节的帷幕是一片欢乐、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氛，胖乎乎的小天使用他们的肉头头的小手抚摸着金羊和硕果累累的葡萄串。那些色调柔和暗淡的最古老帷幕展现的是波斯花园，一泓泓蓝色的清泉，几头浅红色的牲

① 西语塞雷布罗（cerebro）意为脑子、大脑；头脑，智慧。西班牙语中可运用语法手段使词意增大或增强。这里 cerebro 变为 cerubruno，即大脑袋。

畜在饮水。

当一块又一块帷幕展现在参观者面前，他们都惊叹不已。这是一个大教堂的全部历史。大教堂拥有千百万元的收入，为了美化自己，它用了许多刺绣工劳动大军，囊括了巴伦西亚和塞维利亚最精美的面料，用黄金和彩色重现《圣经》等圣书和殉难者的故事。这是教会光荣的传说故事，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用一针一线永久保存了下来。

加夫列尔在每天下午走遍大教堂之后，厌倦地回到上回廊。在最初的日子里，看看外国人的面孔，接触接触漫游欧洲的好奇的旅游大军的新鲜感对他有点吸引力。这是支如洪水般的旅游大军，其支流分流到了托莱多。但不久以后，他感到每天下午他见到的人都一模一样，提出的都是同样的老问题，都是一样的英国妇女，挺着腰板，冷酷的面孔，表示惊讶时都叫喊“噢，噢！”，既冷淡又老一套。当加夫列尔再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时候，他们都以缺少教养的傲慢转身就走。

加夫列尔每天展示教堂的珍宝后回到宁静的回廊，他发现丁子香园的贫穷更为令人反感和不可容忍。他觉得鞋匠更为面黄肌瘦，在他那破旧的屋子里，凄楚地弓着腰在小桌上敲击着鞋底；他的妻子病体更弱了，成了可怜的奴隶，她饿得弱不禁风，但还用她那干瘪的、只能流出血的奶头为她唯一的希望——小儿子喂奶。这小不点儿正在慢慢地死去，这是萨格拉里奥低声对她叔父说的。她常离开缝纫机，去鞋匠家度过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在她做家务活的时候，鞋匠的可怜的妻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小椅子上，抱着小不点儿坐在她膝上，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他。当孩子从昏睡中醒来时，他

吃力地抬起细如一根绳的脖子，昂起头，为了止住孩子微弱的呻吟，母亲把他拢在怀里；但是，孩子缩回他的嘴，因为他知道在那干瘪的奶头上下工夫是徒劳无益的，从那里只能吸吮出一滴可怜的奶水。

加夫列尔观察着小不点儿，注视着他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和枯黄皮肤上在扩展的奇怪的淋巴结的斑点。围聚在病人身边的女邻居们对孩子的病各有自己的说法，从她们的稀奇古怪的草药和臭药膏知识提出一些偏方，甚至有人在他胸部贴上灵验的神像，在肚脐上绘制七个十字架和同样数目的天主教经符，加夫列尔不敢轻信地摇摇头。

“是饿的，”加夫列尔对他侄女说，“就是饥饿。”

他从自己的饮食中省出一部分，把给他送来的牛奶拿到鞋匠家。可是，孩子的胃消受不了这种液体，对他虚弱的体质来说这种液体太稠，一喝下去，就吐出来。秉性刚强、敢作敢为的女花匠托玛莎大姨从教堂外找来一个女人，让她给病孩子喂奶。但是刚过两天，在还没有见效前，那女人就没有再来，似乎是厌恶那个死尸一般的贫血的小生命接近她的奶头。女花匠出去找也徒劳而回；找一个以低廉的代价慷慨为别人的孩子喂奶的女人是并不容易的。

孩子慢慢地在走向死亡。所有的女人都到鞋匠家里去。连堂安托林也每天早晨在鞋匠家门口探头看看。

“小不点怎么样？老样子？一切由上帝安排吧！”

说完之后他便离去了，他没有向鞋匠提到为给生病的儿子看病欠他的几个比塞塔，这就算对鞋匠很大的慈悲。

“蓝衣圣母殿”神甫为这意外事件生气，因为它打乱了回廊的宁静和他这个饱食终日的教会奴仆的食欲口福。那个

鞋匠带着一身清贫和一群贫弱可怜的孩子住在丁子香园，是一种耻辱。每个月他都会有一个孩子死去；他们会把自己的疾病传染给他。他们拿不到教堂财务管理处的一点薪金，有什么权利待在大教堂？这类臭恶的东西，应该被拒之于主的圣殿之外。

他的岳母生气了。

“住嘴，你这个圣徒的盗贼！”她说道，“你不住嘴我就会对你甩盘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假如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那么穷人就该住在大教堂。你最好别对那些不幸的人说这种事情，而送他们一些你从圣母那里偷来的东西。”

这个教堂司事鄙视地耸耸肩。既然他们没有饭吃，就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他也只有一个女儿。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利多要几个孩子，尽管如此，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圣母，为他晚年留有一口饭吃。

在唱诗班结束后，教士会的神甫们要在花园停留一会儿，托玛莎向这些善良的先生们讲述鞋匠孩子的事情。他们漫不经心地听着她讲，把手伸进法衣里。

“一切都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吧！太苦了！”

他们给她一些钱：有的给十分，有的给一个雷亚尔，还有人给一比塞塔的。有一天，女花匠来到大主教宫，但是，堂塞瓦斯蒂安病又发了，不想见她，让一个侍从给她送去两比塞塔。

“他们还不坏。”女花匠一边把募集的钱交给那位可怜的母亲，一边说，“但是，每个人只顾自己，而别人只能自己想办法。谁也不会把斗篷分给别人一半……拿着这些钱，你看看怎么走出这一步。”

鞋匠家吃得好一点。在回廊里瞎跑的这群患瘰病的孩子，倒因小不点儿的病而得益，但小不点儿却越来越差，整天一动不动地待在母亲的怀里，呼吸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当这个不幸的孩子死去时，住在回廊的人都聚集在鞋匠家里。从屋里传出母亲的哭泣声，那无休无止的尖厉的哭泣声，好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的嚎叫。在屋外，父亲无声地流着眼泪，朋友们围在他身旁。

“他像一只小鸟一样地死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话时时为啜泣所打断，“他母亲还在膝上抱着他……我在干活……‘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她喊着叫我：你看看孩子怎么了；嘴在抽动，做出一副怪相。’我走近去，见他的脸发黑，好像脸上盖了一层面纱。他张开了小嘴……做出两个怪相的表情，两眼浑浊，低头弯着脖子……跟一只小鸟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他一边哭着，一边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儿子多么像在冬天给冻死的小鸟那番话。

钟楼人阴郁地望着加夫列尔。

“你什么都知道，你说说，他真的是饿死的吗？”

塔托以他那无所顾忌的冲劲大声叫喊说：“世界上没有公正！这种状况必须收拾收拾！您瞧，在一个金钱如流水，那么多叔叔、伯伯穿金戴银的圣堂里，竟有一个小孩子饿死了！……”

当人们把死去的孩子送往墓地时，回廊似乎成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地方。回廊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到鞋匠家里。女人们围着孩子的母亲。绝望使那个体弱多病的女人变得疯狂。她已不再哭了；她儿子的死使她变得凶残。她想咬人，她想用

头撞墙。

“唉！……我的儿呀……！我的小安东尼奥啊！”

每天晚上，萨格拉里奥和另外几个女人留下来照顾她。在绝望中，她想追究谁应该对这不幸负责，她把注意力放在丁子香园职务最高的那些人身上。堂安托林没有帮助过她一分钱；他矫揉造作的侄女甚至没有进门来看过小不点。她只对男人感兴趣。

“‘银权杖’有责任。”可怜的女人叫喊道，“他是个强盗。他用他的高利贷骗人的诡计榨取我们的血汗钱。他没有给过我儿子一分钱……那个玛丽基塔是个婊子……是的，先生，我就这么说。她只想打扮自己好招惹那些士官生多看她几眼。”

“大嫂，他们会听见你的话的。”有几个女人带着恐惧在央告她。

但是，另外一些女人则反对这种担心恐惧。让堂安托林和他的侄女听去！那又会怎么样？在丁子香园，人们已经受够了那个大叔的贪婪和那个丑女人摆着阔太太的臭架子。她们尽管很穷，但不会在叔侄女两人面前战战兢兢过日子。天晓得他们叔侄女俩单独在他们家里会干些什么呢！……

一阵反抗的风掠过那个昏昏欲睡的世界。那是加夫列尔无意识的影响的结果。他对朋友们说的话传播给了丁子香园所有的男人，甚至传到了女人们的耳朵里。那只是一些很少人理解的模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如同清新洁净的空气拂煦着他们，振奋起他们的精神。它像一种外来的悦耳的回声萦绕在他们耳边。他们只需要知道的是，他们直到那时一直过着的那种平静、悲惨、顺从的生活并非

不可改变的；他们有权利得到更多的东西；面对强加于他们的不公正，他们应该进行反抗。

堂安托林十分了解由他看守的羊群，他不久便觉察到了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在他周围的人群中，他看出了仇视和反叛情绪。欠债人回他话时态度傲慢，拿出贫困作为不再承受他贪婪盘剥的权利；他的严厉的命令迟迟得不到执行。他清楚地感到，当他走过回廊时，人们都在背后嘲笑他，并向他作出威胁的姿势。有一天晚上，当他正要躺下睡觉时，打狗人因回教堂太晚被他斥责时，打狗人的回答却迫使他打开教堂的大门，那时，由于激动他的两条腿发抖了，两眼模糊了。塔托以傲慢不逊的表情告诉他说，他买了一把刀，他想在随便那个剥削穷人的神甫的肚子上试刀。

堂安托林的侄女也向他告状说，别人不理睬她，瞧不起她，再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白白帮她干活。她们傲慢地对她说，需要女仆的人，应该给女仆付钱。她叔父怎么想？是施加他的权威，把这帮无赖管制起来的时候了。

但是，在自己家里是那样神气活现、劲头十足的她，不得不或表面上气壮如牛，或哭着缩回家去，连家门都不敢出。丁子香园的所有妇女都想为自己过去的奴隶地位报仇雪恨，这种奴隶地位已经越来越不为人听从。

“你们瞧她那个样子。”鞋匠的妻子大声对邻居们说，“那个丑八怪也总爱打扮。她是用她那个情人叔叔从穷人身上吸的血装饰起来的。”

从高出屋顶的丁子香园的高高的铁栅栏，总会传出某个声音，哼那首根据大教堂的花园所作的古老的民歌：

教士的主妇
和月桂树，
从来不结果子，
因为永远没发育成熟。

正是这首歌使堂安托林忍无可忍；这种对他和他侄女辱骂性的假设，扰乱了他那吝啬人的纯洁操守。他去拜访了红衣主教，埋怨住在回廊里的那些人。终日处在气愤中的红衣主教大人，听了他的诉说后怒火中烧，差点打他一记耳光。为什么给他讲那些流言废话？为什么已经赋予了他权力？难道穿了法衣，他就没有一点男子汉气概？谁违背教堂良好的风气，马上滚出去！要更严厉，小心别再用这些琐事来打扰他，到那时该滚到大街上的人，就是“银权杖”。

在这次会见之后，堂安托林感到更有勇气，尽管他心里暗暗发誓不再去拜会那位可怕的大主教。他决心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惩罚那最软弱的人，这个人是给他带来那些风波的根源。他要把鞋匠逐出丁子香园，因为除了他的妻子是在那里出生以外，他没有任何权利待在那里。玛丽基塔，由于叔父的坚强决心而感到兴奋，必然会对某些人讲了她叔父的那些打算，这一消息便传遍回廊。

堂安托林慑于全体住户团结一致无声地反对他，他没敢继续往下走。

塔托用嘲弄和威胁性的眼神看着他，“银权杖”相信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你要记着我那把刀子。”但是，最使堂安托林害怕的是钟楼人的沉默，他以阴沉和凶狠的目光来回答他的话。

甚至连善良的“木权杖”埃斯特万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不同看法，他和颜悦色地对堂安托林说：“不过，您真的要赶走鞋匠吗？那样你就错了，非常错误。他终究是个穷人，而且他妻子出生在这个回廊里。堂安托林，这些新闻消息只会带来灾难。”

这教士得不到支持，看到来自各方面的敌意，他把强硬的决定推迟到第二天，而当他的侄女指责他软弱时，反跟她吵架。

他向身为财务主管的受俸神甫求援，但他不想由于牵连进那些小人物的反抗而影响自己恬静的生活。那是“银权杖”权力范围的事，他可以无所畏惧地惩罚和解雇任何他想惩罚和解雇的人。但是，堂安托林面对强硬决定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后果感到害怕，所以最终还是向加夫列尔屈服了，并请他给予支持。他才是在上回廊真正有权威的人。所有的人都听他的，盲目地遵从他的劝告。

“小加夫列尔，你帮帮我吧。”教士带着痛苦的表情对他说，“假如你不发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们戏弄我，甚至辱骂我那可怜的侄女，终有一天我会把丁子香园一半的人撵到街上去，因为大主教阁下授权我处置一切……主啊！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可能是魔鬼被放出在上回廊肆虐。它给我把这些人变成什么样了！”

加夫列尔揣摸着堂安托林的想法，他明白他说的在丁子香园肆虐的魔鬼影射谁。那个魔鬼就是他加夫列尔。“银权杖”说得对。他无意间已经给大教堂造成了混乱。他本来想在那个庇护所寻求安宁和忘掉过去，而反叛精神一直追随他到这藏身之地。他记得第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宁静的回廊时的

打算。他想成为大教堂的一块石头，不思考，没有感觉，像扶壁上处于萌芽状的苔藓一样，依附在大教堂的废墟度过他的余生。但是，外部世界的精神和他一起进了大教堂。

加夫列尔回想起那些在瘟疫流行期越过防疫线的旅游者。他们既健康又高兴，丝毫没有显示他们身上的疾病。但是，破坏性的病菌藏在他们的衣服褶子里和头发中，在跨越护栏和障碍物时，在不知不觉中引来了死亡，并传播死亡。他也是一样，但他不是在传播死亡，而是在散布骚动和反叛的生命。一个多世纪以来，下层人在世界上怒吼，提出抗议。用革命潮流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这呼声在十六世纪末那段时间里，第一次深入到这个世界。岁月在流逝，地球在变化，这呼声已经唤醒了那些和传说中如洞穴中的塑像般一动不动地沉睡的人一样的人群。

加夫列尔在大教堂的存在产生了一种分解的效果，是在过去的毒瘤上注射了一支灭菌针剂。一切都在变，几百年来酿成的顺从和敬重垮了。

那些人的觉醒，如同一个处于革命中的民族的觉醒一样，汹涌澎湃。他们为自己过去奉若神明的错误感到羞愧，这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欢迎一切新东西，不再为其后果所吓倒。这就是人民的信念，人民一旦起步向前冲去，他们便接受一切，捍卫一切，唯一的条件就是新事物，并且鄙视他们刚刚抛弃的传统原则。

“银权杖”的怯懦的屈从，正是加夫列尔同伴中最勇敢的人的第一个胜利。贪婪又专横的神甫在他们面前垂下了眼睛，脸上挂着微笑，想做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这一切应归功于他们的导师加夫列尔，现在他是上回廊真正的主人。堂安

托林在采取一项决定前首先和加夫列尔商量，而他那个丑陋的侄女则对加夫列尔笑脸相迎，如同战败者的女儿用笑脸来讨好胜利的英雄一样。

他们聚会时也不用躲在钟楼人的房间里了。每天下午，他们在回廊里聚在一起，议论着加夫列尔教给他们的大胆的学说，那种宗教气氛已吓唬不了他们。他们很神气地围坐在导师身边，与此同时，‘银权杖’像个幽灵一样在对面长廊里踱步，一边读着他的祷告经文，一边时不时地向聚会的人们投去一瞥凄冷的目光。连他的老臣民，主管修女的教士，都敢于离开他去听加夫列尔的谈话！

堂安托林，以他那种教会奴仆的险恶用心在揣测着加夫列尔所造成的危害的烈度。但在眼下，他的私心胜过了思考。让他们去说吧，又能怎么样？那只是那些人有点妄自尊大，如此而已。一切都是空谈，头脑中一闪念。只要不提出要钱！……他反而得到了加夫列尔这个好助手，因为他与他分担权力，能为自己免去许多烦恼，而且大教堂能无偿地有一个为外国人做翻译的人。有些外国人夸赞托莱多的司事们的博学，对这种赞扬，堂安托林作为完全是对他个人的赞扬加以接受。

加夫列尔对自己说话的后果比“银权杖”更加惊惕不安。他为他那一回第一次谈到自己的过去和理想感到后悔。他是在寻求和平与宁静，但是，他受苦难时代同样的宣传鼓动和盲目的热情的气氛仍然围绕着他，只是规模小一些。他进入大教堂时，本想使自己销声匿迹，但命运在捉弄他，使他这个完全躲藏起来的鼓动者重又复活，去扰乱那片废墟上的安定。社会早已忘记了他，而他却无意识地在躁动，引起

了外界的关注。

那些新信徒的热情是一种危险。他的哥哥“木权杖”并不明白这种祸害的蔓延，好心好意地对他说：“你对那些可怜的人说那些事情，你在把他们的头脑弄乱。你要小心；他们是很好的，但也很粗鲁。在人们一生处于愚昧状况，要想一下子把他们变成聪明人，那是危险的。就像今天要把我这个习惯于做家务琐事的人送上大主教宝座一个样。我会大吃大喝，但是，到晚上，我会肚子疼痛，也许就两腿一伸完了。”

加夫列尔承认这些谨慎的劝告是对的。但他不能后退；他弟子们的情意和他往日做鼓动工作的愿望在拖拽着他。那些纯洁的思想蜂拥进入由人类的智慧在几个世纪中建造的明亮的建筑物后引起的惊讶，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

对未来人类的描绘，激发着加夫列尔的热情。他像一个基督教宣道者带着神秘的诱惑力描述天国的情景一样，讲述着改变人类组织结构的革命之后，人们将会如何幸福。

人们只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幸福。在死后，只存在有着无数化合物的无限的物质生命；但是，人如同植物或没有理智的兽类一样消失；进入坟墓，就化为乌有。灵魂不灭是人类自豪的幻想，宗教利用这种幻想，把这种谎言作为自己的根据。只有活着才能找到人类的天国。在无穷无尽的空间，所有的人都乘坐在同一条船上：地球。所有的人都是危险和斗争的同志，大家都应该互相看做是兄弟，以寻求共同的幸福。为什么要不平等地分配食物？为什么要划分等级？为什么要在劳动中竞争？尤其是，为什么要为生存而斗争？剥削阶级的哲学家和诗人把这种斗争说成是进步所不可或缺

的一个条件……从人类开始思索文明的曙光之日起，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的神圣宏图 and 神圣梦想。宗教曾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然而宗教失败了，它已濒临死亡，只有科学才能在未来实现共产主义。人类应该走回头路，因为它走了一段错路，必须回到起点去。如果第一个人在耕种了一块土地，而在收获了劳动果实之后，便认为这块土地永远是他的，并把这块地作为财产留给他的子女，而他们又找别人为他们耕种这块土地，那么，这第一个人就是一个窃贼，一个非法占有世界财富的人。有些人利用人类智慧的发明、机器等为极少数剥削者谋利益，迫使其余的人束缚于饥饿的法则，这些人同样是窃贼，是非法占有者。这不行！一切都是人人所有。土地，同太阳和空气一样，毫无例外地都属于人类。它的产物应根据所有人的需要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和无边无际的空间相比，人在地球上只存在一分钟，一秒钟，他的生命仅此而已，如果他在这瞬间的存在中，在掠夺狂热的煽动下，与他的同类争斗，抢劫他的同类，这是可耻的，他甚至享受不到猛兽们的有尊严的安心平静，因为当猛兽吃饱了，就休息，而不会由于虚荣和贪梦想去伤害同类。不应该有富人和穷人之分，大家都是人而已。唯一不可避免的区别是智力高或低。但是，智者，正因为他们为智者，应该表现出他们高尚的风范，为普通人作出自我牺牲，不要想用物质的优势去帮助精神上的伟大，因为在人的肚子不分等级和优劣。世上存在的一切东西，甚至一个人认为完全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无足轻重的产品，都是过去和现在几代人的产品。哪个人能有权利说“这是我的，完全是我的”？……对于一个人，在发育成熟前，不会有人询问他是否想出世。他出生了，既然

出生了，他就有权享受福利，加夫列尔宣布了他的最高方案：“一切属于大家，福利为大家共享。”

他的朋友们绝对肃静地听他讲话。

享有财富的权利，深深地印在他们思想里。这句话同他们的贫困形成最强烈的对照，他们的贫困和大教堂的铺张奢华极具讽刺意义。

年轻的教士马丁是唯一胆怯地向导师提出不同看法的人。当一切都属于所有的人，当人有了被承认的享有幸福的权利，而无需法律和强制手段迫使他去生产的时候，应该知道他是否愿意工作，因为劳动已是一种需要，而不是一种美德，如同那些剥削劳动的人，为了美化劳动所说的那样。

加夫列尔斩钉截铁地肯定未来的勤劳精神。未来的人会在不受需求强迫的情况下从事劳作。他不受肉体迫切需求的指挥，启发他良知的是明确的同类休戚与共的观念，或者是这样的信念：一个人若逃避社会义务，其他人将学他的样子，共同生活将成为不可能，从而倒退到现在这种贫困和掠夺的时代。

“为什么现在尚存的为数不多的有教养、有觉悟的人不去杀人和抢劫？”加夫列尔大声说，“不是由于他们怕法律和执法人员，因为一个聪明人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找到戏弄法律和执法者的办法。也不是由于他们怕终生监禁和上帝的惩罚，因为这些人不相信过去的这些创造发明。而是由于所有心灵高尚的人都具有的对同类的尊重；是由于考虑到应该避免暴力，因为，如果大家都诉诸暴力，社会生活将会消失……当今天这种尚属于少数人的思想扩展到全人类的时候，人们将凭自己的觉悟而生活，不用法律和宪兵，他们将以尽

社会义务而劳动。”

加夫列尔尽管有革命者的热情，但并不对当今现实抱幻想。人类仍旧是一块被感染的土地，在这土地上，最好的种子也会腐烂，充其量只能结出一些有毒的果实。必须等待兴起才不到一个世纪的人人平等的革命在人们的意识中彻底完成。在这之后，才有可能和容易地改变社会的基础。他对前景怀有一种盲目的信心。人和社会同样都在进步。社会的演变以世纪计算，而人的演变是以千年计。怎么能把今天的人和史前时期的两足动物相比呢？史前时期的两足动物仍明显地保留着刚刚摆脱的动物性的残存，和人类的祖先猴类和睦相处，唯一的区别是，两足动物开始说出含糊不清的语言，头脑中开始闪烁出思维的火花。

今天的人是从远古时期，在残酷的大自然的逼迫下，和低等动物一起友善、贫苦地生活，忍饥挨饿的野兽演变而来的，虽然今天的人肯定自己高于他们的祖先，掌握了大自然。但在今天的人的身上，仍然平衡存在着古代兽性的激情和新生的思维发展。还要从今天的人发展为哲学家梦寐以求的高级和十全十美的人，没有野兽的私心的人，并竭力把目前残酷和渺茫动荡的生活变为一个福利平等的时代的人。

仍然主宰着人类的兽性让加夫列尔无法容忍。这正是未来高尚宽宏的计划所遇到的障碍。他向那些被惊呆了的听众阐述自然界天地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的起源，这是从原始的原生质到生命的无穷尽的变化的大自然演变的恢弘诗篇。在我们身上还带着原始的印记。应该嘲笑那个犹太人的人格化的上帝，他像雕塑家一样用泥土塑造了人。是一个不幸的艺术家！科学指出了他工作中的疏忽和粗糙，而上帝自己也无法

为那些错误自圆其说。我们身上的汗毛不能像动物身上的毛一样为我们御寒，那么他为什么要造汗毛呢？既然男人的乳房不能分泌乳汁，为什么要赋予男人乳头呢？为什么把人的脊椎像四足动物的脊柱一样，也放在后背呢？在创造依靠两脚支撑的人的时候，理应把脊椎放在身体中间，让它像一个十分坚固的轴，以免发生偏斜和背部的疾病，这种疾病正是由于支撑人体的重量失去平衡引起的。

加夫列尔在假定人是上帝创造的前提下，一一列举着在人体上发现的不可解释的不协调性。

他说：“我为我源自动物，是一个低级生命的历史后裔，比出自一个笨拙的上帝之手的不完善的人更为自豪。我们远古的祖先，是一些和所有的动物一样盲目地屈从于酷烈大自然的野人，但慢慢地，经历千万年之后，发生了变化并取得了胜利，发展了他们的精神、头脑和社会意识。每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会和贵族谈到他们的后代时同样地感到得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衣服、调制的食品、武器、工具和房屋，缓解了大自然的外部影响。在我们四千年的历史中，有哪位英雄人物和发现家能和早期人类相媲美？早期的人，渐渐地经历了千百次消失的危险，确定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当有一天，我们的史前的祖先，不是像一切动物所做的那样，抛弃伤病者，而是看护生病、受伤的人，播种下第一粒种子，射出第一支箭，这时自然界就目睹了一场最伟大的革命。只有未来另外一次革命可以和它相比拟。如果在古代人解放了他的肉体，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伟大的精神革命。那些在智力发展上走得更远的种族，最终将独自留下，剥夺其他种族并成为地球的主宰。那时智力不太发达的人也许会超过

现在最有教养的人。每个人都会在同类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谁也不会想对自己的邻居施行强制。将没有法律，也没有惩罚，由于理性的影响，自愿的伙伴关系将取代现今专制主义的强加于人。这是将来的事，是遥远的事，非常遥远的事。但是，在人类生活中，几个世纪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只不过是生活中的几秒钟。在人变成其智能得到充分发展——今天人的智能几乎处于萌芽状态——的高级人类的那一天，地球将不是宗教所说的愁泉泪谷，而是一个连诗人都没有想象到的天堂。”

尽管加夫列尔那样兴致勃勃地讲解着，但他的听众似乎并不能共享这些幻想。他们默不作声，但是，面对导师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遥远的未来，他们的表情冷漠。他们想立即得到这幸福，就像一个贪吃的孩子，给他看了美味的食品，而后却把这种食品放到他够不到的地方。牺牲、为将来作漫长的努力，激不起他们的热情。从加夫列尔的讲解中，他们得出肯定的结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和那些以前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尊敬的特权阶层，对财富享有同样的权利。既然人类的一部分幸福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怀着要求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那样的热切心情，就想立即毫不拖延，毫无阻力地得到它。加夫列尔从他们的沉默中觉察到某种逆反心理，酷似他巴塞罗那那些同伴们的讥讽表情，他们赞同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暴力行为的谴责。

热情的新信徒和他们的启蒙者之间有着距离。他们怀着敬意听他讲话，但是，他们必须离开他，以便按自己的方式来消化这些教诲。堂马丁是唯一追随他走向令人向往的未来的人。钟楼人、鼓风手、鞋匠和塔托每天晚上都上到钟楼的

房子里，但并不叫他们的导师，在那里，看着描绘不光彩的卡洛斯战争场景的被人遗忘的、发黄的和皱裂的图片，发泄他们对现实的仇恨。

夜间聚会是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一种持续不断牢骚。当他们准确地明白自己的地位时，他们感到自己是最不幸的。鞋匠两眼饱含着泪水回想他饿死的小不点儿，讲述他子女的苦难处境，子女太多，他再奋力工作也无济于事。鼓风手讲述他悲惨的晚年，一辈子每天只有六个雷亚尔，无望再有所增加。塔托，以他好斗的公鸡的冲动，一天下午竟提议砍掉唱诗班所有受俸神甫的脑袋，然后放火烧了大教堂。而钟楼人则阴沉着脸，皱着眉头，按照他的思路重复地大声说：“在下面，有那么多财富，对谁都没有用处……堆积在那里纯粹是为了妄自尊大。一帮强盗！强盗！”

这些天，加夫列尔又回到了在萨格拉里奥身边度日的时光。他的弟子们越来越固执地躲在塔楼里。堂马丁有一个生病的母亲，离开了修道院。

“银权杖”看到加夫列尔孤独一人，感到很高兴。他以为是他阻止了那些弟子，从而中断了他们那些危险的谈话，以便恢复回廊中良好的秩序。一天，他碰见了加夫列尔，面带微笑以保护人的表情对他说：“小加夫列尔，你想不到，由于你表现出众，你将会得到奖励。我不是对你说过，只要你帮我展示珍宝室，会给你找点好处，不是吗？现在你就得到了。从下周开始，每天将有两个比塞塔，像两个太阳一样，落到你的口袋里。晚上你能呆在大教堂吗？……那个曾经是宪警的岁数大的教堂看守，感到累了，要回老家去。好像从那条狗死后，他对这种工作产生了反感。另一个看守一

身是病，需要一个伴。你愿意跟他做个伴吗？如果现在是冬天，我就不会跟你提这件事。在下面过夜你会咳嗽得很厉害。可现在是夏天，大教堂是托莱多最凉快的地方。多美好的夜晚！等天气变了，我另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岗位。你是值得信赖的，尽管你的头脑有点太灵活；你出身于一个出名的忠厚的家庭，这正是工作所要求的。你同意吗？……”

加夫列尔同意了，而且当埃斯特万想去反对，说他身体欠佳，他硬让埃斯特万接受了他的意志。他只是在夏季从事看守警卫工作。再说，每天两比塞塔几乎比“木杈杖”挣的还要多。家庭收入将会翻一翻，不应该失掉这么好的机会。

晚上，萨格拉里奥跟她叔父讲，她敬佩他为了不成为家里的累赘而任何工作都接受的坚强毅力。他们俯身在回廊的栏杆上。下面，花园里一片昏暗，黑色的树冠摇曳不定；上面，夏日的夜空被热热的雾气弄得模模糊糊，星光暗淡。在四方形回廊里只有他们叔侄二人。教堂乐师小阁楼明亮的窗户在对面的屋顶上投下一块红色的方块。风琴发出悠长、凄凉的声音，琴声停息后，乐师的身影带着他神经质的动作在红色方块中晃来晃去，由于反射作用，他的动作给放大了，变得滑稽可笑。

夜的宁静和黑暗温存地笼罩着加夫列尔和萨格拉里奥。从天空降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凉意好像会重新振奋人的精神和唤起回忆。对他们来说，教堂像是一头沉睡的巨兽，在它的怀抱中，他们能得到安宁和保护。

加夫列尔谈论往事，以便让侄女相信，他们在教堂里做的事没有任何价值。他受过许多苦。没有他没有尝受过的苦痛。在他周游世界期间，他挨过饿，挨过很多饿。他不知道是

阴暗城堡的地牢中的折磨，还是那些在人口众多的城市的街道上的绝望的日子更痛苦，那时，他看着豪华玻璃橱窗后面的食品和黄金，身子周围是一片豪华，但由于饥饿而昏厥，感到天旋地转。当他独自一人应对文明的凶残的自私自利时，他还能忍受自己的贫困。当他和他温柔而忧伤的伴侣卢西分担他那流浪汉的贫穷时，那才是极可怕的日子。加夫列尔在谈到这个英国女人时，就好像在谈起一个死去的妹妹。

“萨格拉里奥，你要是认识她，你肯定会爱她的。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一个勇敢的伴侣，她与我的结合更多的是由于思想的一致，而不是由于肉体的吸引。从我认识她那天起，我就喜欢她。我不知道，我们感受的是不是就是爱情。诗人对爱情编造了那么多谎言，那样虚伪地加以夸大，以至于使你不能确切地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

他依照自己的信仰向侄女谈论爱情，解释爱情。爱情是一种“有择亲和力”；这是歌德超出诗人的境界用化学术语给爱情下的定义。他给两个身体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同的新产物的趋势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两个不存在亲和力的人，由于生活的虚伪法则和不断的接触，可以走到一起，然而，他们不会情投意合，也不会打成一片。这种情况最经常发生居住在地球上的异性之间。他们彼此接触，但既不能情相投，也不能意相合。会有短暂的情意缠绵，肉欲的冲动，但永远不会有爱情。可怜多病的卢西是和他相似的人，他们认识了，而且相爱了。对人类的贫困的同情心，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仇恨，对卑微和不幸的人的奉献精神，在他们两人是一样的。他们不仅心心相印，而且思想吻合一致。

她长得丑，丑得既甜蜜又悲伤，在加夫列尔眼里，在一

个不幸者和受难者的世界上，那是最高理想的美。她生长在大都市工人区的贫民窟里，是平民女子的缩影；由于她出生的洞窟的有毒气体和食品匮乏、营养不良，她得了贫血症；她身体瘦弱，由于童年繁重的劳动，女性体态的优美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贵妇人的嘴唇都涂成红色，而她的嘴唇却呈紫色。她面部唯一美丽动人之处是那双眼睛，那是泪水的窗口。她眼睛大大的，但那是由于童年时在寒冷的夜晚踟躅街头，看到的一些恐怖的情景所造成的，那时，他父亲抱着工人想忘掉一切痛苦的粗野心理喝得酩酊大醉，在酒馆里幻想一个天堂，之后回到家，面对家庭贫困便发脾气，并殴打家人。

“萨格拉里奥，她和你们所有出生在下层的女人一样。你们的美貌只能维持一时，只有在花样年华才能保持。穷苦人家的女人若不脱离自己的阶级，就不可能是美丽的。饥饿和操劳是美的大敌。每天的劳作使她失掉了自己的青春活力。在清贫中当母亲，简直吸掉女人的骨髓。在干完活回到家里，又扫又洗在厨房烟熏火燎下消耗成了个木乃伊。正因此我爱卢西，因为她被剥削得憔悴枯竭，因为她是个在忧郁中衰弱的纯贞的女工。她生来美貌，但给社会的不公正变丑了。”

他记得，当那个瘦小的女人谈到要为倒下牺牲的人报仇，要报复漫长岁月所受的压迫时，她是无比的愤怒又冷静。她对未来的憧憬，显得比加夫列尔更激进，更勇猛。加夫列尔赞扬她那鼓动者的勇气，赞扬她在戒备森严的警察之中，抱着装满了宣传品的旧帽盒，冒险穿梭在各大城市，而这种行为足可把她打入监狱。她像是个面带冷笑，既不怕文明人的嘲笑，也不怕野蛮人的粗鲁，在世界各地散发圣经，

传播福音的精神抖擞的英国女教师；但是，卢西散发的是鼓励暴动的传单，她不去寻找幸福的人们，而是在工厂和污染的郊区寻找失去希望的人。他们两人都挨饿；被迫害和监禁活活分开；但他们重又团聚了，并继续他们传奇般的奔波，一直到贫困和痨病夺去她的生命。

在回忆起他们在一家整洁的意大利医院里，在慈善机构冰冷的气氛中，最后几次相会时，加夫列尔哭了起来。由于他不是她的正式丈夫，每周只能去探望她两次。他穿着破旧的衣服，低着头走进医院，他看到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天比一天苍白、消瘦，像蜡一样的透明，一双眼睛出奇的大。她对一切都知道一点，她严重的病情瞒不过她。她在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给我带几支玫瑰花，”她微笑着对加夫列尔说，仿佛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想以一个被人弄得丑恶和黑暗的世界的自然美作为圣餐。他以硬面包糊口，恳求不像他那么穷的同志们的帮助，露宿街头，为的是下次探视时，给她带去一束鲜花。

“她死了，萨格拉里奥。”加夫列尔哽咽着说，“我不知道人们把她埋葬在哪里；也许她会被用来上一节解剖课；她像那些埋名隐姓，他们的英雄主义永不为人知晓的士兵一样，安卧在公墓。但我仍能看到她；在我的一切不幸时刻她都伴随着我；好像她现在在你身上复活了。”

“可是，叔叔，”被这个故事感动的萨格拉里奥柔声地说，“我做不到她做过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勇气、缺乏意志的不幸女人。”

“你叫我加夫列尔吧！”他激情地说，“你是在我征途中重现在我眼前的女友卢西。你要知道，长时间以来我都在审

视我的情感，分析我的意愿，我确信，我爱你，萨格拉里奥。”

女孩子现出吃惊的样子，远远离开他。

“你别走开，你不要怕我。我已不是一个男人，你也不是一个女人。你吃了许多苦，你已经告别了地球上的欢乐，你被不幸锤炼得坚强了，你能够正视现实。我们是两个生活汪洋中的遇难者：剩下的我们只有等待和在一个充当我们藏身处的小岛上的死亡。我们被毁掉了，压扁了，被粉碎了；死亡正孕育在我们的体内；我们是被一个荒谬的社会齿轮碾得残缺不全、变了形的破布。所以我喜欢你，因为你和我同样处于不幸之中。‘有择亲和力’把我们连在一起。可怜的卢西是一个被剥削弄得衰弱的、从出世就受贫困毒害的女工；你是受特权者福利的引诱而离开家庭的平民家的女儿；你不是受爱情的诱惑，而是受幸运者心血来潮的引诱；你是被送给牛头人身怪物^①作牺牲的童女，后来这些牺牲的遗骸被扔进粪坑。萨格拉里奥，我爱你；我们是两个社会的逃亡者，应当共同开辟自己的道路。人们鄙弃我是因为我危险，人们瞧不起你认为你不贞洁；不幸在推动着我们；我们的躯体受到了毒害；我们身上带着战败者的伤痕，但是在死之前，让我们用爱情使我们的余生愉快；让我们像可怜的卢西那样要几支玫瑰花。”

加夫列尔紧握着女孩的双手，她被他的话惊呆了，不知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被弥诺斯王之孙禁闭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每年要吃雅典送来的童男童女各七个，后被雅典国王忒修斯杀死。

该说些什么，她柔声地哭了起来。在丁子香园的顶层，乐师的风琴还在响着。加夫列尔熟悉那支曲子。那是贝多芬最后的哀叹，这位天才，在死神面前，用令人寒战的凄楚委婉地唱出了“这是必然的”这支乐曲。

“萨格拉里奥，”加夫列尔继续说，“自从我看到你带着受害者委曲求全的勇气，面对人们的可憎的好奇心而回到家里的时候起，我就对你产生了兴趣。我在你的缝纫机旁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星期，一个又一个月，看着你在怎样做活。我在揣摩你，我解读你。你是一个单纯的人；在你的心灵中，不存在被文明的邪恶弄得复杂又扭曲的那些人的掩着藏着的东西。从你那温柔的目光中，从你对我的谈话的专注中，我越来越猜测到你对我微不足道的帮助的感激之情。你回忆你生活中的黑暗时期，在那些由于性欲而变得疯狂的兽性男人中所遭受的肉体摧残，而你看到我总是那样温柔地对待你，面对你父亲的暴怒和人们可憎的好奇，我保护你，你的感激之情日益增长，不断增长，一直到今天你爱上了我。萨格拉里奥，连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此你也说不清楚，但是，你这个人适合于我这个人，正像我对你说过的化学分子一样。我也像过去爱可怜的卢西一样地爱你。专一的、永恒的爱情是诗人编造出来的，这种谎言常常受到事实的嘲讽。可以用同样的热情爱几个人。惟有不可或缺的是亲和力。你过去曾疯狂地爱过一个男人，现在你对我有何感觉？我没有欺骗自己吧？你真的爱我吗？”

萨格拉里奥依然低着头继续在哭，似乎不敢看加夫列尔。他在温柔地催促她。她应该叫他加夫列尔，与他以你相称，他们不是患难的伴侣吗？

“我感到难为情……”女孩子喃喃地说，“这么大的幸福使我慌乱……是的；我喜欢您……不，我爱你，加夫列尔……我永远不应该吐露这种爱；至死我也不应泄露这个秘密。我有什么资格让别人爱我？为了不因为记起我失去的青春而哭泣，很久以来我就不照镜子……还有我的往事，我那可怕的往事。我怎么能想到，您……我是说，你，能那样清楚地看出我的思想？你看我是在怎么样地颤抖，那是由于我的秘密被看破之后所产生的感受，所造成的恐惧还没有过去。像你这样的男人屈尊于我，一个终身丑陋多病的女人！不；你不要提另一个男人。我早已把他忘掉；现在你向我施舍你的亲情，我怎么还能去追忆他呢？不，加夫列尔，你是男人中最伟大、最好的男人。你是我心目中的上帝。”

他们紧握着双手，看着昏暗和窃窃私语的花园，长时间地沉默着。上面天才音乐家对正在消失的人生的哀歌仍在回荡。

萨格拉里奥依偎在加夫列尔身上，似乎她缺乏力气，面对幸福感到惊恐的她，想在他那里找到藏身之处。

“我认识你太晚了！”她轻声地说，“我多么想在风华正茂时与你在一起，我多么想把我的美丽和健康都只给你，我多么希望拥有着美貌和风韵使你的余生过得美满。我的感激之情不能对你有任何奉献。我非常可怕；我的内心已经死亡，死神在慢慢地吞噬着我。谁接触我谁就会中毒。加夫列尔，你为什么会看上我？”

“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一个和你同样不幸的人。我们的苦难就是情感的亲和力……另外，我从未像其他男人那样爱过女人。我在漫漫旅途中曾见到过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丝毫都没有动情。我不是一个情种。从我年青时代在巴黎的历

险中，我出门时总有一种不悦的情感。对不幸的人的爱支配着我，致使我的感觉迟钝。我好像醉汉和赌徒，由于沉迷于他们的嗜好，对女人毫无感情。钻进书本里的学者很少能体验到性的召唤。我的激情是对穷苦人的同情。我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仇恨使我专心致志，以致制服了我的功能，从来没有给我时间想到爱情。女人对我没有诱惑力。只有我看到不幸和悲伤的女人时，才崇敬女人。丑陋比美貌更能感动我，因为前者会向我道出社会的卑鄙龌龊，向我展示不公正造成的苦难，它是唯一能激起我的力量的美酒。我之所以爱卢西，因为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且行将死亡。萨格里拉奥，我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你在风华正茂的时候被排除在生活之外，任何人不能喜欢你。我把爱献给你，是为了你的余生能愉快。”

萨格里拉奥紧紧贴在加夫列尔的怀里。

“你多么好呀！”她感叹道，“多么美好的心灵呀！”

“可怜的萨格里拉奥，你的心灵同样美好。你的生活是一个骗局。你出卖肉体，如同穷人的女儿们一样，是迫于饥饿和绝望。你认为会在虚假的爱情游戏中得到面包，如同成千上万的无产者的女儿天天在地球上所做的那样。一切都是为了世上的特权者：父亲的双手和女儿的肉体。当双手失去力量，年轻的肉体失去诱惑力的时候，它们便会被抛在一边，并由其他人来替代。市场是繁荣的……由于你的不幸我才爱你。也许我看到你像过去我见到你的时候那样年轻、漂亮，我不会感到丝毫吸引力。美貌对感情来说是一道障碍。当年的萨格里拉奥，幻想做一位贵夫人，受到穿着像艳丽的小鸟一样的五光十色的服装的漂亮小伙子的阿谀奉承，那时

她不会看上一个被贫困折磨得苍老、丑陋、多病的流浪汉。我们之所以相互了解，是因为我们同是不幸的人。贫困使我们能洞察对方的心灵；在幸福之中，我们决不会相遇相识。”

“的确如此。”她把头靠在加夫列尔的肩上，喃喃地说，“我崇敬使我们相识的贫困。”

“你将成为我的同志。”加夫列尔以温柔的语气继续说，“我们的生命将结合在一起，一起前进，直到死神打破这种结合。我将保护你，尽管一个被人们追捕的病人的帮助起不了多大作用。你将以你的亲情使我活得美好。我们将像教堂里的那些圣徒一样相亲相爱，他们可以放声诉说种种甜言蜜语和做出震撼人心的痴迷的表情，但不会有任何肉体的接触。爱是人类能够生存的一种本能，但我们的爱是不完整的，这不是因为像圣徒那样憎恶自然法则，而是因为生活的斗争给我们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我不是一个男人；贫困给我带来的疾病和我的同类们的凶残毁掉了我的器官。我几乎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更不能造就另一个生命。你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堕落文明的毒素。你怀下的孩子将是一个患有骨疡和血管里充满腐烂物的可怜的怪胎。我们不要用这种怪胎去增加下层人生理上的贫困。我们让那些特权者用他们沾染着他们恶习的支脉去传宗接代吧。”

他用一只胳膊拦着女孩的腰，用另一只手抬起她的头，用他的眼睛凝视着萨格拉里奥的眼睛，那是一双在星光下闪烁着晶莹泪花的眼睛。

“我们是两颗相互爱抚的心灵，两种相互怜爱的思想，不留下激情的痕迹，具有诗人们永远想象不到的纯洁。今晚我们互相诉衷肠，我们相互打开了心扉……吻我吧，我的亲人！”

在寂静的回廊中，他们无声地、长久地亲吻着，仿佛从结合在一起的嘴里发出对他们过去的贫困苦难和死神围绕的短暂的爱情的哭泣。在上面，贝多芬的悲恸继续奏出它痛苦的变调，在沉睡的大教堂内扩散。

加夫列尔直起了身体，扶住了由于激动而瘫软无力，身子往后倾的萨格拉里奥。他一面带着神职人员的威严望着明亮的天空，一面俯在女孩的耳旁低声说：“我们的生命就像这里一个荒芜的花园，在那些塌倒的树干和枯枝中，又吐出了新的枝叶。同志，让我们相爱吧。我们要让春天回到我们这些贫困的贱民中间。那可能是一个悲伤、没有果实的春天，但是它有鲜花。太阳是为上层人升起的；亲爱的同志，它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让我们在这黑暗的井底拥抱，让我们昂起头，既然太阳不以它的热量来鼓舞我们，我们就把它当做一颗遥远的星星一样敬崇。”

第 十 章

七月初，加夫列尔加入了大教堂夜间值班员的行列。

傍晚，他来到下面的回廊，在“圆面包门”的门口与另一个守夜人汇合；那是个一脸病容、和加夫列尔一样咳嗽不止的人，即便在盛夏，也离不开毛毯。

“喂，要锁门了！”钟楼人一边摇晃着钥匙，一边说。

在两个值夜人进了教堂后，他从外面锁上所有的门便离去。

由于白天长，所以当守夜人进入大教堂时，还能见到两个小时的阳光。

“伙计，整个教堂都归我们了。”另一个守夜人说。

他已习惯于空落落的教堂威严的面孔，钻进了圣器室，似乎那就是他的家。他打开放在抽屉上的晚餐篮，把食品摆放在烛台和耶稣受难像之间。

加夫列尔在殿堂中徘徊。过了些日子的监禁生活之后，第一次看到这个孤独和关闭的教堂给他产生的深刻印象依然没有减退。他的脚步声在水泥地上发出回响，这水泥地被过去几个世纪来高级神职人员和达官贵人的陵寝一段一段地分

割开。笼罩着教堂的死一般的寂静，被一些奇怪的声响和神秘的摩擦声所打破。第一天，加夫列尔曾几次惊恐不安地回头看，以为他身后有人的脚步声。

教堂外面，太阳依然照耀着。教堂大门上圆花窗的彩色轮环像一个灿烂光亮的花盘熠熠生辉。下面，在壁柱之间，阳光似乎和阴影交织在一起。蝙蝠从上往下，用它们的翅膀带下拱顶的孔洞中的尘土。它们在石柱间尖叫着，犹如盘旋在石林间。它们盲目地疾飞，不是碰上挂灯的绳子，就是把高高挂在红衣主教坟墓上空的带有积满尘土的抽纱流苏的主教红帽弄得摇摇晃晃。

加夫列尔巡视着整个教堂。他推推各祭坛的栅栏，以确信都已全部锁好，他敲敲阿拉伯区西班牙人专用祈祷室和历代国王小教堂的门，他看一看教士厅的门，然后驻足在萨格里拉奥圣母小教堂前。通过栅栏能看到点燃的灯和在高处的带着首饰的圣像。在这番检查之后，他便去找他的伙伴，两人坐在一个交叉道口，唱诗堂或大祭坛的台阶上。从那里，一眼就能看到整个教堂。

两个守夜人开始戴好自己的帽子。

“他们大概给您介绍过，”加夫列尔的伙伴说，“要尊重教堂的规矩：如果您想抽一支烟，就到‘洛孔’走廊去抽；如果您要吃晚饭，您就躲进圣器室。当我到教堂做仆役时，人家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这是那些呆在家里安安稳稳睡觉的人说的话。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提高警惕，除此之外，夜里，每个人可以做他认为最合适的事……这个时候，上帝和圣徒都睡觉了。他们在经过白天听了一天祈求和赞美诗，又要接受香火和蜡烛在他们脸边熏烤之后，也得休息一下了。

我们就守护他们睡觉，真见鬼！如果我们稍许放松一下，并不是我们对他们不敬崇。伙计，来吧，天黑下来了；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两个守夜人在交叉道口吃晚饭，把他们篮子里的食物摆放在大理石台阶上。

加夫列尔的小伙伴腰带上挂了一把手枪，这算是全部武器装备，那是财务管理处送的，是一件从未放过一枪的古董。“银权杖”指给加夫列尔看过一支卡宾枪，那是前宪警作为他多年服役的纪念品留在圣器室的。加夫列尔做出一种反感的表情。就让它放在那里吧；当他需要的时候，会去拿的。他把卡宾枪和几排由于潮湿而霉锈，又布满蜘蛛网的子弹一起放在圣器室的一个角落里。

夜幕降临时，高处玻璃窗的彩色消失了。在黑暗的各个殿堂内，灯光像暗淡的繁星一样开始放出闪烁的光亮。教堂的宏伟规模看不清了。加夫列尔感到自己在一个黑夜置身于空旷的原野。只有拿着手电筒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时，从黑影中现出大教堂的巨大的、非常可怕的轮廓。壁柱迎面而来，而且越来越高，一直被灯光推到了拱顶。花砖地上的图案似乎随着摇曳不定的灯光在跳舞。加夫列尔在巡逻时，感到有沉重的翅膀在拍击着他的头。一些受惊的鸟划破夜空，撞上壁柱发出的凄厉叫声和蝙蝠的叫声汇合在一起。那是一些猫头鹰，在灯油的吸引下，凌空而下，受它们羽毛的擦碰，油灯在颤抖着。

每过半个小时，大教堂的沉寂就会被起动的弹簧和转动的齿轮的响声所打破。然后便响起清脆的钟声。这是“钟门”上镀金武士用手中的锤子报告时光的流逝。

加夫列尔的伙伴抱怨大主教为了扰乱穷人搞的创新。过去，他和他的老伙计一旦关在大教堂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睡觉，不用担心教士会斥责他们。但是，那位大主教阁下总在琢磨怎么烦扰别人，在教堂各处都安装了一些从外国带来的钟表，每半个小时必须打开一次，并拨准时间。第二天，“银权杖”要逐一检查这些钟表，如发现疏忽错漏，就处以罚款。

“伙计，这是一个不让我们睡觉的活见鬼的发明。不过，我们最多只能打个盹。我们必须互相帮助。一个人睡一会儿，另一个人负责拨弄那些该死的机器。丝毫不能疏忽大意，不是吗，新来的？给的钱很少，挨饿倒很多，我们罚不起。”

加夫列尔一向善良，总是他多去巡逻，小心翼翼地照看好钟表的指针。他的伙伴菲德尔先生，安心地休息，夸他气量大，他们给他派了一个好伙伴，比起他的老伙伴来，他更喜欢加夫列尔。原来的伙伴带着老看守的专横神气，总要为决定谁该起床去巡逻争论不休。

这个可怜的人和加夫列尔咳得一样厉害。他的黏膜炎咳得震撼着教堂的沉寂，各个殿堂的回声，使咳嗽声更响，仿佛几条恶狗在黑暗处狂吠。

“我也不知道这咳嗽拖累了我多少年了。”老人说，“这是大教堂送的一份礼物。医生叫我放弃这个职业，但我的回答说：谁来养我？伙计，您来得正是好时候。这里很凉快，这里正是这时候在索科多维尔大街的咖啡馆出完大汗出小汗的人求之不得的地方。不过，我们虽然在夏天，但是您看看四处侵袭我们的潮气，伙计，要在冬天这才好看。要穿得像

参加化装舞会：戴着帽子、围了围巾、裹着毯子。他们发慈悲允许我们在圣器室里生一点火，但是，即使这样，许多天早晨差一点我们就冻僵让他们给收尸。教士会的人把唱诗班称做‘屠夫神甫’。如果这些足吃足喝的先生们因为在这个冰窖中呆一个小时就叫苦的话，您想想，我们该怎么样呢？您在夏天进入这里算走运。等天气冷了，您会有好戏看的。”

但是，尽管他们是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加夫列尔仍咳嗽不止，大教堂的潮湿使他的病情恶化。

在月色下的夜晚，大教堂变幻莫测。加夫列尔回忆起他游历时见到的一些舞台布景。大玻璃窗在略带着乳白色的乌云的衬映下，显得分外突出。参差斑驳的月光缓缓地在壁柱上滑动，恰似幽灵从拱顶下降。然后，又像张牙舞爪的鬼怪在地面上爬行，转而又溯壁柱而上，直至消失在高空。寒冷苍茫的月色使憧憧黑影变得更加浓重。在月光的移动中，从黑暗中照出这儿一个小教堂，那儿一个墓碑或一个壁柱上的浮雕。在大祭坛栅栏顶端的巨大的基督像，以其古旧黄金的光泽，在黑影的背景下闪闪发光，犹如奇迹般复活的耶稣带着光轮在空间游移。

当守夜老人咳嗽得难以入睡，他就对加夫列尔讲述他在大主教教堂度过的守夜生活的岁月。那是一种和掘墓人的职业相似的职业。在荒凉的寂静中，在死人当中度日，下班前见不到任何人。他终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这个职业治好了他年轻时代的许多恐惧感。从前他相信死人会复活，相信有灵魂和圣徒的复活，但现在他嘲笑这一切。他成年累月地在大教堂熬夜，如果能听到一点什么的话，那就是不敬圣坛和圣徒的耗子的啃咬声。毕竟都是用木头做的！

他只害怕有血有肉的人；害怕在过去年代不止一次进入大教堂的盗贼，是他们迫使教士会建立守夜制度。

加夫列尔很喜欢听老人讲述所有发生在这个世纪的有关图谋盗窃的故事。大教堂里的财富足以使一个圣徒也动心。马德里离这里很近，老人很怕那些贼精。然后他一一讲述严密的警戒防范措施。能够突破这些措施得手的人得是聪明又幸运的人。“银权杖”、钟楼人和圣器看管人在关闭大教堂之前要检查察看，然后马里亚诺把全部钥匙带上塔楼。别想去砸锁。那些锁都是坚固的古老制品。另外，他们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发出警报。过去，还有一条狗的帮助，警戒就更完整。那只狗非常机警，只要有一个行人靠近外面的大门，它就立刻叫着跑过去。那只狗死后，财务主管先生有好几个月宣布要再买一条狗，但他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末了，尽管没有狗，但还有他们两个人，也能管点事，对不？他有一把从来没有开过的手枪；加夫列尔有一支卡宾枪，这支枪仍旧在圣器室里，放在他的前任把它留下的那个角落里。想到他自己和他的伙伴可能会让人恐惧，他有点洋洋自得，但是看到加夫列尔的微笑，他又回到了现实，补充说：

“另外，万一发生异常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能召唤受俸神甫的大铃铛。铃绳就在唱诗堂，只要我们一拉绳，您想想，在寂静的夜里铃声一响，那会多热闹！猜想到大教堂可能发生什么严重事件，全托莱多都会行动起来！有了这些，再加上那些不让我们睡觉的该死的时钟，可以说，连国王都不会像这个教堂那样安全地过夜。”

早上，当加夫列尔离开那禁闭的地方后，冻得要死的他上楼向自己的家走去，只想在床上躺下。他碰到萨格拉里奥

正在厨房里热牛奶，准备他睡前喝。在家人面前，这个温柔的女友仍旧叫他叔叔。只有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她才亲昵地对他以你相称。当她看到他躺在床上，就端起一杯热气腾腾的牛奶走到他身边，带着母亲般的宠爱让他喝奶，帮他理好被头，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窗，以免阳光照着他。

“整夜整夜地呆在大教堂里！”女友带点埋怨的表情感叹说，“加夫列尔，你是在糟践自己；这不是你干的活。我父亲也这么说。既然死后什么都不存在了，我们不能相见了，那么你就应该多活几年，自己要多保重。现在我们相互了解了，我感到幸福，失去你我会非常伤心！”

加夫列尔让她放心。那份差事不会过夏天。之后他们会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应该伤感；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死去。无论待在丁香园，还是在大教堂守夜，他都一样咳嗽。

加夫列尔睡了一个上午，已完全恢复了体力。午饭后他走出回廊。这是他在一天中唯一能见到他的朋友的时间。不是他们来找加夫列尔，就是他去找他们，有时走进鞋匠的家，有时登上塔楼。

他们向他问好，和从前一样专注地听他说话；但是，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某种强烈的独立性，同时也带某种同情心，似乎由于他向他们传播了他的思想而敬佩他，同时又对他反对暴力的温和性格感到遗憾。

“这些鸟已经自己去飞了。他们不需要我了，他们想他们单独在一起。”加夫列尔跟他哥哥谈话时这么说。

“木权杖”忧伤地摇着头。

“加夫列尔，愿上帝保佑，有一天你会后悔对他们说了

些他们不理解的事。他们的变化太大了。这个打狗人，我们的侄子，没有谁受得了他。他说既然别人不让他杀斗牛致富，那么，如果有必要，他会去杀人以便摆脱贫困；他有权同任何人一样去享受，所有的富人都是盗贼……但是，兄弟呀，圣母保佑！……你真的教了他们那些这么可怕的东西？”

“随他们去，”加夫列尔笑着说。“他们还没有消化这些新思想，而胡说八道。但这种情况会过去的。他们是好人。”

唯一让他伤心的是，他发现马里亚诺在躲着他，避免和他接触，似乎他害怕他。他似乎怕加夫列尔以年轻时代就胜过他的绝对优势看透他的思想。

“马里亚诺，你还好吗？”加夫列尔见他走过回廊时问道。

“好极了，好在分配不公。”这位傲慢的同志回答。

“这我知道，老弟，我知道。可是，好像你在躲着我。这是为什么？”

“我躲着你？……决不会。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你。你上我家去的时候，你也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地接待你的。我们欠你的太多；你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已不再是粗野的人……可是，我对于我知道这么多事情但还是个穷人感到厌倦；其他的伙伴也一样。我们不想把头脑装得满满的，肚子还是空空的……”

“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生得太早了。别的人生来的时候会看到事情安排得好一些。当今在世界上还有千百万比你们更不幸的劳动者，他们和当局流血斗争也没有得到成功，你们能干些什么来收拾好现状呢？”

“干什么？”钟楼人咆哮道，“这我们会知道的；你等着瞧吧。我们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愚蠢。加夫列尔，你是学问

大；我们像对待一位老师那样敬重你，你所说的都是真理。但我们感到，当要做实际的事情的时候……实际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干的时候，……我说清楚了吗？……你好像有点，请你原谅，跟所有啃书本的人一个模样，缺少主见。我们虽然是些粗人，但我们更心明眼亮。”

他疏远了加夫列尔，而加夫列尔没能明白他的弟子们走入歧途真会走多远。许多次，当他来到塔楼的房间里想和他们聚聚，他们的谈话便戛然而止，惶恐地看着他，毫无疑问，他们怕他可能听他们的谈话。

堂马丁有好些日子没在回廊露面了。加夫列尔从“银权杖”那里得知，小教士的母亲已经故世。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加夫列尔在丁香园看到了他。他双眼红肿，面部瘦削，皮肤绷紧，好像他哭了很长时间。

“加夫列尔，我是来向您告辞的。为了照看我母亲，我度过了一个月的悲痛和失眠的日子。可怜的母亲已经死了。她已经不年轻了；我一直等待着这个终结。但是，即使一个人再坚强，再能逆来顺受，这样的打击总是时时感觉到。可怜的老母亲走后，我解脱了。只是为了她才把我拴在教会，现在我已不相信教会了。它的信条既荒谬又幼稚；它的历史是由罪行和暴力罗织起来的。我为什么要像别人一样去说谎，虚假地相信一个自己并没有感到的信仰呢？今天我去了大主教宫，对他们说，由他们处置我每个月的七杜罗和主管修女的教士职务吧。我要走了；我不仅要逃离教会，而且我想逃避教会的环境，在托莱多，一个‘叛逆的’教士是无法生存的。您看见这套伪装了吧？今天我最后一次穿它。明天

我将享受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快乐，我要把这块裹尸布撕得粉碎粉碎，让别人无法利用。我将做一个人；我将要走得很远，尽可能的远；我要想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既然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是举目无亲，也没有保护人；您是我认识的最不寻常的人，您自愿地藏在一个窄小阴暗的房子里，栖身于一个跟您的思想觉悟格格不入的教堂……贫困吓不倒我；一个人曾经以每天七雷亚尔的收入充当上帝的代表，他也能面对饥饿。我将当工人；如果需要，我将种地；我将从事任何工作，……但是，我将是一个自由的人。”

两个朋友在回廊中散步，加夫列尔一面给堂马丁提出忠告。在确定他应该去往何处时，他的选择在于巴黎和美洲那些最缺少移民的共和国之间。

傍晚时分，加夫列尔送别了他的弟子；钟楼人在下回廊等他，以便关闭教堂的门。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小教士伤感地说，“您将在这里，在一个您并不相信的上帝的家里度过您的余生。”

“是的，我将在这里死去。”加夫列尔微笑着说，“这位上帝和我，我们俩相互憎恨，然而，好像是，没有我他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他要到街上去，得由我给他引路，晚上也是我在看护他的财富……马丁，祝您健康，走运。希望您成为一个不气馁的人。为真理而受苦是很值得的。”

主管修女教士的消失，没有引起轰动。堂安托林和其他神甫们以为，这青年人是抱着雄心去马德里的，他要参加候选神职人员的队伍。加夫列尔是唯一知道堂马丁真正目的地的人。此外，不久一个惊人的好消息使人们忘记了那个青年教士，这消息如一声惊雷回荡在大教堂，使得唱诗班的先生

们、圣器室的小人物和上回廊的全体居民激动不已。

大主教和教士会之间的争执已告结束。罗马赞同大主教的一切做法，主教大人在他的宫里欣喜若狂，大声吼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他无所顾忌的情感冲动。

受俸神甫走进唱诗堂时，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似乎既羞愧又害怕。

“可是，您看到了吗？……”在圣器室更衣时他们彼此这样说。

他们穿上飘动的长袍，迅速离开教堂，各走各的路，避免形成一个集体或小组，每个人都注意摆脱责任，表明自己丝毫没有和大主教的敌人同流合污。

塔托看到唱诗班的先生们惶恐不安地四散离去，高兴地笑了。

“你们快跑吧，快跑吧！大爷会狠狠敲你们！”

人们都在筹备历年八月中旬的萨格拉里奥圣母节大庆。在大教堂里，一些人怀着神秘感，一些人怀着惶恐的心情在谈论着有一年的这个节日，仿佛都在等着看会发生不同凡响的事件。大主教阁下为了不见教士会的成员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到教堂，节日那天他将亲自指挥唱诗班。他想从近处看看他的仇敌，以他的胜利来压倒他们，看看他们那种羞愧屈从的复杂的表情，幸灾乐祸一番。随着宗教界隆重节庆日益临近，许多受俸神甫想到脾气暴躁的大主教会用严厉又傲慢目光看着他们，心里就直打鼓。

加夫列尔很少关注教士界的种种顾虑。他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为累人的值夜班养精蓄锐，因为现在就他一个人值夜了。菲德尔先生生病了，为了

让财务管理处节省开支又不让这老人失去他可怜的薪水，加夫列尔没有提出要求增加一个新伙伴。他在大教堂里依然平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仿佛他就在上回廊一样，因为他已习惯于那墓地般的寂静。为了不睡着，他借着灯光，阅读在丁子香园能够找到的书籍：乏味的历史文集，文集中总是上帝演主角；圣徒们生平故事，他们的幼稚、轻信和近似怪诞可笑的特点，让他读来也引人入胜；还有他们卢纳家族的那本《堂吉珂德》，他自幼就逐字逐句地读过许多遍，而且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一点童年清新的回忆。

圣母节到了。今年的节日和历年一样。著名的圣像被请出小教堂，连同它的底座安放在大祭坛的一个位置上。她披着保存在珍宝室的斗篷，她身上缀满的珠宝在丛丛蜡烛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恰似一个笑逐颜开的颤动的光谱。

节日仪式开始前，大教堂中那些看热闹的人，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漫步在唱诗堂和“赦罪门”之间。受俸神甫们身穿红袍聚集在被著名的宝光石照得通亮的小楼梯附近。大主教阁下将从那里走下来，唱诗班的先生们怯生生地聚集在那里，交头接耳地交谈着，好像在互相询问会发生什么事情。

执十字架的侍童出现在第一节阶梯上，他把两边有横木的十字架平举着前进，以便通过门。然后，在侍从们的簇拥下，身穿紫色长袍的大主教往前走，身穿棕色长袍的助理主教跟随其后。红衣主教的长袍使受俸神甫们的紫红色的法衣黯然失色。

教士会的成员们站成两排，低着头，向枢机主教致敬。堂塞瓦斯蒂安的目光是什么样的目光！受俸神甫们低垂着

头，微躬着腰，自己都觉得在后脑勺上感到了那冰冷锐利的目光。他带着潇洒傲慢的神情，挺直起他那裹在紫袍下的巨大躯体，仿佛在那时刻，他感到，让他内脏瘙痒难受的疾病已经治愈，压迫他肺部的心肌能不全已经好转。他兴奋得那肥胖的面孔在微微颤抖；他下巴的层层垂肉在短袖法衣的丝织花边上颤动。戴在他那颗又白又红润的小脑袋上的枢机主教红色四角帽，似乎也因狂妄傲慢显得惟我独尊。任何一顶王冠都没有今天戴的那顶红色四角帽那么高傲。

他伸出一只带着紫红色又透出主教翠绿的手套的手，用一种威严的姿势招呼全体受俸神甫一个接一个地吻他的手。这是教会人员的顺从，是从神学院时期起就习惯的一种表面的谦卑，但这种谦卑掩盖着仇与恨，其强烈程度鲜为世俗人所知晓。红衣主教猜测着在这种厌烦心情下的沮丧，并品味着他的胜利。

“你不了解我们的仇恨有多大。”有几回大主教曾对他的花匠女友说，“在世俗人中间，很少有人气死。生气的人会自我宽解，并恢复平静。在教会中，有很多人由于不能报复，一气之下而死去，因为教规封住了他们的嘴，摧毁了他们的头脑。由于无家无业，不为糊口操心，我们中大多数人员是为了自尊心和骄傲心而活着。”

教士会组成了游行列队，陪伴着大主教阁下。穿红衣的打狗人、穿黑衣的执杖人和“银权杖”开道，“银权杖”一边用他的银杖敲得地砖笃笃响。然后是大主教的十字架和一对一对受俸神甫，走在队伍最后的是身穿紫色长袍的大主教，他的红色袍裾拖展得很长，由两个侍童提空着。堂塞瓦斯蒂安大主教向两旁的人频频祝福，用他那双深邃有神的眼

睛看着那些微低着脑袋的信徒。

他那专横的性格和胜利的喜悦使他眼睛神采飞扬，多伟大的胜利呀！教堂就是他的家，在长时间离开之后，他带着一个绝对的主人的威严又回到了教堂，这种威严能压倒那些敢于攻击他的说坏话的奴仆。

在他看来，此时此刻教会从来没有那么光荣。多么令人敬慕的机构呀！身居高位的强人会成为一个万能的和令人敬畏的上帝。绝对没有任何有害的和革命的平等。大人物总是正确的。教义赞颂众人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但是，在树立榜样的时候，教义总要说到那些羊群和应该指引羊群的牧羊人。他是牧羊人，因为万能的上帝要他成为牧羊人。企图离群的羔羊会多么不幸呀！……

在唱诗堂，他的傲慢给他带来的快乐更使他满心欢喜。他坐在托莱多历届大主教的宝座上，这宝座从他青年时代看来就明星般耀眼，在他任主教的整个时期，他始终惦念的宝座。那时他作为主教巡视各省，企盼着当上大主教这一时刻的到来。他直着身子，在蒙特塔博尔华盖下，站立在有四个台阶的阶梯上，为的是让唱诗班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他，并确信他是他们的枢机主教。坐在他边上的高级教士的脑袋几乎和他的脚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如果他们胆敢再起来咬他最隐秘的情感深处，他可以像踩毒蛇一样地践踏他们。

在他欣赏他的权势和胜利的激情支配下，依照各项宗教仪式的礼仪进程，他总是第一个站起来或坐下去，并且和唱诗班齐声唱起来，他那粗犷有力的歌声使众人惊愕不止。从他口中说出的拉丁语，像是射向那些可恨人群的弩炮；他的眼睛带着挑战的表情扫视着两排低垂着的脑袋。

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步步高升，但是，他从来没有感受到此时此刻他所感受到的如此深刻和完美的满足。他自己都对他的愉快心情，对他那种突发的、减轻了他的慢性病的骄傲感到惊讶，似乎他正在这几个小时内耗掉他生命的全部储备。

弥撒结束后，唱诗班的歌手和其他普通成员是唯一敢于看他一眼的人，他们看到他脸色苍白，双手捂着胸口，面部表情异常地站起来。这时，他们都惊慌失措。受俸神甫警觉起来，便向他跑去，在他的座位前形成了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密密的人圈。大主教阁下在憋气，在情不自禁地向他伸出的一圈手中间挣扎着。

“闪开！让我透透气！”他吼叫起来，“让我透透气！……你们都给我走开！把我送回家去！”

尽管他还处在痛苦中，但仍做出一个有力的手势并发出一个老兵击退敌人的誓言。他感到窒息，但他不想让神甫们看出来。他猜想到他们中许多人痛心的表情后面是高兴。谁也别碰他！他自己行！他靠两个忠实的侍从扶着，气喘吁吁地向大主教楼梯走去，后面跟着教士会的大部分成员。

宗教仪式匆匆收场。愿圣母宽恕；来年会办得更加隆重。当局代表人物和嘉宾都离开了他们在主祭坛上的座位，到大主教宫去打听消息。

午后加夫列尔睡醒时，大家都在上回廊里议论大主教阁下的健康状况。他哥哥向从大主教宫回来的托玛莎姨妈问问情况。

“他要死了，孩子们。”女花匠说，“这回他逃不过去了。堂娜维西塔从远处哭着这么向我表示。他不能躺下。他的胸

部像一只漏气的风箱一样起伏鼓动。医生们说他活不到晚上。多么不幸呀……又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

人们以悲哀的沉默接受了枢机主教病危的消息。丁子香园的女人们在大主教宫和上回廊之间来回传递消息。小孩子们被幽禁在家里，如果他们企图到游廊里玩，就会受到母亲的威胁恐吓。

然而，一向对大教堂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的教堂乐师，也出来了解有关大主教阁下健康状况的消息。他有一个计划，吃午饭时，他简短地和教堂仆役们说了。在一位红衣主教的葬礼中，应该做一次出色的弥撒，从马德里请来一个大乐队。他选好了莫扎特著名的“安魂曲”。这是他关心大主教命运的唯一的一件事。

加夫列尔看着他的侄女，感到一种活着的人在强者死去时所感受到的令人舒适的自私心。

“萨格拉里奥，伟人们在陨落。而我们，我们这些病人和可怜人还能活些日子。”

在大教堂关门时，他便下去守夜。钟楼人拿着钥匙在等着他。

“红衣主教怎么样了？”加夫列尔问。

“他的死也就在今天了，如果不是已经死了的话。”然后，他补充说：“加夫列尔，今晚你可灯火通明。大祭坛上的圣母像周围都是蜡烛，要一直点到明天。”他沉默了片刻，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也许，”他补充说，“我会下去陪你一会儿。你一个人一定会感到厌烦。你等着我吧。”

当加夫列尔被关在教堂里时，他看到大祭坛的一部分烛

光闪闪。他习惯地察看了各个大门和栅栏门；他看了看“洛孔”走廊以及过去那曾是一些窃贼藏身的大厕所。当他确信在大教堂里只有他一个活人时，他带着毯子和晚餐篮去坐在交叉道口。

在那里，他待了好一会儿，透过栅栏观赏着萨格拉里奥圣母。他出生在大教堂，自幼母亲带着他去跪拜圣母像，所以他把萨格拉里奥圣母当做美的最完美的典型而崇拜。现在他以艺术家的眼光冷静地欣赏着她。她像所有有钱的女人的形象一样的丑陋和怪诞。奢华和富有的慈悲心加上她的珍宝饰物把她包装了起来。在她身上没有一点基督教艺术家绘制的圣母像的理想主义。她更像一个挂满了首饰的印度斯坦偶像。裙子和披肩用裙撑等衬里扩张起来，头饰上又加了一顶王冠，大得像带檐的头盔，使她的脸显得很很小。黄金、珍珠和钻石在她的服装上显出珠光宝气。她还带着贵重的耳环和手镯。

当加夫列尔想到宗教愚蠢地按尘世的风尚去给天国的英雄穿戴，不禁微微一笑。

晚霞的微弱余晖从大窗子上往下落，不停跳动的蜡烛火忽明忽暗地照映在圣母像的面上，仿佛圣母在扮怪相。

“我还是我！……”加夫列尔自言自语道，“假如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就会认为圣母一会儿在笑，而后又在哭。只要有一点想像力和信仰，这就成了一个奇迹！光线的变幻莫测是神甫们的一个永不枯竭的宝藏。昔日的维纳斯女神也不断变换她的脸部表情，如同一个基督的形象，根据她的信徒的喜好，她时而在哭，时而在笑。”

对这种奇迹他想了好久，这种奇迹就创造了所有各种宗

教，这种奇迹和人类的愚昧和轻信同样古老久远。

天黑了。加夫列尔有节制地用了点晚餐之后，便打开他在篮子里带来的一本本书，借着他那盏灯的光亮读了起来。那些夜间出沒的难看的鸟群，在林立的蜡烛不同平常的光线的吸引下盘旋飞翔，鸣叫着。鸟的飞动和叫声让他分心，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看。时间过得很慢。钟上武士们银铃般的锤击声回荡在漆黑的拱顶下。加夫列尔站起身，在整个教堂走一圈，察看察看标志他守夜巡视的时钟。

在钟敲过十点的时候，加夫列尔听到圣卡塔利娜大门的边门打开了，但是开得既快又不费力气，似乎是用钥匙打开的。加夫列尔想起了钟楼人允诺的话。然后，响起了几个人的脚步声，由于脚步回声显得很大，似乎是一支队伍在行进。

“谁？”加夫列尔有点吃惊地喊了一声。

“老兄，是我们。”在阴影处响起了马里亚诺的阴沉的应答声。“我不是对你说过我们要下来吗？”

当他们进入交叉道口时，大祭坛的烛光直接照亮了他们。加夫列尔看到和钟楼人一起来的还有塔托和鞋匠。为了让他值夜不那么沉闷，他们想来陪他过半夜，而且带来了一瓶白酒和他共饮。

“你们知道我不喝酒。”加夫列尔说。“我从不喜欢喝白酒；就是葡萄酒，也不多喝。但是，你们穿得好像过节似的，你们要到哪儿去？”

塔托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银权杖’九点钟就要关上丁子香园的大门，他们几个想在外面过夜。他们已经在索科多维尔大街的一家咖啡馆待了好一会儿了，像爷儿们一样地

娱乐了一阵。他们成了几个浪荡子。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由于大主教的事，托莱多城也变得人心惶惶。”

“大主教后来怎么了？”加夫列尔问道。

“我想他在半小时前死了。”钟楼人说，“在我上我家去取钥匙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医生从大主教宫出来，他对一位受俸神甫这么说的……咱们都坐下吧！”

他们大家就在大祭坛栅栏的台阶上坐下，头上的帽子戴得很低。马利亚诺把一串钥匙放在地上，这一串铁钥匙就像一把铁锤。这些钥匙中各个年代的都有：有一些既粗糙又锈点斑斑，带着锤子敲打的痕迹，在钥匙把附近明显的有徽记标志；另外一些比较现代，磨得溜光锃亮，仿佛是银的；但是，所有这些钥匙都很大，很重，齿很粗，和这座伟大的建筑相匹配。

三个朋友好像特别高兴，一种紧张激动的兴奋，以致互相推搡着，嘻嘻地笑着。他们斜眼看着圣母像，然后用一种加夫列尔不可能明白的神秘的表情相互对视着。

“你们喝多了，是不是？”加夫列尔微带责备地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你们都知道，喝酒是穷人的堕落。”

“叔叔，过一天是一天。”打狗人说，“大人物死了让我们高兴。您知道：我曾一向敬重大主教阁下，但是都见鬼去吧！一个穷人唯一能够高兴的是看到上层人也有这一天。”

“喝吧，”钟楼人把酒瓶递给他，“我们能健康、快乐地在这里相聚，是一种幸运，而大主教阁下明天将要躺在木板盒子里了。我们会使劲地敲一天钟！……”

塔托喝了一口，把酒瓶递给鞋匠，鞋匠长久地把嘴贴在酒瓶上。在三个人当中，看来就他醉得最厉害。他两眼通

红，眼睁睁望着四周，一声不吭地待在那里。只有别人对他说话时，他才勉强微微一笑，似乎他在想着很远很远的的事情。

相反，钟楼人倒比往常更加能说。他讲到大教堂的财富，堂娜维西塔将会多么有钱，还讲到那天晚上，教士会的许多人会多么高兴。他只有在举起酒瓶时才停下来不说话，然后把酒瓶传给他的伙伴们。在充满香烛烟雾的空气中，扩散着酒气。

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马利亚诺几次打断谈话，似乎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说，可是又犹豫不决，缺乏勇气。最后终于下决心说了：“加夫列尔，时间在过去，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话要说。现在是十一点刚过一点。还有几个小时足可把事情办好。”

“你要说什么？”加夫列尔奇怪地问。

“长话短说，我们就开门见山。这是一件你发财，我们也发财的事。我们想摆脱这种贫困……你早就已发觉我们都躲着你。在很高兴听你谈话的同时，我们还喜欢在我们之间说说话。你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事情来说，你一文不值。跟你可以学到东西，可是摆脱不了贫穷……几个月以来，我们都在想，必须及时一搏。你对我们所说的那些革命离得太遥远。我们的孩子辈能够看到，也许他们也看不到。有学问的人考虑未来的事情是好的，但是，像我们这些粗人只着眼于现在。我们用了好多时间琢磨了些荒唐的事！绑架堂塞瓦斯蒂安，向他索要一百万赎金，在一个晚上进入大主教宫，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这一切荒唐行为都是你的侄子想出来的。但是，今天上午，当我们在我们家

抱怨贫困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了出路。你是大教堂唯一的守夜人，圣母就在大祭坛上，她佩带的珠宝首饰，一年中其他时间都保存在珍宝室，大教堂的钥匙在我手里……这是世上最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我们把圣母像的珠宝首饰统统拿走，然后我们去马德里，天亮时我们就到了。塔托认识那里的许多业余斗牛士；我们在那里藏一段时间，然后，你熟悉世界各地，你来给我们领路。我们去美洲，卖掉那些宝石，我们就成了有钱人。加夫列尔，站起来！我们去剥夺那尊偶像，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原来你们向我建议的是偷窃呀！”加夫列尔惊呼道。

“偷窃？”钟楼人说，“你愿意，你就这么说吧，那又怎么样！你吓怕了？……他们偷我们的更多，我们生来就有权利占有世界上一小块土地，可我们转来转去却没有找到一个自由的地方……再说，我们这样做会损害谁呢？这块木头上挂满珠宝首饰对它毫无用处。它既不吃饭，冬天也感不到冷，而我们是一些穷苦不幸的人。加夫列尔，你看到我们穷苦，你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饿死在妈妈的怀里，而那些偶像却满身佩带着金银财宝……干吧，加夫列尔，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来吧，叔叔，”塔托说，“拿点勇气出来。请您相信，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在关键时刻也会出谋划策的。”

加夫列尔没有再听他们的。这意外使他陷入了沉思。他惊骇地在思忖他犯下的巨大错误。他发现，在他和他认为是他的弟子的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他想起了他哥哥的话。呀，这就是天真的人的好心！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没有预见到在几个月当中把需要一辈子去思索和探讨的东西教给无

知的人会产生危险。在受到革命鼓动的人民中所发生的事情，也会在小范围内重演。最崇高的思想经过平庸之辈的筛选也会变质；宏伟的愿望会被愚昧和贫困的沉渣所毒害。

由于受剥削而沾染恶习的人一旦醒悟，会从救世学说中寻找报复过去的办法和自私的利益，哪怕是要以牺牲他们同类为代价。

他已经在沉睡在两个世纪前的处境中的教会的贱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以为他为未来的革命做出了贡献，培养了人才，而当他从梦想中醒来时，看到的却是些无知的罪犯。多么可怕的失望呀！他的思想仅仅有助于破坏。他给那些迷惘的头脑清除了愚昧的偏见和奴隶的迷信，他只做到了使他们大胆干坏事。自私是在他们身上唯一活跃的激情。他们仅仅学到了他们是穷苦的人，而他不应该是穷苦的人。他们那些不幸的同伴们——人类中大多数贫困又悲惨的人们——的死，他们不感兴趣。无论如何，他们要摆脱现状，改善他们的境况；至于世界是否仍然如旧，至于为了保证上层人的舒适生活，下层人普遍地在流泪哭泣，遭受痛苦，忍饥挨饿，这些对他们都不重要。他们在他们当中播下了自己的思想，想提早收获。正如人为地强化的农作物，虽然生长得奇快，但只能结出变质的果实，他的宣传的结果是道德的败坏。像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毕竟是人！人类中的猛兽不惜牺牲同类以寻求自己的幸福！只要能享受一生短暂的富足，宁愿让别人永远遭受混乱和痛苦！呀！哪里能找到高尚的人？哪里能找到一个因信仰公理而崇高，做好事而不求回报，为人类的团结一致而牺牲一切，使未来美好的上帝般的人呢？

“行了，加夫列尔，”钟楼人继续说，“我们别浪费时间。

就一会儿的事，然后，一走了事！”

“不。”加夫列尔摆脱沉思后坚定地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向我建议的是盗窃，当看到你们要我一起干这种事，我非常痛心。别人偷盗是由于他们天性的本能或心灵的堕落；你们之所以走这一步，是因为我想启发你们，是因为我试图启开你们的智力，认识真理。啊！真可怕！太可怕了！”

“但是，加夫列尔，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呢？那不就是一段木头吗？我们拿下它的首饰会损害什么人呢？难道那些富人和有产者不都在偷盗吗？我们为什么不该学他们的样呢？”

“就因为这个，因为你们企图做的是学坏样；因为它会再一次使产生贫困的暴力和混乱的制度永远存在下去。如果富人剥削穷人的行为和你所做的仅仅是为了你（请你听清楚），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大众，去霸占一件东西的行为别无二致的话，那么，你为什么恨富人呢？我不惧怕偷盗，因为我既不相信财产，也不相信事物的神圣性；但是，正因此，我对私人占有深恶痛绝。我反对私人占有。你们占有这些是为了什么？你说的是为了弥补你们的贫困。这不是真话，是为了做有钱人，是为了进入特权集团，是为了使那个可恶的少数人，那个奴役别人而享受财富的少数人增加三个人。如果托莱多所有的穷人揭竿而起，激怒地来敲大教堂的大门，我会为他们开路，我会亲自指引他们，向他们指出你们所垂涎的那些珍宝，并且对他们说：‘你们拿走吧！’。这些是他们的先辈流出的血汗，代表了在领主土地上的奴隶般的劳动，是国王的税吏的野蛮的掠夺，以便使国王和权贵们能

够给为他们打开通向天国大门的偶像缀满珍珠宝石。这些东西并不因为你们胆大包天而属于你们三个人，它们属于所有的人，正像地球上的财富属于所有的人一样。人们为世界万物出力是神圣的事业，是未来的救世的革命；现在几个人想根据现行道德观念占有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对于资产阶级的法律而言是一种犯罪，在我看来，是对被剥夺的贫穷人，即现有财富的惟一主人的一种侵犯……”

“住嘴吧，加夫列尔。”钟楼人强硬地说，“如果我让你说下去，你会一直说到天亮。我听不懂你的话，我也不想听。我们来是为了帮你的忙，你别跟我们进行说教。我们希望看到你和我们一样富有，而你对我们的回答是谈论别人，谈那些你不认识的人，谈那些在你像一条狗似的到处流浪时连一块硬面包都不曾给你的人类！我不得不像我们青年时代打仗的时候那样来指导你。我一向喜欢你，敬佩你的才智，可是，必须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地对待你……加夫列尔，闭上你的嘴，跟我们一起干！我们将把你带向幸福！上，伙计们！”

塔托和鞋匠站起来，并向大祭坛的栅栏走去。打狗人用力推一扇栅栏门，刚开了一点儿。

“不行！”加夫列尔使劲大声喊道，“你们给我站住……马利亚诺，你不知道你在做些什么。你们以为占有这些财宝，你们就得到幸福了？往后呢？你们的亲人都在这里。塔托，想想你的母亲。马利亚诺、鞋匠和你都有老婆，有孩子。”

“呸！”钟楼人说，“等我们远离这里而且平安无事，他们会找我们团聚的。有了钱什么都能办到，重要的是要有

钱。”

“那你们的孩子会怎么样？人家会对他们说，他们的父亲是贼！”

“但是他们会在另一个国家成为有钱人。总之，他们的人生历程不会比其他富人的子女差。”

加夫列尔确信，鼓励那几个人的决心已铁定。他要阻止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马利亚诺看到加夫列尔站在他和大祭坛之间，就用力地去推他。

“让开，小子。”他说道，“既然你毫无用处，就让我们进去。难道是你害怕圣母？你放心，即使我们把她所有的一切都拿走，她也不会显灵。”

加夫列尔试图采取决定性办法。

“你们什么也别干。假如你们越过栅栏，你们进到大祭坛，我就拉响铃，十分钟之内，托莱多所有的人都会守在各个大门口。”

他打开唱诗堂的栅栏，怀着制止住钟楼人的决心进入唱诗堂。

惟有鞋匠一个人，像一个郁闷的醉鬼，随他走了进去。

“那我子女们的面包呢！”他含糊不清地咕哝说，“他们想偷抢我的子女！……想让他们继续受穷……”

马利亚诺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他看到，鞋匠手中举着一串落在栅栏的台阶上的钥匙，然后又听到一种奇怪的撞击声，似乎是在敲击某种空心物体。

加夫列尔大叫一声，便摔倒在地上。

鞋匠继续敲打他的头部。

“别再打他了！……你给我住手！”

这是躺在唱诗堂入口处的加夫列尔最后模模糊糊听到的几句话。一种黏稠、热乎乎的液体流过他的眼睛。然后是一片寂静、黑暗……什么都没有了。

他思想的最后一闪念就是要对自己说，他要死了，也许他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生命的最后的跳动，一个永逝的生命的动荡不定的余波。

他又活过来了。他吃力地睁开双眼，通过一个带有铁栏杆的小窗户看到了太阳，四壁白色的墙和一张铺有肮脏的细纱印花床单的床。他觉得头很沉。经过极大的犹豫不定和挫折之后，他的思维还能形成和理出个印象：有人把大教堂放在他的太阳穴上。巨大的殿堂坠落在他的脑袋上，把脑袋压扁了。疼痛至极！……他不能动弹：他头痛得要裂开了。耳朵嗡嗡作响；舌头僵硬。眼睛只能模糊地看到一些东西，仿佛太阳光变得浑浊不清，一层红色的雾气笼罩着物体。

他相信，一张长着小胡子、戴着宪警帽的脸贴近他的脸，望着他的眼睛。那张脸翕动着嘴唇，但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毫无疑问，那是过去迫害他的噩梦重又出现。

当人们注视他时，看到他在睁开眼睛。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先向他的床走去，他后面跟着另外两个胳膊下夹着纸张的人。根据他们嘴唇的动作他猜想，他们在和他说话，但他什么都没听见。他已到了另一个世界？难道他的信仰是假的，在死后还会存在另一个和他已经抛弃的生命一样的生命吗？……

他又倒在黑暗中，呆滞不动。过了好久……好久。他的眼睛又睁开了，但是，现在的雾气更浓重，但已不是红色

的，而是黑色的了。

在这些重重雾帐之中，加夫列尔相信他看到了他哥哥的脸，那是一张害怕、惊恐不安、痉挛的脸，几个戴两角帽——那种噩梦般的帽子的宪警团团围住了可怜的“木权杖”。然后，是更加模糊不清，更加憧憧不定的萨格拉里奥的脸，她用饱含着极度悲痛的泪水的双眼望着他，用目光亲吻他，她周围那些黑黢黢手持武器的人并没有吓倒她。

这是他最后看到模模糊糊、憧憧不定的形象，仿佛是在瞬息即逝的火花的闪光下看到的。然后是永久的黑暗，毁灭了……化为乌有。

在他永久地闭上双眼的时刻，他身旁响起了一个声音：

“我们一直在跟踪你，狡猾的家伙。你隐藏得很好，但你还是由于又一次犯罪而暴露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你怎么交待圣母的那些珍宝……你这个小贼！”

上帝和社会秩序的可怕的敌人没有向那些人做任何交待。

第二天，他被抬出了监狱的病房，消失在公墓中。他死亡的秘密由大地保守着，这位双眉紧锁的母亲无动于衷地目睹着人间种种斗争，她知道，伟业和野心，贫穷和疯狂必将在她的腹中腐烂，其结果只能孕育生命的更新，如此而已。

一九〇三年八一九月

于马尔瓦罗萨海滨（巴伦西亚）

译 后 记

《大教堂》成书于二十世纪初。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萨贝尔彻底战胜摩尔人在西班牙长达八百年的统治，胜利结束了光复战争，实现了西班牙的统一。同年，在伊萨贝尔女王的支持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此后近四百年间，西班牙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和宗教势力，牢固地统治着拉丁美洲，从那里掠夺了大量黄金和其他财富，成为显赫一时的强国。直到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国力日衰。所以，在二十世纪初，西班牙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的矛盾日益加深。《大教堂》集中反映了长期统治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的全面危机。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选择了西班牙天主教的摇篮——托莱多大主教教堂为背景。托莱多大教堂历史上为西班牙首席大主教驻地。当年，天主教双王的婚礼就是由托莱多大主教主持的。教堂的建造从一二二六年隆重奠基起，延续了二百余年，直至十八世纪仍陆续增加一些新的工程。建筑风格丰富多彩，既有西班牙、哥特式的，也有阿拉伯、穆德哈尔式的，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它是世界上最宏大的天主

教堂之一，其中央大厅高三十三米，地面长一百二十米，宽六十米。教堂内有几个世纪来西班牙及西欧国家著名建筑大师、美术家、雕塑家的作品，许多是传世之作，还有其他手工艺工匠们的精心杰作。可以说托莱多大教堂是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的主人公加夫列尔出生在世代以大教堂为家的家庭，由于天资聪颖，很有希望在天主教会步步高升。年轻的加夫列尔在周游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后，又回到死气沉沉的大教堂。他在大教堂内仍然在下层穷苦人中宣传他的先进思想，结果反被急欲改变他们贫困状况的他的弟子们所害。布拉斯科通过主人公之口，从政治、历史、经济、科学、音乐、艺术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天主教的腐朽没落和西班牙的社会现实，其中不乏作者寻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各种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等先进思想，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进步倾向，这也是布拉斯科许多作品共同特点。

最后，我们想说明一点，小说涉及西班牙天主教史和西班牙历史、建筑学、音乐、天文等诸多领域，翻译中我们尽可能查阅有关图书资料，并得到了巴勃罗·比拉迪乌·伊利亚斯和莫妮卡·佩雷·比加斯两位西班牙专家的热情帮助（在这里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限于我们的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译 者

二〇〇二年四月于北京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大教堂

作者=（西）比森特·布拉斯特·伊巴涅斯（V i c e n t e B l a s c o I b a n e z）著；汤柏生，吕臣重译

页数= 3 2 0

S S 号= 1 2 5 6 9 1 9 0

出版日期= 2 0 0 2 . 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